吴觉纪念文集

序

钱正英

《吴觉纪念文集》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为它展示了一位有理想、有才华而又历经坎坷的共产党员，如何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在各种艰辛复杂的条件下，坚持为真理而斗争的光辉历程。

吴觉同志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4年逝世。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而吴觉同志几乎在每个阶段都处在斗争的第一线，经受了一个又一个的严峻考验。他受过大学教育，抗战前坐过牢，抗战时打过仗，建国后领导过建设，在“左”倾思想下，受过不公正的党纪处分，以后又久病缠身，主持过高等学院的工作。他的丰富阅历锤炼成他那特有的气质。李一氓同志曾赠他一副生动而深刻的对联：“主人颇有江湖气，坐客能谈山海经”。人们正是从他那豪迈爽朗的“江湖气”中，感受到坚贞内涵的革命理想，在他那玩世不恭的“山海经”谈笑中，体验到为真理而斗争的不屈意志！

我初次见到吴觉同志是1950年秋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同志的办公室。当时，曾山同志负责组建治淮委员会，会址设在安徽省蚌埠市，主任由曾山兼任，副主任由豫、皖、苏三省领导兼任，下设办公厅、工程部、政治部、财务部。吴觉同志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万金培同志任财务部长，汪胡祯同志任工程部长，我辅助汪任常务副部长。吴、万和我都是淮委党委委员，吴任副书记。曾山把我们三人找到他的办公室，通知了上述决定，咐嘱我们充分支持汪胡桢同志，并共同承担淮委的日常工作。我们三人过去素不相识，战争期间工作在不同的地区，个人经历不同，风格更大不相同。淮委的三大部分设在蚌埠市的三个地方，各有一套机构，在省以下的各级治淮指挥部，还有各自的系统。如果三大部的工作不协调，将造成互相制约和无尽扯皮。但在吴觉同志主持下，大家团结得非常好，真正做到坦诚相处，和衷共济。当时的蚌埠，只是一个小城镇，条件相当艰苦，但是上上下下，一心扑在事业上，精神蓬勃，工作愉快。至今许多老同志在回忆当年岁月时，仍感乐在其中。这当然首先是由于建国初期的社会风尚和大家的觉悟，但吴觉同志确实在当时起着极为重要的核心作用。治淮初期，除了繁重的业务工作外，我们面临两个最大问题是：如何团结好大批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好上、中、下游的水利矛盾。我们几个驻会的党委委员分析了当时的治淮形势，一致认为，团结好知识分子，是开展治淮工作的关键，而处理好水利矛盾，又是团结三省共同治淮的核心问题。由吴觉同志起草，淮委党委通过了关于团结知识分子的决定，这对端正各级领导的指导思想，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对于水利矛盾，由于涉及各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处理的难度很大。我们虽努力从全局出发，仍难免受到各种误解。我是负责工程的常务副部长，更成为矛盾的中心人物，可称为“众矢之的”。1952年，由于淮河发生内涝灾害，受到一些人的严厉指责。在中央和华东局的主持下，吴觉等同志仗义执言，才澄清了是非。经组织决定，将我调回华东水利部。但是厄运接着落到了吴觉和万金培同志身上。万金培同志被调到地方，并在以后挨了整。吴觉同志留淮委主持工作，遇到越来越大

的困难，以后竟被诬陷有历史问题，甚至被怀疑有反革命活动，而受到极不公正的党内留党察看处理。当时已调中央工作的谭震林和曾山同志，虽然对吴觉同志很了解，但由于伪证很难一时搞清，又无法改变结论。最后谭震林同志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向水利部党组交代，吴觉同志在历史上有贡献，即使受到了严厉的处分，也可担任重要工作，并决定将他调到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任副局长。此后不久，在“左”的错误下，淮委整个被撤销。

吴觉同志来北京谈工作时，我为他感到不平，更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愧疚。他却很豁达，他告诉我，有些历史情况很复杂，自己当积极为组织提供资料，以便弄清问题，他到三门峡后，虽然处境困难，身体不好，仍勉力工作，克尽职守。我去工地时，他正患着哮喘病，我要他静卧休息，但他坚持要陪我视察工程。当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地上坡下坡时，我感到的是一颗热烈跳动的纯洁的共产党员的心！

以后，由于身体实在不能适应三门峡的工作，他被调回原籍江苏。“文革”期间，他受到更大的迫害，但他始终坚持原则，拒绝参与任何派性斗争。粉碎“四人帮”后他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水利部重新组建淮委时，我们建议由吴觉同志任水利部副部长兼淮委主任。但江苏省委要求把他留在南京，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我和当时的江苏省长惠浴宇同志就吴觉同志的去留进行“谈判”。他向我说明，南工在“文革”期间遗留问题很多，工作难度很大，经省委再三研究，认为吴觉是最佳人选，希望水利部予以照顾。最后我们两人商定，尊重吴本人的意愿。从一般人看来，吴觉同志如去淮委，工作驾轻就熟，比较容易，如果去南工，人地生疏，一切要从头做起。但是吴觉同志权衡后，却选择了南工。他对我说，由于他患哮喘病，不能多去野外，恐怕误了治淮工作，学院虽然工作繁重，但多在室内，还可勉为其难。他的抉择又一次显示了一位共产党员的胸襟。

他去南工后，我从教育部的同志处了解到，大家对他的评价很高。他以共产党员的诚挚开朗，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信任。随着工作局面的打开，他又辞去院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虽然疾病缠身，他仍坚持岗位，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和吴觉同志 30 多年的交往中，我一直把他看成同志、兄长，并受到很多教益。我相信，许多同志又将从这本书中，看到真理的力量，看到共产党员的品格，从而受到教益。

（钱正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水利水电专家，曾任水利部部长。）

目录

目录

序钱正英（1）

传略

吴觉传略（3）

文存

在主力来到之前（19）
土地复查初步总结
（1947 年 5 月）（38）

华中六地委两年来工作总结
（1949 年 2 月 19 日）（69）

在常州地委城工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1949 年 8 月 12 日）（98）

治淮委员会关于第二年度治淮工作的报告
（1952 年 8 月 13 日）（101）

“抗盟”是抗日救亡的进步组织
（1967 年 11 月 4 日）（106）

附：苏北抗日同盟总会
陈扬（108）

同心同德，加快步伐为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而努力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南京工学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1980 年 5 月 28 日报告，5 月 31 日通过）（113）

怀念

记吴觉李锐（135）

吴觉的侠肝义胆陈克天（147）

“赴难有诗啼精卫，慰魂无语吊孤鸾”
——纪念吴觉同志逝世三十周年李广涛（152）

人民治淮的先驱与功臣《治淮》杂志编辑部（156）

杰出的才干高尚的情操
——忆吴觉同志在治淮战线上张柞荫（160）

开辟治淮道路的带头人
——回忆吴觉同志王祖烈蔡敬荀（163）

他应为水利多贡献姚榜义（166）

怀念吴觉同志钱仲韩（170）

蜡炬成灰泪始干
——沉痛悼念吴觉同志杨詠沂（172）

悼念革命前辈吴觉同志管致中刘忠德（174）

我所感知的吴觉前辈朱爱民（176）

追忆王凤山（183）

那些年
——忆父亲吴克坚（188）

永远的思念吴克勤（195）

专题

吴觉与淮河大队柳宏为（205）

坚持就是胜利
——试述吴觉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开辟所做的贡献
成静（209）

吴觉为淮阴第二次解放所作出的贡献刘波（215）

事举而水利兴
——论吴觉对治淮事业之贡献耿宣（223）

拨乱反正除旧布新
——吴觉在南京工学院郭家宁（229）

梅花苦寒香善舞风袖长
——对吴觉同志革命道路的几点感悟马婷（236）

年表

吴觉年表（245）

附录

我的自述（257）

讣告（347）

治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任命录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五十六次政务会议通过（349）

后记（350）

吴觉传略

吴觉，原名吴延恪，又名吴玉，1912 年春生于江苏省淮阴县渔沟农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引湘任过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宿迁中学教务主任、校长等职，一贯同情革命，对吴觉走上革命道路始终抱持着鼓励与支持的态度。母亲何氏为家庭妇女，性情善良。因父亲的薪俸颇丰，吴觉 8 岁时随父母迁入淮阴城内，就读于第六师范附小，接受新式教育。

青年磨砺璞玉初明

1925 年秋，吴觉考入江苏省立师范第九中学。校长李更生是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办学严肃认真，教学内容中充满强烈的爱国精神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使吴觉得益非浅。1927 年 5 月，北伐军进驻淮阴，年轻的吴觉第一次感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刷，开始热情地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去。次年春，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三五研究社”，接触到《新青年》杂志和“创造社”的文艺书刊，启蒙了他报效国家、投身革命的思想。同年参加了驱逐校长的斗争，并为学潮的领头人之一。结果与其他 11 名为首的学生被国民党政府大学行政院（即教育部）通令开除，这次打击使他对国民党政权感到失望。

1929 年春，吴觉到南京入私立正谊中学，同年冬又转赴上海入建设大学附中求学。这个学校是一批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办的，未经当局批准备案，旋即被勒令停办。1930 年秋，吴觉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政治经济系，入校后就参加了校内党所领导的革命学生会，9 月即由吴天木、方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吴觉工作积极，斗争勇敢，经常参加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数次参与捣毁反共反苏的现代书店和放映反共电影的黄金大戏院，多次几乎被捕。其后被选为团支部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休学在家的吴觉联络淮阴城内的一些进步知识青年，组织“国难剧社”，宣传抗日救亡。他结识了当时驻防淮阴的西北军第二十五路军总参议、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宣侠父支持“国难剧社”的活动，以二十五路军总指挥部的名义每月津贴“国难剧社”活动的经费。

1932 年 9 月，吴觉回大夏大学复学，向组织报告了休学一年的详细经过，中共上海党组织经过考察，将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又被选为大夏大学党支部书记。

这时，上海的学生运动因历遭国民党的摧残破坏，正处于低潮时期。上级党要求积极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复苏革命形势。大夏党支部在吴觉领导下，很快发展到 60 多名党员，此外还有几十名共青团员和百余名基本群众。上级党决定以大夏的学生运动来推动整个上海的学生运动，遂将大夏党支部改组为支部局，吴觉任支部局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联盟以英国人李顿爵士为首的调查团，发表了“李顿报告书”，其基调是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并提出以锦州为“中立区”划界停战的荒谬主张。吴觉领导支部局立即发起组织“李顿报告书研究会”，发动学生对李顿报告书进行揭露，参加者达五六百人。这次活动使沉闷许久的学生运动重新出现了生机。

1933 年 5 月 1 日，上海地下党发动群众举行“五一”大示威。吴觉在示威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经上海地方法院转解苏州高等法院。吴觉与同时被解送的四五十名难友，沿途在汽车、火车上，在苏州大街上，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呼喊“打倒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主义”、“收回东北国土”等口号，慷慨激昂，沿途群众无不为之动容。吴觉后来回忆道：“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壮烈激昂的大示威、大游行，是从上海地方法院游行示威直至苏州高等法院，途程有二百多里，尚有国民党法警沿途护卫与开道，真是生平快事。”由于敌人没有抓到他参加示威的确凿证据，加之他父亲延请律师营救，反动当局不得不宣布他无罪释放。

吴觉出狱仅仅 10 余天，又在一天拂晓被两名国民党特务从学校宿舍中逮捕。在这次应付敌人的审讯时他承认了曾经参加过共青团，但咬定仅有两三月即自动脱离了，避开了任何涉及党组织的问题。因此，大夏大学的 100 多名党团员和进步群众，没有一人因吴觉被捕而受到株连。特务们未能得到一丝可资利用的东西，遂交由军事法庭判处他 1 年零 3 个月的徒刑，7 月解送苏州反省院执行“感化”。由于父亲的多方奔走，请托了已进入国民党省政府高层的学生周化鹏等人帮忙，吴觉于 1934 年 2 月获释出狱。

吴觉出狱以后，获知自己已经被大夏大学除名，继续求学已经不能，只好回到家乡淮阴。回乡家居的吴觉仍积极和淮阴城内几位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的同志及学校中的进步学生建立联系，并与淮阴狱中的政治犯管文蔚、谢冰岩等建立了密切的友谊。

1934 年冬，中共淮盐特委书记赵心权等到淮阴，向吴觉宣布恢复他的组织关系，让他负责恢复淮阴党的工作，并在城内安置特委机关。但是不幸再次袭来，1935 年 3 月初，吴觉又一次被捕。在狭小的黑牢里，遭受特务残酷报复的吴觉感染了严重的伤寒病，几乎病死。反动当局无法对其审讯，却以他拒不认罪、毫无悔改之意，判处死刑，呈报省方核准就地正法。

吴觉的父亲得悉，星夜赶往省会镇江，请周化鹏等设法营救。经过周化鹏的活动，省方核准“重新研讯”，并派人将吴觉提解省城审理，后被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1936 年春，再度解送苏州反省院，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了。多次被捕入狱，遭受的种种挫折，不仅没有消磨掉吴觉救民族于危亡、拯民众于水火的革命热情，反而使得他逐步认清了国民党、改组派的反动本质，一次次修正着自己的革命轨迹，最终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走上了共产党所引领的光明道路，并坚定不移地一直走到了最后。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吴觉获保出狱。一番周折后他再次回到家乡淮阴，并秘密购买枪支，准备在淮阴沦陷后组织抗日武装。一回到家乡他就四处去找党，得知淮阴城内已经没有党的组织后，权衡之下，他没有去革命圣地延安，决定留下做组织救亡的工作。12 月初，宋振鼎在武汉接受了董必武、张爱萍“回苏北，自己创造工作，组织抗日”的指示，带着一批抗战宣传材料回到淮阴。看到宋振鼎带回的材料，吴觉、李干成、谢冰岩、夏如爱等一批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召开了座谈会，一致认为，日军即将占领苏北，唯一的出路在于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动员人民群众，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并决定建立“苏北抗日同盟会”，筹办《新声晚报》。大家公推吴觉负责向国民党当局备案。

这时，由于南京沦陷，江苏省政府也迁到淮阴。其时省主席顾祝同在江西，由民政厅长、陆军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代理省主席。吴觉去找时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的周化鹏交涉。周化鹏想利用吴觉等人在青年中的威信及活动能力，成为自己党派斗争的筹码，便邀约吴觉、谢冰岩等到其家中“座谈”。周化鹏借谈统一战线问题歪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鼓吹统一战线组织是“化学性质”的“化合”，各党派要溶为一体，尊奉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吴觉针锋相对地指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各党派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它是物理性质的结合，而非“化合”。如果硬要“溶为一体”，那就不是合作，而是吞并。结果，双方在基本观点上谈不拢，想谋取周化鹏的支持成为泡影。之后，吴觉等经过研究，决定利用蒋桂矛盾，借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压蒋介石嫡系江苏省主席韩德勤。

1938 年 1 月下旬，吴觉与谢冰岩带着士绅朱德轩的介绍信去徐州找李宗仁。李的机要秘书、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夏次叔，代表李宗仁接见了他们。夏次叔是倾向进步的人士，又经过在总动委会组织部担任总干事，掌握组织实权的中共地下党员郭影秋的活动，很快就以李宗仁的名义批准了吴觉他们的请求。郭影秋鉴于当时淮阴是江苏的临时省会，还要求吴觉抓好淮阴县动员委员会的工作，来影响和推动苏北各地动委会工作的开展。因此，又用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委任吴觉、朱公亮等为淮阴县动员委员会的指导员，开展淮阴的民众动员工作。

1938 年春节后，吴觉、谢冰岩从徐州回到淮阴，带回李宗仁的“尚方宝剑”，成立了淮阴民众动员委员会，由进步人士朱德轩兼任主任委员，吴觉任组织部副部长，掌握组织大权。2 月 19 日，“苏北抗日同盟会”在淮阴正式成立，宋振鼎任理事长，吴觉当选为常务理事。吴觉还个人出资以苏北抗日同盟会名义出版不定期刊物，主要翻印延安的出版物，作为发动群众的宣传教育材料。淮阴、涟水、淮安、泗阳、盐城、阜宁、灌云，泰州、南通等 20 余县，都陆续建立了抗盟组织。苏南的江阴、安徽的泗县也和苏北抗日同盟会建立了联系。吴觉还利用淮阴县动员委员会组建了民众抗日自卫队，集训了区、乡干部，建立了抗日青年团和妇女救国会，抗日青年团一度发展到 2000 多人。

韩德勤看到吴觉等人的抗日活动和苏北抗日同盟会的蓬勃发展，想拉拢收买为自己的势力。韩德勤的副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首先出面邀请吴觉“恳谈”，后韩德勤亲自宴请，政治部主任李歧鸣代表韩、李委吴觉为支队司令，要求他在原有组织的基础上扩组“抗日”武装。吴觉坚持两个条件：一是部队一经组建，其发展不受限制，二是所建部队的政治工作必须独立，不受干涉。几经谈判，未达成协议。

韩德勤对吴觉这批人屡次引诱拉拢无效，转而采取限制打击的手段。此时徐州失守，李宗仁部退走，他们更是无所顾忌，首先禁止吴觉等翻印延安出版物，接着秘密监视吴觉的行动，10 月，停发苏北抗盟和动员委员会的活动经费。由于受到严重的限制，抗日同盟会不得不疏散力量，抗日自卫队也多被迫解散。

提枪立马武装斗争

经过了四次被捕的磨难，吴觉深深地认识到没有武装就毫无反抗能力，敌人可以随时随地逮捕你，干革命不能光凭喊口号，要有自己的武装，对国民党不能抱任何幻想。因此最后一次出狱后他就决心搞武装，秘密筹备枪支弹药，决定再也不能毫无抵抗任敌人摆布。与韩德勤决裂后，他加快了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的步伐。一方面他拿出存款，还动员岳母资助部分积蓄，又与张一平、朱公亮等合作商业贸易，筹措发展抗日武装所需的大量经费，委托友人代购枪支弹药；另一方面利用为其父治丧守灵的机会，在族人、亲朋和附近农民中进行组织抗日武装的动员工作，将国民党的一个区常备中队拉在手中。这个中队的中队长吴铁生是吴觉的族叔，到吴觉家吊丧时，吴觉与其作了恳谈，做了真挚的说服工作，又通过拜师收徒，把班排长拉在手中，从而牢牢掌握了这支拥有 100 多人的武装。此外，吴觉还与一些帮会首

领、土匪头目、国民党上海暗杀团的枪手等“三教九流”建立联系，一方面防止这些地头蛇投入敌人营垒，一方面也吸收改造了其中一些人，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1939 年 1 月，中共苏皖边区特委建立了以张芳久为首的中共淮属工委，恢复与开辟苏北党的工作。张芳久到淮阴后，落脚吴觉家中，共商抗日大事。

1939 年 3 月 1 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苏北淮阴等七县，韩德勤的省政府和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吴觉在日军进淮阴城之前，领着张芳久等夤夜赶往其祖居渔沟农村，将已经酝酿筹划好的武装拉起来。不到一个月，组成一支 200 余人的队伍，命名为“淮阴人民抗日义勇队”，成立了总指挥部，吴觉任总指挥，张芳久任参谋长，宋振鼎为政治部主任，张一平为副官长。这支抗日武装刚刚建立，就在渔沟东五条路伏击日军汽车队，打响了淮阴抗日的第一枪。4 月中旬，又在渔沟东南文殊庵奋战一昼夜，打退了淮阴、泗阳两县土顽惯匪韩雄、石海青两股 500 多人的多次强攻。接着，夜袭淮阴城北重镇王营的日军据点，扑灭杨庄、西坝两个伪镇公所，镇压了伪镇长，缴枪十余支。这些战斗提高了抗日义勇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声威。

吴觉领导的抗日义勇队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顽固派严重不安。1939 年仲春，拥兵逃命、躲在百里之外的湖滩芦荡中的国民党淮阴县长陆选之，来函要吴觉“念同学之情”，出任他的县常备大队长。吴觉的族叔、国民党顽固派的旅长吴漱泉也以委任团长的诱饵来拉他，吴觉一一严词拒绝。此后陆选之就派他的县常备大队不时紧紧尾随抗日义勇队，监视抗日义勇队的活动，又以他的县政府名义禁止抗日义勇队筹集粮饷。这样一来，抗日义勇队的军需供给发生了严重困难。

对此，吴觉决意争取与涟水抗日义勇队联合，扩大实力。1939 年 6 月，根据苏皖区党委指示，淮阴、涟水两县的抗日义勇队和淮安民众自卫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八团，张芳九任党代表，吴觉任团长，李干成任政治部主任。八团的成立为接应八路军主力部队东进淮海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八团建立后，经短时间整训，即开赴淮阴渔沟、五里庄一带清剿土匪，镇压了恶霸匪首张六、向大荣、吴其清等，同时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抗日。韩德勤把八团视为“心腹之患”，迅即纠集淮（阴）、涟（水）、泗（阳）、沭（阳）四县的土顽和地主武装等联合进攻这支仅有数百人的部队，妄图一口吞掉这支新生的抗日部队。八团孤军奋战，困难重重，内部思想有些混乱，有人主张退走，吴觉力主坚持就地斗争。为谋取进一步扩大反击顽固派的实力，吴觉于 1939 年 11 月率领八团东渡盐河，到达涟水东部地区，说服薛华甫等率领涟水抗日独立中队脱离国民党，改编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九团。又将八、九两团合编为陇海南进支队第三梯队，公开通称“淮河大队”。吴觉任梯队长，万众一任政治委员，薛华甫任副梯队长，林士钧任参谋长，高兴泰任政治部主任。梯队下辖八、九两团，八团团长改由陈书同接任，九团团长由薛华甫兼任，全梯队 500 余人。吴觉指挥第三梯队先后在小尖镇、郑潭口两地击破了顽固派灌云、涟水两县常备队及地主武装的进攻，歼顽军一部，俘获百余人枪后，返回涟西。从此，顽固派的地方武装便不敢再来寻事生非了。

1940 年春节前夕，涟水城的数百名日伪军到涟水西部地区“扫荡”抢劫。国民党的军队早已不见踪影。吴觉等淮河大队的领导为保护群众过好春节，派出几支小分队，利用密集村庄灵活运动，四面袭扰敌人，迫使敌人于第二天收兵回窜，途中又闯入淮河大队在洪码头布下的口袋阵，遭到伏击，是役击毙日伪军 100 多名。

1940 年 2 月，韩德勤调集他的主力三十三师一个旅和省保安第七旅合击淮河大队，王光夏保七旅首先在沭阳县钱集一带以重兵包围淮河大队。吴觉指挥淮河大队与顽敌鏖战竟日，击毙顽军团长以下官兵近 200 人，于当夜突出重围。与此同时，顽固派还选拔了 17 名特务骨干，组成“飞行大队”，窜入淮河大队游击区活动，并悬赏 5000 元缉捕吴觉。然而这批特务刚刚踏入淮河大队防区，就被“淮大”全部捕获处决。

为打破顽固派的“清剿”，吴觉指挥淮河大队以重力打击顽固派的社会基础，清除敌人的耳目。1940 年初夏，淮河大队突击消灭了涟水西部两支各有 200 多人的地主武装，镇压了两名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在一个暴风雨夜，吴觉亲自率领突击队，奔袭盘踞淮阴县境内的省特务室的特务武装洪毕成大队，将其 60 余人全部抓获，处决了骨干分子。从此，汉奸、特务、土匪对淮河大队闻之胆寒。远道兴师来“剿”的国民党主力军，奔命一阵，无功而返。淮河大队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奋战，一方面狠狠打击了日、伪、顽、匪等反动势力，另一方面，淮河大队本身也得到了发展壮大。到 1940 年夏秋间，已扩大到八、九、十三个团共 5000 人左右，在苏北淮海地区开辟了一块游击根据地，为八路军主力南下苏北创建了一个稳固的前进阵地。8 月间，淮河大队接应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从皖东北顺利进入淮海地区。1940 年 10 月，八路军主力东进盐阜，策应新四军进行黄桥决战。吴觉奉命率领淮河大队留守淮海，警卫苏皖区党委和五纵队指挥机关。淮阴城的日军侦知我主力东进后，便倾巢而出，奔袭我首脑机关。吴觉指挥淮河大队奋勇阻击两昼夜，击退了日军。

同年冬，上级党决定以淮河大队十团一部 600 余人补充五纵队二支队，另一部 500 余人补充山东南下增援华中的一一五师教导五旅，九团分别改编为区党委警卫营和地方武装。1941 年春，上级党又将八团升编为教导五旅第十五团，吴觉任团长。至此，吴觉等创建起来的这支地方抗日武装全部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胜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42 年 5 月，新四军独立旅（原教导五旅）北返山东归还一一五师建制。中共淮海区委调吴觉回淮海区工作，任淮海行政公署民政处长。

这时，淮阴的日、伪、顽、匪异常猖獗，日伪军不断向我解放区“扫荡”，推行“治安肃正”，全县据点星罗棋布，每十里左右就是一个。盘踞淮安境内的韩德勤也步步挤占解放区，淮阴县的抗日民主政府被挤到边缘的一隅。在此形势下，9 月，中共淮海区委调吴觉任淮阴县县长，兼任独立团团长、县委敌工部长，镇守淮海区的南大门。吴觉到职后，首先开展了全县扩军运动，扩大县独立团作主力，每个区建立一至两个连作骨干，再建立若干联防队，形成完整的三级武装体系。与此同时，发动群众，大力改造地形，把所有道路都变成交通沟，沟沟相通，村村相联，实行坚壁清野，各级领导率领武装力量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敌进我进，觅敌人缝隙，穿插敌后，打击敌人的巢穴，严惩汉奸、特务，铲除敌人的社会基础，使敌伪汉奸大为恐惧，各伪区、乡长都秘密到我根据地面见吴觉，伪军团长、大队长、中队长等亦陆续前来拉关系，发誓为我效力。我敌工人员经常出入敌伪据点，开展秘密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到 1943 年底，终于胜利粉碎了日伪的“治安肃正”运动，赶走了顽固派，不仅收复了本县被敌、顽侵占的地区，而且收复了邻县几个区，使根据地扩大两倍以上。

1944 年 7 月，吴觉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华中局组织部和敌工部的负责人都表彰了吴觉在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对敌斗争中的杰出作用，黄克诚和金明在全国解放以后，也都还一致肯定“吴觉在开辟和坚持苏北根据地时作出的贡献和他的特殊才能”。1945 年 2 月，吴觉回淮海区任中共淮海地委委员、淮海专署专员，8 月，任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军分区副政委。

岁月沉浮苦而弥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和平民主建设。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四块解放区联成一片，形成整体。1945 年 11 月 1 日，在淮阴建立了以李一氓为主席的苏皖边区政府，吴觉任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1946 年 6 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指派吴觉任北线后勤司令，随陈毅指挥部行动，负责指挥和调度皖北、淮海、盐阜三个地区的后勤工作。9 月，敌人占

领淮阴以后，皖北、盐阜相继沦为敌后，战勤军需的人力、物力都基本集中由淮海一个地区负担。同时，华中党政首脑机关和部队后方人员以及大批物资都要北撤山东，大大增加了后勤工作的艰巨性。吴觉领导淮海人民胜利完成了两淮、涟水、宿北等重大战役的战勤和领导机关北撤两大任务。此后，淮海区也转入了敌后坚持的局面。

淮海，是华中与山东联系的枢纽，是当时华东地区解放军北上南下的唯一通道。蒋介石长时间集中10万以上的兵力，压境淮海，轮番“扫荡”。这时，吴觉任中共淮海地委书记、专署专员、军分区政委，全面领导淮海区的敌后坚持斗争。1947年2月，华中分局决定再建中共苏北区委，吴觉任苏北区党委委员。从1946年到1948年的两年中，淮海区的党政军民在吴觉等人的领导下，充分运用抗日战争敌后坚持的成功经验，广泛开展人民战争，袭扰和打击敌人，成功地坚持了华中六分区的敌后斗争，始终保障了中共党和军队苏鲁交通、南北联系的畅通。同时为解放军主力部队先后补充了两个建制旅和两个建制团以及一个炮兵营的兵员。

1948年冬，淮海战役期间，吴觉率领六分区地方部队配合友邻部队解放连云港，俘敌3000余人。接着又连续收复了淮阴、淮安、宝应等城。淮阴、淮安解放后，以两淮城区为主建立两淮市，吴觉任中共两淮市委书记、两淮市市长、军管会副主任、警备司令部政委等职，开始建设人民城市的工作。

1949年4月，吴觉率领六分区地方干部随大军渡江南下，接管常州，任中共常州地委书记、常州军分区政委、军管会主任。1950年8月，任苏南行政区高等法院院长，为新解放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进行民主改革，作了起步的工作。

1950年夏淮河大水，酿成重灾，130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时作出了“根治淮河”的英明决策，同年11月，政务院成立治淮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谭震林先后兼任主任，吴觉受命担任治淮委员会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淮委党委副书记，协助曾山、谭震林贯彻落实中央的治淮方针和政策原则，具体负责主持淮委的日常工作，实际全面承担组织和领导治淮的重任。

遵照中央确定的“根治”目标和“蓄泄兼筹”的方针，吴觉带领广大技术干部，通力合作，考察和研究了淮河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从长远利益出发，立足根治，变害为利的具体规划。对于上、中、下游水利利益不一致等种种矛盾，吴觉总是以他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从治淮的全局出发，努力协调好上、中、下游的关系，使整个治淮工程始终都能围绕“根治”的总目标进行，实现毛泽东提出的苏、皖、豫“三省共保”的原则。

吴觉在淮委工作4年多，把知识分子看作党的宝贵财富，信任、尊重、团结他们。他挥笔起草并经淮委通过关于团结知识分子的决定，这对端正各级领导的指导思想，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吴觉还要求治淮战线所有的党员干部，都把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贯彻。他自己带头与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与他们谈心，商讨问题，与他们同桌共餐，边吃边聊天，彼此间全无芥蒂，十分融洽。对于工程技术人员的合理建议，他总是积极采纳，满腔热忱地予以支持。对于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他也十分关怀，好房子总是优先安排给知识分子，甚至连看戏看电影这些不显眼的小事，也不疏忽。因此，当年参加治淮的万千名新老知识分子，无不深深感受党的温暖，倾其全部身心奉献于新中国的治淮事业。

吴觉在治淮中勇于负责，果敢善断。佛子岭水库是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大型水库。在工程设计时，国内工程技术人员与苏联专家意见分歧。吴觉认真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和分析论证以后，颇有胆识地果断拍板，采纳国内专家的方案设计施工，既保证了大坝的质量，又避免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从而胜利建成了我国自己的第一座连拱坝水库。在淮委期间，吴觉常年住在办公室，经常通宵亮着灯，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即使在病中也难得好好休息一下。1954年，淮河再次发生洪水，新修的水利工程面临严峻的考验。吴

觉不顾自己刚刚做过胆囊手术的病体，急忙回到工作岗位，与钱正英一起，日夜指挥各地的抗洪抢险斗争。尽管这次洪水与历史上造成毁灭性灾害的 1931 年的洪水相似，然而受灾损失却大为减少，尤其是津浦铁路和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了安全保障。

吴觉为人正直，豁达大度，平易近人，善于接待和团结各层次的干部和群众，肝胆相照。他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的，干部、职工随时可访。但却为个别人所嫉恨，遭到无端的打击和迫害。1955 年“肃反”运动中被宣布为“现行大特务”，将他逮捕，蒙受不白之冤。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过问下，弄清了这桩冤案，1956 年 9 月 1 日，吴觉恢复了自由。

1958 年 7 月，吴觉遭到不公正的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在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同志和水利部党组的帮助下，到三门峡工程局任副局长。吴觉同志在三门峡工作期间，虽然政治上受到严厉的极不公正的党纪处分，身体又患哮喘病，但是，仍然坚持原则，勤恳工作，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博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身体关系，吴觉调回江苏，工作尚未安排好，“文革”到了高潮。在这场动乱中，他又受到了审查。但是，无论是批斗，还是交代，他不受派性的干扰，坚持党性原则。对自己，对别人，总是实事求是，十年间写下了百万字的说明材料，对自己的革命历程据实以告，不伪饰拔高功绩，也绝不肯自我贬低诋毁，始终相信党，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1978 年吴觉恢复了名誉，1979 年 10 月，调任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在南工，他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在南工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的大会上，表示坚决支持民主党派的活动，并带头打开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

吴觉非常重视南工党的建设，1980 年 5 月在学院第三次党代会上，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统一了党内的认识。他还组织制定了南工发展规划，使全校有了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力主在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前下，创造条件，扩大学院规模。他还告诫大家不要保守自满，要看到工作中的不足，同时又鼓励大家锐意改革，开拓前进，努力把南工办成第一流的重点大学。

吴觉同志在南工仅几年时间，就使学校走上了团结奋进的轨道。他衷心拥护党中央提出的干部“四化”方针，积极建议并实施切实措施选拔年富力强的同志到院、系领导岗位上来，并鼓励青年干部放开手脚，大胆工作。特别是他自己能以身作则，在南工领导班子调整时，主动退居二线，不当院长，专任党委书记职务，表现了一位老同志对党的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和广宽的胸怀。

1984 年 4 月 30 日，吴觉因病逝世，终年 72 岁。他临终前嘱咐妻子儿女，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对组织上唯一的请求是将他历史问题搞清楚。在他逝世之后，组织重新审议决定，他的入党时间从 1932 年算起，以告慰这位老共产党人的英灵。

文存

在主力来到之前

1939 年 2 月，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踏进了淮阴城。1940 年 7 月，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经过抗争，终于来到了淮海地区。

在主力到来之前，淮阴民众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阻拦，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到创建由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迫于我党的各项抗战政策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怒潮，口头上不得不答应抗日，实际上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到 1937 年底，上海、太原和南京等地就已相继失陷。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为首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由镇江北渡，经扬州迁到了淮阴城。淮阴便成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整个苏北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由于韩德勤继续奉行不抵抗政策，更加激起了淮阴和整个苏北人民的不满。1937 年 11 月，来自淮（阴）、淮（安）、涟（水）、泗（阳）的爱国青年和爱国同胞谢冰岩、夏仲芳、夏如爱、吴道楼、夏前轩、谢楠、赵心权，以及灌云的孙若溪等聚会于淮阴城，分析形势，探讨抗日救国之计。我们这些人，有的在十年内战时期淮盐特委被破坏前是共产党员，有的因为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曾坐过牢，有的是爱国的知识分子。还有个别人当时在组织上还是国民党员，但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势的鼓动下，他们也转到了同情和支持抗日的方面来。鉴于当时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国民党对我们主张抗日的行动，骨子里虽然反对，表面上还不得不装出一点欢迎的姿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书记长周化鹏还出面邀集我们座谈统一战线问题。他歪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化学的化合”，蛮横无理地说：各阶级，各政党，及其所属的武装力量，都要统一于一个政府，一个军队，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否则就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我们的理解，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物理的结合”，是“联合”而不是“化合”，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阶级及其政党，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在对日作战这个大前题下，各自都要不断发展自己的抗日力量，这样才能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争取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当面向他提出苏北要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抗日中心组织，以发动与组织各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他不等我们把话讲完，就推说这事要请示韩主席后才能答复，草草结束了座谈。

过不几天，在我们的再三催促之下，周化鹏转达韩德勤的意见，说现在有党，有政府，有军队，有团体，要抗日，可以参加到里边来，另搞什么组织不行。我们从韩德勤一贯消极抗日的行径中知道，要韩德勤顺顺当当同意我们建立抗日组织，是不可能的。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各种情况，发现韩德勤跟李宗仁之间本来就存在的矛盾，最近又增加了新的裂痕。抗战爆发后，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韩德勤受蒋介石之委主持江苏省政。不久前，韩德勤听说日军要在盐城沿海登陆，闻风而逃，李宗仁对此颇为不满，在徐州把他训斥了一顿。韩德勤无法违抗战区司令长官的指令，只得灰溜溜地回到了淮阴。大家认为，如能通过一定关系，到李宗仁那里告韩德勤一状，可能有助于我们抗日救亡组织的建立。商量结果，决定找朱德轩老先生商量，争取他的支持。

朱德轩是要求抗日的一个进步省绅。在北洋政府时代，他是江苏省的省议会负责人，协助韩

紫石主持省政。北伐战争后，因为对蒋介石不满，曾去上海法政大学当教授，做律师。“八一三”沪战爆发后，韩德勤代理江苏省主席，想借他的社会声望，扩大自己的势力，假借“协助抗日”之名，特地把他从上海请回苏北。李宗仁出于国民党内部派别斗争的需要，在兼任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后，对朱德轩颇为尊重，特委任朱德轩为总动会的常委。朱老先生支持抗日，主持正义，对韩德勤的消极抗日本来也不满，因此当我们去找他，说明要找李宗仁先生商议抗日救亡大事时，他当即表示同意，并为我们给李宗仁写了信。

我和谢冰岩带着朱老先生给李宗仁的亲笔信，到了徐州。当时李宗仁不在徐州，他的一个姓夏的秘书和一个姓郭的部长分别接待了我们。我们向他们陈述了淮阴和苏北人民热切要求抗日的情况，报告了韩德勤不顾民意，不准许我们成立抗日组织的问题，提出了成立苏北抗日同盟会的请求。他们很快向我们转达了李宗仁先生的意见，说战区司令长官认为，建立抗日救亡组织的要求是合理的，应该许可，并要我们回去首先把淮阴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成立起来。我们趁热打铁，根据五战区的建议，在徐州就提出了淮阴县总动会筹委会的名单。当时考虑到经费等问题的现实情况，战区委任我和朱公亮以及淮阴县长胡海泉为淮阴县总动会筹委会的指导员，具体负责筹组淮阴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

我们由徐州返回淮阴后，即向朱德轩说明了去徐州的情况要他准备出面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淮阴县总动会。

当我们把李宗仁的委任状交给胡海泉的时候，胡海泉眉开眼笑地说：“今后淮阴抗日的事情好办了。李司令长官那里有你，江苏省方有我，好极了！觉兄，今后淮阴抗日的事，烦你一手办理，兄弟愿为后盾。”

这个善于投机的胡海泉，之所以如此高兴，是完全出于他权势斗争的需要。他是属韩德勤的体系，紧靠韩德勤是无疑的，只因为最近外面有江苏要换桂系人掌政的谣传，他感到目前只有一脚踩两船，一旦省政府换了桂系，才能保持他既得的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内心世界的支配，他不仅高兴接受了李宗仁的委任，而且在一度时期内确实支持了我们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

1938 年 2 月，淮阴县民众抗日总动会经过各界代表会议正式成立。朱德轩被推为县总动会主任，朱公亮为秘书，胡海泉为组训部长，我为副部长。胡海泉只想挂个名，所以组训工作全由我们在搞。紧接着，各区也相应成立了动委会，纷纷办起抗日青年训练班，进行政治军事的训练。

在此同时，宋振鼎和谢冰岩等同志筹组的苏北抗日同盟会也成立了。苏北抗盟的成立，在更大的范围内团结和积聚了苏北的一些民众抗日力量（当然，跟当时的其他抗日团体一样，里边也随抗日潮流混进了一些不纯分子）。当时从延安“抗大”、“鲁艺”学习回苏北的青年陈扬、丁宕之等 5 人参加抗盟工作，我们正好请他们给抗日青年训练班讲课。他们带回来的毛主席著作、朱总司令的游击战术，以及抗日救亡歌曲，成了训练班的主要教材。

参加抗日训练班的青年，经过训练后，绝大多数分到各乡镇当训练员，编组抗日自卫队和模范队（这种群众性的抗日队伍带有民兵性质）。这些训练员大多数是热心抗日救亡工作的，但由于他们每月可以领取 20 元生活费（是由总动会从商会及县的地方经费中筹集来的），因此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生活，靠人事关系混进训练班的。

编组抗日自卫队和模范队的工作，进展很快，一两个月之内，全县自卫队、模范队的总数就达 2 万之众。但是，由于当时我们还未能与党的组织取得联系，自己的组织和领导工作都存在着当时条件下难于避免的局限性，所以这些群众抗日自卫队伍，基本上仍为地主富农势力所掌握。当初，韩德勤慑于李宗仁的权势及地方人士舆论，不敢赤裸裸地阻止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因此采用了一系列伪善笼络的手法。先是由他的二十四集团军副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出面，以征询我们对他的部队意见的名义邀约我们会谈。我们针对他们部队中发生奸淫妇女的罪行，毫不客气地批评他的军队缺乏纪律，根本不像抗日的队伍。在我们的严词

批评面前，李守维竟恬不知耻地说，军队的纪律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士兵强奸妇女问题，这也不能苛责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军队都有随军妓团，可以解决士兵的性欲问题，可是由于中国风气落后，社会组织差，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奇谈怪论出自一个国民党高级军人之口，只能使我为之哑然失笑！

不久韩德勤假二十四集团军战报创刊纪念之名，又亲自出面，宴请闲话。韩德勤摆出一副很有点气量的架势说：韩某来到家乡，深信诸位能够通力相助。唯抗战之事，政府决心已定，诸位不必有虑，在做法上未必周全，此乃深望有识之士给予批评指正，政府当真诚接受，力加改正的。他还假惺惺地请我们为他二十四集团军的战报写点文章。

不管韩德勤的话说得如何冠冕堂皇，也欺骗不了知道他底细的人们。这个文贪武怕的官僚军人，对抗日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他之所以大言不惭地兜售决心抗日的词藻，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笼络人心，以实现其更大的政治野心罢了。想当初，他刚主政江苏时，也没有什么基本武装，后来凭借他省主席的权势，改编了几个地方保安团，强行兼并了直属财政部而不属黄浦系的税警团，打起了不足额的八十九军番号，继而虚报情况，又骗取了一个二十四集团军的番号，乱发委任，到处招兵买马，不择手段地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作为他扩大地盘和向上爬的资本。此时此刻，他正想借抗日之名，扩大队伍，唯因人们识透了他的野心。真正要求抗日的人们，都不愿意投入他的队伍，而今淮阴各区乡的抗日自卫队和模范队正搞得热火朝天，韩德勤确实眼红了，想借淮阴县总动会之手从中捞取油水，也想通过苏北抗盟从其他县抓点兵源。我们看透了韩德勤的用心，感到对这个人没有必要多费口舌，于是就对他说，但愿韩主席真能一反孤意，真心抗日啊！

事情完全不出我们所料。在他亲自出面之后，很快就派他的八十九军政治部主任李歧鸣与我们会谈，说什么韩主席深知我们是一批真心抗日的志士能人，政府旨在录用真才，团结力量，以发展抗敌舒难之大事，因而“主席想借重你们，有意委吴觉先生任支队司令，隶属军部，扩组抗日武装。枪支弹药，薪饷装配等，都由我军供给，决不歧视。”

我们考虑后回答：“政府这一措施，我们是欢迎的，编组抗日部队也是理应受命的，但有些具体问题须待商榷，容日后再谈。”李歧鸣以为事情有了进展，欣然表示同意。事后我们议论了这个问题，都认为这件事必须考虑到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要警惕陷入韩德勤的圈套不可自拔。便研究了接受组军的两个条件，即：一、支队名义可以接受，但为适应抗日形势的发展，人数编制应不受限制；二、这支武装的政治工作人员应由我们配备，工作应由我们这些人搞。在第二次会谈时，我们坦率地提出了这些条件。李歧鸣听后，皱一皱眉头，说这个问题须请示主席后才能答复。过不几天，李歧鸣转达韩德勤的意见：部队随抗日形势的发展而有所扩展的问题可以考虑，政治工作的主要人员必须由八十九军政治部委派，工作必须由军政治部领导，军事工作他们也可派员辅助。我们当即表示，根据这一情况，似难接受组军之命。我们当时之所以婉言拒绝，确因事关重大，在没有找到党的组织、得到党的允许之前，是谁也不敢擅自妄为的。

可以想见，韩德勤在对我们笼络不成、收买失败之后，必然要对我们采取硬的一手。这也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逻辑。其时，形势到了鬼子占领徐州，挥戈西向郑州，威逼武汉，李宗仁已拔兵向蚌埠撤退的时候。先前，我们搞抗日救亡组织，是李宗仁同意的，韩德勤敢怒而不敢言，如今他看李宗仁自己也溜了，便无所顾忌地把他反人民，反进步，排除异己，破坏抗日的全套解数施展出来了。

韩德勤首先采取“煞家风”以镇邻里的手法，大打出手了。他宣布淮阴县县长胡海泉通共，泄露机密，给予撤职处分，同时施行家法，逮捕了当时组织上属于国民党复兴社分子，但行动上对同情革命，参加并支持苏北抗日同盟会工作的两个人（后来这两人相继参加了我党），胁迫参加苏北抗日同盟会及淮阴县抗日青年团等抗日组织的国民党人公开登报，申明辞职退出，严禁翻印和传播延安的报刊和文件，从各个方面孤立和瓦解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对淮阴

县民众抗日动员会，则严令停拨地方经费，用经济封锁的办法，从上面扼杀活动，并利用他掌握的区乡政权和顽固的地富势力，从下面进行捣乱和破坏。就这样，活跃一时的淮阴人民抗日自卫队和模范队，被纷纷瓦解了。新的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疏散抗日力量。陈扬、金求真等外来同志，即向南转移到了接近新四军的地区。

这是 1938 年 11 月前后的事，距淮阴沦落日军仅 3 个多月的时间，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沉闷的时刻。我们对前一时期的工作作了冷静的反省和比较清醒的评价。大家为前一时期未能充分利用苏北有利条件打开苏北的抗日局面而感到惋惜，更为抗日救亡工作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而感到痛心。我们检讨了前一时期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上层的周旋上，未能把组织群众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错误。究其原因，除了我们在政治上缺乏斗争的经验，在作风上不踏实外，最根本的是得不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早在苏北抗日同盟会成立之初，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就考虑到要在斗争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正确打开苏北抗日的局面，就必须迅速争取党的组织领导。因此我们于 1939 年春就派人前往武汉找党，我党驻武汉办事处要我们直接与山东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年夏秋之交，我们又派人到山东找党，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同志答复我们，党组织暂时派不出人来，要我们先把工作做起来，稍待些时候，党组织一定派人前往联系并建立组织。

如今，战局的发展表明：国民党军队仍然坚持不战而退，而我们党的抗日主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到达这里，要对即将占领淮阴的日军进行武装反抗，就要靠我们自己来组织抗日武装，等是不允许的。但是，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深深知道，要把抗日武装建立起来，并且使之在抗日的战斗中逐步成长壮大，没有党组织来领导是不行的。

我们是多么希望重新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置于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啊！

为了争取在党组织一旦派人来的时候，就能拉起一支武装，根据党要我们“先把工作做起来”的指示，我们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方面通过一些私人关系，筹起了一些钱款，另一方面通过一些社会关系，对个别同情抗日的国民党区队做工作，从他们那里买过来一些武器弹药，把它埋藏起来。为了培养搞武装的干部，我们通过抗盟的关系把一些热心抗日的青年，送到有我地下党的国民党五十七军万毅团的学兵队，接受军事训练。

1939 年元月间，苏皖边区特委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指示，决定由张芳久、高兴泰和戴曦等三位同志组成淮属中心县委（工作范围包括当时的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四个县）来到这里。高、戴二人一来就去涟西农村，张芳久径自来淮阴城找苏北抗盟的人。当时只有我和谢冰岩在城内，我们向芳久同志汇报了准备拉武装的情况，议论了淮阴和苏北的政局。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原拟邀约邻近各县的抗盟负责人来淮阴聚会一下的，不料几天之后淮阴县城（即清江市）陷落，我们全转移到了农村，就未能聚会。

1939 年农历正月十一，从徐州过来由连云港登陆的日军，在毫无阻击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侵入淮、涟诸县，韩德勤的二十四集团军及省机关，连夜全部逃离了淮阴城。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到处皆有，逃难的人们纷纷向远离交通线的农村奔去。淮阴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芳久跟我们研究认为，国民党行政机构散了，部队走了，这正是我们抓紧时间拉武装的好机会。于是，我们在把抗日留城人员及其家属撤至大兴庄张圩一带后，即与芳久、丁九等同志星夜赶往渔沟，将我们先前贮存在那里的近 20 支长短枪及自己家中与家族中的自卫枪支，武装了族中的和附近的贫苦子弟。当时包括向地主商借的枪支，首批组织起来的人枪有 60 以上。进而将这批武装与事前做工作沟通了关系的国民党渔沟区常备中队汇合。经过地方进步人士的引荐，我们把国民党的四五十个散兵游勇组成了一个中队。洪泽湖边在总动会时残存下来的五六十个抗日模范队，这时也组成洪湖渔民抗日大队北来投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汇集了四股脱产的武装，人数达二百几十个。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立即宣布组成抗日义勇队。同时成立淮阴义勇队总指挥部于张圩，我任总指挥，张芳久任参谋长，谢冰岩任秘书

长，宋振鼎为政治部主任，张一平为副官主任。指挥部又设一个政治大队，由从淮阴、西坝、王营等地撤退来的抗日救亡青年百余人组成。这些人为补充减员后来逐渐输入连队，成为骨干。

由于国民党淮阴县政府的武装部队早就逃离了淮阴，因此抗日义勇队总指挥部的牌子一打出来，全县各地各种小股武装纷纷前来请委，我们在抗日义勇队的统一番号下，委了不少“支队”、“大队”。一时间，抗日义勇队的旗帜遍及淮阴北乡各区。这些武装比较杂，真正脱产成队的也不多。为了加强基本队伍的建设，芳久跟我们研究决定把在渔沟汇合的四股武装，作为基本队伍，集中起来进行整编。1939 年 4 月间，我们的队伍在张圩集中，组成教导大队，夏如爱任大队长，并由盐城抗盟介绍来的陈克天及经万毅部队受训回来的周文科、辛苦，以及石振邦等同志担任所属各中队的领导。部队在建立党组织之前，张芳久同志这时就开始了党员的个别发展工作。

我部在草创之初，一个中队听说日军的一个车队经渔沟奔淮阴，便与地方抗日自卫武装李可拔的队伍配合，于渔沟东的五条路布阵，伏击了敌车队。这次战斗——不，严格地说，这还算不上是一次打仗，（我们这支部队除张芳久同志外，谁都没有打过仗）战士们在没听到命令时就向敌人开了火，而当鬼子摆开阵势，用机枪小炮还击时，我们却早就依托密集的村庄，安全转移了。敌恼怒之下，一把火烧平了五条路旁大地主吴其数的庄圩。——虽然未能给敌人以大的杀伤，但是，这是淮阴人民向鬼子发出的第一枪，也是我们这支队伍从打仗学习打仗的开始。五条路战斗至今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义勇队的抗日行动，震动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汉奸土匪的武装。土匪头子韩雄联合国民党顽固派所招安的泗阳土匪石海青，集结了四五百个武装土匪，企图吃掉我义勇队主力。结果由于我部各队的协同作战和地方抗日自卫武装的支持，在渔沟东南的文殊庵打退了这支土匪武装的进攻。

初战赢胜既振奋了我部指战员的精神，也迅速扩大了我部在群众中的声威。在抗日群众的掩护下，我们不断用小股武装袭扰驻敌。日军在淮阴城外围重镇王营筑了碉堡，我们就派部队去夜袭困扰。一天夜里，敌人炮楼周围突然升起几颗红绿信号弹，紧接着便是一阵密集的枪弹飞向敌人的碉堡，驻敌恐慌万状，探照灯照亮了不眠的盐河，机枪小炮乱射狂吼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王营镇内外的群众议论纷纷，到处传扬：“老八路已经到了淮阴，这一夜仗打得不轻！”

侵驻淮阴城和王营镇的日伪军，妄想造成一个“安全”的环境，推行伪化，在外围的杨二庄和西坝两处建立汉奸政权。伪政权一建立，我们即派出两个突击队，夜渡盐河。一个突击队镇压了杨二庄伪镇长朱五，全部消灭驻在镇上的黑狗队，缴枪十余支，另一突击队镇压了西坝的伪镇长郑某。这一行动不仅阻止和迟滞了敌人的伪化，同时也向一切投降派及动摇分子发出了严正的警告：投降敌人，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部积极抗日的活动和发展态势，引起了拥兵逃命远离淮阴的国民党淮阴县长陆选之的不安。陆选之是接替胡海泉之职而当了淮阴县长的，接任县长不久，他听到日军将要进犯淮阴城的消息，连他的县政府也不顾，带着一个团的武装，隐蔽到了离淮阴百里之外的宝应县属仁和集的湖荡里，此人早先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并且为闹学潮而被同榜开除过。现在他在湖荡里得到了我们义勇队在淮阴活动的情报，唯恐我们这支部队在淮阴扎下根，日后在韩德勤面前不好交待，便“念同学之情”来信邀我去“共商淮阴抗日大事”。我知道同这种人打交道，只会徒然浪费时间，而不会有什么甜头的，因此是拒不愿往的。但是，有些同志认为，此去有理，起码可以封他的口，摸他的底，叫他造不起谣。不得已，我勉强前往。一见面，他就首先聊起中学时代闹学潮、被开除的“光荣史”，想借此引起我对他当年爱国进步形象的回忆。谈到邀我前来的意图时，他说想委我任他一个常备大队的大队长。我一听就明白，其用意是想通过委任达到限制我部的发展，并进而兼并我部的目的。我当时婉言拒绝。当然，

陆选之是不会就此作罢的。在此不久之后，他派出部分武装，尾随我部，紧挨我部驻地住下，企图挤我们走，并监视我们的活动。他们来了，我们换驻地，他又来了，我们再走。就这样，像推磨一样在淮阴县境内转圈子。他们无可奈何，就又通过他的县政府，企图禁止我们收税吃军粮。这一压，除我四股脱产的基本武装外，原来委任的一些“支队”、“大队”就因缺钱少粮而纷纷解体了。这一起一伏，倒使我们的队伍精干了些，领导力量也更加集中了。地方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也更看清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每到一处，他们乐意接受吃派饭的方法，解决我部钱粮不足的困难。

当时，打起抗日武装旗号的部队在淮属各县皆有。淮阴县是抗日义勇队，而涟水则有民众抗日独立营，淮安又有民众抗日自卫队，另外还有许多以个人名义命名的抗日游击小分队。这些武装，有相当一部分在组织上或思想上与我党有所联系，但都没有公开打出八路军、新四军的旗号。我们处的是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统治的区域，即使有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也不会允许不属于国民党的武装力量长期存在的。从韩德勤到国民党的各个县长，无不在以抗日的名义不择手段地企图收编这些抗日武装。淮阴县的县长陆选之是这样，涟水的县长徐继泰，则更是以兼任涟水、灌云、阜宁等四县抗日总指挥的名义，采取多种手段在到处吞并武装。

在义勇队略具规模时，我们就与芳久等同志就部队发展方向问题交换过意见，认为部队开始打灰色的旗号是可以的，但考虑到人民群众传统的合法观念，目前只有共产党的八路军或国民党的正规军、地方杂牌军才是合法的，其他的武装，往往容易被人们视为土匪武装。那么，我们也只能在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两者择其一。而八路军不仅是合法的军队，而且为广大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开明人士与觉悟的农民所景仰。因此，即使国民党顽固派反对我们，我们也要争取打八路军的旗号。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企图不择手段地收编、吞并抗日武装力量的情况，部队的去向现在已到了必须择一的时候了。为了统一认识，1939 年 6 月，芳久带领我们把义勇队开到了当时敌伪顽不易到的淮涟边区的小成集一带，一面派人与涟水、淮安两县各抗日武装商谈改建八路军事宜，一面就部队准备打八路旗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讨论。6 月，经请示，苏皖区党委决定我部打八路军的旗号，番号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上级党根据新的形势派万众一同志来担任政委。我任团长，陈书同任副团长，张芳久任参谋长，李干成任政治部主任，高兴泰任副主任，谢冰岩任秘书长，陈亚昌任副官长。全团设 4 个营，陈克天、朱启勋、林士均、王道明分别任营长，周文科、陈凤洲、王国干等分别任教导员。八团下设宣传队和随营干校，宣传队的主要任务除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外，还负责部队驻地的妇女工作，随营干校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及地方培养干部。

万众一同志来后，即成立三地委，淮属中心县委亦即并入三地委。万众一任地委书记，张芳久和杨汉章为地委委员。三地委除原淮属四县外，当时还包括盐城和阜宁等县。由于当时我们还远离主力，因此，八团实际是三地委直接领导的部队。

八团的旗帜亮出之后，涟水王小楼、王雨洛、朱慕萍、王雨沛、王雨斌、张胜武、潘子明、朱启宇、朱铭熙、朱士民、张达志等人组成的游击队，以及淮安的李玉宣、任家骥等人组成的游击队，相继宣布参加我部。

八团建成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于 8 月间，西进淮阴渔沟、五里庄一带活动，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同时，清剿匪伪，为民除害。有名的恶霸匪首张六、向大荣、吴其清等，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我们镇压的。9 月我部去涟西，配合地方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工作。10 月，返回淮阴活动时，遭到淮阴县运北行署主任许飞由率一个团以及顽固地主孙厚安等的反动武装阻扰袭击，周旋三日，经地方人士调解，顽我双方同时撤军。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与我摩擦的开始。这时，国民党潜入我部的特务吉文崇，暗杀我义勇队创始人之一，中共淮阴东南区委书记张德雨同志。阴谋败露后，吴文崇潜逃淮阴城，投奔日军，任新亚会会

长，并和国民党省特务指挥部的洪毕成特务大队狼狈为奸，收集侦察我军情报，策动我家属来拖腿。有时还冒充我军人员，奸淫妇女，抢掠财物，企图破坏我军声誉。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省特务指挥部又派出一个特务骨干分子 17 人组成飞行大队，企图封锁陇海线，割断我部与山东主力的联系。凡此种种，表明韩德勤的省政府，已决心消灭我部。围剿、摩擦的形势进一步形成。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三地委指示我们，部队必须迅速扩大，建成一支可以对付国民党一个县的武装力量，以便随时驰骋跳动穿插旋转于苏北各县。因此，我部迅速跳过盐河，去涟东争取薛华甫、石大康两部分武装参加八路军。薛、石两位同志的部队，当时虽然挂的是国民党区队的招牌，但由于他们同情我们，支持抗日，已与国民党涟水县政府发生矛盾。他们感到，中立不成，不如趁早汇合八路军，以免遭顽固派的突然包围吞并。当我与薛、石两同志一谈与八路汇合的问题，薛、石两同志带头响应。所属两部士兵，也由于我们事先派王国干、朱士霖、潘子民等政工人员做了大量工作，无不欢欣鼓舞地加入我部。11 月，以薛华甫为团长、王国干为政治部主任的第九团于涟东成立，石大康、胡启奎等为营长和教导员。这时，我部组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南进支队第三梯队。我任梯队长，万众一任政治委员，高兴泰任政治部主任。陈书同任八团团长，陈克天任副团长兼一营营长，周文科为政治处主任。朱启勋、朱慕萍则为八团二营和三营营长。
其时，我部也仅是一个 500 余人的一支不大的队伍。但是人手一枪，都是战斗员。
鉴于摩擦的形势紧迫，我们决定挺进滨海区，到陈家港一带建立海陆两栖根据地，以便进行长期斗争。当我部刚进入该地区小尖镇一带，社会关系还未接好，即遭绥靖团、灌云常备团以及涟水恶霸武装拦击。激战竟日，因我意图被敌识破，便决定乘夜撤返。部队撤至郑潭口，又与尾随我部的涟水常备队遭遇。我被迫应战，以决一死战之姿态，迅即猛扑敌人。敌人不习惯夜战，在惊恐紊乱中为我俘获百余人枪。我们原意乘胜撤出战地，只因天色破晓，难于脱离，便选择有利路线，边战边撤。战至中午，我大部已脱离战斗，唯一个连队被敌困于一个农屋内，难于脱战。我便集中一批神枪手，绕敌侧翼向敌展开射击，压住敌人火力，终于救出了这个连。部队回归涟东后，敌请地方人士出面，以“再不寻事生非”为条件，要求我发还所俘人枪。我部为了顾全大局，再次表明坚持统一抗日，枪口一致对外的诚意，当即释放了俘获的人枪。
在这次摩擦战中，我们深深感到造就更多的神枪手是何等的重要。于是我部一面加强对战士的前途教育、阶级教育，以普遍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针对我军缺乏火炮和连发武器的弱点，部队日夜加强瞄准训练，努力造就一批神枪手。
在我部活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我部一面尽量避开与顽固派的摩擦，一面努力捕捉战机打击日伪军。
1940 年春节前夕，涟水城的数百名日伪军，开出车队，耀武扬威地进入我部活动区的涟西、淮涟边区“扫荡”抢劫。我部为保护群众，过好春节，当即派出八团朱慕萍营划成若干游击小队，利用密集的村落灵活运动，进行阻击、尾击、侧击。敌进我进，敌住我打，使日伪军白天行动中不敢分散上庄抢劫，夜晚停下来不敢分散睡觉。春节初一上午，这一伙强盗被我搅得疲惫不堪，正匆匆窜进城，不料在归途中又闯进了我八、九两团在洪码头布下的口袋阵。敌车队遭我突然打击后，立即组织反击，向我指挥所猛扑。九团团长薛华甫当机立断，率领他的警卫队向敌人车队猛冲射杀，打退了敌人的反击。我军速战速决，完成伏击任务后，立即撤离战场，不料我后卫部队一个连在撤离途中被鬼子咬住困于小马庄。全连指战员英勇抗击打得敌人不敢近战。敌人无可奈何，尽用重炮轰击村庄。房屋起火，墙垣轰平，敌以为我被困战士全部烧死，然而当他们想去拣一点战利品回去邀功领赏时，几个日伪军刚接近燃烧着的村庄，又被火海中发出的枪弹送了命。敌人再也不敢去送死，又怕我部来追击，只好车载百十具死尸回城了。
我们的战士何以能在火海中坚持战斗的呢?原来，战士在除夕那天开展爱民活动，给群众家

的大水缸都挑得满满一缸水。战士们的衣服被烧着了，便跳进水缸，灭了火，继续战斗，身上又着火了，再跳进水缸，灭了火，又投入了战斗。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英勇地在火海中抗击日军的。

这次战斗，我八团四营营长王道明，义勇队老战士、排长严水文，叶朝中等 20 余人光荣牺牲。从火海中生还者也都烧了头发、眉毛，遍体灼泡。但是，英勇的战斗，也是最能教育群众、赢得群众的。洪码头之战，捷报飞传，群众对八路军真是有口皆碑，都夸八路军真厉害，打得鬼子狼狈逃窜，骂国民党常备团没用，见鬼子望风而逃。

这个消息传到韩德勤的耳中，又勾起了他心中的嫉恨。这里是韩德勤和顾祝同的故乡，是他二十四集团军的兵源之地，岂能让八路军存在、发展、壮大？因此，便督促其主力三十三师，迅速北上淮涟，命令保安第七旅王光夏由泗阳东进，配合三十三师合击我部于淮涟地区，当我得知顽敌北到达阜宁、涟水边境时，我部移驻六塘河一带，并向西北沭阳一带行动，佯作北去山东之态，意将顽敌引向西北，然后我隐蔽伺机返回涟水东渡盐河，窥机反击敌人。1940 年 2 月初，我部住沭阳马厂一带休息，情报失误，为王光夏部所乘，猛攻我驻地各部，鉴于我部过于分散，易被顽敌各个击破，即命令所有部队放弃村落，迅速撤至指挥部后的丁字沟内，坚守杀敌，准备坚持到夜间突围。当时敌冲锋号频频哀鸣，我神枪手沉着射击。顽敌副团长以下数十名被我击毙，胆颤心惊，不敢接近战沟，只好用迫击炮向我阵地乱轰，同时调集各处武装，将我军团团围困。顽敌认为困局既定，即待翌日三十三师赶来参战，围歼无疑。我得知敌主力已由南窜逃南北六塘河之夹滩内，估计明日必将赶到参战。而我部苦战竟日，未吃饭，未喝水，火力消耗殆尽，如夜里不能突围，明日必遭全军覆没。情况严重，我们毅然决定夜间奋力突围，以博死里求生。先由八团向东突击，因敌火力太强，未能突出。敌人知我突围，忙调援东线。我九团发现北部敌人有向东增援行动，便见机向北突围，冲破敌人阵地，全军鱼贯突出包围。此时敌人眼看逼我就歼的计划破产，慌了手脚，把战地所有村庄都放火烧着，火光照亮四野，机步枪齐发，喊声四起，庄庄呼应。我部最后一批突围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勇敢沉着，匍匐爬行四五里，才突出重围的。到第二天早晨曙光初照大地时，我军已胜利返回淮涟边区小成集一带集结休整，而敌人还在马庙附近搜索我部的去向呢。

这次反摩擦战，我部付出了极沉痛的代价。即将出任淮安县委书记的直属队指导员吴正霖，六连连长朱玉山，排长宠永才、戴如谈，排政宣朱士顺等十多个干部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了。然而，国民党顽固派清剿我部的反革命决心是不可改变的，更严重的反清剿斗争还在后头。时间仅仅过了半个月，江苏省政府对我又布下了全面清剿的阵势。敌以三十三师的一个旅和常备第七旅为主力，搜寻求歼我部，以七个县的地方武装防堵拦截，搜查地方游击小组等革命组织。同时，到处贴布告，宣布我部为非法武装，分别以 200 元至 5000 元各等价悬赏缉捕我各级干部，号召我部官兵投诚，胁迫军属来部队拖战土后腿，强迫我地方干部自首叛变。一时乌云遮空，阴风阵阵，反动地主、恶霸、汉奸、特务等丑类，群魔欢舞，都认为这下可以把这里的八路军及共产党斩尽杀绝了。

对严酷的现状我们作了这样的分析：所有县城及重要集镇均被日军所占，交通割裂，敌顽之间尚有一定矛盾，国民党主力部队之运动、转移和食宿等都有一定困难，联合清剿的时间不可能延续一个月。敌人与我制造摩擦，有违民意，失道寡助。我部经过几年来的战斗，不仅积有一定坚持斗争的经验，而且与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每到一地，群众为我放哨警戒，递送情报。打起仗来，伤病员的掩护医治、牺牲的同志收殓埋葬，都由地方群众主动承担。但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当敌大部队向我清剿时，我们必须力避与之正面接火。为此，我部决定暂时撤销团营一级，把部队编为若干小队，分散隐蔽活动。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与日军的据点和交通线还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利用敌占城市周围的空隙和自然河流的附近盘旋兜转，随时打击、镇压地方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使地方区、

乡保长及士绅不敢附和敌人。当时九团各队主要活动于涟水东部，八团各队则主要活动于涟西。有若干小队分别活动于灌涟边区、淮安边区和盐、黄河的夹滩一带。在活动中，各小队间既保持相当的距离，同时尽量做到一旦出现问题，可以互相策应。由于沭阳马庙一战的减员以及撤销宣传队和教导队两个建制，我部这时已减至 300 多人。在把部队编成若干小队分散活动时，我们从八、九两个团中，挑选骁勇机灵善射的 60 余人，组成一个由我总部直接掌握的突击队，专门清除特务恶霸等反动武装。

在这次敌清剿摩擦行动将开始时，我部突击队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干净利落地将顽省特务指挥室直属的特务飞行大队全部消灭。当国民党顽固派主力三十三师进入涟西地区时，涟西两个各拥有二百左右枪支的反动恶霸地主特务头子余士卓（余五）与张文波，先后被我突击队神枪手所镇压。在淮阴背靠敌伪区活动，行动诡诈的特务洪毕成大队，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也为我长途奔袭的突击队全部歼灭就擒。我部分散的各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活动区内民愤很大的反动恶霸地主和反共分子、特务等相继镇压了。

由于我们对地方上的汉奸，特务和恶霸地主等采取了坚决镇压的行动，国民党的区、乡、保长及一般地主，非但不敢反我，而且不得不加意保护我地方组织与我部人员，从而起到了稳定活动区局势的作用。而国民党顽固派的主力，由于掌握不了我部活动，倒反而怕得要命，龟缩隐蔽，不敢分散活动。进入涟水西部参加会剿的淮阴县常备团，在受我打击后狼狈窜回。浩浩荡荡远道而来的顽三十三师，奔命一阵，结果也只能带着寻获的飞行大队 17 名骨干特务的腐尸回省，向韩德勤报功领赏去了。

喧嚣一时的所谓联合清剿，只及半月即告结束，我部坚持苏北敌后孤军奋斗的最后一次反摩擦战，就此胜利结束了。

这次反清剿中，我部非但未被消灭，反而迅速得到发展壮大。敌人的清剿，使我部的一些流散人员和过去的离队人员陆续归队，地方积极分子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很多人加入我分散中的小部队与敌人搏斗，由于我积极开展日伪顽战区的武装斗争，淮安北部农民刀会也组成黄河大队，携带百余人枪参加我队伍。另外，在交通关键性地区，又成立了许多游击小组。如活跃在王集朱码一带的，就有以王观涛、颜振普等 20 余人枪组成的游击小组。先前我在郑潭口反摩擦胜利后于五港一带成立的滨海大队，在这次反清剿中也获得了很大发展。

在敌清剿开始时，苏皖区党委鉴于苏北形势险恶，认为我们这支部队实质是一支武装的干部队，为了保护党的财富，曾指示我们相机撤入皖北根据地，以保存这批力量。当时我们向区党委陈述了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表示过坚持必胜的信心。因此在取得反清剿胜利后，区党委立即发来了表扬信，鼓舞、激励我部继续坚持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不久，我们又接区党委转来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要我们坚持原地斗争，迅速充实发展部队，完成一个建制旅，积极准备迎接主力东进。

因此，在这次反清剿胜利后，我们即根据华中局的指示，迅即集中部队，恢复团的建制。是时，八、九两团已达千人之众。区党委已派来钱潜、罗映臣等同志充实部队中层骨干领导。在迎接主力东进的热潮中，我队伍飞速发展，一个从几百人发展到千余人的部队，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近 5000 人的一个旅的规模。在主力东进后，我们以拥有 500 余人的滨海大队为主，会合各个新发展的小股部队组成了十团，陈书同任团长。主力东进时，旅团番号对外均称为某某大队，以迷惑敌人。这时我部对外就称为“淮河大队”，这是后来淮河两岸群众都熟知的番号。

1940 年仲夏，我部派出得力的向导，策应主力东进。八路军一一五师南下增援的第五纵队黄克诚司令，率领部队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由皖东北迅即东进苏北，增援新四军。从此，我党开始了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

同年初秋，进驻淮海区的主力部队，全部继续东进盐阜区，纵队司令部（即新四军三师师部）仍暂留淮海指挥，司令黄克诚与区党委都驻扎在六塘河岸陈圩钱集一线。黄克诚同志向我部

面授任务，要我部接替主力防守六塘河南一线，监视盐河线，防堵韩德勤的残部北窜淮海地区，维护皖北老区与苏北的交通线。不久，淮阴日军侦得我主力已东进盐阜的情况后，一天早晨倾巢而出，企图奔袭我三师师部和区党委，当时我驻守六塘河南岸淮阴境内的八团立即出动应战，接战阻击敌人于五里庄至徐溜沿线，继则是夜以继日地袭扰敌于南六塘河两岸。翌日上午，日军才强渡北六塘，进抵钱集。由于我部继续奋力抵抗，敌无法前进，突然奔袭的阴谋既已破产，鬼子怕腹背受击，慌忙拔兵窜回淮阴。我区党委机关未受丝毫损伤，三师指挥部稳坐陈圩，岿然未动。

同年冬，由于主力连续作战的减员，急需补充，而苏北根据地初建，尚不能进行群众性的参军运动，因而华中局决定将我十团所属滨海大队五六百人调归主力三师八旅以补充缺员，同时命我十团所属团结大队 500 余人，拨归补充南下增援华中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至此，我十团全部上升为主力。

在根据地初建期，县及地区都还没有骨干武装，因此上级又决定由胡启奎营下放涟东县，改为县的武装。该团石大康营奉调改为淮海地区一级的警卫营。九团的另一个营后来随八团上升为主力。九团在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任务后也全部上升为主力。

1941 年春，八团上升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后，改为教导五旅十五团，我任团长。鉴于部队上升前，万众一、高兴泰等同志已先后调离了部队，上级又派来了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领导干部。八团在上升为主力前，仍坚持淮涟与顽匪进行了频繁的斗争。同时抽出枪支弹药组织地方游击队，如后来在 1941 年前后反蚕食反“扫荡”反顽斗争中出名的刘大队便是其中之一。

同年 4 月间，八团在去宿迁、泗阳靠近旅指挥部休整前，为了酬答淮阴家乡群众数年支援养育之恩，行前清扫了淮阴南部朱集、新渡一线匪顽。这次战斗，我方付出了年轻有为的一营教导员朱鸿宾、一连连长陆正学等数十名同志的生命。归属主力后，曾随旅参加了陈毅代军长亲临指挥，全歼顽匪王光夏部的有名的陈道口战斗。是年夏，宿迁陆集反“扫荡”战斗中，我二营营长朱启勋与日军肉搏，在肚破肠出的情况下，手握肠子，指挥部队战斗，在全营安全撤退后才上担架，终因流血过多而逝于担架。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鼓舞了部队，感动了群众。事后人们在涟水小成集建亭立碑永志不忘。

时光流逝，我部三个团的英勇战士们，在抗日和解放两个时期的伟大斗争中，牺牲者数以千计。在此我只能略举一二，以志不忘。如在创建我部武装和在恢复与发展地方，部队党组织等方面都曾做过许多艰苦工作的张芳久同志，八团成立不久，就在深入乡村工作时不幸遭坏人暗害牺牲了，我部义勇队老战士、屡建奇功的突击手孙明哲，在任营长时牺牲于山东的某次反“扫荡”中，八团初建时的指导员贾贯秀，牺牲于东北战场，教导员朱士霖任某团政委时，在名震全国的四平战役中英勇牺牲，沈阳解放后，于公园建墓立碑。朱慕萍任团长后，1949 年解放南京渡江时牺牲，周文科解放战争中领导淮阴武装斗争，在战斗中牺牲。

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当年建树功勋的老战士，在战争中过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诬为特务、走资派、杀人犯，竟被严刑拷打，毒害致死，如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高兴泰，九团团长薛华甫等便是。我是幸得老同志和一些革命群众的掩护，才免遭害死的。我的问题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解决的。在我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方面的今天，作为一个老战士，应该自勉：

人老风霜饱，四化前程好。

烈士抛头颅，幸存当折腰。

土地复查初步总结

（1947 年 5 月）

第一部分土地复查前一般情况

一、地主留地问题（多留地、留好地、隐瞒黑地）

根据调查统计及各县报告，一般地主留地皆比较高，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贫雇农。如涟水同兴区的王圩乡，地主留地每人平均是 5.032 亩，而得田户每人得地水平仅 3.123 亩。以该乡罗堆村为例，全村土地总标准是 3.47 亩，留地户（地主、富农）是 4.73 亩，而得地户仅 2.6 亩，地主留地比贫雇农多 2 亩以上。另据沭阳周集区合乡得标村的调查统计，亦是同样情况，地主留地是 4.12 亩，而贫雇农得地只 3.805 亩。

地主留地不仅在数量上高于一般得地户，而所留的地，在质量上更是超过贫雇农。地主留田大都是园田、近田、屋基田，这些都是好田。如涟水双河村逃亡的王兰生 5 口人，留了 30 亩好田，地主王如琢 4 口人，留有 23 亩好田，每人平均到达 6 亩，而该村尚有赤贫农没得田。贫农 84 户内有 52 户平均每人得 2 亩田，均是最孬的碱地。又如属于章集区双河乡戚庄村的分地比例，贫雇农 65 户，人口 344 人，现有田 944.9 亩，每人平均 2 亩 7 分，其整个阶层所留田中好田 45%强，中下田 55%强；干部 29 户人口 117 人，现有田 366.4 亩，平均水平 3 亩 1 分，其整个阶层所留田中好田 63%强，中下田 37%强；地主富农共 12 户，现有田 226.5 亩，平均水平 3 亩 4 分，其整个阶层所留田中好田 94%强，中下田 6%强。根据这个村，可以了解，地主富农不仅比贫农每人多留 7 分 8 厘，差不多全部是好田，其收获量必然超过贫农一倍以上。

所以产生上面的现象，主要是在土地改革时，干部不是发动群众清算地主土地，只动员地主随意献地，以致地主投机留好地多留地。

地主不仅留有好地与多留地，而且拥有黑地，以假典假卖等贪婪狡猾的阴险手段欺骗群众，隐瞒黑地，由于地主屋基大，地块大以及过去强耕邻田，零碎积累，实际土地往往多于契上亩数。还有以多报人口，收买落后干部与个别佃户，替其隐瞒黑地。如涟水戚沟地主马月江利用以上手段及收买干部孙文标，隐瞒黑地有 23 亩之多，泗沭裴圩区松张乡全乡查出黑地 5 顷多。

此外地主多余的耕牛、农具以及青苗尚有未拿出，涟水双河村逃亡地主王兰生、王如琢耕牛、农具均为追出，分出的仍被收回的事也常发生。因此虽经去年土地改革，地主在经济上仍超过一般贫雇农，诚如涟水一位农民说："土地虽改革，但是地主地还是留的比我们地多，而且都是好田，农具用不了，再加上往年积蓄，日常生活吃的白面卷子，我们是喝稀饭吃洋钱（即山芋藤）。"

在政治上地主挣扎维持他封建残余的影响，还没有抛弃其复辟的企图，进行挑拨离间以达到

投机取巧的勾当，老契不拿出，不立新契，写了新契也不划上十字，仅写了个押字，念念不忘收回土地，继续维持其封建统治。

二、贫雇农尚有地田不足、肥瘦不均、产权未能最后确立、果实未分、无力耕种等现象

因地主多留田、留好田、隐瞒黑田，相反说明贫雇农没有得到足够土地，根据以地主及贫农得地水平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贫雇农未得足土地的严重现象。有些地主留田竟超过贫雇农一倍以上，因此有些农民反映说："共产党叫我们翻身是好心，但是翻到现在，得的是碱地白田，又无耕牛农具，不得也罢，得了反叫我们发起难来了。"

这是由于干部不民主、自私自利，自己得好田、以孬地换好地，甚至包庇亲戚、朋友、族人，造成的极不公平现象。农民得白地还要缴公粮，许多斗争果实及青苗弄到干部手中，被贪污了，或公家留用没有分给群众。如某干部，将群众斗争得来的 5 只牛，卖掉自用，农民斗争得来的耕牛，也有给干部送回地主富农，这造成了贫农地未得足，肥瘦不均，以及无力耕种等现象。农民还有没有屋基地，没有房屋住，沭阳章集区宜选乡胡庄村是一个中心区，过去工作做得较好，土改中一般尚能走群众路线，但在这次复查中，发现查出该村 14 户孤门小姓没有屋基地，后来全乡查出 141 亩屋基地，分配给 41 户赤贫户，使他们有了足够的土地与房屋及屋基地。

由于干部封建残余思想存在，轻视孤门小户与老实头，因此在土改中孤门小户均未获得足够土地，造成赤贫的严重存在。如沭阳宜选乡孤门小户某贫农，因干部不肯分 3 亩好麻田给他，不能生活而几番想自杀，外来户杨富当，干部全分给他孬地，气愤全家搬走。亦因未得足地不满以致有抛荒现象。

在得田户方面，产权思想未最后确立，表现在老契未追出（最好的乡也只能追出十分之二三），追出的老契由于干部不重视，随便抛弃损失，未能当群众面烧毁，新契未写，写出了也未分给群众，且用的是官契纸，有的用钢笔写契，未采用农民旧习惯，因此群众思想顾虑，认为不算数，有农民分得土地尚不知地界，有的只知地段而不知弓口，未经农民自己清丈，未栽地界，因此得田户的产权思想未能最后巩固确立。

在群众中，变天思想还是一般存在，但另一方面农民知道地主留地太多，仍要向地主富农追出土地，未得足与未得到好地的要求再分，要求调剂，这表现农民是迫切要求土地。

三、干部方面的情况

（一）个别的存在着严重的富农路线

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多留田高于基本群众，留好田、多余的耕牛、农具等，不退青苗。根据王圩乡所得材料来看，是由于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富农路线，同情地主怜惜地主，认为地主拿出地已太多了，不能再追了，尤其认为地主家公子妇女，都是娇生惯养不能劳动，不能比之一般贫苦的穷人，应比穷人多留地，对地主只献孬田不献好田，也就不加追究了。

所以产生富农路线倾向的根源，这与干部自身成分有关系。以王圩乡双河村干部成分来看，一般核心干部大多是中农，两个村长、村农会主任均是中农，妇会长是地主，以全乡来说，乡指导员、乡农会主任、乡队长、财粮委员、保卫委员，亦都是中农，这些中农成分中，只有 1/3 是新中农，其余都是富裕中农，因此中农成分占了领导地位。中农过去虽受压迫，但是中农是想上升的，他们看不到雇贫农的痛苦，加之领导上次土改的骨干又都是富农，他们对贫雇农的痛苦是不能体会深刻的，因而产生了富农路线，因此在分配土地时，对群众是恩赐观念，甚至有个别农民干部打击力争土地的农民说："山东不知打的怎样？争什么！"因为富农路线的存在，对土地改革一切工作，就不会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去处理，老契可以不追出，地界也不确立，赤贫农的宅基地、住屋耕牛、农具种子，也不积极向地主去争取。

（二）干部包办代替

在土地改革中，干部存在着包办代替的作风，没有贯彻群众路线，没有启发群众去争，自己去讨论，自己去分田。分田本是群众的事，但偏偏有些干部个人或几个人商议了一份分地草

榜了事，发生得地户不知地在何处的笑话。在群众中产生了恩赐观念，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群众，在组织上不能发展群众、巩固群众。如沭阳章集区胡圩村，即是由村支书与组织委员包办代替出榜了事，潼阳某村即由于指导员对分田一人独自当家，因此群众大多数不赞成，都主张重分。

（三）自私自利和贪污包庇

在土改中，干部怕分自田、预先卖田者有之，以孬田换好田者有之，以远田换近田者有之，以带小姨子名义冒领土地者有之，以少报田数多得田、以弟兄三人报三个田数亦有之，以一切办法达到多得地自私的目的。

由于自私而发展为贪污群众斗争果实，如斗争的现款公私两用下马虎了事，斗争的粮食、牛可以私送回家去，自卖自用，地亩捐原是每户 5 角，某乡长加收 7 角，每户多捐 2 角贪污享受，不能及时将果实分给群众，自私中饱。有农民沉痛地说："斗争举手是我们的，分果实则是干部的。"群众的不满造成群众对干部很深的隔阂。

在土地分配上的包庇行为，表现为自家、本庄、亲戚、家族、小组都是多分田、分好田，甚至分田小组也是集体自私，多分田、分好田。对爱人、妻女家亦不例外的分好田、多分田，这种不公平的包庇行为，又发展为另一方面的欺软怕硬，结果是刺头讨巧，老实头吃亏，孤门小姓没势力的，虽经土地改革，但仍旧是赤贫农，引起了群众对干部的不满与不信任。此次复查中，一般群众均表现分田要自己做主，不信任干部，这一方面表示了群众的进步，同时也表现了由于干部在土改中不公平包庇所招致的后果。

至于个别落后分子，受地主收买庇护地主，这更是失去阶级立场的严重现象。

（四）关于中农利益的侵犯

过去由于执行政策的偏差，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虽经地委一再指出纠正，但在以往复查中，对中农仍有侵犯，有的中农未得到补偿，其原因：

1、对中农划分的错误。一般划分中农与富农的区别，不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上去划分，不问其生活来源是否主要依靠剥削，还是靠自力，仅从每个人 6 亩田，超过 6 亩田者就是富农，未到 6 亩田者就是中农。如此划分，就很容易侵犯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利益，甚至有的乡村划分是 4 亩地以下者不拿地，4 亩地以上者都拿出，发生侵犯中农的严重现象。

2、由于政治上狭隘的片面成见，对某些中农由于某时期的政治态度不够好，复查时就不补了。如沭阳宜选乡雇工沈從成，过去怕受压迫接近了汉奸沈從岭，于是就从表面认为他是坏人，因此就觉得不补他土地。

3、对肉头中农抱成见。肉头中农是一钱如命，贫农困难时向他借钱借粮往往遭到拒绝，因此在复查赔偿中农利益时，干部群众对其嫌弃而不予补偿。

4、私人报复。有的中农对干部不满，干部亦不满他，所以在补地时就提出不补或不补齐，有的藉口中农无劳动力不补足。如此次王圩乡就有两户中农因此而未补偿其损失。

总之，经过了纠正侵犯中农的偏向，在复查开始中，某些基层干部对补偿中农仍表示不满，反映说："好事都是上面做，拿地是我们去拿，现在又要补，补了有什么用呢？"

（五）土地复查中的各方反映

1、干部的反映。干部的思想与表现可分以下三种典型：（1）对复查抱抵抗思想。因为自己贪污、多得田、得好田、得近田，加以作风不好，因此就怕复查，怕在复查中降低威信，或不能再当干部，害怕赔偿贪污果实。少数干部认为"复查是查干部的"而怕复查，因此对复查是抱对抗态度。

（2）怕麻烦。在土改中走了许多弯路，因此对复查有怕麻烦的情绪，有些干部认为复查没有用，他们说："有天下就有群众，没有天下就没有群众，群众不跟你走，再复查也没有用。"

（3）希望复查的。有的干部在土改中，没有得到利益，未贪污，想在复查中得些利益；有的觉得自己未贪污，心中很高兴，希望黑白搅清；也有的过去落选干部，希望这次复查能查

掉一批干部，自己可以东山再起。
2、群众反映。（1）得地户（基本群众）。一种是对复查信心不高，存在变天思想，还有认为弄来弄去好地都是干部的。一种是对复查抱有希望的，认为种一季是一季，总比不种的好，要复查是大家的事，大家的事大家担，因此基本群众中未得田的与赤贫农希望复查。
（2）中农的两种反映。一种是怕复查的，有两类类型，一是被侵犯的中农，害怕再拿地；其次是未被侵犯的中农，认为去年滑过去了，今年滑不过去。另一种中农较了解我们的政策，对复查抱无所谓的态度。
3、出地户亦分两种。一种认为自己已出过地了，这次复查是查干部的，抱不闻不问态度，狡猾些的地主，则幸灾乐祸，挑拨干群关系，掩盖自己，工作中假献殷勤。一种抱怀疑态度，怕复查再拿地出去。

第二部分复查方针
我们的复查方针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摧毁封建势力，贯彻土地改革，消灭明分暗不分现象，使土地分配公平合理，使雇贫农均获得满意土地，纠正干部及少数农民多分土地、多分好田、多得果实、自私自利、脱离群众的富农路线的倾向，改造干部作风，以团结所有农民进行反蒋保田保饭碗斗争。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必须要达到如下具体要求：
一、以雇贫农为主，以雇贫农为骨干，团结中农，组织群众大多数，彻底发动群众，摧毁封建残余势力，树立群众的巩固翻身思想。
由于地主数千年来的对农民压迫，检讨目前部分群众阶级觉悟还有不够高的地方，对封建势力还没有存在高度的仇恨心，与地主有此慈悲妥协的观点，及吃不住地主利诱威吓的变天思想，远不能决然地武装起来与他们斗争。如东海吴集区个别农民因恐惧变天，还有暗地送钱给地主，与地主暗中勾结，这次复查中，一定要把隐藏的封建残余势力肃清，把地主在干部与群众中的威望肃清，使群众提高一步，敢于拿起枪杆进行群众性游击战争。所以首先我们要说明，以政治上打垮封建势力，即或某一乡土地问题并不过分大，但也要精细地组织群众，达到教育、扭转变天思想，通过土地复查彻底确立翻身思想。
二、克服富农路线，反对干部多留田、留好田的现象，查出地主富农黑地，清查公田，以消灭农村中赤贫现象，抽多补少，填平补齐，抽肥补瘦，肥瘦搭均，以达公平合理，教育群众确立产权思想，提高群众的生产情绪。
这主要说明要在经济上摧毁封建势力，在这次复查中，不允许富农路线的存在，应该把地主多留地一律拿出，很好清查黑地，把公田拿出，分给赤贫农，解决群众土地要求，达成数量上、质量上公平合理，避免重分大变动，首先在干部中挤出多余土地，再挤地主、富农的多留地、黑地等，不向农民挤地，一般说足够满意解决赤贫农土地要求，以扭转变天思想，一定可以提高群众生产情绪。
三、彻底清查果实，算出地主、富农多余农具、耕牛，补偿赤贫得田户的青苗，以解决赤贫农之生产困难，消灭熟荒，分配多余房屋，给无住屋的赤贫农。
彻底清算果实，干部坚决拿出贪污果实，地主未退青苗的应退出，集中一切财力，以帮助无力耕种的赤贫户。
四、贯彻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包办代替的官僚作风，一切由群众做主，以求彻底发动群众。
事实证明，要完成复查，只有彻底发动群众，如群众未发动，可以断言土地复查不能完成，要彻底发动群众，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包办代替的官僚作风。复查是群众的事，一切应由群众做主，分田、分果实、丈地、要契等均应由群众自己去做，当然不是等于群众自流，

干部必须掌握方针、政策，启发、教育、领导群众。
五、普遍赔偿中农损失，教育中农，团结中农，以达巩固雇贫中农的团结，以达到团结人口90%以上。
在解决贫雇农满意土地后，要肯定赔偿中农，一个也不漏。一般彻底查出地主、富农土地，除补足赤贫农外可以补充中农。如实在无地，公田、学田可以一亩不留，做到补还中农利益，并在政治上提高中农地位，教育中农。
六、通过复查，开展民主运动，改造干部作风，调整干群关系，以达成干爱民，民拥干。
在复查中，必须开展民主检讨，始能提高群众信心，启发其情绪，过去多得田、贪污果实、打骂群众的干部，必须向群众坦白反省，打骂的要道歉，多得田与贪污的要拿出交还群众，除非在群众自愿的情况下，可以部分的拿出或分期拿出。一方面对成分很好的干部必须教育，使群众了解其功劳，同时也要指出群众在执行公派任务之应尽义务上的许多缺点，适当掌握，能做到干群融洽，干能爱民，民能拥干，严防普遍反干部的倾向。
七、通过复查运动，清洗阶级异己的投机分子，及个别变质的退化分子，大胆提拔贫雇农，改变村乡领导成分，掌握武装，整理组织发展组织，以确立巩固的群众优势。
根据这次调查的几个乡的材料，在乡村领导成分中，中农以上占了主要成分，还有一些流氓，干过顽伪的分子。非雇贫农出身的，也就不了解与不能体味雇贫农的甘苦，不能代表基本群众的情绪，也就不能代表基本群众的意志，不能为群众办好事情。同时个别异己分子，他们有统治人的思想与剥削人的观念，而形成了官僚作风。因此，复查中必须改变其领导成分，大胆提拔好的积极的雇贫农成分，充实支部领导，政权武装群众。团体应以雇贫农为主，最坏的蜕变分子，不惜以群众斗争的压力，予以清洗。对于积极工作的干部，未变质的干部，亦应纠正其缺点，予以教育，被清洗的干部亦需争取，争取其戴罪立功。同时组织群众武装，加强群众武装的观念，开展群众性游击战完成坚持任务。
在土改运动中，党与群众团体不但未能发展，相反的有些群众组织垮了台，这固然由于土改后接踵而来的大后勤，未能加以整理，但当时主观上也未能一边开展运动，一边及时发展组织整理组织，此次复查中，必须将群众绝大多数组织起来。

第三部分复查中的具体政策
一、地主
在贫雇农得到满意土地后，另一方面使地主能生活下去，不至于陷入绝望，不完全使地主走向敌对，使他们能生活下去，给以适当的照顾。我们要团结90%以上的群众，但对少数地主、富农，我们亦应予以分化，所以在处理上对不同性质的地主、富农应采取不同方法。
对一般地主、开明地主应分别处理，对逃亡地主应分干顽事和不干顽事，干顽事的亦应区分为坚决为敌服务或不坚决的。根据以上原则，确定地主留地多少。
一般地主留地在贫农以上中农以下水平。
1、逃亡地主与贫农一样水平或略低于贫农水平。
2、逃亡干顽事而不坚决的应低于贫农水平及低于一般逃亡地主。
3、坚决干顽事罪大恶极者，将其本人应得部分没收，家属留地等于贫农水平。
4、一般地主留地略高于贫农水平或与贫农相等，但稍高于贫农四五分者亦不必再抽。
5、开明地主及工抗荣烈属，留到相近中农水平，但开明地主与工属之留田超过贫农水平者需得群众同意。
6、地主所留的地，在肥瘦上应相等于贫雇农。此次复查必须严格执行抽肥补瘦、肥瘦搭均之原则。

7、地主除留下能维持生产的农具外，其余农具应分给农民。
8、地主多余房屋可以分给赤贫户住，但不可拆毁，假如一乡里有很多没收房子未分配，在农民解决住屋情况下，可做公共保管，留作公共事业。
9、不允许分地主家具、物件、衣饰等。
过去地主土地已分掉的即不补，如未分的在复查中应根据以上政策处理。
二、富农
1、根据土地情况，一般留地到中农水平，或介于贫农与中农之间水平。已分配者不补。假使在土地多的地方，可以抽出其剥削出租部分。
2、新式富农（即勤俭起家的），可以高于中农。
3、富农坚决干顽事的，留到贫农水平。
4、罪大恶极的可以没收其个人土地。
三、对地主、富农的鳏寡孤独，过去没有照顾的可以适当照顾，但要经过群众讨论。
四、中农
1、坚决普遍赔偿中农损失，尽量设法赔偿土地，土地不足时可以补以公债券。
2、凡投敌坚决为敌服务，查有实据者，可以不补偿，个别的可由群众讨论补偿。
五、市镇贫农及小手工业者
1、在土改中已经分得土地者，尽量动员其要地，有其他职业不以土地为主要收入，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准其退出。
2、在土地不敷分配地方，市镇居民有职业者可以少分。
3、土改中得地抛荒者，可以征得同意退出部分土地。
4、在土改中未得足土地，而要求土地者，可依其实际需要分给土地。
六、青苗
1、地主、富农的黑地、青苗全部拿出，得地者得青苗。
2、地主、富农多留的自种地，富农的青苗与得益户对半分，地主的青苗与得地户四六分，地主得四成地户得六成。
3、地主、富农多留佃种地，青苗全部拿出给佃户与得地户三七分，佃户得七成，得地户得三成。
4、中农补的土地，青苗归中农得。
5、公田佃种田，青苗全部拿出，佃户得七成，得益户三成；公田自种田，自得七成，三成归得田户。
6、学田青苗收获或给学校或分给群众，由群众民主讨论。
7、分得地主的果木树，不许刨，地主自留地面上的树木归地主。

第四部分民主检讨与干部改造问题
一、对干部的认识
（一）对干部的正确认识。淮海区经过了三个时期，一个是秘密时期，一个是抗战时期，现在是自卫战争时期。从秘密时期转向公开发展到现在，全地区的干部不仅在秘密时期坚持了，而且经过了抗日战争，在敌伪残酷“扫荡”斗争下锻炼出来了。目前经过了今天自卫战争，蒋后斗争的残酷性超过了抗日时期，但目前基本上是坚持下来了，确信是一直可坚持到反攻到来。在这许多艰苦斗争中，尤其是基层干部，更是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抹杀的功劳。不可想象的，我们的干部在艰苦残酷生死的斗争中锻炼出来了，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在民主建设上，干部带领农民向封建势力作斗争，曾不断领导群众生产，使农民获得了很大利益，

贫农的生活水平是比前提高了。比如去年的大灾荒，干部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救灾，假使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话，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民。在自卫战争中，繁重的后勤任务中，完成了之前的任务，使战争取得了胜利。
总之，干部受到了战争的考验，政治上都是坚定的，党的方针通过了基层干部是基本上完成了的。
除了以上功劳外，我们干部是有缺点有过失的，但这些缺点，亦仅仅如冀鲁豫《人民日报》社论里指出："是拥护中流露出一些不满，是热爱中感觉一些失望。"今天党与群众基本上是团结的，但对某些个别分子与具体人的不满，可能尖锐一点，如果仅拿一点去看全部，那完全是错误的。
今天的干部问题，不只是淮海的问题，而是整个解放区的问题。因为群众在几年斗争中政治上是进步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切都在进步中，客观形势也进步了。但因干部的进步赶不上客观形势，赶不上群众的需要，因此就暴露出来了缺点，所以这些缺点也可以说是进步中的缺点，今天我们太强调了干部的缺点而看不见干部的功劳，这是不公平的。
（二）干部的几种现状
1、四种类型的干部：（1）品质优良，工作积极，作风正派；
（2）品质好，作风也正派，在生活上有小缺点；
（3）成分好，但带有浓厚旧社会的意识；
（4）变质的阶级异己分子，地痞流氓。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除了第四种不可救药外，以上三种皆可以挽救的。
2、从群众眼中看干部：（1）毫无批评、真心诚意拥护的干部，这种干部是少数；
（2）本质上不错，作风上不好也不过分坏，群众抱无所谓态度，此类干部占大多数。
（3）深恶痛绝，群众决心抛弃，此类占绝少数。
从以上分析看，在群众眼中的好坏干部也是两头小、中间大，为群众所深恶痛绝者亦是极少数。再根据几个乡的实践来看，放手让群众进行民主检讨，只有个别的群众不满外，大多数经反省检讨后，群众皆很满意的，坚决推翻的仅是少数。这说明真正发动群众后，群众的眼是明亮的，可帮助干部检讨进步，不会成为盲目反对干部。
3、干部不良倾向的根源：
从客观上检讨：（1）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遗传，自私的观念一贯流传着，都有高人一等的统治思想，我们干部是在旧社会生长的，所以旧社会的遗毒很深。
（2）今天处在农村环境中，农民一般的特点是狭隘自私，在农村中往往容易产生报复及宗族、家族的小集团观念，耳濡目染都给干部很大影响，同时在斗争过程中，地主封建势力也有意的腐蚀拉拢我们干部。
（3）干部政治觉悟不高，我们干部自身成分不是工人，大部分是减租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或者中农成分占多数。
（4）历年来繁重任务及突击工作，干部学习检讨机会很少，如参军、后勤等工作，为了完成任务，对群众都是用强迫方式，造成对上负责，对群众不负责任。
领导上检讨：（1）在每一个繁重的突击工作完成后，及时加以总结工作不够，未能抓紧教育干部，提高干部。如反奸运动，由于领导上没有抓紧，以致干部有大批贪污现象，助长了自私自利倾向，后来虽然做过总结，但还是不够；在救灾中虽完成了任务，也有发生不照顾群众利益的事，也有趁机贪污的现象，但也未加以总结。在土地改革后接着来了大后勤，因客观环境都没有加以总结，如果在每一突击任务完成后，能够来一次自下而上的全面总结，是可以把干部思想上、作风上提高一步。
（2）在思想教育上做的不够，未能很好的抓紧一个问题，教育全党，没有能把根源找出来，展开全党讨论，如宿北的反奸，过去也加以检讨，但做的还不够。

（3）在赏罚制度上不够严格，对干部基本上是思想教育，但对个别极坏干部必须抓住一个时机加以法律制裁，对于好的干部应该加以表扬，作为全党学习的模范。对这方面我们过去虽然做了些，但还嫌不够，所以下面有个别干部反映："调皮讨巧，老实吃亏。"因制度的不够健全，个别这种现象是可能存在。

4、干部不良倾向的严重性：（1）使党的路线政策不能贯彻，如土地改革，基本精神是要求摧毁封建势力，使雇贫农获得满意土地，经过干部努力，基本上是完成了，但没有贯彻下去，产生许多不公平合理的现象。如我们的党是与群众密切联系，我们的路线是群众路线，这方针基本上是执行了，但由于干部的贪污腐化，在个别人事上，群众对干部极端不满；如党的宽大政策，基本上是执行了，但由于个别干部的包办，也有杀错人的。因为干部的自私狭隘，感情用事，对上级的指示不能执行，致使党的方针政策不能百分之百的贯彻下去。

（2）使一切工作进行受了阻碍，一切工作不能提高。

（3）减弱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如果能够完全贯彻下去，一定能达到与群众更密切的团结，群众基本上是拥护党的，但因对个别干部的不满影响了对党的信仰。在土地改革中因为分配土地不均，干部作风不好，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这些作风如不能改造，可能使群众由热爱中的失望而变成绝望，今天要把淮海区坚持更好，群众更靠近我们，必须要改造干部作风，而达到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4）使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尽量发挥，或多或少妨碍了群众的进步。封建势力打垮后，群众的积极性基本上是提高了，群众满腔热情要求民主，所以不能高度发挥其积极性，主要是干部不民主，被干部的官僚作风压制住了。如群众积极要好地，这是好事，但干部说"你要好地吗？搬出淮海区去要！"压制住群众的情绪，造成矛盾的尖锐化，这是很危险的现象，应该注意改造干部的作风，应有足够的认识干部不良作风的严重性。

二、民主检讨的方针精神与要求

（一）方针

在群众发动起来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后，今后唯一阻碍群众进步的是干部作风，在干部作风中最严重的是官僚主义。至于彻底清除官僚主义，在今天来说，是不可能的，这需要群众真正翻身后，在政治文化上都达到相当提高才可能。目前战争时期，要做到减轻减弱官僚主义的发展，将来能真正开展广大民主运动，更好地改造干部。

改造干部的基本方针，是思想改造重于组织改造，以思想改造为主，组织改造为辅，但这也并不机械。今天一般干部是忠实于党的，被人民深恶痛绝的是极少数，应该根据实际现状来处理，对少数异己变质分子，应采取组织改造。

（二）改造干部的精神

以今天的情况来说，认为一次肃清干部坏作风是不可能的，中农只能做到把干部提高一步，因为改造干部是长期艰苦的斗争过程，犯急躁病是不合客观情况的。

今后改造干部，应全党集中力量，通过每一运动每一工作，一刻一分钟都不能放松来改造干部，必须经各部门的努力，加强宣传教育，健全组织生活，而不是说经过一个运动过程就放松了，就认为天下无事，必须每一工作完成后，要加以总结，使干部思想彻底转变，坏的作风不能发展。

在此次民主检讨的领导上，应以爱护干部、帮助干部进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领导干部检讨，我们领导干部，如果专门去找干部的毛病，不站在爱护的立场上，往往形成上下隔阂，使干部不能彻底反省，不容易接受意见，我们必须确立热情诚恳帮助的态度，使检讨容易收效。

（三）民主检讨的具体要求

1、在这次土地复查中，首先要求干部做到不阻碍群众的翻身，彻底把群众发动起来，贯彻土地改革，因此过去干部多得田、得好田果实的都应全部拿出，给予自私自利的严重警惕。

2、一些坏的干部，一定要在群众面前悔过坦白，使群众发动起来敢讲话，使群众无顾虑，

个别坏的可以首先撤职。
3、克服包办代替，经过这次民主检讨，把干部提高一步，确立初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做人民勤务员的思想，把高人一等的统治思想压制下去。
4、好干部得到提拔表扬，坏的给以适当处理，阶级异己分子必须清洗。过去干部不是经过群众认识而鉴定，这次评定干部的好坏，经全党确定后另外须经群众来评定，经群众鉴定的是真正好干部，应予表扬。
5、提拔贫雇农成分为支部领导骨干，因为初翻身群众要保卫自己利益，阶级仇恨性比较深，同时贫雇农自身对贫雇农的体味是不同的，真正翻身的群众也懂得正确执行政策。
6、树立基本群众做主思想，提高民主积极性，发扬民主，建立初步民主制度。
三、如何开展民主检讨
（一）检讨的方式
1、干部检讨必须与群众检讨相结合，必须发动群众以阶级友爱的精神来替干部洗脸，才能使干部检讨更彻底，群众积极性能提高，群众怨气可以发泄而尽。有人认为检讨干部作风，经党内就可以了，其实经过群众检讨，更可以揭发彻底，群众能深刻认识干部。在步骤上，是先党内检讨，随后再结合群众提意见。
2、无论在党内检讨或群众检讨提意见，不仅要表功而且要检讨，检讨缺点也要检讨优点，不表功会使干部灰心，不检讨会使干部麻痹。检讨方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先检讨或是先表功皆可以，但与群众结合检讨时，重点是检讨，不然会丧失群众情绪。
3、民主检讨开展，必须要很好打通干部思想，首先把干部的不良作风严重性说明后，以实际材料打通干部思想，说明向群众检讨，不会丧失威信，反而提高威信。
对群众应打通其敢说话思想，使群众没有顾虑，做到有什么说什么，另外教育群众，认识到什么是好干部，什么是坏干部，说明好干部的条件，是能够武装坚持、立场坚定、努力完成任务、不与地主为伍、能替农民解决痛苦。
4、群众在拥护干部检讨上，应着重于过去勤于公务等态度、躲避逃跑等现象上，从积极方面订出自觉的纪律，服从干部领导。在检讨上要有分寸，方式可以采取示范。
5、在外力帮助地方，可先了解情况，然后再开展检讨。
（二）检讨的原则要求
1、经过这次检讨，使干部情绪不消沉，能积极工作，勇敢负责。
2、达到群众彻底发动，使群众情绪提高。
四、干部问题的具体处理
（一）本质优良、作风正派，为群众爱戴的干部，应给予表扬证功，具备提拔条件者应加以提拔。
（二）品质好，作风上生活上有小缺点、小倾向的干部，除给予适当的批评教育外，对其优点与成绩方面，应给予记功表扬。
（三）对有严重倾向、沾有浓厚旧社会作风、正在变质的干部，视其功过酌情处理。
1、功小过大，其功不足以抵过者，组织上可以给予警告、停止党籍或开除党籍处分，行政上予以停职、撤职、赔偿、查办到判刑。
2、功过相等者，除向群众认错赔偿损失外，主要予以争取教育，不着重组织上或行政上的处分。
3、对成分本质好，而有严重不良倾向的，可准其戴罪立功。

第五部分土地复查过程

一、调查了解，确定方针

要开展土地复查，首先要了解这一村乡的具体情况，如土地分配情形，赤贫农得地情况及干部关系等，了解以后，可以确定工作重点。了解方法，可分为以下数种：

1、首先进行个别访问，主要向得益户的雇贫农中进行访问，尤其要问孤门小户，广泛地向小组、中农、干部中搜集材料。

由于贫雇农是新得到土地的，他们很乐意告诉你许多事情，尤其是赤贫户及得益不足户，他们多半是孤门小户，在土改中因未分到足够的土地及好地，他们又满腹委屈，最容易告诉你土地分配不公，及果实未分等贪污事情。在访问中一定要说明自己身份，与表明在此次复查中，决心解决一切不公现象，使群众反映干部的更真实的材料。

其次从干部中了解，必须注意三点：（1）有些干部因在土改中犯了毛病，对复查在思想上抱对抗态度，不愿意告诉你真实情况；（2）干部与干部间易于包庇，即使问到好的干部，因互相间的要好或顾虑，也不会告诉你真实情况；（3）互相间不团结的干部，又易于夸大缺点。因此访问干部，只有从各方面调查，将材料互相参照，详细分析，再将从群众方面了解的对照，即可得出一般情况，尤其是干部情况。

2、从会议中去了解。个别访问后应即召开得益户的群众会议、党内干部会议，说明形势及复查的意义，进行漫谈，于漫谈中发现问题，收集材料。

3、进行统计。须要很清楚的了解一乡一村的土地改革中的偏向，应着手于统计工作，从土地分配的统计表中可以露出问题。因此，要了解土改的情况，首先要做好统计工作，将土改前土改后得地户、出地户、中农、赤贫农等各阶层得地水平、得地多少、出地多少、好孬地各多少都一一统计出来，如地主留地水平超出贫农，则贫农地未得足，超过的应拿出。

二、打通思想，组织力量

在群众中打消害怕变天思想，教育其要地，得了地才可以使自己翻身，子孙翻身，否则自己受苦，子孙抱怨。要使他们敢于要地，敢于说话，无顾虑地向干部提意见。干部中要认识复查的重要，要想发动群众，首先干部要想群众反省检讨，退出多得土地与贪污果实。

在复查过程中，主要力量依靠贫雇农，以广大的贫雇农为主力，尤其须掌握赤贫农及得田不足的贫雇农，因为他们更积极些。在运动中，必须吸收中农参加，从贫雇农中发现选拔大批积极分子，成为领导分子，再加上一批大公无私、成分纯洁的干部领导。如果以自私自利、贪污腐化的干部为此次复查的领导骨干，是会失败的，这是贯彻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先决问题。

因此，根据这个原则与收集的材料，召开干部党员会议，及贫雇农会议，进行打通复查思想，着手组织力量。

（一）在干部党员会上，首先确定复查中的干部领导骨干，选择正派积极的干部充任领导骨干，另一方面清理果实。

（二）在群众会议上，打通群众思想后，即进行讨论，如何复查，而联系到组织复查骨干，在得益户贫雇农会上，选出积极正派的人组织成公道小组（即复查小组，因“公道”二字，是群众自发名词，比较适合群众口味），以从事复查工作。

三、行动阶段

（一）首先召开复查委员会，漫谈此次如何贯彻土地复查，在会议上把得地出地与果实应得与不应得的预算造好，预算造成，再让党内支部讨论，看看当中有无偏差。分果实有两点：一是缺什么分什么，二是把果实有重点集中使用，解决最困难户。

（二）召开群众大会，通过预算，在群众中进行讨论，公布出田、得田、分果实的墙报。

（三）草榜公布后，即发动群众性的要地要契运动，成立清丈、复算、说理等小组，并吸收中农及贫苦小学教师参加，开展运动。干部则分头掌握，由群众自己去清算、清丈田亩，追地契，查黑地，坚决反对干部包办代替。党内干部要分头掌握，老契追出，土地清丈分好后，

即转入发动群众立新契、打地界。立新契要慎重其事，尊重群众风俗，自己买棉纸，由群众央请中人四邻出田户吃饭，热烈确立产权。

四、民主大检讨，民主改选与巩固组织

经过了土地复查过程，在党内可以经过更深一步审查干部，而群众也可以认识干部，因此在土复将结束时，即须进行组织调整与民主大检讨，以改造领导。首先开支部会，根据群众意见确定调整对象，好的干部应当表扬，本质好作风坏的应教育其向群众坦白道歉，也不抹杀其功绩，对变质异己分子坚决予以清洗，大胆提拔贫雇农中积极分子，改造领导成分，人员大体确定后，再召开党员大会，在党员中讨论通过，再传播到群众中去，有计划进行酝酿。在群众中还须进行两种教育：一是反省自己对公益义务等不服从干部不对的地方，及今后应该如何爱护干部；二是酝酿讨论当干部要具备哪些条件，什么人够当干部，以使群众正确选举，以能选出党未察觉的更好干部。

酝酿成熟后，召开民主检讨大会，表功检讨，群众也进行检讨，对干部检讨上要比较严格，空气要和蔼团结，干部选出后，即进行宣誓就职，干部宣誓内容是真心诚恳为群众服务，爱护群众；群众宣誓为拥护干部与付出干部领导，随后召开胜利团结大会，以武装保田保家口号坚决斗争。

由于经过此次复查，群众是彻底发动了，积极分子是必然大批涌现出来，因此于复查过程中，或复查过程的最后阶段，应即着手发展党员、农会员、妇会员及民兵等，将所有的群众团体都加以整理与恢复，只有把一切群众组织发展和巩固起来，今后一切的工作才可以彻底开展与完成。

复查运动所经历的四个阶段是如此，但这四个阶段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毫无联系的，他是相互关联的，不过每一阶段有其重点而已，如打通思想，在每一阶段都要进行的。在运动过程中，组织力量是任何阶段都要抓紧的。在第二阶段，虽然是以打通思想、初步民主检讨、组织力量为主，但是对个别变质或投机的异己分子，为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干部，可以经过群众罢免，另一方面也不能机械，如果某一乡乡干整个成问题，如不进行组织大改造，则群众不易发动，因此于第二个阶段即可进行民主大检讨与组织改造，然后再进行土地复查工作。

第六部分几种类型

一、富农路线（涟水王圩乡）

王圩乡在土地改革时，由区里派来正副区长在该乡指导工作，他们均是富农成分，全乡的干部亦大部是中农成分，在工作开始时，找地主富农谈话，劝他们自动献地，结果皆献孬地留好地，每人留地亩数在 5 亩以上，而得地户每人亩数皆在 3 亩左右，在地主手中还有大批黑地。

根据地主富农水平，及贫农、外来户未得足土地，可以看出该地封建势力还未彻底废除，封建势力在我们干部和群众中均有深厚影响。虽该乡亦有个别包办贪污现象，但不甚严重，在该乡主要是富农路线，因此须确定方针口号，坚决发动群众夺取地主多留地及黑地，彻底摧毁封建势力。

二、干部包办代替（泗沭梨园乡）

梨园乡干部戴世春，出身虽是贫农，他本人在家不肯做活，当过顽区长 3 年勤务员，当过土匪，大胆妄为，作风下压上拍，其实质是地痞流氓。在此次土地改革中，他打击干部说“你们是中农，会犯中农路线”，完全由他一人操纵包办。他当时开除了 4 个党员，他说：“上级说要洗刷，树老了会盘根，非割去老根才能发展。”事实上被开除的党员并不坏，成分也是贫农。在土改中他的工作方式，凡地主富农地一律拿出，中农每家所有田超出全乡水平 1

亩多的亦一律拿出，地主富农青苗全部拿出，中农拿出一半，全乡 556 户中，共侵犯了 92 户。在分地时，他提出口号是先抗后贫，其实在分时抗、贫完全分到最孬土地，靠河岸的好地完全分给干部。第一次分过后又剩下几顷好地，干部又以自孬地调换，结果还有园地未分，最后也被干部分掉。果实分配时，马虎不公平，全乡民兵先提出十石粮做弹药费，另外几十万斤火草全部糟蹋了。另外他又组织冲锋队，组织了全乡男女老少，冲光了 26 家地主，冲得的果实，由参加冲锋队的人抽签分。因此全乡搞得一团糟，群众怨声载道，深恶痛绝。这次复查中为了发动群众，根据群众要求，而确定方针是首先开展民主检讨，斗争罢免戴世春，以便突破一点开展工作。

三、佃户匀地（宿迁河堂乡）

全乡共 4 个村，胡庄村有 8 户地主，有土地 13 顷，水庄村地主是极乐庵老和尚，有 27 顷土地，贺庄是老和尚客庄，有 7 顷土地，除这 3 个乡村外，只有桥口村有几户富农，其余大都是贫农佃户。经过过去历年减租斗争，地主土地已绝大部分转移至佃户手中，老和尚逃跑后，没收土地又全部分给佃户种了。

在土改时，由于干部包办代替，只动员了地主富农献地，地主富农皆献孬地，佃户并未匀地，佃农每年每亩收获量是在 400 斤以上，中农在 240 斤以上，地主富农在 200 斤上下，贫农每年只 70 斤，相差悬殊。

因此这乡主要方针是说服佃农拿出好田，分给贫农，此次复查中，除应追出地主富农好地外，贫农普遍要求佃农匀地，后来召开会议，商定佃农水平降至 250 斤上下动员匀地。对佃农动员匀地，基本上以团结为方针，提出鱼帮水、水帮鱼的口号，对佃农要确立基本群众的态度，指出贫农因得地不足而不满，说明团结贫农增强斗争力量的重要性，并把贫农得地不足水平告诉大家，以使佃农自觉匀地。

四、边区土地复查

（一）一般群众思想情况

1、淮海区转入敌后坚持，在群众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初开始认为蒋军力量大，八路站不住，经几个月来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数次“扫荡”清缴，这种胜利的坚持，给群众情绪上以很大鼓舞，因此边区群众回味道：还不像鬼子时代一样吗？尤其是山东几次大捷，群众看到我正面力量的强大，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承认八路军一定能胜利，一种估计青纱帐起时能反攻好转，一种仍对胜利有怀疑。

2、群众对蒋军的憎恨。由于蒋军的纪律不好，造成群众普遍仇恨，感觉到还乡团比过去二皇军更坏，沦陷区人民因深受蒋军的蹂躏，更回想到过去共产党的好处，因此对我们更加拥护了，对敌人是无限仇恨。

3、群众思想上有顾虑，生产情绪不高。因边区是拉锯式斗争形势，怕蒋军来敲竹杠，因此生产不积极。虽然认为我们能胜利，但群众是有顾虑的，还没有大的勇气马上起来干。

4、干部在边区武装活动，对群众不相信，认为群众不可靠，没有形成群众性游击战争，对群众武装放松，斗争中陷于孤立。

5、土改后一般土地情况：有的地给地主要回去了，许多土地因不敢种大片抛荒，也有得地户把收获的粮食送给地主，有的群众还不知地界在何处。

（二）边区如何进行土地复查

1、基本上土地问题未彻底解决，以中心区一套来管边区是行不通的，群众多少因畏惧地主而与地主有联系。首先研究开展群众性武装斗争，如果武装斗争不能发展起来，土复工作就无法着手，只有群众敢于拿起枪杆，撕破脸斗争，消除严重的害怕变天思想，土复工作才可以进行，非突破这一关不可。

2、如何发动群众性游击战也应与土地改革贯穿起来，与群众基本利益结合起来，如敌人在边区进行抢粮、绑票、抓壮丁、奸淫，应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通过这种方式发动群众。

干部应分散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打响第一枪，或者组织群众打更放哨，逐步深入主动前进，走向斗争。
3、加强宣传工作，与政治攻势结合起来。武装斗争未搞起来以前，动员群众抗捐抗粮，加强时事宣传，扩大对敌胜利信念，造成群众性政治攻势，把土顽气焰压下去，争取瓦解土顽，在群众中树立对敌非法行为进行武装斗争的观念。
4、在边区最低限度使群众敢种敢收，在这一地区群众已动起来后，可以提出："一锹也动土，十锹也动土。"以开展全面斗争，奠定将来复查基础。
（三）在新收复区要发动群众进行反倒种、反倒苦，第二部再做土复工作，领导者要学会一面武装斗争，一面做群众工作。

第七部分复查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如何贯彻群众路线
（一）过去工作中为何不能贯彻群众路线
1、过去许多工作都是突击性的，为了快就不能细腻组织，规定时间很短不能细密打通群众思想，久之变成对上负责对群众不负责，因而产生代替包办的官僚主义。
2、在等级社会制度中，一般有一种高人一等的统治思想，不能与群众感情融合，因而不走群众路线。
（二）如何贯彻群众路线
1、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上确立相信群众，要有群众观点民主作风，认为群众无能是不对的。法西斯对群众是采取欺骗手段，他们是不相信群众，我们应认为群众是一切力量的泉源，是有创造能力的，一切的新发明，皆是过去劳动者积累的经验。几年的经验也证明，群众的力量是大的，如筑公路、修河堤都是群众的力量。就追契来说，使用了群众力量，很容易追出，所以自命不凡、骄傲自大，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2、什么叫做群众路线？所谓群众路线，在思想上明确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谁、依靠谁、通过谁。土地复查时为了贫雇农，就要依靠贫雇农，因此在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是要选择贫雇农为领导骨干，所以走群众路线，一定要确定阶级对象，要发动贫雇农成分来干。
我们的复查方针政策，要告诉群众，要群众了解让群众讨论研究，群众就能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一切靠群众做主，丈地、要地、分地、追契皆可由群众来做。根据几个乡的实验，真正通过群众，才能达到公平合理。
在具体问题上，一切根据群众要求，一切尊重群众习惯，不能把我们主观想象的东西硬套在群众头上去，如写契，过去印的官契纸，群众不习惯，还是让群众自己买纸去写，反而积极认真。
（三）党如何领导群众
所谓走群众路线，不等于自流，党要领导掌握。
1、党首先是启发，在行动之前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产生力量，要打消群众害怕变天思想。
2、要掌握，在群众运动中一般在开始以前往往思想顾虑而右倾，在行动后往往会左些，在行动中就需要掌握，如防止侵犯中农等。所以领导者要相信群众，但不是失去掌握而做群众尾巴。
3、党要为群众撑腰，不让群众情绪冷下去，群众发生困难时，要予以英明判断，帮助解决其困难。
领导干部要深刻研究群众路线理论，研究有哪些阻碍了群众路线，再找出克服的办法，对下

面应找出实际例子，打通走群众路线思想。

二、关于积极分子

（一）什么叫积极分子

简单的说，在群众运动中，能出头，与群众有联系，办事公正，本质好有热情的都可以叫做积极分子。开始发现的积极分子，往往与个人利益要求相结合的，开会时敢讲话，对土改不满，背后议论都能培养其为积极分子，在开始时条件是不能过高的。

（二）如何发现积极分子

在工作汇报中与检讨工作中也能发现。在运动开始时发现的积极分子，带有浓厚的私人目的，真正与群众有联系的积极分子，必须要在工作深入时发现。我们的干部对积极分子的看法，有时会错误而找不到真的积极分子，因此必须打通乡村干部对积极分子的正确看法，与什么是积极分子。

（三）如何培养教育积极分子

1、过去对积极分子，只是使用而未注意到培养教育，运动一结束就没有积极分子了，因此在土地复查中，应特别注意对积极分子加强教育，使其在政治上不断提高。

2、对积极分子的教育，应在运动中经常不断的把策略方针计划进行会议教育，并通过实际工作，加强其阶级教育，与联系群众等教育。

3、在运动中，应经常掌握积极分子的思想情绪，帮助他解决困难及研究工作，发现积极分子有毛病，要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思想，进行个别教育，适当的鼓励与批评，但不宜过火，免得使他骄傲或灰心。

4、在运动中应把积极分子组织到实际斗争中去，给予实际锻炼，运动结束后，最好办训练班，从政治上提高一步。

（四）如何使用积极分子

1、对积极分子的使用，要看他能力适当分配工作，不要一下子提拔太高，任务交的太大。

2、对积极分子使用，不能鞭打快牛，否则也会用垮。

3、不要把积极分子当干部使用，使他与群众脱节，最好是摆在群众中，哪一村的仍在哪一村工作。

三、组织力量

（一）县区要以群众团体为主，集中一批力量，进行实验，取得经验，打下复查基础，在实验中要达到三个要求：1、在会议上一定要提出实际问题；2、经验要交流；3、比一般乡提高一步，但不得马虎。

（二）乡开始时以乡干为主，进行打通思想，发现积极分子，组织乡复查委员会，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工作。

（三）以发现积极分子为主，积极分子发现后，不断的在群众中进行表扬，使群众认识他，选入公道组，公道组不断扩大。

（四）雇贫农以村为单位，组织到各个组织中去，如清丈组、要契组、写契组等，分头进行工作。所有雇贫农必须全部参加运动，亦须普遍发动中农参加。

四、如何开展土复运动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实验，突破难关，取得经验，扩大影响。县要专门抽出一部分干部，加上区一部分干部，再由预备第二期搞的各乡中抽出较好干部参加实验，选择两三个问题最严重乡进行实验。第二阶段，以县委力量，把所有乡干集中起来打通思想，再以县区力量，加上已参加实验的所有干部，分散配备普遍开展，每乡加入外力帮助，可以做到更彻底。

五、关于整理组织问题

在土地复查中要把各种组织恢复与整理起来，建立各种经常制度以便今后转变我们领导方

法。
（一）群众团体
1、先把组织整理与恢复起来，与发展会员，最主要是农会和妇会。
2、群众团体干部不宜兼职。
3、党委注意系统领导，尊重群众团体独立性。
4、订立经常工作内容。
（二）民兵
1、全区民兵组织大部分垮了，应结合群众工作迅即恢复与整理组织，发展群众性游击战，大量发展民兵。
2、民兵是参军唯一对象，因此应注意教育，加强思想教育。
3、目前民兵应培养成对蒋伪斗争的群众骨干，乡政权的支持者。
（三）支部
1、恢复与整理组织。
2、健全制度，按期开小组会，过组织生活。
3、提拔雇贫农成分，在土改及自卫战争中变质异己分子一定要洗刷，在土复中干部要经过反省检讨。
4、大量发展贫雇农成分党员，充实党的新鲜血液，改变干部领导的成分。
（四）行政
通过此次土复运动，普遍实行乡村政权改选，最好提拔贫雇农成分。
1、设正、副乡长各一人。
2、设财粮委员一人（县委、支部要很好审查）。
3、设后勤委员一人。通过复查，应进一步整理后勤组织，以迎接大反攻。
4、设武装委员一人。
5、设调解委员一人。
6、设优抗委员一人。
（五）确立产权思想
群众产权思想未确立，也是翻身思想未确立，这问题是很重要的，主要从行动中去确立。
1、追老契。如果老契未追出，群众思想上仍有顾虑，不敢种地，而且也给地主存在幻想，企图复辟。在追契中，要发动群众进行面对面撕破脸斗争，拣最坏最顽固的对象，突破一点，进行斗争，以形成热潮。老契追出后，应当群众面烧毁，减少群众的顾虑。
2、丈地写新契。反对干部包办代替，丈地由群众去丈，群众才会认为是自己地，加强对地主的对立，写新契也由群众自己买纸，自找中人、四邻，郑重成契。
3、成契立地界。由群众自己下石灰桩，可以使其与地主更对立，在成契上不要发动大请客，号召节约。在成契酒席上，可以装入新内容，在漫谈中加强阶级教育。
（六）关于补偿中农
要打通干部对争取中农重要性的认识，中农在农村中占很大比例，如涟水中农占40%以上，如果失掉对中农的团结，一定会有很大损失。其次中农一般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许多是在减租斗争中上升的，将来的民主建设，中农仍是很大力量。因此在精神上不问赔多赔少，一定要普遍赔偿，不但在物质上给以赔偿，而且给以精神上的安慰。
在团结中农问题上，要使贫雇农和中农两方面都打通思想。在贫雇农会议中，说明中农不剥削，说明团结中农的重要；在中农会议上，进行诉苦教育，说明中农过去与贫民一样受地主压迫，给予精神上安慰，使其在政治上提高一步。召开中农会议，要召集全部中农，不要仅找出地中农，其目的在教育与争取全部中农阶层。
（七）妇女产权的问题

1、这次土地复查中，基本上要把妇女组织起来，要发动绝大多数妇女参加这一运动。
2、这次土复中大批妇女积极争产权，这是好的现象，这是妇女要求政治上解放的标志，应积极加以领导。
3、在妇女争产权中，小大姐、贫苦妇女及家庭关系不睦的妇女很积极，老年及中年妇女是不积极的，应很好发动，不能强迫，妇女产权确立了，其对社会活动必积极，对生产情绪必高涨。
4、如何领导妇女争产权。第一阶段土复才开始时，可以提出妇女争产权口号，主要力量集中在地主、富农方面，应组织大量妇女参加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活动。第二阶段可以发动妇女争产权，小大姐、寡妇可以单独立契，夫妻可以并名，主要应采取劝导、说明精神，动员确立产权思想，不能生硬强迫，避免造成家庭不和。

第八部分经验教训

一、土地复查中的错误认识

虽然根据几个乡的实验了解，已可以充分说明过去有些同志对土复的认识是错误的，是不正确的。有些同志认为，经过了土地改革，土地问题已完全解决了，认为土改中田地已经分完，再没有什么公田，地主土地已分得很彻底，是不会有什么黑地存在，而对群众则认为群众最迫切要求是分果实，又认为群众有顾虑，是不敢要地或对土地没有什么浓厚兴趣，其实这种说法，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一种荒谬绝伦的说法。现在根据调查的材料，各地上报的各类土复材料，证明各地还留有公田，而且个别乡的公田留的特别多，地主所留土地不仅多于贫雇农，而且质量上大多是好地，地主比贪婪的老鼠还要狡猾，他们用尽一切阴险手段，卑鄙无耻地隐瞒黑地，造成雇贫农得地不足的现象。因此我们确信，每一个乡每个村都有地分，而且有好地分。

至于有人认为群众有变天思想，不想要地，群众迫切要求是分果实，这是还没有真正摸到群众基本要求的肤浅说法。当然，在青黄不接的春荒期间，群众迫切要果实，同时我们也承认很大部分群众存在变天思想，但是我们应该了解，群众内心的基本要求是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只要你很好的教育与打消群众害怕变天思想，那么，群众拼命争的是土地，对果实倒反而是淡然处之。经过土地复查的地方，一旦把群众变天思想克服，争土地的劲头往往能争到通宵达旦，非常需要土地，过去不要的薄田、孬田，也有人抢着要了。这里有一个具体经验，就是涟水同兴区双河村，领导土复的同志，一时对群众实际的要求有误解，认为群众最迫切、最基本的要求是果实，因此在工作中先去分果实，结果在工作上走了弯路。当然这并不是说群众不要分果实，或者在工作中就不需要分果实了，问题并不是这样，主要说明群众最基本的要求是土地，因此在土地复查中，主要解决问题的重点是土地，土地得到解决后，再进行分果实。如果还有些地方发现群众不肯要地，这也不能说明群众不要土地，这仅是反映领导者未能打通群众思想，而宣传自己无能罢了。

二、放手发动群众

土地复查能否彻底完成，要看群众是否彻底发动起来，群众发动起来了，一切地主黑地可以查出，老契可以追出，土地分配能达到公平合理，干部的自私也可以绝迹，干部的官僚主义也就不容易发展，群众组织可以加强，也能武装起来保田保命。因此，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我们一切工作都有办法，党的一切决议与号召，就容易为群众接受，变为群众自觉的行动，不仅土地复查时如此，其他工作也是如此。

要达到土地复查彻底完成，必须要大胆地放手发动群众，土地复查时继续发动群众，全部土地复查过程，也就是发动群众的过程，不管是打通思想、组织力量、查黑地、分地、分果实、

追老契、立新契、开展民主检讨、调整干群关系，都要群众自己行动才能完成，所以领导者必须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

三、民主检讨与复查的关系

在土地改革中工作没有做好，主要是干部问题，今天若不解决干部问题，复查工作是做不好的，所以干部问题是复查中的中心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所谓解决干部问题，并不是说把在复查中斗争方向转向干部而放松了对封建残余势力的斗争与对群众害怕变天思想的扭转，这是错误的。在土地复查中，主要的斗争方向，是彻底发动群众摧毁封建残余势力，完成土地改革。

我们应该认识到，所谓干部与群众关系，只是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协调，为了巩固自己阵营去打垮另一敌对阵营，必须要达到内部的团结，克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最后打败敌人，必须在干群间来一次整理，使内部团结起来，求得更有力打垮敌人，在我们内部扫除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障碍。因此，我们的斗争目标是封建势力，调整组织也是为了巩固内部阵营，为了巩固已经得到的胜利，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放松了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将斗争重点转向我们的干部，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掌握这一方针，加强群众阶级教育，扭转群众害怕变天思想，发动群众对封建势力的仇恨，积极行动起来争取土地。如果群众害怕变天思想扭转，翻身思想确立，群众对干部就能做到友爱的批评。

四、统计工作

在土地复查前，一定要了解土地情况。之前的土地工作缺乏统计，对乡村里有多少土地、土地情况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掌握，分田时难以做到公平合理。统计工作是科学处理问题的根据，便于研究和了解情况，今后一切工作不能粗枝大叶，而要精密细腻的计划，必须要做好统计。

附四点要求：

1、要求打通各级领导干部及群众的复查思想，因这次复查是今后一切工作转变的关键，各级领导干部应重视这一工作，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

2、这次复查要抱彻底完成的精神，要求一乡一村皆能彻底，虽然一方面要求尽量快，但是必须服从达到彻底完成，不能彻底的必须重新再搞。土地复查已结束的乡，如果民主大检讨与改造和整理各种组织没有完成，应继续完成。

3、应以此次复查来转变过去领导作风，一村完成后一村总结，一乡完成后一乡总结，一直到区到县，都要全面总结。

4、加强报道，介绍典型经验，以往因战争阻碍，不能随时总结以致经验不能及时交流，目前只有加强报道，以弥补这个缺点。

华中六地委两年来工作总结

（1949 年 2 月 19 日）

第一部分两年来对敌斗争总结

一、对敌斗争四个阶段

自 1946 年夏自卫战争开始，至 1948 年淮海会战第一阶段结束之 12 月底，我分区获得全部解放为止，其间二年有余，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坚持（1946 年 6 月～12 月底）。自卫战争爆发后，至翌年正月初沭城沦落敌后，为时 6 个月，此一个阶段是敌我双方大军云集我区，主力决战拉锯争夺的局面。我区是以全面全民全力支援战争，直至沭城沦陷，尚未解除后勤任务，大军北撤山东，尚有数万民工随军北上。于此阶段，固然全力支前而完成了支前任务，同时亦布置了坚持准备工作。

1、6 月至 8 月底的两个月，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全区土改工作，全区群众进一步发动，奠定了以后能够坚持的主要条件。

2、以会议与训练班的形式，全党进行了初步审查部分，调整了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初步改造了支部，在可能为敌占据的地方及交通线和市镇，布置了秘密工作，建立情报网与发展党员。

3、依据抗日时期的战争经验，估计将来可能为敌分割，地委采取分散领导，建立三个中心县委，分散领导各县准备坚持工作。每个中心县委建立了一个支部武装，一面领导各县恢复县区武装的建军工作，一面准备一旦转入坚持局面，与被敌人分割时作为每块根据地独立坚持的机动部队。

4、除恢复县区外，并整理民兵，组织与发动民兵开赴前方参战，锻炼战争经验，准备坚持。

5、12 月底接近战局转变前，地委召开扩大会，始明确号召与组织坚持，其具体布置为：（1）全区发动与组织群众性的游击战；（2）三个支部各以非交通线的地带如柴米河、六塘河、沙礓河建立点的坚持；（3）规定敌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土顽；（4）公开明确号召，并指出我区转入敌后达到坚持的胜利，全党思想上必须充分准备战胜敌人的三板斧：一要战胜敌人大军过境的第一板斧，而不被冲垮吓垮；二要战胜敌人“扫荡”的第二板斧，而不被扫垮；三要战胜敌人最后进行清剿的第三板斧，而不要被敌人清垮。

主要经验教训：地委的坚持方针与具体措施是明确而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顾虑松懈支前工作，未能明确认真地进行坚持思想教育，因此转入敌后一部分区级以下干部党员表现惊慌失措，而有一部分投敌。由于坚持思想不明确，亦影响建军任务未能完成。除每个支队建立一个营外，一般县队多者 3 个连，少者七八十人。区队均未能建立致使坚持困难，土顽气焰嚣张，我基层武装力量薄弱，致使应对掣肘。

第二阶段——坚持阶段（1947 年 1 月～6 月底）。1947 年正月初，我军战略转移北撤山东，敌即以 6 个师及后续部队两个师，共 8 个师跟踪过境，齐头并进，一面窜进一面“扫荡”，敌骑遍野空隙颇小。但因事前思想上已有准备，故各级领导机关能灵活跳动，坚持原地斗争，组织小型武装及民兵游击小组，穿插空隙，进行游击、侧击、尾击，安定群众情绪，对乘机活动的反动分子，进行坚决镇压。在镇压中虽发生错捕错杀事情，但在镇压政策下确使坏人不敢动，群众情绪为之稳定。在敌人大军一面过境一面“扫荡”下，土顽还乡团则异常嚣张，伸入我区进行顽化，建立据点，我则集中支队以下武装进入敌人侧后，全面展开向土顽进攻。一支队与陇海线南侧举行反复大清剿，给土顽以很大镇压；二支队攻克淮涟中心据点古寨，打下时码土顽据点，控制盐河线；三支队攻克运河线陆集、仰化集等据点，并消灭孙良诚部一个排，而县区民兵于敌人大进军过境时，亦敢打响仍有缴获，因此干部群众情绪较高。但在某一方面，又生出了些麻痹情绪。对敌大军过境“扫荡”的胜利结束，除敌人重兵驻集之主要交通线外，均未顽化，其间约月余。

随后敌人二十八师进行全区性大“扫荡”，四十四师、五十一师及孙良诚部均配合地方土顽进行不间断的“扫荡”，时间持续 3 个月之久。此阶段匪主力参加“扫荡”者达 7 万人，至 6 月始趋稳定，斗争异常频繁。以沭阳而言，敌人大小“扫荡”与出击达 1485 次，泗沭则是 1587 次，6 个月中各县遭到敌人大小“扫荡”与出击者平均数仍达千次以上。此一阶段之结束时在匪绥署主任张雪中亲自指挥下，四十四与五十二两个师对沭淮线东部进行全面重点清剿。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以军事占领而达到编制保甲，推行顽化时间达一个月，张匪亦自负得意广播说出“淮沭路以东的共匪全部肃清”的梦话。其实，我们是完全战胜敌人的清剿，而且地区日趋巩固。

在此阶段中，边区展开反拔地、反拔租运动，中心区进行土复实验全面结合反“扫荡”、反掳掠、反抓丁、反奸淫、反烧杀的群众运动，加之广泛的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沭阳县而论，我们组织了 2600 名半脱离生产的民兵游击小组，在敌人“扫荡”时对敌进行阻击、冷枪、尾击的麻雀战术。平时则监视敌人据点，即使是敌人“扫荡”时临时建立的据点，亦采取四面包围，敌出则打响纠缠，敌人日间“扫荡”失败后，即采取了夜间奔袭。我则组织群众到处巡逻，广泛建立情报网，进行彻底的破拆与改造地形。在群众的破拆运动中，可以说是达到了有路皆破、路路皆沟，使敌主力行动困难，相反的便利了我们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

开展决心运动、立功运动。以贯彻坚持方针，号召坚持原地斗争，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但在具体执行上是灵活运用的。在敌人重兵严重清剿情况下，可机动转移至敌之侧后，靠近敌人，与敌人回旋纠缠，内线留置少数精干武装坚持，转移外线的武装则寻缝插入，捕捉镇压坏人和土顽，遇机迅即插回恢复秩序。如东海、潼阳在敌人历次清剿中均采取此种方针，达到了一面保存力量，一面坚持原地斗争，粉碎了敌人顽化企图。

在作战方针上，仍继续贯彻集中力量打击土顽。匪军与土顽配合“扫荡”时，则与敌人就近回旋，寻隙消灭土顽，或则与敌大换防，敌进我进，转至敌之后方，对土顽进行广泛“扫荡”。如 4 月份敌进行重点清剿柴米河以北后转进六塘河两岸清剿时，我分区主力则由敌之侧面转过柴米河去，配合支队及县区武装向敌反击，“扫荡”土顽摧毁顽政权，一中心县委地区当即恢复。坚决打碎土顽的碉堡政策，在敌不关重要我则至为重要的地方，必须集中力量，坚持争夺。如敌拟隔断我苏鲁交通，于我东海等县中心安设据点，集中土顽守备，我则集中分区主力，攻克东海中心据点万匹，全歼守敌 300 余。三支队连续全歼潼阳晏圩、夏圩两个中心据点的守敌，自此挽回陇海沿线的局面，打破土顽碉堡政策。敌人严重“扫荡”前对群众进行教育，进行空室清野，发动与组织群众青年跑反，“扫荡”后则及时进行抚慰，揭破敌人阴谋，及时争取被敌胁迫而走的群众，家里妇女老弱则组织反强奸与反掳掠运动。

于敌人严重“扫荡”情况下，在领导上是采取按级下去分散掌握，各级配备能打干部为领导核心，每乡配备一两个能打的干部，严格执行奖惩制度，有功者奖，胆小动摇不能坚持者，必须及时处分，或调换工作，遇有问题要抓紧及时开会，及时教育，及时解决。

在土顽极度嚣张任意残害我家属或基本群众时，我们是采取了适当的针锋相对斗争，掌握有理有利有节三个原则，适可而止，不能扩大，收效颇大。敌人不敢乱捕乱杀我军属，在沭阳钱集区土顽还有代我军工属收割麦子。个别的地方执行过火，则相反是坚定敌人、扩大敌人。

于敌人“扫荡”前后，或我大小战斗胜利的时候，即是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与争瓦（即“争取瓦解”）工作，如红黑点运动、一封信运动、选路运动，收效颇大。在此一阶段，争取回归土顽及流亡者 10708 人，洗手不干二下江南的未统计，作战毙伤俘敌 7000 余，由于我执行专力打击土顽与展开群众性争瓦工作，因此，土顽力量大幅削弱，无坚持信心的纷纷洗手不干。如初转入敌后时，土顽乡层政权一般都有武装五六十人，经过六个月的斗争结果，一般匪乡的武装仅有七八个人了。一般说我们地方武装力量是超过土顽的，因此我们敌后斗争，不仅站稳脚跟，而且日趋巩固。同时在此阶段，由于某些地方敌情严重与地形不利，尤以领

导上的错误丧失了些地方，如宿北县全部顽化，灌云县大部顽化，撤出灌东，面积缩小仅能控制原有地盘的 38%，控制人口 42%。

主要经验教训：（1）宿北县及灌东之全部顽化，固然由于敌情严重，地形不利，但深刻检讨，主观领导之错误为主要因素。宿北与匪大军过境及敌人清剿时，未能执行上级的指示，避实击虚，专力打击土顽，宿北领导同志采取了与地委相反的方针，连续与匪主力硬拼，连战皆北，伤亡过大，部队及地方情绪异常低落。加以当时宿北的领导同志缺乏战争经验，坚持决心，在敌人最后一次“扫荡”时跳出县境，终于导致该县全部顽化。而灌云之灌东所以全部顽化，由于分区派往坚持之分区主力与地方未能正确的建立一元化的领导关系，致使敌人“扫荡”时指挥不统一，作战配合差，主力同志缺乏根据地观念，领导无决心，终于连续挫折后不能坚持。

（2）敌情严重与敌“扫荡”时，所有武装及领导干部可钻隙跳动，但不宜距敌太远，愈靠近敌人胆子愈大，且可见机行事。

（3）部分地方顽化后，干部民兵既已撤出，可以将之组织成游击队，经过教育后可进行武装活动，与敌纠缠，以武装斗争逐步恢复失地。若采取抗日战争时的经验，全部遣散回去做秘密工作，其结果必然是全部损失，非被敌杀害即是自首离开。如淮阴、涟水于敌初期“扫荡”后采取此种办法，招致党员干部很大损失。

第三阶段——一面坚持一面反攻（1947 年 7 月～1948 年 10 月底）。经过了 6 个月的坚持阶段，一般说的土顽武装已被削弱得仅能退守坚持而无进攻的力量，离开蒋匪的主力配合，土顽是不敢公然向我中心区突击的。加以蒋匪的主力正集中力量向我山东进攻，而我刘邓大军正转向外线作战向敌人进攻，在整个形势上已起了基本变化。加以我区因连续三年水灾，致形成麦收后为 40 年来所罕见的灾荒。灾荒发展至最高峰有灾民 90 余万，断炊户 34 万，灾民占我所有控制人口达 63%。加以财政极度困难，入不敷出，必须以军事上积极向外增加收获，发动灾民生产度荒与开源节流。地委根据这一变化，于 7 月底 8 月初召开了地委扩大会，除总结过去坚持阶段的斗争，复根据整个形势变化趋势及本区斗争的情况，确定组织力量集中向边区发展，向边区进击抢占阵地，前进一步以巩固既得的阵地。在具体布置上，因分区主力已于前一阶段上升为野战军，提出另组分区主力，集中使用，达到能粉碎敌人一个旅左右兵力的“扫荡”，以打击匪主力的猖狂，加强攻坚教育，提高攻坚能力，以支持各县开辟新区，发展县区队，集中力量开辟边区，继续专力贯彻消灭土顽力量。

10 月初华中指挥部进入我区作战，首先打下盐河线新安镇，使我进一步的巩固盐河线的控制，奠定了开辟灌东的基础，继则进军攻克沭淮线的五里庄，使我更巩固地控制了沭淮线，自此我区已经更巩固的连成一片，基本上打垮了敌人对我分割的局面。

分区新建主力，在此阶段战力日趋提高，首先于 9 月间魏庄阻击战，以一个营扼守魏庄，血战竟日，阵地毫无动摇，毙伤敌人数百人，终于粉碎了敌人主力 4 个团的“扫荡”；11 月集中 3 个团阻击敌人五十一师之 3 个团配合土顽企图重占沭淮线之企图，经过 3 日围攻，敌人死伤数百，最后终于遗尸于野突围逃窜，自此以后敌人不敢向我中心区蠢动，其间有 5 个月敌人未向我中心“扫荡”。

同时分区主力在攻坚战亦有很大提高，1 月 15 日攻克宿北中心坚固据点陆沟，全歼守敌 300 余人，扫除宿新线据点，支持了宿北开辟。4 月间配合主力攻打响水口，我分区主力伸入灌东攻克了中心据点杨集等。5 月分区主力一部，攻克众兴外围据点韩圩。28 日攻克苏北南涧坚固据点，均全歼守敌。6 月分区主力一部配合苏北兵团陇海东线战役，阻击新安镇增援之敌八十三师，消灭该师十九旅近一个营。由于分区主力攻坚战的提高，对各县团开辟边区收复失地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县区的活动，在这一阶段的初期是比较不够活跃的，由于从 9 月至 11 月全地区展开土复平分，同时地区相对稳定，各县对武装对敌斗争是放松了，在党内普遍产生了麻痹苟安情绪，

满足现状，没有认识反攻的形势，仍囿于单纯的坚持观念。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产生了保命思想，静待反攻到来。地委根据这一情况于 12 月召开扩大会，尖锐的提出反对单纯的坚持思想，反对满足现状的情绪，反对保命思想，正确认识工委所指示的一面坚持一面反攻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对于发展武装提高战斗力，具体提出各县团能够单独作战打垮地主一个营以上兵力的进攻，并能歼灭其一部，以减少敌人的频繁“扫荡”，达到独立坚持，积极开展边区。所有县区一切武装不准留在中心区，集中力量向边区前进，挺入敌区，开辟新区。在战术上提出“猛进猛出”、“猛打猛卫”，开展“掏心”战术，夜间奔袭土顽的心脏，出其不意，大量歼灭土顽；提倡歼灭战，反对消耗战，采取联合集中力量斗争，集中个别县的力量，统一指挥开展我各县结合部的斗争，克服过去两不管的现象，大量歼灭土顽。所有县区乡的武装通过诉苦运动订定每月杀敌俘缴、收复失地的立功计划，掀起竞赛热潮，保证计划完成。

经过这次会议以后，全区县区武装都一直挺进边区，伸入敌区，往往均能以同等兵力干脆彻底的全部消灭数百敌人，捷报频传。杀敌俘敌缴获之多，战绩空前，而我伤亡极小，在一致向前进军的形势下，盐河线之敌被压缩至涟城，不敢过河再犯。由于淮阴、泗沭两县团联合斗争，开辟了六塘河南三个半区，在西线敌人被驱至运河以西，我们控制运河线，与江淮交通。北线之敌亦被压缩至陇海线，恢复了潼北武装，将撤出的干部组织三个连队，经过诉苦后，提出打回宿北去，于冰天雪地的夜间往往采取往返近百里的奔袭，屡获干脆彻底的歼灭大量敌人的胜利。虽有十余个同志冻死了，冻残了手脚，但未动摇他们收复失地的信念。经过苦战 3 个月，将装备优良的的近 3000 余的土顽消灭大半，武装了自己、壮大了自己，造成比之土顽占绝对优势的力量，终于达到收复失地恢复了 4 个区的政权。

整个淮海在这一致向敌人前进的形势下，不但恢复了些新的阵地，而且将敌人压缩在边缘的点线，在二纵未南下前，我们已控制人口 59%，面积 58%。二纵南下后，吓走沭城之敌，我则二度扫除沭新线据点。夏季我苏北兵团发动夏季攻势后，至 10 月我则控制人口 81%，面积 76%。

在这一阶段斗争的表现特点为：敌人一个旅左右的兵力是不敢向我中心区进犯，同时我县团的战斗力亦空前提高，不但能大量歼灭土顽，而且能敢于打匪主力。在坚持阶段中，仅有个别的县团能够消灭一个排的匪主力，但到这一阶段，县团能以一个营的兵力消灭匪主力两个连，因此匪主力一个营就不敢伸入我区活动。有时一个团的兵力进犯往往被我县团所击溃，因此敌人往往以一个旅的力量在我边区骚扰抢劫，摩擦性最重，边区受蒋灾最深。二纵南下以后，敌人意图驱逐我苏北主力，曾 3 次以 2 个师至 4 个师（即军）的兵力，并配合快速部队及空军，向我中心区作大规模的“扫荡”。但由于大局好转，我地方部队与干部情绪很高，信心益强，虽在敌严重“扫荡”下，仍能坚持原地斗争，如潼阳在此期间，全县曾三度为敌全部占领，在敌人步兵配合装甲汽车的追寻下仍能坚持原地斗争，不时寻机给敌杀伤，与敌回旋纠缠，伤亡虽大，仍能坚持斗争。

主要经验教训：这一个阶段除了采取主动地、积极地集中力量加强边区，进入顽区打击敌人外，并有力地纠正了再坚持阶段所产生的在锄奸及俘虏政策上的过左倾向，正确的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在过去阶段中对攻克据点后，俘虏交给群众处理大多是杀掉放者寥寥，非但罪大恶极首要分子要杀，即是罪恶较轻的胁从分子也难幸免。经过打通思想，纠正偏向后，非但持枪抵抗者不杀，即是所俘获乡、区、县与匪顽之连营以上干部一般的经过教育后释放，因此土顽盛传我们是真正宽大。因此，在我区县武装往往能迅速干脆全歼同等数量之敌，而自己伤亡极小，如宿北县团以三个连全歼八十三师的侦查大队近 500 余人土顽武装，自己损伤 10 余人，1 团消灭陈家港盐警近两个大队，自己死伤 20 余人，以及我分区主力追击进窜盐警，毙伤 400 余人，俘 2000 余，而我仅伤亡 40 余人。这固然是由于我战术的提高，但是端正了党的锄奸俘虏政策，亦是致胜的主要因素。

第四阶段——全面解放（1948 年 11 月～12 月底）。我主力南下展开淮海大战，首先于第一

阶段消灭黄伯韬兵团解放我区北部陇海线，我分区主力亦同时配合向东进军，收复新海，恢复灌东，追歼进窜盐警 2500 余人，回师南向威胁两淮。两淮之敌知大势已去，狼狈南进，虽曾复返意图重占，但为我分区主力阻击予以痛创，不得已而放弃重占两淮意图。南线威胁已去，至此我分区已获得全部彻底的解放。

二、两年对敌斗争的统计

1、歼敌。综合敌后两年来我共歼敌 23609 名。1947 年共俘敌官 110 名，1948 年俘敌官 191 名，合计 301 名，1947 年俘敌兵 6364 名，1948 年俘敌兵 7749 名，合计俘敌兵 15113 名，连俘敌官合计 15414 名。1947 年毙伤敌 4101 名，1948 年毙伤敌 4094 名，合计两年毙伤敌 8195 名。

2、敌我损失。两年合计歼敌 23609 名，我军两年伤亡失踪团以下干部战士合计 5011 人，与歼敌数相比是 1 比 4.5 强。

3、缴获。两年缴获步枪 7577 支，轻机枪 210 挺，重机枪 19 挺，短枪 291 支，手提机枪 31 支，大小炮 51 门，其他汽车军用品物资未统计。

注：以上歼敌与缴获及我之伤亡损失 3 项统计未包括地方民兵、游击小组、政府之警察部队，以及 1947 年正月至 6 月分区主力作战均未统计在内。

4、争瓦统计。两年来争取回归流亡 42333 名（内有我做秘密工作者 466 人），争取回归武装土顽 8438 名，（内为我做秘密工作者 257 人），争取匪主力 4779 名，（起义开小差者均统计在内），三项合计 55550 人，带回步枪 901 支，轻机枪 4 挺，短枪 24 支。

5、两年来本区人口面积发展表。

人口（人）百分比面积

（平房里）百分比

原有 242381838425

1947 年 1 月至 6 月底坚持阶段 110000042%1481838%

1947 年 7 月至 1948 年 3 月二纵南下前 155000050%2254058%

1948 年苏北兵团夏季攻势后至 10 月 223303781%2934876%

12 月底全部解放后 2700000（约数）400000

注：现有人口数与面积之多于原有数，因为增加两小块新解放区。

6、进军统计。（1）参军补充主力合计 22080 人，内分 1946 年 8 月至 10 月两次参军共补充华野 16000 人，1947 年 12 月参军补充主力十二纵 3200 人，1948 年 7 月参军补充主力十二纵及二纵者合计 2880 人。

（2）提升参加主力者合计两个旅部 7 个整团（提升至十二纵）合计人数约 15000 人，内分 1947 年 4 月上升一个旅部及两个整团，同年 9 月上升一个团，1948 年 4 月上升一个团建制，12 月底上升一个旅部及 3 个整团。

（3）零碎提调连排建制补充主力及出区者合计 2519 人。

（4）合计两年来我区参军及部队上升者，共 38599 人。

（5）如除去自卫战争大参军不计，则我敌后两年来共上升参加主力者合计 22599 人，内建制上升者 16519 人，参加补充主力者 6080 人。

三、锄奸保卫工作

淮海区在两年敌后坚持中，执行党的锄保政策有显著的成绩，但由于缺乏对干群联系革命形势不断的进行党的锄保政策教育，以致执行政策中曾产生许多偏向与错误（两年宽大政策争

取的人数未作统计，处决的人犯据不完全的统计是 4086 人），本分区执行锄保政策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主力北撤至 1947 年 6 月，我主力北撤后地区分区，地主、国民党、三青团、特务气焰嚣张，抢劫公粮物资，搜捕我方干部党员，甚至组织暴动，迎接敌人。我方乡村干部及群众不少情绪低落，在这种情况下，在增强干部群众的时事与政策教育的基础上，适当的缩小宽大尺度，正确执行镇压政策，公开宣布罪状镇压坏人，打击蒋匪气焰，教育群众，巩固革命阵营是完全必要的。例如泗沭裴圩区坏人未镇压前，公粮被扒，伤兵被杀，干部不敢蹲下来工作。实行正确镇压后，干部民兵一天遇到 7 次土顽，都无人敢于告密，安全的应付过去。但也有少数地方，干部对时事认识模糊，不相信自己力量，夸大敌人力量，不请示上级批准，就擅自暗杀，也有个别地方盲目的对区乡布置杀人数字，把杀人权授予区乡，形成乱杀现象，造成混乱，引起群众恐惧我们，反而对坚持不利。

在蒋匪气焰嚣张情况下，实行正确的镇压是对的，但我们在实践中较多的强调了镇压，在坚持站住、组织革命秩序开始恢复、需组织开展争瓦工作时，转变的不够及时。坚持初期俘获土顽的镇压数字，以致影响土顽打仗比较顽强。

2、1947 年 7 月至 12 月，锄保工作和土复结合进行。由于土复运动的开展，群众觉悟空前提高，在群众的检举下，全地区破获敌特坏人达 1644 人，收到了巨大的成绩。锄保干部也普遍的懂得了锄保工作需要群众踊跃，另一方面也犯了严重的违反政策的错误，普遍使用肉刑，打死人太多。全区打死的人估计约在 1000 人以上，这主要由于：（1）领导上有左的情绪，有急性病，认为奸细一次可以除光，认为不分阶级不分轻重，只要有政治问题都可以镇压，认为可以任意打人，可以消灭地主的肉体。（2）领导上的尾巴主义，群众要怎办就怎办，听任使用翻身大棍，随便使用肉刑，有的也认识到杀人需要经政府批准，但仍撒手让群众乱杀。（3）少数群众中存在过左思想，任意私人报复，乱打乱杀。

3、1947 年底至 1948 年 6 月，初期地委专署规定县一级组织无处决人犯权，基本上制止了乱杀的偏向。但由于敌后资财枯竭，坚持斗争中的子弹供应缺乏来源，又由于宽大政策的精神还没有完全为干部群众的思想所接受，因此滥捕人、罚子弹费的现象还很严重。经地委在县委会议上严格打通思想后，一般的县级干部执行夸大政策比较大胆，如潼阳放了一个顽区长，灌云放了一批战俘，影响了土顽分子敢于回归，但一般的乡村干部思想未通仍不甚满意。

4、1948 年 7 月至年底，地委专署颁发收回杀人权与严禁滥捕滥罚的决定，通过锄保干部会议及各县司法科长会议检查各县锄保政策的执行情形，规定审讯请批等各种制度与手续，在党内又处分屡次不改的违反锄保政策的干部藉以教育全党。各县干部回去后，通过回归人员训练班、甄别工作、镇压罪大恶极分子及释放顽干的群众会议等方式，对群众进行实际的锄保政策教育，收效很大。淮海战役前，边沿区各县在干部群众中又广泛的进行了新收复区政策教育，因此，目前除极个别的打杀顽伪干部外，违反政策的左倾偏向在全地区基本上已经纠正。

最近在执行宽大政策中，有少数新收复区又发生对回归分子无原则的宽大，善恶不分的偏向，现正在进行政策教育，打通思想，予以纠正中。

全地区从今年 7 月至 11 月 5 个月间，共处决人犯 72 名，收到宽大处理的是 1634 人。

第二部分两年来的地方工作

一、敌后两年来的财政工作

1946 年我主力北撤前，淮海区支持了 4 个月的解放战争，人力物资消耗极重。主力北撤后，物资大批损失，地区缩小，收入锐减，大部分机关财产撤往山东，撤出干部家属增多，致使

需要公家供给的人口大增，加之连年成灾，蒋匪“扫荡”频繁，物资损失极重，因此财政上形成极严重的困难。但在全党当家，大力采取有效措施，在按轻重缓急的原则性，在严格的制度和纪律下，实行统筹统支，厉行精简节约，发行公债，发行钞票，又由于上级的正确领导，及友邻地区的援助下，终于克服了困难，度过了财政难关，保证了坚持的胜利，具体说来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我大军北撤至 1947 年 6 月的坚持阶段。全地区 46 年全年公粮 8000 万斤及五分区运来的大米 300 万斤，在主力北撤前即已被消耗殆尽；各机关部队积蓄的财产，已大部分运往山东；不仅地区面积极大缩小，而且极不稳定；华中币贬值，白洋出现，每元换华中币数万元至十万元，税收无人过问财政机构大部解体；由于失陷地区干部家属撤出，以致脱离生产人员增至两万多人，扩大了开支上的需要。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地委决定全党当家，克服财政困难，作长期打算，保证敌后坚持：调整财经机构，重建财经制度与收支手续，颁发贷管法令和税率；号召全党动手，清理遗存各地的粮食物资；组织驻鲁后方办事处，统一处理撤往山东的物资，保证留鲁人员的供给，负责请领协款，源源支援敌后坚持；进行财力动员，号召各机关部门献出所有的物资；降低生活水准，厉行节约，口粮分区主力 1 斤 15 两，杂粮机关县队 1 斤 14 两，地方党政人员仅发 1 斤 10 两，菜金停发，仅发少许黄豆，其余办公费仅发一部，其他津贴待遇费及日用品均取消。

在执行这些措施中，忽遭蒋匪 2、3 月间的“扫荡”，已清理出来的粮食物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约近两亿元，税收亦因“扫荡”萎缩，存款告罄。因此 3 月间又作紧急措施：（1）举办粮草公债，估计可发 500 万斤。（2）发行 10 亿元本钞。（3）进一步整理财政，贯彻统筹统支，强调清理物资，预计财力动员运动可收入 4 亿元至 5 亿元。在财力动员的基础上，重建贸易系统，以财力动员的款项作为贸易基金，稳定华中币。（4）整理税收。估计敌人不“扫荡”时每月可收入 1 亿 5000 万元，组织生产出口。（5）派人到山东预计提领夏衣万套，华中币 8 亿元。另派人到区党委请求援助。

至 4 月间蒋匪又举行“扫荡”，现有的物资又受到损失，印钞工作也延迟不能完成，至山东的人只带回 2 亿 7200 万元，4000 套单衣，5 万发子弹及少许药品，因此财政上空前艰难，机关干部几乎小秫子都吃不上。后又决定进一步加强财政建设，组织财经委员会，加强财政领导，解决夏衣，制定排白洋办法，确定增粮办法，并通过夏征改善财粮状况。在实践中计征得公粮 1283 万斤，田赋 6 亿 6603 万 8050 元。

自主力北撤至 47 年 5 月共计收入粮 1529 万 3118 斤，草 2199 万 2786 斤，华中币 18 亿 5678 万 6593 元，勉强的维持过去。

2、1947 年 6 月至 1948 年 6 月。47 年 6 月至年底，地区逐渐发展至近 500 万公田，华中币值逐渐提高，群众情绪稳定。发生水灾时，有供给人员 29599 人，粮贴人员 1916 人（乡干）及文教税干人员合计 35861 人，秋季征粮 1380 万斤，田赋 3 亿 5000 万元，夏秋两季合征公粮 2663 万 3400 斤，除公债消耗及上半年的透支外，尚实存 1438 万斤，12 月份从五分区运回 200 万斤，每月经常临时支出 230 万斤，可以维持到 11 月底，总算可以勉强维持过去。夏秋季共收田赋 11 亿 2936 万 7693 元，每月税收 1 亿 5 千万元，但每月支出经费 3 亿 6316 万元，所以财政上还很困难。领导上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继续贯彻全党当家，加强财委会领导，保证财政政策、计划与制度的贯彻，继续发行本币 12 亿元，全力排白，召开金融贷管会议研究业务，整理乡村财政，向阴平、灌东一带开展征粮，扩大收入，保证克服困难。一面厉行精简，地方游击队即被精简 3000 余。

1948 年 1 月至 6 月，由于连年灾荒及蒋匪“扫荡”抢劫，这半年内形成延续性的全面严重灾荒，灾区占全地区面积 3/4，灾民达 90 余万，内断炊户 30 余万，占全地区 1/4 的轻灾区和非灾区负担量已占收入 20%左右，又加之进出口贸易停滞，政府全无财经积蓄，灾区群众对救灾失去信心，因此财经危机极为深刻。因此，地委觉得在这一时期内以救灾作为中心任

务，除组织群众自救外，在非灾区、轻灾区进行财力动员，发行公债公粮 470 余万斤，实收入账救灾公债 100 万斤，组织安插灾民约 10 万人。在脱离人员中进行政治动员，极大限度的降低生活水平，地方仅发每日口粮大米 15 两，再从中捐献救灾，每日仅能吃三餐稀饭，全地区党政军人员，每日仅能吃半饱，因此每月节约粮食 40 万斤。又进一步精简党政人员 5600 余人（占原有人数 36%）投入生产。此外华中 1 月份以后，又拨来农贷和账粮计划粮 1345 万斤，现金 10 亿 5000 万元，棉花 11 万斤，因此终于克服财政困难，战胜了灾荒。

二、救灾工作

1、灾情。本区连续三年水灾，47 年水灾之大为 40 年来未有，全区控制之 8 个县中有 5 个县被水全部淹没，所余的淮、涟、泗三县亦被水淹 1/3。因水来太早，中秋被淹者均失收，而麦季仅是半数收成，群众积蓄久已耗尽，加以蒋匪屡次“扫荡”，抢劫太重。蒋匪抢劫，灾情有增无止，土复中普遍错动中农，以致中农装穷，有粮亦不敢拿出，粮食市场有价无市，灾情乃发展极快，造成 40 年来未有之奇灾。灾情发展最高峰，灾民达 99 万 6000 人，占我所能控制人口的 63%，而断炊亦达 34 万 7000 人，占总人口 23%。因此大部分灾民及灾区基层干部对生产救灾工作失去信心，情绪消极，存在依靠政府救济思想。

2、地委对生产救灾的领导。地委根据灾情决定动员全党全民力量，生产自救，战胜灾荒，作为麦收前的中心任务，其领导过程及具体措施如下：

灾情暴露后，地委于 47 年 8 月间地委扩大会上布置生产救灾，号召广种青菜、荞麦、萝卜以补救粮食之不足，但因菜生虫灾，种植虽多，收获不大，复因霜来太早，荞麦亦告歉收。8 月底开展复查运动，地委当即召开复查与秋种相结合，群众所争得的果实麦子，悉作麦种，成绩很大，解决了灾户麦种，均能按时完成秋种，比之 1946 年前播种面积都有大量增加。11 月开展平分斗浮财运动，地委虽号召斗浮财与发展副业相结合，但因左倾情绪充溢全区，削弱领导形成自流。群众中流行着认为越穷越光荣、有钱要挨斗，有的则认为既要彻底翻身，就要过地主生活快活一下，大吃大喝，浪费斗争果实现象甚为严重。

12 月底地委深感若不以全党力量领导群众生产救灾是无法度过灾荒的，决定灾区以生产救灾工作为中心，非灾区则以土复为主结合救灾为当时工作方针。此种方针不够明确，县以下仍以土复工作为中心，忽视生产救灾工作，因此灾情未能遏止，有增无止。

时至 1948 年 2 月底，灾情益趋严重，卖儿鬻女，个别饿死者时有所闻，蒋占区及游击区灾民纷纷进入我中心区的非灾区求食无法阻止。至 3 月初，蒋区进来的灾民有 4 万人，我游击区及灾区进来灾民近 6 万人，合计约 10 万人，驱之不去，让其自流求食。

因人多亦无法求食，社会秩序为之紊乱，人心惶惶，情况甚为严重。因此地委于 2 月底决心停止土复，确定全党全民专力生产救灾，对于进入非灾区灾民采取疏散，有计划分配就食，实行灾民劳力与当地春种春耕以及一切生产相结合，老弱灾民则由群众民主评定，认领就食或出饭养活。对灾区老弱无生产能力之断炊灾民，政府定期拨发急账粮，每人每日发给 4 两粮食，以急救断炊老弱，宣传我党政策。布告鼓动中、富农和地主挖粮，保证粮食自由贸易，发展一切可能发展之副业。至 4 月间，则广泛组织挑野菜采树头叶，同时地委将党校学院及机关人员组织 200 余人调查督导组，分赴各灾区进行检查生产救灾，各级按日报告灾情。在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强调生产自救，开展救灾立功运动。在灾民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动员通过算细账，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及依赖外援思想，提高其生产自救的信心。帮助他们组织各种副业生产，在灾区进行贫富互济、有无相通的互济运动。在非灾区及轻灾区进行阶级教育，在加强“天下农民是一家”的认识基础上，发行救灾公粮公债，动员捐大批粮食物资救济灾区，同时有组织的安插进入灾民 9 万 9500 人。机关部队进行节约捐献，政府结合生产救灾，有计划的举办运油、运盐、纺织、修堤堵口，及运粮等工账，又采取一些有效办法平稳粮价。加以上级及友邻区之大力支持与援助，从 4 月上旬至麦收的艰难日子里，灾区基本上停止了发展，终于渡过了难关，战胜 40 年来未有之灾荒，现统计各项救灾措施，

在实践中的实际收效情况如下：
平分斗浮财群众分得果实粮 600 万斤（以每日生活量一斤计算），解决灾民总生活量 13.4%（总生活量系按 30 万断炊灾民 5 个月所需粮作 100 斤计算的）；据部分统计挖野菜及春菜 500 万斤（每日以 3 斤计），占灾民总生活量 24%；各种副业生产盈利折粮 250 万斤（每日以 6 两计算），占灾民总生活量 14.6%；非灾区及轻灾区群众捐献粮及公债粮 580 斤（每日以 12 两计），占灾民生活量 16.7%；本区机关捐献粮计 37 万 6500 斤（每日以 6 粮计），占灾民总生活量 2%；政府举办公账粮 508 万 3600 斤（每日以 8 两计算），占灾民总生活量 20%；总计本区灾民生产自救及本区内部互相调剂粮食占灾民总生活量 92.4%，上级及友邻地区实际运到的援助粮 154 万 3000 斤（每日以 6 两计），占灾民总生活量 7.6%。
灾荒终于战胜了，我们领导了 90 余万的灾民度过了灾荒，抢救了濒于饿死的 30 余万断炊户，安插了由蒋区、游击区等进入的近 10 万灾民，以非灾区 4 个人养活外来灾民 1 人，使之安然度过灾荒，这是收获。但由于领导上的麻痹，2 月间灾情突然增加，加以连日大雨，灾民无法采食野菜，尤以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未能及时发下急账，2、3 两个月先后饿死灾民全区达 150 人之多。
三、两年来的宣教工作
1、1947 年 1 月至 6 月的坚持阶段中，我主力北撤本区转入敌后，群众情绪不稳，敌人气焰嚣张，部分干部坚持思想准备不够，宣传组织不够健全，因此由全党打通思想，贯彻时事教育坚定胜利信心，文教工作陷入停顿或自流状态。4、5 月间发展中学两所、区村学 610 所，学生 18620 人，但在教育方法上都创造了“教武结合”的经验，灵活进行教育，或是教师背枪，学生担任交通联络，随联防队分散游击教学。在“扫荡”频繁的环境中，《淮海报》无法铅印，不得已改为油印版，每日刊发数百份供区级干部阅读，但对鼓舞斗争情绪确立胜利信心起的作用很大，而通讯工作每月支社仅能收到来稿百余件。
2、在一面坚持一面反攻的阶段的 1947 年 6 月至年底，因敌后形势已趋稳定，干群坚持信心已初步确立，6 月地委曾召开宣教会议，各县配备宣传干部，才建立了部门系统工作，进行了红五月宣传月和“七一”、“七七”宣传周，对群众的教育意义很大。开展三次较大的政治攻势，即五月攻势、十月攻势、年关攻势，散发宣传品 22 万 7371 份，建立广播台 235 处，听众 93895 人，并有机会的布置市镇宣传，恢复出版《淮海大众》及《淮海画报》。党内通过“七一”进行党史教育和党性检查，接着与检查土改结合，在干部中普遍进行“三查”，编印时事及支部教材，恢复了党刊学习，中心县委及县委共计出党刊 7 种，起交流工作经验，指导工作作用。国民教育进入恢复整顿，各县加强或重建领导机构，提出发展中心区儿童教育与群众学校，不放松边区教育，大量发动贫雇农子弟入学。在这一时期区、村学发展为 819 所，教师 1428 人，学生数发展为 35269 人，几增加近一倍。
文艺方面恢复了淮海文协的组织，评出剧本 60 本，鼓词 15 种，发展农村剧团 97 个，文艺小组 95 个，艺人组 7 个。《淮海报》至 8、9 月间改为铅印，对坚持土改的领导起了不小作用。
通讯工作通过“八一三通讯运动”开展全党办报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建立了 508 个通讯社，发展了 2403 个通讯员。在运动两个月中，支社收到来稿 13681 篇，培养并发展模范通讯员 229 人，模范通讯组是 30 个。这个阶段的第二时期是 1948 年 1 月至 6 月底，这个时期是全区严重的灾荒时期，全党开展生产自救的思想教育。《淮海报》指导救灾工作起了很大作用，4 月 1 日又改版，进一步增强与读者的联系。国民教育方法领导上提出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各中学、区学、村学等普遍组织生产小组，每天以一定时间拾草、捕鱼、种菜、挑野菜等，以解决灯油火草、书籍讲义等困难。如涟水刘圩村学 36 个儿童割草解决了寒衣，沭阳大沈庄小学挑 23600 斤小蒜，解决了学生及其家庭的困难。由于方针的正确，所以在空前的严重的灾荒中，我们的教育不但坚持了，而且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这一时期的统计，

中学由两所发展为 6 所，区学、村学发展为 1113 所，教师则发展为 1859 人，学生数增加到 59256 人。同时通讯工作由于土复及群众觉悟提高，又提拔大批贫雇农干部，为了适应这一情况，春季就开展了工农通讯运动，各中学、区学、村学教师，纷纷培养工农通讯员，配合乡村干部成立黑板报委员会，做到黑板报、读报组、通讯组、识字组四大结合，共发展通讯组 1852 个，发展培养通讯员 14605 人，内有工农通讯员 7437 人，普通通讯员 7168 人。在运动的两个月内计来稿 64788 篇，发展读报组 868 个，因此比之“八一三运动”通讯组则增加了 3 倍半，通讯员也增加了 3 倍多，运动中来稿则增加了 4 倍半。自此以后来稿已进入正常，每月约 7000 余篇，比之坚持阶段则足足增加了 70 倍。农村文娱亦发展农村剧团 207 个，有 3946 人参加文娱活动。第三时期是 1948 年 6 月至年底，为了全党用报办报、乡村用报的方针，与七一开展“七一乡村报运动”。各地区乡党委在运动中开始注意使村报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先由土复实验区开始，然后推广全区，共建立乡村黑板报 1138 处，涟水一个县在两个月的运动中即出版 1855 期，进一步的使通、报、读、识很好的结合，使农村通讯组扎下深厚的基础。自此以后支社每月收到来稿 8000 余篇。

在这一时期国民教育方面，领导上提出在巩固儿童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干群的识字运动，普遍推行小先生制，收到很大成绩。如涟水有 231 个群教班，4095 人参加学习，内有干部 1917 人，占全部文教干部 60%；沭阳男女干部及群众共有 5396 人得到教育；泗沭仅妇女就有 4405 人开始学习。

淮海战役我区全部解放的 12 月份统计，我区教育发展状况是现有中学 7 所，教师 72 人，职员 25 人，学生 1154 人，区学等合计 1661 所、2113 级，教师 2600 人，学生 82193 人。

四、整党审干工作

1、党员情况。1946 年 7 月份统计，全地区共有党员 52429 人，我主力北撤淮海区转入敌后，敌占区支部被破坏，损失很大，至 1947 年 7 月以前坚持阶段的统计，降为 26994 人，除撤往山东及部分转入部队工作外，党员损失约有两万余人，占全部党员的 2/5 强。经过 1947 年秋冬季的土复、整党运动及 1948 年春季的生产自救运动，群众觉得提高，发展了大批贫雇农积极分子入党，计除调往外地工作学习的党员外，尚有党员 32537 人。

2、干部情况。淮海转入敌后的初期，绝大多数干部对坚持有信心有决心，敢于对敌人做英勇的斗争，但也有不少区以下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中确有部分坚持信心不高，对敌斗争表现软弱。1947 年春季土复中，有一些干部（中农成分较多）认为土复得罪人多对坚持不利，也有个别的干部在敌人大军过境时擅离职守。还有不少干部有右倾情绪，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多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也有些五四土改时得好地的贫雇农成分干部，害怕土复中会退出好地，地富成分的干部怕土复自家要拿出东西。经过秋季提出反地富思想及右倾思想后，干部中这些思想才被逐步克服，但因领导上当时比较笼统的提出反地富思想，未能把地富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明确分开，对争取掌握政策与放手发动群众问题，干部思想中认识亦不够明确，以致在运动普遍开展时，发展了左倾思想，并发生尾巴主义的思想，无条件的顺从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放弃了党的领导。

整党审干中，收到了不小的成绩。比如由于贫雇农积极分子大量被提拔为干部，整个的干部成分发生了新的变化：1947 年 7 月整党审干前，贫雇农成分（包括产业工人、苦力）的党员干部占 67%，贫雇农成分（包括产业工人、苦力、新中农）在乡干占 50%弱，在区委中占 30%，在县委中占 7%；整党审干后，据 1948 年夏季统计，干部党员中贫雇农成分占 70%，乡干中占 70%，区委中占 43%，县委中占 21%。审干的另一个巨大成绩，是由于大量提拔了贫雇农成分干部，就有可能抽调出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区与新收复区去工作。从 1947 年 11 月到 1948 年 12 月，除参军、坚持、牺牲、被俘的干部党员外，从老区抽出去的准县级以上至地委一级干部 52 人，到华中党校的区县级干部 100 人，区级与准区级（区股长与群众团体会长）314 人，去华中公学 2000 人，乡干（等级未评）765 人，以上合计 3231 人。又从

本分区老区调至新收复区、新解放区将近 1000 人，北撤山东的干部机动了的最少有 1500 人，另又动员 400 人到华中学机要、卫生工作，及最近 12 月又调往江淮等 149 人，总计本分区的老区抽出了 6200 个干部。另一方面，整党审干工作再乡村干部中是普遍进行的，县区级干部只初步审查，就是已经审查过的，多注意简单的组织改造，没有很好的掌握思想改造，引起了干部对党发生隔阂。但这个偏向转变也快，一般被撤换下来的干部多介绍学习去了，蹲下不干的仅是少数。总计审干中乡干部被开除党籍的 80 人，撤职的 456 人，区委撤职的 20 人，合计 556 人（此数字可能不确实）。

目前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包庇自私现象虽比整党审干前有进步，但仍须大力克服，区以下干部中也有不少有怕机动的思想。地委最近布置总结支前工作，要求再进行时事教育提高战争观念的基础上，克服干部的自私包庇观念，打通干部的机动思想。

五、新民主义青年团的建设

1、青年团的发展概况。（1）1947 年 6 月地委在组织部会议上提出在沭阳、泗沭、涟水三县试办青年团：从党内抽调一部分干部作为新青团的骨干，在各种工作中、斗争中培养积子，发展团员建立团的组织，此时发展团员的人数很少，各种是党委代办的，也没有建立起单独的团的组织。

（2）9 月间开始土复运动，沭阳、涟水、泗沭等老区发展团员较多，质量也较好。涟水从上到下，初步的建立一套团的组织，县设青年科，区委有团委会，设青年区委或青年干事一人。其他各县仍由党委代办，在运动中青年团员常常表现积极热情，要求进步，思想顾虑少，对地主斗争也能不顾情面，参军中能起带头作用。如涟水王集区 4 个团员自动报名参军，50 个新兵在他们的模范行为的影响下，一个也未开小差。在生产工作中，女青年团员常能积极带头学耕地，一般的青年团员往往自动替抗、烈属代耕，带头做优抚工作。学校里发展了团以后往往证明在学习上、遵守制度与完成任务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但这一时期，武装斗争紧张，不少干部未能够充分认识到青年团的作用，对青年团的发展关系不够，因此除老区一些县外，边区尚无新青年团的组织。

（3）1948 年 8 月地委为了加强新青团的领导，规定新青团归各级党委组织部领导，地组及各县县组设青年科长一人，涟水、泗沭、沭阳三县区组织科设青年干事一人，专做新青团工作。此后，新青团有基础的县，即着手整理组织，推动了新青团工作的开展，即在过去的边区也开始试办。

（4）1948 年 11 月，地委召开各县青年科长会议，建立各级团的组织，县区配备青年干部，布置整理新青团工作。适逢淮海战役开始，干部多到前方支前去了，工作进展速度较慢。

目前，涟水、泗沭、沭阳三县团员数量最多，约 6000 余人，东海、灌云、潼阳正在集中干部有重点的在一两个区内建团，每县已正在发展。目前全区干部均配备完整，仅宿北县每区仅配一人。11 月统计：在全区团员发展为党员的 557 人，党员抽调做团的骨干的 123 人，共有 5 个中学有团员 312 人，占学员总数 30%强。

现全区共有团员 10532 人，已建团支部乡 493 个，占全乡数 40%弱，区学支部已建立 53 个，占全部区学 1/3，机关及中学已建立支部 27 个，亦占总数 1/3，在这次支前借粮等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如沭阳统计青年团员在支前借粮中记特等功 28 人，一、二、三等功 561 人，受表扬 601 人，共 1190 人，占全部团员 3000 人的 40%。

2、新青团工作的几点体验。（1）新青团是在党的领导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抽调了部分青年党员做团的骨干发展团的组织，可经常注意健全团的组织系统，经常分配团以一定的工作任务。

（2）新青团是通过各种实际工作，是在坚持、土复、生产、支前、救灾等群众运动中，发现青年积极分子加以培养教育发展起来的。

（3）由于青年团员热情求进步特别迫切，所以团内必须建立并加强学习制度，加强团员政

治的驾驭，提高团员的政治觉悟，发展的手续仪式要求隆重，组织生活也要严格，但要避免把团和党一样的错误看法，以致形成关门主义的毛病。

六、妇女工作

本区妇女工作敌后两年发展情况，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1947 年 1 月至 7 月的坚持阶段。本区转入敌后，脱离生产妇干多撤往山东，未撤的则分散各县打埋伏，基本上妇女工作的系统领导已解体。极少数的妇女干部拿枪打游击，领导武装斗争，如宿迁县妇联主任周亚同志任区联防主任。基层妇干部分的参加武装斗争，或做情报等工作。妇女群众在蒋匪“扫荡”中团结自发地进行防生命、防奸淫运动，纷纷组织保身小组。

2、同年 9 月以后，由于领导上提出大力发动雇贫农妇女参加土复，因此当时妇运的主要特点是贫雇农妇女大部分参加了土复斗争，不少地方妇女单独的成立了新妇会和姊妹团。如涟水在这一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就有 13215 人参加新妇会，1766 人参加姊妹团，没有成立新妇会的地方，妇女也能和男性群众合起来开会诉苦，初步地提高了妇女群众的阶级觉悟。

大土复运动结束后，地委决定至新麦苗登场以前是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工作，因此妇运工作亦随之转为大量组织妇女群众从事副业生产（如拐粉、纺纱等），组织妇女挑野菜采树叶以度荒。在这一阶段才逐步的恢复由地委而下的妇女工作的系统领导。

3、1948 年 8 月间，地委为响应毛主席的“生产长一寸”的号召，同时鉴于本区十年武装斗争，出兵较多，劳力缺乏，因此，领导上提出大量发动妇女从事农业主要劳动生产，及时组织妇女参加秋耕秋种等生产工作。家里无劳动力的妇女都认为这是好事，家里有男劳动力的妇女多存依赖思想。或是认为妇女不能耕地，基层妇女干部，有的也思想不通，认为搞生产也不是妇女的任务。领导上根据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打通思想的办法：在妇女干部中检查过去劳动妇女不肯接近妇会的原因，使干部认识到领导生产是发动广大妇女的最好办法与内容；在家中没有男劳动力的妇女中，通过算细账使她们更进一步的体会不能耕种的苦处；在灾区与防荒相结合，提出妇女种麦种菜进行副业生产防荒；县区乡各级妇干带头学耕地，突破妇女不耕田的遗俗。同时选择工、军、荣、烈、民工的家属及其他无劳动力的贫苦妇女首先学耕学种，突破典型后即在全乡全区会议上介绍经验，推动全盘。

在这一阶段中也发现发动妇女生产工作中的缺点，由于领导上强调秋耕秋种，以致不少妇女干部单纯领导妇女学耕地，而对其他副业生产注意不够，也有不少地方干部认为生产不需要领导，耕地不是妇女的事，以及其他各种实际情况，因此在这些地方妇女生产工作形成自流。

4、淮海战役将要开始前 10 月间，地委为了动员全党全民力量迎接行将到来的支前任务，妇女工作亦改以支前生产为中心，除组织冬耕及支前任务外，为弥补男性干部随民工上前线，号召各级有计划的大量提拔妇女干部担任行政等工作，以负责后方生产工作。

但是在妇女及群众中普遍存在着“支前是男子汉的事”、“支前是官家的事”等不正确思想，因此各地普遍进行思想动员。在新收复区，妇女没有组织的地方，进行时事阶段教育后进行诉苦，诉过去受蒋匪的罪，诉跑反的苦，启发妇女的阶级觉悟，认识支前是美事；在灾区除进行时事阶级教育外，又与备荒结合，通过算细账说明多碾麦可以多苦一些麸子和粮食度过灾荒；也有的地方进行三比：比前方战士、比抗军属、比以前受的罪，通过良心检讨，激发阶级觉悟及支前热情；也有的地方时事教育后，直接发动竞赛，提高支前情绪。在普遍的思想教育后妇女的支前情绪普遍提高，很多妇女、工、军、烈属都主动的参加磨麦、送麦、运粮、担架及驻地后勤等工作，部分地方建立了妇女支前组织。合计妇女参加磨麦者是 21 万 932 人，共磨麦 1213 万 1249 斤，参加运麦的是 58330 人，共运麦 742 万 3779 斤，参加担架者是 2826 人，尚有不少青年妇女参加数百里长途运粮。

本区在 12 月底以前共有村级妇女干部 4323 人，以妇女担任行政小组长的合计 1 万人。在目前有的地方在大支前生产总结（1949 年 1 月间总结）中通过评比选举模范，提拔妇女干部，

有些地方通过按期的工作汇报，提高妇干能力，再加提拔。在新收复区，通过开工、军、荣、烈属及贫苦妇女会议，进行阶级时事教育，通过诉苦打通做干部思想后，提拔妇干。目前按不完全统计（除涟水、苏北外的 7 个县统计），在冬季支前生产中共新提拔妇女干部 10492 人参加党政群各种工作，内有区干 39 人，乡干 980 人，村干 3080 人，组干（行政小组长）6393 人，目前我区村组三级行政机构绝大多数都提拔了妇女任正副职。

七、生产工作

1、农业生产。由于 1946 年秋的大后勤，当时在领导上未能适当解决支前与生产的矛盾，因此麦种面积大为缩减，比之往年一般少种 1/5 到 1/4。至翌年麦种，当时结合大土复斗浮财，解决了麦种问题，号召与组织扩大种麦面积，全地区一般的比 1946 年增加播种面积达 1/5，但当时未能明确的提出有组织施肥。

1948 年麦种，事前提出扩大种麦面积结合减荒，并组织施肥，大量组织妇女参加耕田撒种，因此在党委的号召与组织之下比之 1947 年，除宿北、潼阳因敌人大量驻守抢劫而少种外，全区其他 7 个县均增加播种面积，尤以宿迁、东海两个县增种 20%。而今年（即 1948 年）麦种最突出的表现是群众积极施肥，凡是过去有施肥习惯的地方都尽一切可能施了肥。施肥的县一般占户口 80%以上。据泗沭调查所种的 16 万 9851 亩麦田，麦田中下 12 斤豆饼是 3021 亩，下 20 斤至 40 斤豆饼是 45635 亩，下 40 斤至 100 余斤豆饼的是 28193 亩，而下粪的有 79729 亩。下肥的一般情况时老区的比新区下的多，在老区里是确定产权结束土改的区下得特别多。在老区沙土地的施肥已达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准。依据今年麦种的面积之增加以及施肥的增加，则生产量当可增加 10%以上。

1947 年的春种，由于敌人“扫荡”频繁，领导上以全部力量集中对敌斗争，故对春种未加领导。1948 年春种由于领导上抓得紧，加以积极组织减荒，尤其在统筹调剂下贷种，一般说比之 1947 年是大量增加的，尤其是豆子种得特别多，未被水淹的豆子形成十余年来未见的丰收。

2、减荒。减荒口号的提出是在 1947 年秋种时，当时收效不大。1948 年春种，各县仍有组织的推动，减荒收获颇大，惟缺少统计。至同年秋种冬耕更大力推动，据 8 个县不完全的统计，今年在秋种冬耕中共减荒近 25 万亩。

荒田最多的地方是过去游击与淮海战役的新收复区，在荒田特多的地方同时也是耕牛最缺乏的地方。耕牛减少仅及抗战前的 35%，一般的地方减少为抗战前的 50%，最少的比之抗战前也只有 65%。由于形势稳定，提出保护耕牛，实行等价交换后，各县耕牛均有增加，耕牛死亡率逐渐减少。据今年夏季统计，在各县个别缺牛最多的区乡已有增加耕牛数较原有数增加一倍。依据我区整个减荒情况估计，淮、涟水、泗、沭四个县的荒田在 1949 年内可以全部消灭，而潼阳、宿迁、宿北、东海、灌云 5 个县须要至 1950 年内才可能基本上消灭荒田。

3、副业生产。本分区副业生产最主要的纺织、榨油、拐粉、养猪等，分述如下：

（1）纺织。本分区抗战以前除宿迁大兴集纺织发达外，一般的并无纺织基础，亦不是农民的主要副业。抗战中我根据地建设后，主要以我区猪油出口换得盐阜区棉花进口。本区并不产棉花，虽曾号召群众种棉，但因土质与经验关系，收效极微。抗战期间在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扶植下，曾经普遍发展，成为当时的主要副业。敌人投降后，根据地统一的和平时期，纺织实业几近全部垮台。自卫战争中于 1947 年冬为了结合救灾，在政府大力扶持下，又逐渐恢复。截止目前，据 8 各县的统计，现有纺车 85261 辆，而现在动起来的有 47943 辆，现有织布机 6244 架，现在动起来的仅 1742 架。虽动起来获利甚微，仅因在目前条件结合救灾的情况下尚能维持，将来则无前途。

（2）榨油。原是我区唯一副业，抗战及自卫战争中油的输出阻滞，大部油坊均告停产，存者不及 1/5。由于我区今年丰收豆子，尤其在我政府倡导扶持之下，今秋以来，始渐趋恢复。据 9 各县（内缺 12 个区）的统计，现有油坊 3665 座，现在恢复继续生产者 1750 座，差不

多已恢复一半多，其余尚在逐渐恢复中。
（3）养猪。我区养猪是为农民主要副业，亦为过去之主要出口。由于十年战争，交通梗塞，南销受阻，尤以自卫战争转入敌后，蒋匪抢劫，因此一般群众仍不愿养猪。今年形势稳定，我于 6 月间公开号召群众增养猪子，大力推动组织、号召每户增养一头，猪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没有统计，估计今后可能大量增加。
（4）拐粉。经过去年今年结合救灾，尤以最近半年来结合支前供给部队，拐粉甚为发达，获利亦丰，一般的达一本一利，其发展数量估计已达抗战前水平。
八、土地改革
本区土地改革时分以下 4 个阶段进行的：
1、1946 年中央五四指示后到本年底主力北撤前的全面土改阶段。这个阶段其实是 6 月至 8 月底，仅 3 个月就结束，全区转入全面支前。地委遵照中央五四指示“中间不动两头平”、“力求其快、力求其平”的方针，执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推进土改。由于时间紧迫，一般的采取地主富农献田的办法，发动群众诉苦斗争，提高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因此对地主实行清算是很差的，地富普遍多留田、留好田，浮财没有献出来。土地全部分了，耕牛农具亦大部分了，收到成绩很大，贫雇农都得到了土地。如全区 600 个大乡除敌占区新海附近约 30 个乡未进行土改外，其余 600 个乡全部进行了土改，得到地产的贫雇农及一部分贫苦中农，约占总人口的 45%，也有不少贫雇农分到了青苗、种子、耕牛、农具，但贫雇农得地不足，果实也分的很少，因此贫雇农感到有些不舒畅，土改没有彻底。另外因战争紧迫，为了分地简单分得快，地委提出每人土地超出全乡总平均数一亩半至两亩以上，就得拿出分，因而侵犯了部分中农的土地。在沭阳城内分房子也形成这样的错误。
2、1947 年 1 月至 1948 年 1 月的土复运动阶段。地区转入敌后，由于领导上认识斗争的要能坚持，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因此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在 7 月份以前敌人“扫荡”清缴的坚持阶段中，在环境比较稳定县里，在敌人“扫荡”的间隙中，实行典型突破，消减赤贫补偿中农，但认为地主经过双减与反奸、土改，已经没有什么搞头了。不少乡村干部土改时多得地，留好地，多得果实，包庇私人，贪污浪费，因之打算在复查中首先要解决干群关系，挤出干部多得的土地果实，补偿中农。但在实际运动中了解挤出来的并不多，才又转向地主富农，挖出好田相当多，干群情绪才提高起来。也有的县如泗沭开展民主检讨，由党内到党外，评功检过，解决干群关系改造干部，但由于运动方向不是向封建势力进攻，所以运动规模不大，成绩不大。
同年 7、8 月间，根据刘少奇同志对薄一波同志土改报告的批示，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布置土改工作，工作过程分打通思想、发动群众与组织斗封建分浮财、调整土地四个阶段。各县复召开扩大会，实行民主检讨，广泛揭发右倾思想，密切了上下间的关系。有的召开贫雇农户会议，进行诉苦追穷根与地主比生活，提高了阶级觉悟，也教育了干部。又进行不断的审干整党，提出消灭封建挖封建根追浮财，进一步的推广了复查，广泛的开展了群众运动。
绝大部分群众卷入了运动，参加了行动，对封建地主撕破脸皮，群众觉悟初步提高，对封建地主斗争剧烈空前，解决了群众的麦种困难。如沭阳一个县即从地主富农手中斗出麦种 20 万公斤，解决了群众暂时生活的困难。因为适逢我区 40 年来罕见灾荒，所斗出果实可以解决灾民两个月的生活，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
根据 5 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斗争获得的果实合粮 400 多万斤，衣服 56000 多件，布 5000 丈，牛、驴 3600 多头，猪、羊 3000 头，白银 14 万多元，黄金 80 多两，其中 3 个县共斗出农具 35000 多件。在涟水、泗沭、宿迁、潼阳的大部分乡村，在复查中都根据中间不动两头拉平的方针，进行了调整土地，从地富多留地留好地中进行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对赤贫户进行调补。在运动中发现了很多积极分子，如沭阳县据不完全统计，发现 4000 多新积极分子。但由于干部及老积极分子在运动中的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作风，因此群众完全当家作主还不

充分。在运动中有时也发生了左倾偏向。

3、平分阶段。10 月 20 日中央“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召开县农会会长、妇会会长会议了解情况，发出如何执行中央“土地法大纲”的指示：成立农筹会，通过检查工作进一步进行三查，重新整顿贫农团、新农会，进一步推动运动；继续进行斗封建追浮财，结合整党，初步的纯洁了党的组织，群众运动普遍的猛烈开展。除边区游击区外我所控制的 500 余乡（小乡）都掀起我区过去从未有过的热烈的群众运动。在边区群众一面武装坚持一面向封建势力斗争，如宿迁大兴庄一个乡半边为敌人占据，群众还积极斗争封建，又如东海沭河区河西岸被敌占，东岸照样向封建展开斗争。斗争摧垮了封建势力，追浮财也彻底，群众得到翻身，收到了很大成绩。但在运动中”左”的偏向进一步的发展了，表现在对敌人不够策略，在追浮财中对大、中、小地主与富农、恶霸缺乏严正的区别，普遍吊打，使用肉刑；在对自己方面表现在阶级路线掌握不稳，单纯的贫雇农路线，比较普遍的侵犯了中农利益，扩大了打击面；在贫农团里过分强调了成分纯洁，有个别县查三代，一般的都犯了关门主义的毛病。此外，不仅侵犯了农村地富的工商业，同时也侵犯了市镇的工商业，犯的比较严重的是高沟、汤沟、马厂 3 个市镇。

发生偏向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老区封建势力，在过去历次斗争中已经基本打垮，剩下的只是残余势力。由于干部小资产阶级的片面性、狭隘性，一方面表现为疯狂性，形成左倾偏向，另一方面表现为尾巴主义，盲目的听从群众的过左行为，不能从党的全面利益去看，放弃了党的领导，又由于不懂得正确划分阶层的方法，对党的政策缺乏了解。

由于灾荒严重的 1948 年春，全区中心任务转向生产救灾，因此土地未能进行平分，确定产权。

4、1948 年 6 月至秋季麦种前。由于 1946 年五四土改不彻底，贫雇农得田不足，浮财没有分到，1947 年的大土复中，浮财虽然搞得彻底了，但因划阶层错误，比较普遍的侵犯了中农，一部分地区土地未调剂，部分地区调剂了土地，但未确定产权，因此，地委确定了划阶层、团结中农、调整土地、确定产权、结束土改的方针。

6 月间，各县抽调干部近千人，组织工作队分到 11 个区 106 个乡进行土复。土复队集中后进行以华中土改会议陈政委的总结为中心的教育，搞通土改方针与政策，学会划阶层，然后分散各区乡结合当地干部，进行初步调查了解情况。根据各乡村特点，拟订土改实施具体计划，调剂土地，确定产权，联系正确划分阶层，合理的补偿中农。至 8 月间各部工作基本上完成了，计完成 170 个乡。为了大支前运动，全党全民进行抢耕抢种，土复工作又告停止，转入秋种支前。

5、全区土改情况小结。

（1）全区经过五四土改的占现有全地区（除城镇外）的 94%。

（2）全区未经五四土改的及新解放区占现全地区的 6%。

（3）全区经大土复运动与平分、阶级斗争、挖浮财而尚未确定产权的占现有全区 39%。

（4）全区经调剂土地确定产权的占现有全区的 11%。

（5）全区新收复区经过反拨田反拨租的占现有全区的 20%。

（6）全区新收复区未经过反拨田反拨租的占现有全区的 24%。

在常州地委城工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1949 年 8 月 12 日）

在我军胜利渡江接收城市工作三个多月以来，已获得了初步成绩，没有发生严重的原则错误。这都应归功于我们全体干部的努力，尤其主要的，是归功于我党中央、华东局、区党委的正确领导。

接着吴觉同志提出三个月来有以下的收获：我们完整地接收了城市，并对各阶层进行了广泛的政策宣传，基本上扭转了工人、学生自发的左倾情绪。在发动与组织群众方面，全分区（除武进外）的产业工人，据不完全统计约有 21715 人，已组织 13587 人。各县且都注意到工人的福利事业。在学生会方面，各县一般也都有了组织。其次是迅速恢复了生产，对工人进行了生产节约的教育，打下了反封锁的思想基础。一般的都办了训练班，江阴、武进、常州训练出来的工人将近 1300 人。大约有 1700 多青年，经过了青年团主办的青训班学习。通过教育，培养与提拔了大批的工人干部和青年干部。同时，又建设与发展了青年团，整理了党的支部。在经济上，则打败了金圆券，消灭了捣乱市场的银元投机，确立以人民币为本位币。在治安方面，一般都进行了户口检查与管制，予匪特以严重打击，并消除了和消除着小偷偷窃风气。同时，由于干部工作人员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对转变城市奢侈风气，也起了很大作用。

谈到这里，吴觉同志复强调指出：城市工作曾经有过不少缺点，有的至今还存在着，例如某些地方曾犯过高工资政策的错误，幸而很快克服，影响不大。有些干部，在生产上表现了门外汉。对工人教育不够，使工人阶级尚没有明确地确立领导阶级的思想；对工人干部的提拔，也不够大胆放手；在肃清匪特方面，没有形成群众运动；对烟民、赌徒的处理，不够明确，城市管理不够科学、严密。群众的发动与组织上，多少还存在左倾的关门主义，尤其是青年团更为明显。工会是工人的群众组织，领导路线不明确，容易模糊工人对工会的认识。以上这些，都有待我们迅速地克服。

一、目前城市及情况如何克服困难

吴觉同志指出：江南的城市一般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性。表现在动力、原料多依赖帝国主义，而生产的东西又多是消费品、奢侈品及外销的货物，以致在今日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匪徒封锁之下，呈现麻痹、萧条。吴觉同志强调指出：目前暂时的萧条，是表示城市性质的转变，不是坏现象，不足以大惊小怪。他又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现在各解放区尚在逐步统一，交流物资不够畅通，城市关系尚未沟通，因此城市孤立状态尚未打破，而今年又是普遍灾荒，加上工人觉悟还没足够提高，资本家对我还有顾虑，尤其城市革命秩序尚未完全确立，使特务还能造谣钻空子，这些都是城市生产不能马上提高的客观困难。

今后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主要是集中力量打破敌人对我的封锁，因此必须积极支援前线，以求解放全中国，迅速打破封锁。生产上完全自力更生，彻底逐出帝国主义。加紧我们内地物资交流，在城市不生产的人口疏散回乡生产。而更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大力开展农村工作。

二、今后城市工作任务

根据以上情况，吴觉同志提出：今后的城市工作，在工业生产方面一般是维持，并争取有条件的个别发展，城市除留有足够人员外，集中全力发展农村生产，在原料、市场获得解决后，再集中力量来发展城市工业生产。因此今后城市的总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者，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及爱国民族资产阶级，组织城市绝大多数的群众，为肃清匪特，巩固秩序，生产节约，度过难关，沟通城市，面向农村，自力更生，打破封锁，逐步改造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而努力。

谈到城市工作的具体任务时，吴觉同志提出：首先是结合反封锁运动来肃清匪特，应很好宣传造成城市的半殖民地性质是国民党卖国政策的结果，而目前反动派复勾结美帝国主义对我进行封锁，派遣飞机进行扫射，留置特务造谣言，打黑枪，破坏城市生产，造成人民生活上的不安。要使群众充分认识国民党特务的罪恶与无耻，以掀起反匪、反特、反窝匪、反庇匪、追谣言、检举与控诉运动。其次是依据各地的原料销路具体情况，有计划有目的的来维持与发展工业。对奢侈品有计划的改为人民必需品，贩卖洋货的商店慢慢使其走向大众化，依靠帝国主义的原料与机器，改为应用国内或本地出产的原料与机件。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推销成品。这主要是依靠产业界自己，应打破保守与坐家待客的思想，去主动努力，或组织商人去推销。第三是工人的工资，要有计划的改为以人民银行的折实储蓄单位计算，这样劳资双方利益都可照顾。今后关于劳资纠纷问题，应组织劳动局专门处理，以前一切的解决方案，皆以劳动局批准为有效。在工会组织方面，要争取绝大多数工人入会，反对关门主义。要大力教育工人，确立工人领导阶级的思想。第四是青年团的建立要采取公开方式，明确团是群众的组织，是青年的先锋队，要广泛的发展，反对以前的小手小脚的关门主义，但也并不是拉伕式的，而是公开讨论、上级批准与群众结合。

最后，吴觉同志对 8、9、10 三个月城市工作的具体任务作了布置后，报告结束。

治淮委员会关于第二年度治淮

工作的报告

（1951 年下半年—1952 年上半年）

（1952 年 8 月 13 日）

中央水利部并转毛主席、周总理、中南军政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

第二年度的治淮工程是在第一阶段治淮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及华东、中南各地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由于我们对淮河情况认识的增进，经验的积累，广大群众爱国

治淮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现已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兹分点报告于后。
第一年工程师在 1950 年大水灾以后，河道堤防，遭受严重损坏，我们既缺乏全面勘测资料而救灾工作又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开始的。工程目标，侧重于防洪、排洪。尚有试做山谷水库一所以取得经验，并做洼地蓄洪工程 4 处，部分河道加以整理。中游利用正阳关以上 8 个湖泊洼地拦蓄洪水，并在润河集建筑分水闸一座，作为淮河中下游洪水总的控制机关，使在 1950 年暴雨情况下，限制正阳关下泄洪水，不超过 6500 秒公方。正阳关以下的淮河全线及苏北里运河进行筑堤培堤工程，配合润河集控制拦蓄洪水工程，使正阳关以下皖北、苏北两大平原，初步获得安全保障。更使我们得以争取时间，进行全面的勘测，详细的规划设计，达到根本治理淮河的目标。这一期工程，胜利地完成了，计筑堤防 2191 公里，疏浚河道 861 公里，完成中型山谷水库一所，上游湖泊洼地蓄洪工程 4 处，润河集分水闸一座及大型涵闸 5 处。第一年工程完成后，沿淮地区获得丰收。
第一年治淮工程胜利完成后，淮河洪水，已开始受到控制，沿淮人民也得到初步保障。在取得初期治淮经验、集训了大批干部、获得全流域的勘测资料的基础上，第二年便开始进行根本治理的工程。淮河的基本情况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因此，依据中央指示的治淮方针，根本治理的主要方法，应为：蓄水控制、整理河道、及开发水利。综合运用上述三种方法，不但要求在夏秋非常暴雨情况下将洪水有控制地拦蓄泄送，免除干支流的泛滥，并且要求将淮河流域每年绝大部分的水量，同样有控制地存蓄，并统筹利用，以大规模地发展坏河流域的灌溉事业，并改进巷道，开发水力发电。在这一总的意图下，第二年的工程计划要求是：完成颍河尚有白沙及洪汝河上游的板桥两水库，并开始筹建淮河干流上的南湾、洪汝河上游薄山及沙河上游佛子岭等三水库中游继续完成 3 处湖泊洼地蓄洪及其控制工程，以达到拦蓄洪水 100 亿立方公尺的目标；完成上、中、下游 39 处内河的整理工程，以继续解决豫中、豫东及皖北等广大平原上的内涝问题；开辟苏北灌溉总渠，以统筹利用洪泽湖蓄水，建设苏北 2500 万亩稻田、棉田的灌溉事业，若遇非常洪水并可分泄 700 秒公方的洪水流量直流入海，减轻排洪入江的负担。截至 6 月底止，以上这些工程都基本上完成了，计共做土方 1 亿 8700 余万公方（上、中游群众自办的沟洫工程 1 亿余万土方还不在内），砌石方 40 万公方，混凝土方 5 万 5000 公方，高良涧进水闸、运东分水闸、东淝河闸已于最近完工（其他闸坝工程尚在紧张进行中）。
第二年度的土方工程任务较之第一年度更为巨大而困难，其中疏浚土方共计 1 亿 6000 万公方，书库筑坝和切岭土方共 1500 余万公方，两项共占全部土方的 90%以上，这和去年以筑堤为主有极大的差别。疏浚 1 公方土所需劳力约当筑堤的两倍；水库运土困难；切岭的挖土运土困难均为筑堤之 3 倍。这就使今年工程无论在规模和困难程度上都超过去年一倍以上，而这个艰巨的工程任务又与上游的土地改革复查，中游的土地改革及全流域的农业增产任务交织在一起，其困难时可以想见的。
但是困难并没有能阻止治淮工程的前进。苏北为在插秧前完成灌溉总渠的工程，调配了 8 万 2000 多名干部，动员了近 80 万民工走上工地，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时期，民工一面扫雪，一面挖土，终于在 4 月底完成任务。中游春修之始雨雪连绵一个多月，为要赶在麦收前做完工程，民工数从 80 万增加到 110 余万，阜阳专区增调 9 个县级的宣教干部和 80 个区级干部上堤加强领导，西淝河工地组织 1 万 8000 民工以 3000 付笆斗日夜排除积水，濛河洼地民工提出“排干一块挖一块”、“小雨不停工，大雨少停工”的口号。6 月中旬上、中游均完成既定土方任务。
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在我国灌溉史上开辟了革命的道路，总渠西起洪泽湖。东达黄海长 170 公里，供给灌溉流量 500 秒公方，连同今后数年内陆续完成的干渠、大、中、小沟及大小涵闸，构成一个极其庞大的灌溉系统，将使苏北、废黄河以南、通扬运河以北、洪泽湖向东直至海滨荒地，获得巩固的水源，可保证 1500 万亩稻田及 1000 万亩棉花及其他旱作物的常年

丰收。
今年兴建的淠河东源佛子岭蓄水库，能拦蓄洪水近 5 亿公方，除配合 1954 年兴建的响洪甸水库使淠河最大洪峰从 4000 秒公方降到 1500 秒公方外，还能灌溉农田 50 万亩，发电 4000 瓦，并经常供给淠河以一定流量，使载重 50 吨的木船能直达大别山区，使大别山区的丰富物产能畅通交流。该水库的主要建筑物——连拱式的钢筋混凝土拦水坝——长 516 公尺，高达 74 公尺，坝基深植在地面 19 公尺下的花岗岩层上，建筑这样的高的连拱坝，需要高度的工程技术水平，将为我国今后大规模的水利建筑工程创造经验，这样高度科学技术水平的建筑是以前国内不敢梦想的，帝国主义讥诮我们不能离开他们而进行建设的谏言，将随这个大坝的建成遭到又一次的驳斥。
第二年工程完成，上游已有 3 个水库和 4 处洼地可以蓄水，部分河道经过整理后，部分地区已有了避免洪水为灾的保障，在山谷水库的建筑上，也摸索了一些比较完整的经验，培养了大批干部和有经验的工人、民工和技术人才，为以后大量举办水库工程打下了基础。中游淮北平原，因整理了支流，大部分地区，除免于淮水泛滥外，还取得了不受内水灾害的保障，下游也因中游洪水有了控制和灌溉总渠分泄部分供水的作用，运河东堤的巩固，基本上已可以解除洪水威胁。
第二年工程中显示着民工劳动效率的不断提高。今年民工总数仅比去年多 20 万人（第二年上堤民工 240 万人）而多做了将近一倍的工程，平均劳动效率提高了将近一倍。这个优异的效果是和民工爱国治淮情绪的高涨，及先进工作方法的普遍推行是密切地关联着的。两年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及治淮的实际效益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了沿淮农民，在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英明指示和号召下，治淮中爱国劳动竞赛运动，普遍而深入地展开了。在工人阶级“找窍门”运动的影响下，农民群众发挥了他们的智慧，“想点子”成为群众性的热潮。上游板桥水库中的王廷秀模范民工分队的技术研究小组对砸石子、挖土、劈土、运土、装车等工作都想出了一套新办法，改进了技术。苏北灌溉总渠模范功臣丁广富、汪本初等也各以其机体的智慧改进了工作法提高了劳动效率。而青年团员祝怀顺则集中多数进步经验成为一系列的先进工作法，该工作法的特点是体力劳动与群众的智慧创造相结合，是力求劳动组合的科学合理，尽量减少杂工；善于学习与集中各方面的先进操作经验，改进操作方法，以提高劳动效率，由于这一工作法的推广，使工地面貌一新，加速了工程的进度。
第二年度所做的混凝土方和使用的钢料机器都比第一年多两三倍，水库、涵闸工程固然需要多种的机器和熟练的技术，即切岭工程也需用铁轨、斗车、照明等新式工具，技术干部与技术工人缺乏，成为突出的困难。由于工人阶级主人翁思想的提高，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逐渐学会了新技术，特别是在“三反”运动后技术干部责任心的加强，逐步克服了这些困难。在工人的耐心帮助下，白沙水库有 3700 民工学会了架电线、铺铁轨、运用搅和机和修理机器等工作，其中 587 人自动申请参加工程大队；隧道运石队民工 230 多人学会使用开山机，并有 16 人去支援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工程。
从两年来的治淮实践中，使我们加深了对淮河水情和地形、地质的了解，积累了经验，认识了工程的规律，加强了工程的计划性，提高了科学与技术水平以迎接今后数年的治淮工程，并为我国的水利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严重的水灾破坏，我们不能够等待全部计划制订完成，就必须立即开工。因此，虽然在正确的方针、规划的指导下，而在某些具体工程上总不免带着多少的急促性与被动性，我们依靠群众，通过实践，在完成第二年度工程中已取得了主动，进行了全面的勘测、调查了水情、学了些工程知识、制定了较为精密的规划设计、使工程指导逐步周密正确，避免走弯路。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是有进步的，而这种进步也恰合于工程发展的规律。治理淮河是在新式工具不足与技术不熟练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的工程，这是有困难的，然而是完全可以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能否打

开群众智慧的宝库，能否在不断的学习中提高自己，改善自己的技术条件。两年来我们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今后还要向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第一年的工程性质极大部分是为了除害（防洪），使用人力，使用农民的粗陋工具进行的土方工程战略绝大部分。今年的工程就更多的结合着兴利，建筑工程已占着相当的比重，工人阶级从政治思想、组织形式以至劳动技术方面对农民的领导作用更显著了。广大的农民，也在两年来的集体劳动中锻炼、提高了自己，甚至部分已成为技术工人。在今后几年的治淮工程中，技术工作的比重将更为增加，机器将日益代替人力，在这方面我们已有了一定的准备。

关于五年治淮的具体计划及第三年度的工程任务，我们已拟具了一个兴利的草案，拟待治淮委员会 9 月初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另文报告。

根据这两年治淮工程的成绩与经验，我们完全有信心，依靠广大群众，按照预定计划，完成根治淮河的伟大事业，实现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

曾山曾希圣

吴觉钱正英

“抗盟”是抗日救亡的进步组织

（1967 年 11 月 4 日）

根据我自己亲自参加苏北同盟会的建立与活动的体会，提出自己对同盟会的看法如下：

一、我认为苏北抗日同盟会不是国民党的外围的群众组织，更不是其御用的反动工具。他的短暂生命是在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下诞生的，又是在国民党百般摧毁下逼使其领导机构趋于解体。同盟会虽不是党所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但也是在毛主席的抗日号召响彻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照亮了国民党地区产生的，其领导主流上是一批想继续革命或追求抗日的革命青年自动结合，其基层分子，大多数又是青年学生、小学教师、城市工人、店员及追求解放的青年妇女。故其是抗日战争初期的在国民党区域的抗日救亡的进步组织。

二、以其全部活动过程看，他宣传党的十大纲领，宣传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反对当时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以反对国民党的溶共政策，坚决抵制参加国民党的御用组织，而成立抗日的民主的进步的国民党区的独立组织。而其全部宣传工作，翻印延安书籍、刊物，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翻印发行游击战术），宣传毛主席的持久战，反对速胜论等。

三、从其长远影响看，在尔后建党中，同盟会所领导下的积极分子，数以千计地被吸收入党，其中大多数成为党的各个方面的干部，且不少在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同盟会活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党的武装，即八路军淮河大队领导下三个团及一个游击大队。如：八团上升为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第三团，成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其第九团则分散为地方分区及县的警卫武装；其十团与滨海游击大队都分别补充壮大主力。总之，从其发展趋势看，似不能否认苏北抗日同盟会。对尔后建党来说则起了一个桥梁作用，打下了党的建军基础，为以后建立民主抗日根据地准备了干部。虽然当时同盟会的实际领导成员中大多数是脱党分子，大部分又是自首叛变分子，也有的是曾经干过特务，有罪恶，但是其后都被党分别使用，经过长期斗争与历次运动证明，这些人尚不是死心塌地走向反动的分子，还是追求革命与要求进步的。特别是中、下层的广大成员分子是好的，是积极要求革命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党的好的、较好的干部，散布全国各地。

附：

苏北抗日同盟总会

陈扬

苏北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还只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由于抗战以来我们失去了不少中心城市，尤其是上海南京的相继陷落，使得很多热情的救亡青年相继地从都市跑回到苏北内地来，散布在广大农村里，他们很艰苦地、很积极地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配合那里原有的工作同志，用铁的事实从各方面说服了淳朴的农民，使得沉寂很久的苏北农村开始传遍了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呼声。广大的农民组织起来了，武装起来了，一队一队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他们的武器有步枪、手枪、盒子炮，也有能杀人的镰刀、斧头、鸟枪、铁铳、土炮，每天晚间各人带着家伙集合起来，雄纠纠地在田野间演习着：怎样进行侦察搜索，怎样利用地形地物，怎样实行袭击敌人，抗日的情绪如烈火般地在每个人的心头燃烧着，他们是随时准备着和日军作武装斗争的。但是这样的工作还是散漫地、个别地进行着。由于苏北形势的日趋严重，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各县除了分别成立一县的救亡运动领导机关外，为了建立各县间工作上的密切联系，建立一个苏北总的救亡组织，已是非常迫切的需要的一件事，尤其是当去年日军正由邵伯沿运河向北进犯，苏北各县情形非常混乱，游击战争即将发动的时候。在这样的客观环境要求下，苏北各县工作同志为了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开展救亡运动，为了发动苏北民众参加游击战争，便产生了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在 2 月 19 日各县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各县抗日同盟会也在总会成立前后相继成立，首先是淮阴、涟水、淮安、泗阳四县，接着是盐城、阜宁。现在连灌云、宝应、泰州、泰兴、东台、南通、海门、启东等县也和总会建立起了密切关系，甚至江南的江阴，安徽的泗州也和我们有了工作上的联系。目前我们就是想把“抗盟”组织普遍到苏北的每一个县里，以便整齐我们的步伐，集中力量在政府领导之下，协助各级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进行动员民众、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教育民众、武装民众等工作，这就是我们总的任务。说到总会本身，它由各县代表大会产生理事 25 人，

候补理事 5 人，再由理事中互推常务理事 7 人，处理日常会务。总会对各县抗盟的领导：第一是派人到各县巡视，检查各县工作，出席各县会议，帮助各县布置工作；第二是总会对各县经常有书面的工作指示；第三是各县对总会经常有工作报告。此外总会与各县间又有密切的交通来往，总会又成立了发行机关——苏北出版社，翻印外界一些重要的参考文献，分发至各县，苏北的文化读物实在太缺乏了。现在我们已经翻印了四次，都是分析目前抗战形势的论文和游击战术这方面的材料。最近总会又出版一种小型的油印刊物，每周一次，辅助教育会员工作。各县“抗盟”对小组的领导，是经常派人参加小组讨论会，有的由常务理事或理事负责，有的则专门成立巡视委员会。小组讨论会的内容是政治分析，工作检讨，工作布置，问题讨论，自我批评。各小组会员除参加小组会议外，还须有经常的工作，如参加各级动委会工作，参加自卫队工作，组织歌咏队，开设识字班，出版壁报，召集农民谈话会等。最近总会对各县工作的指示上，曾特别强调充实并活跃小组生活是目前各县“抗盟”的中心工作，这点涟水做得最好。

总会为了加强会员的政治认识，广泛地号召召开政治讨论会，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外政治形势、工作方式等问题。参加讨论的不只是会员，有时非会员也参加，这样更可使社会一般人士了解我们抗战的意义。这样的政治讨论会，在总会、在各县“抗盟”、在各小组，都是很热烈地举行着，而这样的政治讨论会使我们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上便利不少。总会及各县“抗盟”的工作中心之地，一向都是注重放在农村活动，这在中国的抗战是必要的。但是城市工作也不能放弃，城市工作发展是可以影响农村的。最近各县“抗盟”也注意到这点，指定专人负责，因此各县的妇女运动、学生运动、文化运动、歌咏队、话剧、演讲会等，都办得活跃起来，城市中的会员也一天天增加。

为了广泛地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在农村中进行深入的抗日政治鼓动宣传是非常必要的，而巡回宣传队就是一个最好的工具。于是在“抗盟”会员的宣传、推动下，各县都成立了巡回宣传队。有的用动委会名义，有的则直接用“抗盟”名义。巡回宣传队主要采取化装宣传方式，目前宣传的中心内容就是组织自卫队问题。这样的工作在淮阴、涟水收效最大，每一个地方都能集合起千余人左右，群众已和我们打成一片，和我们一同呼口号。此外，宣传队还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招待：烧水煮饭、打扫宿地。和地主也处得很融洽，我们很诚恳地向他们解释目前政治形势，说服了他们转变过去的旧观念，农村中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好的收获，其它各县也获得了群众的热烈响应。话剧、歌咏，对于救亡运动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淮阴的救亡剧社公演了三天，观众达四五千人，把整个淮阴县城都弄得非常有生气而活泼；淮安的救亡剧社也公演了三天，观众虽不及淮阴的多，只有二三千人，但是一般民众的抗日情绪却提得非常之高。现在这些救亡剧社已分批下乡公演，和各县巡回宣传队配合起来。至于歌咏，救亡歌曲是到处都唱着，在城市、在乡村，随时随地都可听到，尤其是由《武装保卫山西》改编而成的《武装保卫苏北》，会唱的人更多。涟水北乡一个大庙里的和尚也唱得很不错。这样的工作所以能深入普遍的原因，就是因为“抗盟”各小组散布在城市、农村里，很努力地工作着。因为“抗盟”是站在协助动委会工作立场上的，所以参加动委会上级机关工作的会员和负责领导“抗盟”的会员，他们在工作上是要划分清楚的，即是参加动委会上级机关工作的会员，不能再负领导“抗盟”工作的责任。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为了加强会员的政治认识，这样的工作划分是非常必要的。

“干部决定一切”，这句名言对于我们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由于工作的迅速开展，非常迫切需要干部。所以我们先后在涟水乡间开办了两次干部训练班，每次三四十人。学员是从工作中挑选的积极分子，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课程有抗日民众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术、军事学、一般政治常识。训练期虽只有两个星期，但是在学习、生活两方面却表现得紧张活泼。此外，当地农民来旁听的很多，我们都将他们编成小组，参加他们讨论。除平常学习外，又举行了两次附近农村宣传，毕业时又举行了一

次规模较大的晚会，参加民众有千余人。这三次工作，影响了周围十余里的民众。这样的训练班在目前苏北说来，可称作国防教育的模范。现在的苏北教育制度，仍然维持抗战以前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缺憾。

目前苏北民众运动工作中心，就是组织各县乡镇自卫队。这不只是为了保卫家乡、维持后方秩序，同时也准备着苏北一旦沦陷即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抗盟”会员都很积极地广泛地参加自卫队，在里面起着模范作用，帮助动委会进行自卫队政治、军事训练，建立自卫队政治工作制度，成立基干队，作为将来游击队基本力量。苏北的武装力量是很强的，各县枪支愈向北愈多，譬如泗阳一县就有两万余枝，土枪鸟枪还不在内。这样庞大的民众武装力量是不应该放松组织的，为了开展苏北游击战争，为了争取抗战胜利，更是一分一秒也不能疏忽的。从地形上说，洪泽湖、盐阜一带湖荡都是很好的游击根据地，当青纱帐起时更便于游击队的活动。最重要的还是当地的群众条件，一般抗日情绪都很高涨，而且过去也有不少革命斗争经验，只要我们好好加以组织，苏北游击战争的前途一定也会如华北、江南一样活跃的。现在的苏北的形势是一天天严峻，敌人不只从打通津浦线，夺取徐州来占领苏北，而且最近又复由通如一带向盐阜进兵来扰乱苏北。这样，苏北民众和日军作武装斗争的时候快到了。因此总会在最近的紧急工作决议中号召各县“抗盟”会员，集中力量来布置一县的游击队根据地，加紧基本武装力量的政治、军事训练，在民众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宣传鼓动。

因为“抗盟”是站在拥护中央政府、拥护江苏省政府立场上帮助政府进行动员民众工作的，而且在工作上也表现了我们的诚恳态度，因此，当地的军政党机关负责首长都还相当善意地注意着它的工作。我们也估计同他们之间的摩擦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尽力避免摩擦，尽力解释。总会有代表经常驻徐，为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担任委员，并且在宣传部中担任干事职务。最近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有公事到各县，指示各县动委会与各县“抗盟”取得密切联络，对于第五战区苏北各县青年工作团也有同样指示，并且将各县“抗盟”重要干部介绍出来，同时江苏省负责人也向我们表示愿意吸收一切优秀的抗日青年参加抗战工作。现在各县“抗盟”也相继参加各县动委会。在各区、乡、镇动委会中，我们的会员也是参加的，在工作上都表现得非常积极。一般群众对“抗盟”的影响（印象）也很好。我们向他们表示愿意留在苏北和他们一块儿打游击，因此我们的上下层统一战线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当然还是非常不够的。现在苏北的工作障碍第一就是上下层政治机关还不能充分适应抗战需要；第二是一些顽固分子抱着成见，不愿民众运动广泛发展；第三是汉奸土匪的活动，造谣破坏，挑拨离间。最近如皋、东台的失守，就有汉奸搞破坏活动。

“抗盟”从非正式成立到现在，有两三个月，但是它的工作确实有了相当成绩。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够的。检查我们两月来的工作，我们深深地感觉到第一是总会及各县抗盟理事会还不够健全；第二是干部的缺乏，最近两泰的游击队中，我们只能派遣少数会员参加工作就是一例，我们要广泛地号召苏北青年的还乡运动；第三是我们干部能独当一面工作的还不多；第四是我们缺乏坚强的政治领导；第五是这里的文化读物太少，使我们在会员教育上感觉非常不便。希望各地救亡团体，尤其是武汉的，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

同心同德，加快步伐

为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而努力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南京工学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1980 年 5 月 28 日报告，5 月 31 日通过）

同志们：
我受院党委的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各位代表审议。
我院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是在 1963 年 11 月 2 日召开的，距今已经 16 年了。上届党委在 1966 年下半年停止了活动。1971 年 12 月经江苏省委批准，成立了院党的核心小组，代行党委的职能。到 1979 年 9 月，省委又任命了本届党委。经过十年动乱，正反对照，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南工自建院起到“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间，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上届党委积极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教育方针，使教育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学校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实践证明，我院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根本不存在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学校在遭受“重灾”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恢复工作进行得较快，这也是与过去工作的基础较好分不开的。
今天，全国已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团结，思想上进一步解放，经济上在调整中前进的大好形势。我们召开这次党代表大会，应当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继续前进，使学校工作迅速地全面地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做出新的贡献。

一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我们在省委和教育部党组的领导和关怀下，带领全院师生员工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从各方面进行整顿、恢复，做了大量工作，使学校面貌逐步发生变化，为全院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了条件。
第一、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拨乱反正，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新局面。
（一）粉碎“四人帮”后，全院师生员工积极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打了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清算了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并联系我院实际，批判了“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和反动的“两个估计”，基本上澄清了被林彪、“四人帮”搅乱了的许多路线是非，砸碎了压在广大教师、干部、工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日益提高，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干部、群众，绝大多数也提高了认识，振奋了革命精神。
（二）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我们发动群众，清查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整个过程中，我们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调查研究，弄清问题，慎重处理，总的看来，在政策掌握上是比较稳的，运动是健康的。通过揭批查，澄清了一些大是大非，弄清了若干问题，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成绩是主要的。这个运动的主流必须充分肯定。当然，也存在一些缺点，思想发动不够细致，后来运动又转得

较急，搞得不够深透，还可能有遗漏的地方，这就需要在今后继续加以解决。
（三）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先后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多次会议公报、文件和重要讲话的精神，进一步分清思想理论是非，为端正思想路钱，自觉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打下了一定基础。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就不难发现：在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上，在如何看待“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怎样评价毛泽东同志和认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问题上，在为什么要转移全党工作着重点的问题上，在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问题上等等，我们的认识确实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党的教育，一步步地提高的。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许多问题，原来不清楚的、有疑虑的，现在清楚了、不疑虑了，原来不敢想、不敢做的，现在也敢想敢做了。尽管党内外对当前形势和某些政策认识上还存在分岐，少数人思想上的旧框框还比较多，但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是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已日益深入人心；同心同德，加快步伐建设四化，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把过去的的损失补上去，已成为广大群众的心愿；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有所消除，干部中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有所改变，这一切，都大大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促进了党的建设和学校工作。在面上进行形势任务教育的同时，我们开始重视党内的思想建设，各个总支、支部都抓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学习、贯彻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不少党员能注意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政治觉悟，在工作、学习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四）我们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处理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三案”和历史上遗留的问题，落实了党的政策。
在纠正冤、假、错案方面，一年多来，审理复查 1300 余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的有 800 余人，“文化大革命”前的有 500 人），现已基本结束。“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敌性处理的案件 55 人，绝大部分属冤、假、错案，重新作了结论，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消除了影响。受审查、迫害致死的 25 人，除作出结论外，分别进行了抚恤和善后处理，对其中多数死者还举行了悼念仪式，公开平反昭雪。“文化大革命”前，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有 300 人，除两名学生缺少材料外，已复查、改正 298 人，对因反右派受到各种处分的 85 人，也都作了改正；对与右派有关的政刑案件中的 16 人，全部改正的 14 人，部分改正的 2 人。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处理的 45 人，已全部改正、平反，恢复了名誉。其他历史陈案中属敌我矛盾案件的有 17 人，全部改正的 11 人，部分改正的 1 人，维持原处理的 5 人。对在这些案件中无辜受株连的一些人，也都通过派人、发函等方法在一定范围内给他们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此外，我们对过去的所谓“反动学生”问题也都作了复查和改正。
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我们对一些老、中年老师，根据本人条件和工作需要，安排他们担任了院、系、所、室、组的领导工作，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其中有些人还被推选到全国和本省、本市兼任有关职务和担任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同时，还先后提升了 58 名教授、副教授和 678 名讲师。
在落实工资福利政策方面，1977、1978 年调整 1500 名教职工的工资，调整了内部关系，调动了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带来了安定团结的新局面，许多同志放下了思想包袱，心情舒畅，主动积极地从事本职工作。
（五）我们整顿了系、组行政和党组织的领导理论班子，改选了党总支和党支部，民主选出了各教研组的领导干部。通过调整和选举，加强了基层领导力量，发扬了民主，增强了团结，为进一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发挥行政系统和业务干部的作用，推进教学等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近几年，我们在学生和教职工中发展新党员 156 名；还调进教师和科技人员 317 名，招收青工 315 名。
（六）我们健全了政治工作机构，成立了学生工作部和各系学生工作办公室，逐步建立了一支做学生政治工作的队伍，制订了一些工作条例和制度，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了加强。

团委、学生会积极组织“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的活动，广大学生通过政治课和各项教育活动，精神面貌出现了新的变化，风气、秩序大有好转，并且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近两年，我们还恢复出版了校刊。

两年来，我们进行了民兵整组工作，开展了学生军政训练。治安保卫工作有所加强，促进了学校秩序的安定。

恢复了院工会，在进行职工业余教育、搞好生活福利、宣传计划生育、表扬先进教职工、活跃文体生活和家属工作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还恢复了统战工作部，加强了统战工作，协助各民主党派恢复了组织活动，他们正在开展思想教育，为统一祖国、实现四化、办好学校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二、整顿、恢复学校秩序，加强各项基本建设，逐步提高了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一）自从党中央改革招生制度以来，我院除原有学生外，先后招收了 3315 名本科生（包括八种师资班），426 名专科生，106 名研究生，18 名外国留学生，接受近 428 名进修生。为搞好日常教学，教学环节的改进和充实，从教学制度的健全到教学工作的研究和检查，做了大量工作。大部分老专业，在专业方向、内容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改造。另外，还有金属材料、电气技术、环境工程、真空物理技术、系统工程、应用数学、应用物理等 7 个新专业正在筹建中。

我们加强了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学，也开始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全院教学实验项目已达 300 个，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的教学实验已基本上能按教学计划的要求开出。在加强“三基”的同时，我们着手进行教材、器材和人才方面的基本建设，已编写 117 门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开出了 9 门提高课，实验装备得到了较快的恢复、改造和更新，还办起了电化教学，运用了一些电化教学工具，添置了 113000 余册图书、期刊，特别是抓了师资进修提高，477 人过了基础外文关，2500 人（次）听了各门进修课程，其中包括学习“电子计算机的原理与应用“课程和上机练习操作。

现在，教学秩序已基本稳定，教学质量较之前几年有了明显提高，从在校学生的考试成绩上看，是比较好的。学生中学习业务技术的空气较浓，并开始出现了一些尖子。我们成立了马列主义教研室，加强了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工作，开展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从多方面设法教育学生重视政治学习和思想修养。学生们在坚持体育锻炼方面也有不少进步，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有 1900 人，我院体育工作受到了教育部的表扬。

（二）这几年，我们对科研力量也作了些调整和组织。在人力、资料、设备、加工力量等比较缺乏的条件下，通过开展内外协作和钻研、试验，科研工作有了新的进展。1978 年在全国和江苏省科学大会上，我院有 50 个项目受奖，其中 9 项获得省 1978 年重要科技成果奖；1979 年经有关方面鉴定，有 35 项科研成果分别具有一定的先进水平和特色。

学术活动也同时开展起来了。这两年，对校外交流的学术论文有 350 多篇，《南工学报》公开发行量已达 3000 多份。

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正在逐步开展。仅 1979 年来我院讲学或作学术报告的有 41 人；同年，我院也派了一些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出国考察、进修、参观。现在，我院已与美国五所高等院校初步建立了联系。

（三）三年来，后勤方面基本建设的进步是显著的，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共达 21100 平方米，其中教工宿舍 15100 平方米，学生宿舍 6000 平方米。这批工程面积之多，速度之快，是建院以来没有过的。三年来，教职工搬进新房子的有 236 户，住老房子有所改善的 212 户，今年还将有近 200 套住房供分配，教职工居住状况正在逐步改善。与此有联系的生活需要，如液化气灶、煤气管道等也在逐步设法解决。

物资、设备也有大量增加，仅 1979 年添置的教学、科研、生产用仪器设备就达 4658 件，总值 800 多万元，其中精密仪器设备的价值占 1/4 以上。还购买了大量的木材、钢材、生铁等

材料，各种教材供应量（包括自印和采购）仅 1978 年就达 20 多万本。
去年各工厂完成教学、科研和生产任务的情况也较好。电子管厂全年利润达 114 万多元，出勤率达 95%以上，平均每人所创产值达到了全省电子工业系统的先进水平。机械工厂去年克服各种困难，组织了千余人次的学工劳动。
在总务工作上，也作了很大努力，除了完成若干小基建任务外，也购置和自制了 13000 多件教学和生活用具，安装和维修了一些水电设备，调整、修缮了教室、实验室用房。对职工的管理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医院、幼儿园、食堂、浴室等方面的服务项目和服务质量都有了增加和改善，校园和宿舍区也在逐步整理、绿化。
我们先后制订了一些管理办法。实验室和工厂实行定额管理，教师试行工作量制度，学校基金在筹建，全院试行了奖励制度等。此外，还进行了清仓核资，健全了仓库管理，调剂了物资余缺，为了加强财务管理，建立了财务处，修订了学校财务管理制度，整顿了财务分散等状况。
总之，粉碎“四人帮”三年来，我们在学校遭灾十年，创伤累累，思想和组织十分混乱的情况下，从事各方面的工作，边整顿，边恢复，在恢复过程中有所发展，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我们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在江苏省委和教育部党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院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按照党在新时期的要求，以及和先进的兄弟院校相比，差距还很大，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问题。我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得差、理解不深，对我院实际又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工作方法还很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新要求；思想不够解放，某些地方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以致在党的建设和学校建设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在群众普遍关心的生活问题上，抓得不及时，不得力；在任务重、矛盾多以及经验不足、班子不稳定等情况下，往往忙于处理日常事务，被动地应付当前，工作形成平推，而且一般布置多，深入检查少，总结经验差，胸中无全局，手中缺典型，这就必然影响到步子迈得不大，进展不快，学校面貌未能迅速改观。这方面的教训是不少的。

二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有哪些主要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和吸取呢？
（一）建立稳定的学校秩序，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办好学校的前提条件。
动乱只能造成破坏和后退，安定团结、有秩序才能建设和前进，这个道理已为“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要做到学校秩序稳定，内部安定团结，首先要有思想上的一致。必须看到，林彪、“四人帮”长期推行极“左”路线，其流毒很深，加上过去工作中一些“左”的情绪，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袭，必然反映在人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看法分歧，态度不一。有些人从“左”的观点和情绪出发，对党的路线和政策怀疑、抵触；有些人滋长了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有些人把“向前看”变成了“向钱看”或是“向后看”，不顾大局，纠缠老账，抱派性观点、派性情绪，甚至搞小圈圈等等。这类情况，虽属少数，但如果听其自流和蔓延，只会松懈斗志，造成思想混乱，直接影响到安定团结，同心同德搞四化。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先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上来，团结起来向前看，团结一致向前进。从党委领导来说，应当用很大精力，抓这件大事，带头学习、领会党中央的精神，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层层引导，并结合思想实际和工作部署，及时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而决不能离开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就具体工作抓具体工作，也不能单纯地就团结问题谈团结问题。

为使学校秩序稳定，内部安定团结，必须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大量问题，不少的是在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至于在批判斗争中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宁“左”勿右、无限上纲的现象则更多，往往把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当作政治立场问题，把思想分歧当作路线斗争，甚至当作敌我问题，只看家庭出身，不看本人情况，只看政治历史，不看现实表现，甚至把正确意见当作错误意见，把善意批评当作恶意攻击，这种是非不分，界限不清的情况，曾经造成思想混乱，关系紧张，严重地影响学校内部的安定团结。现在对“三案”虽已分别作了处理，对一些批判与斗争不当的地方作了必要的说明解释，但是我们对此工作做得还不细，特别是没有在落实政策中抓紧思想教育，通过对实际事例的剖析来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消除“左”的影响，端正思想路线，共同吸取历史教训，提高全党的政策水平，以致至今还有些人是非不清，不能正确接受教训。

在学校日常工作中，时时处处都涉及到政策问题，仍要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好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如果思想上不一致，不能正确对待，或者处理得不适当，政策不落实，就会影响安定团结。在落实好的政策过程中，总会遇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总会遇到旧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阻碍，重要的是我们看待党的政策，要有一个全局观点，要有党性原则，绝不能抱片面的、本位主义的观点，绝不能从派性和个人利害出发。与此同时，还要讲究实际效果，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方法。一定要防止情况不摸清，教育不深入，政策界限和具体标准不明确，上下口径不统一，走群众路钱又不够，结果在掌握分寸上有出入，甚至被某些歪风邪气钻了空子，以所谓“灵活性”破坏了“原则性”，形成若干特殊和例外，带来副作用，不利于安定团结和调动积极因素。过去我们在调配住房、评定职称、调整工资等工作中，是有这类教训的，应当认真吸取。

学校要达到秩序稳定，内部团结，还需要从组织上、制度上加以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在来之不易，我们全党同志务必十分珍惜它、巩固它、发展它，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对于那种违反纪律、破坏秩序、破坏团结的人和事，一定要批评教育，并酌情予以纪律制裁。过去，我们发扬正气、表扬好人好事少，对歪风邪气又打击不力，有拖延等待甚至姑息迁就的地方。值得注意的还有：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派性影响等往往搅合在一起，在某个时候某个问题上暴露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工作上、制度上又存在若干缺陷和薄弱环节，有时明明是一、二个人的问题会牵连到一批人，明明是新发生的矛盾，会追溯到陈年老账，明明是可以通过彼此协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的事情，却采取了激烈的、对立的形式，对这类情况，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并采取预防的措施，要注意抓思想苗头，抓工作上的薄弱环节，抓典型的人和事，通过实事求是地处理具体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提高觉悟，增强团结。当然，学校秩序往往与社会环境影响有关，我们还要经常依靠和配合治安等部门适当解决。

（二）坚持以教学为主，把各方面工作拧成一股绳，大力培养人才，是办好学校的中心问题。学校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场所，教育有其本身的客观规律。过去用政治运动冲击教学、科研，用领导政治运动的办法来领导教育工作，显然是错误的。至于“四人帮”推行的那套极“左”的口号和实用主义的做法，更是荒谬的。现在，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要以四化为中心。为适应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在我们学校，就更加需要坚持以教学为主，狠抓教学、科研。过去，我们迟迟未能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未能认真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对教学、科研抓得不够，这是由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工作方法还不适应，加上大量的历史上遗留的问题要处理，各方面的整顿、恢复工作要进行，牵扯了很大精力。

坚持以教学为主，一方面，多年来教学工作中许多行之有效的原则，曾经遭到种种攻击和破坏，现在需要加以澄清、恢复和贯彻；另一方面，在新的形势、任务下，教学工作要不断改革，教学、科研、生产三者要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其中又有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急待研究解决。以上，都涉及到对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如何理解和贯彻，涉及到如何多快好省地培养人才，归根到底一句话：要继续摸索和遵循教育规律来办好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对此，党内党外有各种看法和想法是好事，现在既需要通过民主讨论，统一教育思想，明确工作方向，以利于处理好教学、科研、生产三者的关系以及它们内部各方面工作的关系，又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一些措施，鼓励和支持大家在稳定正常工作秩序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试验和创造。

办好学校要依靠广大师生员工的努力，其中，特别要树立依靠教师办学的思想。过去，我们学校在这方面是有经验教训，也吃过不少苦头的。南工的这支教师队伍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他们在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迫害，工作极端困难的一段时期，仍然坚守岗位，尽力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尽管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局面，但是许多教师还是辛勤劳动，想方设法教好学生。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依靠教师办学，正是党加强对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的领导的一种表现。既然知识分子是党的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既然学校工作要以教学为主，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克服某些“左”的、片面狭隘的观点和情绪，重视教师在办学中的地位，从各方面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学校政治工作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学校各方面的工作质量以至培养人才的质量。以四化为中心，强调业务技术重要，丝毫也不意味着政治工作不重要了，相反的，对政治工作的质量要求提高了。那种以为今后政治工作可有可无的看法，是十分有害的误解。近几年来，一方面是社会上某些错误思潮和忽视政治的倾向对学校人员包括政工人员本身有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放松了教育和组织工作，政策措施等也未跟上去，以致政治工作一度削弱了，这是一个损失。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线。忽视和削弱政治思想工作，必将犯历史性的错误。专不等于红，红必须专。今后政治思想工作如何密切结合教学等业务来进行，政治工作的组织、制度如何健全，队伍如何扩大，政工干部本身如何做到又红又专，政治工作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对于这些问题，要逐一解决，使政治工作真正加强起来。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都要坚持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加强教育，改善管理，决不能抱单纯技术观点和迷信、滥用经济手段。

后勤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需要迅速适应和紧紧围绕培养人才这个根本任务，需要坚决服从和认真服务于这一中心。后勤人员努力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师生员工的生活服务，是为四化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后勤人员要增强当好后勤兵与红管家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专心本职工作，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其他人员要尊重后勤人员的劳动，积极支持、配合。十年动乱，摊子扩大，“欠账”不少，到处补缺，加之目前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各方面矛盾很多，而我们党委领导帮助又不够，后勤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办学需要。今后亟需加强对后勤部门的领导，同时发动全院人员来支持、配合后勤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实际困难。

（三）加强和改善党委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所在。

治国必先治党，同样，治校也必先治党。对此，我们过去是认识不足的，放松了党组织本身的建设。实现党的领导作用要依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还要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各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依靠党的干部和党员的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各个领域发挥骨干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现在，南工党内确实存在着组织涣散、纪律松驰、党风不正、党纪不严的现象，这是林彪、“四人帮”破坏、毒害的恶果，也与近几年来我们“党不管党”以及党内不讲思想意识的修养有关。如我们没有好好抓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个别党员

有违法乱纪等现象，长时间未得到应有的教育和处理。党内的种种不良倾向主要表现在：党的观念淡薄，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党的文件传达和重要报告不愿听，不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党内外无别，上下不分，透风泄密，不顾影响；放松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工作挑肥拣瘦，不服从调配；思想斗争不开展，在原则问题上做“老好人”，批评不得，也表扬不得；办事凭老经验，工作上推下卸，不负责任；不如实反映情况，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骄傲自大，不讲民主，不靠集体，不能很好地与党外同志合作共事；利用职权，谋私利；甚至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怀疑、抵触，消极对待，乱发议论、传小道；派性高于党性，明无山头暗有礁，闹不团结，工作中不互相支持配合，搞小圈圈，排斥一部分人，拉拢另一部分人，以及个别人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等，所有这些，虽然表现在少数人身上，但影响很坏，它严重地侵蚀党的肌体，削弱党的战斗力，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挫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危害党的事业。现在，党的组织迫切需要整顿好，建设好。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干部看领导。作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更要严以律已。领导干部能否带头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处处做出好的样子，至关重要。过去我们党委一班人在这方面做得差，特别是平时很少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就必然影响到党委领导工作的效果和威信。身教重于言教。过去我们对干部在工作上提要求多，耐心教育、具体帮助少，一度对一些中层干部的工作调换得多了一些，对有些同志的工作欠及时慎重的安排，事前事后又未很好地对他们进行个别工作，这也曾造成一些误解和思想负担，给党内团结和学校工作带来影响。我们既要重视每个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表现，又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具体的人和事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且看他们本人当前的认识和态度。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前期，许多干部对林彪、“四人帮”的面目认识不清，受骗上当，是可以理解的；而到后期（从批林批孔到粉碎“四人帮”以前），如有人再紧跟着“四人帮”，另搞一套，“十年一贯制”，那就不单是认识问题了。对在前期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以后不坚持错误，不继续搞派性、犯更多的错误，党和群众是不会再去具体追究的，当然，他自己应当很好地接受教训。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领导我们结束了十年的混乱局面，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引导党和国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在这个时期，即使过去犯过一些错误的干部只要他真诚地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就应该欢迎和信任。即使过去没有犯过什么大的错误的干部，如果现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抱着抵制以至对抗的态度，那也是不能允许的。所有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或者是受委屈的，都要坚信党的政策，从积极方面看待落实政策的工作，识大体，顾大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向前进。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首先具有这个觉悟。

加强和改善党委领导，除了组织上的加强，思想作风上的改进之外，还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过去，我们有时强调依靠集体领导多些，但分工负责的精神不够，往往事无巨细，把本应分工负责去贯彻执行的事，也拿到会议上来讨论，造成问题不集中，对重大问题缺乏通盘考虑和深入研究，影响到集体领导作用的发挥。正由于对一些重要部下缺乏通盘考虑和深入研究，看法不够一致，要求不够明确，这时虽有分工，也难于负责。有时，强调分工负责，个别商量解决问题的多，加强集体领导，抓的又不够，对共同性问题，对一个时期如何抓住中心，带动其他，不能及时有效地商讨和决断，缺乏协调一致的动作。今后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切实执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与此同时，还要认真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行政领导和职能部门的作用，摆脱日常具体事务，集中精力，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研究解决学校工作中带原则性的关键性的问题。

三

回顾过去，南工是在极不平凡的年代，一步步地曲折地向前进的，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也得到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展望今后，新时期新形势的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务十分光荣而繁重。我们要加强领导，吃透“两头”，抓住中心，统筹兼顾，在今后两年内着重做好下列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党委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

（一）我们要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党风党纪，提高党的战斗力。我院现有党员 1033 名，“文化大革命”后入党的新党员占 1/3。虽然组织状况总的看来还是好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不少新党员对自己要求不严，有些老党员对自己也要求不严，有的新党员不合格，有些长期合格的老党员现在也不那么合格了。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我们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更高了，即使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对他们来说，也有一个重新学习、重新改造，使自己从言论到行动都符合党规党法的要求的问题。

首先，要以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基本教材，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其次，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按中央规定，在适当时候进行组织整顿。

准备用一二年时间轮训党员，分期分批，教职工中的党员，按总支范围组织，采取半脱产等方式进行，学生中的党员利用部分假期集中进行。党员轮训，要以“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为中心，抓住三个重点：明确党员标准，发挥模范作用；坚持党性，根绝派性；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纪律性。要强调边学习、边对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准备用一、二年时间轮训科长以上党员干部（除归中央和省委轮训的以外），围绕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进行干部考查。

在平时要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党委、总支负责人都要给党员上党课。为密切党群关系，搞好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加强群众对党员的监督帮助，党的组织还应不定期地召开群众座谈会和通过个别谈心，接待来信来访等，征集群众对党员和党组织的意见。

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要健全领导班子，准备采取领导挑选和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建立领导干部后备名单，在这方面，一定要破除唯成份论、重德轻才和论资排辈等老框框、老办法，并通过适当步骤，使院、系两级领导班子逐步年轻化、专业化。党委、总支和支部都要定期总结工作，发扬民主，进行改造。要建立党的纪委检查机构，在党委领导下，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组织仍应按党章规定的入党条件，本着积极慎重的发展方针，继续有计划地培养、发展新党员，有些业务骨干经过多年考验，一贯表现较好，积极要求入党，对他们的培养、发展工作要加以重视和抓紧进行。

全党要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用。院、系领导干部和机关部门都要带头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精简会议和文件，分工蹲点跑面，多深入到第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加强政策研究工作，实行面对面的领导。在这方面，要通过认真实践，使之形成制度，形成风气。

要继续加强党委本身的建设，搞好学习和团结，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党政分工，用更多的精力来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二）我们要继续学习、宣传和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至五中全会的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分别不同对象，进行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除了重点放在党员和党员干部之外，对其他教职工也要通过形势与任

务的宣传、学习和政治活动，继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积极开展“兴无灭资”的教育和斗争，帮助大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确理解党的路线和政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消除模糊认识和混乱思想，自觉地搞好团结，搞好工作和学习。对学生和教职工中的团员、青年，要围绕上述教育，着重进行革命理想、革命传统、社会主义民主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方面的宣传教育，继续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的活动，，使他们坚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对实现四化的信心，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红与专的关系，并通过表扬先进来树立正气，搞好校风。在加强学校治安保卫措施的同时，要结合对典型事故、案例的剖析和处理，继续对全院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和“四防”教育，并结合学校秩序的整顿工作，进行“三公共”（爱护公共财物，搞好公共卫生，维护公共秩序）的教育。

要使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到教学领域，贯穿于课内外一切活动之中，加强学校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对学生教政治理论课和做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们要创造条件，采取措施，加强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加强政治教师与其他政工干部工作上的协同配合，定期分析学生中的带共同性的倾向性的问题，研究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予以引导，使政治理论课在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提高日常政治思想工作的效果，更好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院、系和各部门负责人都要尽可能给学生和教职工上课、讲话，进行必要的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

要充实政工队伍，配齐专职、兼职人员，搞好思想建设，落实有关政策，并广泛发动和鼓励教师和老职工一道来做学生和青年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既教书又教人，既管物又管人，使政治思想工作更具有群众性和针对性；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作用。要改进政治学习的方法，加强基层活动，把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搞得深入细致，生动活泼。

要继续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完成“三案”和一些历史上遗留问题的善后处理，包括有关档案材料的清理和对抄家物资的继续查处；检查知识分子政策和统战政策的落实情况并切实加以改进；继续搞好提升职称和调资升级等工作；抓紧进行干部、教师的培养、考核和干部队伍结构的改革工作。要健全和坚持政治工作的各质制度、规定，加强人事管理，学生搞学年小结，干部、教师、职工搞年终鉴定和考核、考查，政工部门每年分别召开学生和教职工政治工作会议。要大力宣传好人好事、好思想、好经验，分别表扬师生员工中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贯彻民主办学的方针，每年要召开师生员工代表大会，集思广益，改进学校工作。

第二，紧紧围绕为四化培养人才这个中心，坚持以教学为主，狠抓教学、科研，搞好后勤工作，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

（一）在教学方面：一是要加强对当前教学工作的研究和改进，同时抓紧进行教材和实验室的建设。对多年来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原则要加以全面贯彻。在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的教学上，从内容到方法都要力求“少而精”，切实改变那种内容庞杂、一味灌输、管得死、“抱着走”的现象。在基本技能的训练上，要从严要求，并落实到每门课、每个教学环节中去，防止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要重视体育课的教学，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使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目前一些学生中存在着学习负担过重、被动应付、“消化不良”、劳逸结合得不好、体质下降的状况，应引起足够重视，从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解决“超学时”、加强体育锻炼、搞好伙食和卫生、执行作息制度等方面设法改变。面上教学，要注意抓“两头”，因材施教，对学习很困难的学生要给予必要的指导帮助，而对于学习很优秀的学生，则要创造更多的条件，制订试行办法，加以特殊培养。在近一二年内，全院要逐步开出一大批选修课，同时完成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修订和其他教学文件的制订，并选编各门课程的基本教材和主要参考材料，使之相对稳定下来。实验室要稳步建设，逐步调整，克服“小而

全”、本位主义的思想和仪器设备分散、重复，利用率低的浪费现象，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证重点建设。近一、二年内，全院要增开出一大批实验项目，并准备单独开设实验课。二是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同时重视对教学基层干部的培养帮助。要加强对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引导大家端正思想路线，继续解放思想，摆脱一切旧思想、旧习惯的束缚，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政治与业务、进修与工作等关系，统一教学思想，端正工作态度，一切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心为实现四化培养人才，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回避任何困难，团结起来，刻苦钻研，大胆创造，向更高更新的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前进。要重视对教师的业务培养，总的目标应该是打好基础，狠抓深造，形成专长，建成梯队。在普遍提高的同时，贯彻“择优”和“拔尖”的原则，有计划地进行重点培养。不承认差别，不讲重点，不择优，不拔尖，就不可能及早产生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学术领导人与骨干力量。平均对待，一律拉平，只会浪费人才、压制人才、埋没人才。不准拔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个政策和道理，一定要使大家想通和掌握，各级领导首先要做到坚定不移，坚决克服那种文人相轻、互不服气、求全责备、忌贤妒能以及回避矛盾、四平八稳、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错误倾向。师资的培养提高工作，应该有计划、有目标、有要求、有措施，其中包括为学术上造诣较深的老、中年教师配备得力的班子或助手，设法减轻他们社会工作的负担，使更多的教师特别是中年教师明确进一步深造的业务方向，加强青年教师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等等，都要不失时机地抓紧进行，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建成梯队，办好一批专业，体现理工结合，形成自己的特色。教研组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是繁重的，它直接关系到教师的成长和教学质量、科研水平的提高。我们要通过总结经验、培养典型、训练骨干、配备助手等办法来帮助教研组主任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好。

（二）在科研方面：一是各教研组、研究所（室）要根据四化建设需要和本学科发展趋向，结合各自的工作基础和业务专长，尽快确定长远研究方向，落实近期任务、选题，拿出研究成果，切实防止和改变那种走一步看一步，零打碎敲、力量不集中、长期无成果的状况。现有项目，符合方向的坚持下去，不符合的逐步调整。选方向不能受现有课题的限制，定任务不能离开方向，只顾眼前。

二是除了适当补充和加紧培养现有专职人员，逐步形成一支各类人员配套的专职队伍以外，还要充分发挥兼职教师的作用。各教研组，也要通过明确方向、落实任务、组织进修、带研究生和科研试验手段现代化等，把科研队伍逐步建设好。暂时没有条件建立研究机构的教研组，可先成立科研小组。现有研究机构，要从人力、物力和理论上为尽快招收学位研究生打好基础。全院准备继续筹建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和建成一两个现代化的试验研究基地。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开展学术讨论，特别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有计划地聘请国外专家来院讲学和指导科研工作。

（三）在生产方面：校办工厂应继续努力为教学、科研服务，在保证教学实习和科研试制加工的前提下，适当安排生产任务。院机械工厂还要积极组建教学实习车间和科研加工车间。各工厂都要加强管理，健全制度，发动群众，挖潜革新，提高生产能力，搞好经济核算，出色地完成各项指标，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学校积累更多的基金贡献力量。

（四）在后勤方面：一是后勤人员要牢固树立为教学、科研服务和为师生员工生活服务的思想，打消自卑感，加强责任心，做好本职工作，甘当无名英雄。所有学生、教师和职员都要重视后勤工作在全院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纠正那种轻视后勤工作和体力劳动的错误观念，并且用“三公共”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后勤人员搞好物质保障，制止某些“前修后拆”、“前疏后堵”、“前清后乱”的不良行为。我们要在全院人员中继续开展增产节约的教育，从各方面精打细算，严格执行制度，加强管理，及时表扬、批评，纠正那种“重点大学多花点无所谓”、“反正是老公的”错误思想，迅速改变目前用钱、用物、用水、用电上的浪费状况。这是一个关系到执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树立社会主义新风

尚、培养青年一代的大问题。对于严重浪费的行为和盗窃公物的事件，一定要追究责任，按法纪处理。

二是总务工作亟需加强。既要按编制补充和调配部分工作人员，又要积极培养、选拔青年工人充实班、组骨干，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革新活动，建立一支维修房屋、家具和水电设备的专业队伍。后勤干部都应安下心来，钻研业务，掌握有关工作规律，学会管理，加强工作计划性，带动大家逐步实行半企业化改革，在有关群众性的生活福利方面努力增设服务单位和项目，提高服务质量。

三是基建工作要搞好校园和宿舍区的规划设计，再鼓干劲，克服困难，搞好校内外协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提高基建速度和质量，一步步解决教学、科研、生产用房和改善教职工的居住条件。今明两年，要争取完成 3 万多平方米的建筑工程。

四是财务工作上，要建立经济审查委员会，进一步改革学校资金管理体制，改进预算经费包干办法，总结建立“学校基金”的经验，加强行政管理和群众监督。

有关业务行政工作，这里只是着重提出以上几点。在今后两年内，我们还要按照学校发展规划的要求，规定步骤和方法，分别加以具体实施。

同志们，南工各方面的工作基础是比较好的，上级领导对南工工作很关心很支持，人力、物力、财力的条件也正在逐年改善，尽管当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是学校工作已经通过前段时间的整顿、恢复，得到了一定发展，我们已开始了新的长征。当前形势十分有利，让我们在党的五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江苏省委和教育部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委的领导，搞好党内外的团结，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切实转移工作着重点，同心同德，艰苦创业，加快步伐，扎扎实实，为把我院办成具有先进水平和特色的重点大学，多快好省地为实现四化出人才、出成果而努力奋斗！

怀念

记吴觉

李锐

1981 年夏，我到南京出差，特去看望一别 20 多年的老友吴觉。这时他任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和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因哮喘痼疾发作住在家中。一进客厅，就看到墙上挂着李一氓遒劲书法的一帧条幅：

主人颇有江湖气，坐客能谈山海经

抗日战争时同吴觉同志共事淮海区，曾撰书此联以赠之。三十五六年后重遇南京，虽历劫无重数而雅兴不减当年。回京后曾直同志告以联语，因重录寄之，当共哄笑。然这一段历史不可没也。李一氓于北京。一九八零年元旦。

这两句话真是把吴觉写活了。我最初认识他是 1938 年 1 月在徐州，那时我正负责组织公开合法的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政治上比较开明，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吸收了一批地方开明士绅和进步人士。当时党的苏鲁特委负责人是郭子化，他有较多的上属关系，也被聘请为委员，特委成员郭影秋就在动员委员会内工作。吴觉是淮阴人，他同谢冰岩代表苏北的抗日青年，从淮阴来徐州找党的关系，同时带了地方上层人士介绍信来找总委会，取得成立地方群众组织的合法权力，以便回到淮（阴）淮（安）涟（水）泗（县）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他们由郭影秋安排，来找过我，说起他们的活动情况，知道苏北有一批人刚从监狱和反省院中出来，还有从外地流亡回来的进步青年，急于找到党的关系。这次他们只带回总动委会的认可，而没有能接上组织关系。吴觉被任命为淮阴动委会的指导员，受权组织县动委会，他们已成立的抗日群众团体也得到承认。

1938 年 5 月，徐州突围前夕，我奉特委命，率领青救团组织的三四十人转到东北军于学忠部队，新组建一个战地工作团。于部突然改变挺进山东敌后的计划，我们也只好随部队突围。在突围中被冲散，与总部失去联系，我们一支小分队辗转向东突出敌人包围。后来我只身来到淮阴，在吴觉处住了三四个星期，其间并到涟水东北军五十七军常恩多师同党组织联系过。由于我的介绍，吴觉同他们早有来往。

吴觉是七七事变前两天，通过国民党上层关系从苏州反省院保释的。他回到淮阴时，日军已逼近南京。这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省党部正搬到淮阴。省主席顾祝同未到任，由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代理。省党部书记周化鹏是他父亲的学生，为世交。吴利用这些上层关系，争取组织进步团体的合法地位，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活动。他同夏如爱、宋振鼎、谢冰岩等一批失掉关系的党、团员同志，将淮阴、涟水、淮安、泗县、灌云一带进步青年都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尽量扩大抗日进步力量，准备在苏北敌后打游击。为此，吴觉还与同族人的帮会领袖、土匪头目、国民党上海暗杀团的枪手等三教九流联系，以防止这些地头蛇跑到敌人那边去。他自己弄到七支枪，埋藏在农村的家中。周化鹏等人也知道，以吴为首的这一批从监狱、反省院出来的共产党员或“嫌疑分子”，有活动能力，在青年中有威信，在即将来临的敌后游击战争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吴觉等准备成立苏北抗日同盟会时，周化鹏便主动找吴等开座谈会，想把他们拉过去，说是要起“化学变化”，国共两党统一战线要“联合为一体”。当即遭到吴觉等人的拒绝。于是周化鹏也不同意他们成立苏北抗日同盟会。吴随即找到他父亲的朋友，江苏省有名的士绅、进步人士朱德轩，同国民党顽固派作合法斗争。朱是上海的名律师，顾祝同、韩德勤是他的同乡后辈。吴觉到徐州，就带来了朱的介绍信去找李宗仁的。他们从徐州回来，带回第五战区的“令箭”，正式成立淮阴县动员委员会，由朱德轩任主任委员，朱的亲信淮阴县长胡海泉为组织部长，吴觉兼副部长，掌握组织大权。于是合法地成立了苏北抗日同盟会，由大革命时的老同志宋振鼎任理事长，谢冰岩任秘书长，骨干有李干成、陈书同、万金培等。同时还创办刊物、翻印延安的出版物。由于获得了合法地位，活动就便利多了。这个群众组织很快向乡下发展，各区乡陆续建立起抗日自卫武装，吴觉还与朱德轩一起到各乡检阅。后来吴觉筹集经费，秘密购置枪支。

我是 5 月上旬到达淮阴的，当时因敌机骚扰，常有警报，吴觉就以城郊农村他岳母家为活动场所，我就同他们住在一起。3 月间全国学联在武汉开成立大会时，我曾去参加，弄到了大批书刊，包括许多介绍红军游击战争经验的小册子，带回徐州传播了，自己也因此学得一点皮毛。在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影响下，这时国民党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和关于召集“国民参政会”的决定。国民党这个具有两面性的《纲领》，在内外政策上较过去有了一些变化，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我到淮阴时，正遇上国民党的淮阴县长要请吴觉等人吃饭，韩德勤八十九军的政治部主任李歧鸣等人参加，商谈对统一战线的看法问题，“以求得意见一致”。在这之前，江苏省的保安司令（二十四集团军的副司令李守维）和韩德勤本人，都分别找吴觉、谢冰岩他们谈过话，也请吃过饭，表示愿意听取进步青年的意见。这些国民党分子对统一战线有他们的理论，就是所谓“化学性质”的，所有党派都要溶为一体，由国民党领导，奉蒋介石为“民族领袖”。这一次吴觉一定要拉我一同去赴宴，借重我这个“不速之客”，以张他们的声势，表示他们并非纯地方性质的力量，而是与外面已取得一定联络的。参加这次宴会的，记得还有宋振鼎、谢冰岩。他们要我作主要发言。1984 年 4 月 30 日吴觉去世后，他的儿子将他的 1955 年在安徽受审查期间所写的详细自述和其他有关重要资料寄来，其中记述了这次宴会：

“同年夏，国民党江苏省当局要淮阴县长胡海泉出面请我们吃饭，同时请他们省方要人，如李歧鸣等，想利用吃饭交换一次意见，主要想在对统一战线认识方面求得一致之意见。我们参加作客吃饭者是我及宋、谢三人，另外还有李锐同志，因李锐同志由山东来淮阴，他听了党内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报告，我们准备在座谈会时以李锐同志为主发言（李锐同志今年尚在中央任水电总局局长）。在宴后开始座谈的时候，国民党人开了话题后，即由李锐同志发表了长篇意见。李的一席话很生动，说得国民党人哑口无声，而不敢继续发言了。”

这次宴会后，吴觉等人很想留我在淮阴工作。由于苏北这一带还没有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我于是到涟水常恩多部的党组织联系，考虑是否先留在该部。吴觉等曾经介绍过一批当地的进步青年给该师办学兵队，内中已建立党支部。到常部后，同师长常恩多长谈过一次，在旅长唐君尧处住了几天（唐是西安事变时捉蒋介石的指挥官，跟我谈了当时的详情）。由于国民党的政训处对东北军监视甚严，以至常师长很谨慎，在晚上坐床垂帐读进步书籍。我也不便在该部留下。最后只好仍只身离开淮阴，经上海回到大后方。临别时，吴觉特地为我换了服装，介绍了泰县的熟人关系和一路情况，这是一个真空地带，长江的港口同上海有轮船来往。从此，我与吴觉即不通音讯。

“文化大革命”时，我在秦城的单监生活中，枯坐无聊，追怀往事，作了些怀旧的诗。记述抗战爆发到徐州突围的长诗《转蓬曲》中，有几句讲的也正是这一段经历：

失伴只身走淮阴，敌后孤悬一死城。
当地新交欲揭竿，苦于蒋党阻重深。
借我外来不速客，席间舌战群丑惊。
走访涟水“杨开多”，亲耳临潼捉蒋情。“杨开多”为常恩多师代号
师座读书犹垂帐，众目睽睽难久停。
万里云罗一孤雁，江淮涟泗人留停，
半月勾留别依依，不敢扁舟远搁浅。

这次和吴觉相聚半个多月，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后来直到苏北沦陷后到我军主力东进前的这一年半当中，在党派来的淮盐工委的领导下，吴觉等组织了一支开始只有几百人的抗日义勇队，吴担任总指挥（谢冰岩为秘书长，宋振鼎为政治部主任，夏如爱为教导大队队长），成为淮阴地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后来这支武装逐步扩大为八路军南进支队第八团、第三梯队（对外名淮河大队），吴任团长、大队长等。淮阴是 1939 年 3 月沦陷的。当时淮海地区的情况极为复杂，他们的处境极为困难。除日、伪、顽（国民党）军外，还有为各方争取的地

方游杂武装。吴觉率领这支部队周旋其间，同日、伪、顽军浴血奋战，给日伪军不断打击。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中，部队日渐扩大，吴觉本人则被张贴布告，悬 5000 元的赏格捉拿。他在《自述》中说：“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斗争，这是我亲自掌握的，被我镇压的特务是难以数计的。”随着部队的扩大和改编，吴觉最后担任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第三团团长。直到 1940 年，虽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吴觉还没有正式解决党的组织关系。他自己说：“这一年半的斗争是尖锐、残酷、艰难、困苦的。我们没有根据地，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日伪统治区内活动，既要防顽，又要防日，实处于敌伪顽夹击的状态。同时我们没有经济来源，数百人的一支游击队完全依靠分散在老百姓家里吃饭，这就需要有最高度的自觉的纪律。群众条件好有基础的地方，虽然可以隐蔽，但因吃饭问题使你难以停留两天以上。我们经常日伏夜出，灵活跳动；经常夜行七八十里，穿插于淮海、盐阜两个地区……常饿着肚子作战与快速度地行军，没有卫生人员，平时病号治疗护理有其困难，作战伤员更是难以处理。在这一年半的坚持斗争中，牺牲了不少的优秀干部。……刘少奇同志曾决定为了保存这数百人干部，要我们撤到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但我们表示可以坚持，而且可以坚持到迎接主力。……由于我们的游击坚持，保障与掩护了苏北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我八路军的主力，终于在 1940 年盛夏之际进军苏北，建立了淮海与盐阜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我已 28 岁了。”这一段描述，不禁使我想起那半个多月同他相处的日子，他的豪迈气概、潇洒风度和英发才干，历历如在眼前。吴觉后来从部队调到地方，曾担任淮海行政区专员等职。

解放初期在湖南工作时，黄克诚和金明同志都同我谈起过，吴觉在开辟和坚持苏北根据地时作出的贡献和他的特出才能。黄老还特别谈到，少奇同志说过，当年金明从山东到苏北后，一大功绩就是放手使用了吴觉这一批从监狱和反省院出来的老同志，从而进一步打开了淮海地区的局面。

我第三次见到吴觉，是 18 年之后的 1956 年秋新安江水电站开工之前。我到上海找谭震林同志，请求支援技术干部，华东局派张灿明同志同我一起到蚌埠找吴觉，请淮委支援。这时正是吴觉被错误“肃反”，关押一年之后，刚恢复自由。他陪我参观佛子岭水库和正在施工的响洪甸水库，畅谈了分手后各自的经历。

第四次见面是 1958 年，我到三门峡出差，他刚去任工程局副局长。他有哮喘老病，患肺气肿，仍立即陪我到工地各处跑动，还艰难地同我一起爬上混凝土拌合高楼。这次他才比较详细谈了他在淮委挨整的一段经过。这种滥施专政手段，随意残酷整人，在吴觉身上的这一段往事，是早在 1955 年发动的。扼要记述如下，颇有史料价值。

1950 年，浩大的治淮工程开始时，华东局调吴觉到安徽，担任治淮委员会秘书长和党委副书记，负责日常工作。由于党委书记比较主观武断，淮委的许多干部意见不少，淮河流域几省之间，也因此不甚协调。吴觉总是帮助劝说疏导，以求搞好团结，做好工作。开始倒也相安无事。可是好景不长，矛盾逐渐发生和发展了。1952 年初秋的一次会议，这位党委书记组织了一些人对当时的淮委主任和工程部副部长大加责难，吴觉认为这些责难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在另一次会议上作了公正说明。当会议材料整理上报时，这位负责人让人转告吴觉，要他修改发言记录，吴没有同意。果然，不久报复就来了。1953 年新三反运动中，就有当事者投书《人民日报》，说吴觉官僚主义，毫无群众观点，压低民工工资，造成工地紊乱……这份材料是如此“典型”，正合乎新三反报道的需要。报社十分重视，派了记者到现场调查。不调查倒也罢了，一调查就发现原来情况完全弄颠倒了，会议记录和有关文电表明：吴觉多次主张提高民工工资，而总是遭到了那位负责人的拒绝！

1953 年夏天，在北京开治淮会议，涉及到淮委和水利部高层人事安排。会议期间，党委书记对吴忽然表示好感，似乎有封官许愿之意，且示意到上面谈谈（与他不合调的）某某的小话……吴是一个刚直耿介的人，毅然拒绝了，说：“我一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由此，矛

盾越积越多。例如，按照“经费尽量用在工程上”的原则，没有在佛子岭水库上游建筑别墅式的招待所，关于洪泽湖拦洪蓄水的水位问题，中央批准了吴觉照顾苏皖两省的建议，华东局对淮委领导比较支持吴的意见等等，都招来对吴的怨恨之心。当时水利部领导有意将吴觉调出安徽，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这位负责人先是认可，后来又坚不同意。到 1955 年 8 月，由于发生了对苏北抗日同盟会这个组织的一些诋毁和误传，终于一纸逮捕证突然放在吴觉的面前叫他签字了。逮捕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与淮委一位领导干部的关系问题，一是本人的历史问题。淮委那位领导干部告过党委书记的状，由于历史问题在受到审查（后来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至于吴觉本人的历史问题，华东局于 1954 年已作出结论。对于这两条理由，吴觉都不服，当即声明，他与淮委那位领导干部的关系尽人皆知，有目共睹，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至于本人历史，华东局已作过处理，此外再无可交代。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吴觉不仅从 1930 年起先后四次被捕，两次进反省院，而且在抗战前后同那么多国民党的上层人士有往来，亲属关系也极复杂，有的已跑到香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吴觉一被捕，他的亲戚朋友凡是可以逮捕的都逮捕到安徽来，强迫他们写“检举材料”。他的家遭到了搜查，妻子被捕后曾一度神经失常。家里雇用的一个保姆，也被逼着“检举”，几乎上吊。在淮委召开的有党内外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宣布吴觉是那位被审查干部的幕后指挥人，而且还是“大特务”。为了弄清楚自己的问题，吴觉写了几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一生的政治历史。例如前面提到的他曾经要我陪他去同国民党方面谈判这样的事都没有遗漏。虽然他在材料中提到了我，但是当年始终没有人向我调查过他的情况。现在想来，这大概是由于目的只是要打击吴觉，并不是真要全面查清吴的政治历史，所以有可能证明其历史功绩的人就都不去找了。充满杀机的是，要吴交代抗日战争初期他们搞武装斗争阶段的两桩历史悬案：一位上级派来的参谋长的失踪；淮阴县委书记被人暗杀。利用这样悬着多年的无头公案，文章是很好做的。吴觉不幸中的万幸是，正在这时候，这两宗悬案都在江苏破案了，找到了真凶。尤其荒唐的是，放在办公室用的收音机，被没收后诬为收发报机，造成一个“现行犯”的疑团，派出大批外调人员，跑遍大半个中国，以查证这个“现行特务”。后来由于实在找不出题目做文章，“大特务”无从证实，加以有中央同志过问，只好不了了之。到 1956 年 9 月 1 日，即关押了整整一年之后，吴觉才获得自由。他从此杜门谢客，不与任何人往来，有人劝他到外地休养，也怕引起疑虑。我那次向淮委要干部，看来是华东局领导有意让吴觉出面接待的。当时吴没有同我细说这一段灾难。吴觉这样韬光养晦，倒也过了两年清净日子。到 1958 年 7 月，终于让他离开安徽，到三门峡工程局了。后来到 1962 年，吴觉应召到安徽申诉，那位负责人才完全承认这是一桩错案。

从 1930 年起，吴觉曾 4 次被捕，两次进反省院。第 4 次还几乎判了死刑。他在监狱受过酷刑，带过大镣，几乎病死。他在应付敌人时，也不是没有过错误，例如 1933 年第 3 次被捕，他承认了共青团员的身份。但应该看到更重要的事实是：大夏大学的 100 多名党团员和进步群众，没有一个因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吴觉被捕而受到牵连。而且，这种错误吴觉从来没有隐瞒过。

他的儿子给我的信中说：“爸爸十分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在‘文革’关押的最困难日子中，他每天偷偷地记叙自己的历史，利用我们送饭探望的机会，一点一点地带出来，让我们子女了解他忠诚耿直的为人，了解他顽强战斗的一生。”“几十年来，爸爸常同我们谈及您及您和他的相交的往事。今从他遗下的上百万字材料中，按各历史时期摘出二部分寄上，以便您了解爸爸的为人和他辛酸的一生。他曾向谭震林老伯保证过，几十年专案审查也证明了他对党交代的真实性。”

在干部的历史审查中，如果审查者带有偏见，或不够实事求是，或情况过于复杂，许多问题往往就难以如实解决。经过 20 多年的内查外调，直到 1978 年，吴觉的历史，才恢复了本来面目。他的入党时间从 1932 年算起，是直到他逝世之后，才由组织重新审议解决的。

吴觉的自述材料中有一个细节，在党的干部审查工作中，我认为很值得注意。这是 1954 年 12 月写的有关反省院中的一个看来很复杂的问题，摘录如下：

“结论草稿最后引录‘自新人评议语’中，有谓‘吴觉非但积极反省，而且供出其他反省人情况，足证是彻底转变’。并谓我对此坚不承认。我第一次入反省院，是我第三次被捕以后的事，我以承认曾参加共青团不久即自动退出的托词，骗过特务的追讯，复经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叛处徒刑送反省院。在出反省院前，大夏支部曾有人来监狱看我。我在被捕之初，于敌人强暴胁迫利诱下，尚能坚不暴露组织供出同志，而反省院是执行感化机关，既无死亡威胁，又不审讯犯人，我又从未为其审讯，何能供出其他反省人的情况呢?若谓可能在敌人面前暴露了其他反省人的学习情况，其实反省人的学习，敌人了解最清楚，也不需要问反省人的，因为各个反省人的日记、作文、读书笔录，都直接交给敌人审阅，反省人之间是互不传阅的。院方对反省人管理极严，反省人之间不准交谈，反省人之间也是互不暴露思想与案情的。当时我在反省院第一组学习，与我长期同住一室的人，表现极坏，出院后即当特务去了，这种情况，也不需要我去谈。我在反省院时曾被人控告为不肯反省学习的。因此敌人的评语是不可置信的。根据我当时情况，不可能蹲满六个月期即释放的，敌人之所以能将我期满释放，主要是由于我的父亲通过他的学生邱有珍、周化鹏二人帮的忙。邱、周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委员、部长，曾情托反省院的思想考核主任王进珊，要王到期将我释放。在我出院前，王进珊曾找我谈话，说院中很多人都反对放我，可是他仍设法决定放我，使我可以继续求学。我出院后曾与同出人薛味五（薛现仍参加革命）亲到王进珊及周化鹏处表示感谢意。十数年来，对这个情节，我已向党作了三次报告，苏北淮海区根据地初开辟时（1940 年），我也曾与刘瑞龙同志谈起。据刘说，他是认识王进珊的，并说王过去是右倾分子。在我第一次出反省院后不久，王就为反省院院长逐出反省院。因此，敌人对释放我的‘评议语’，固不能设想为敌人伪造档案，以准备 20 年后的今天来陷害我，但是在旧社会内，反省院思想考核主任徇情伪评语或欺瞒上峰的事，也是可能的。事实如此绝非坚不承认，请组织上能详加查考，判其真伪。”

吴觉一生的坎坷，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革命历史环境的复杂与党内斗争的复杂。在 30 年代上海这样的地方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在抗战初期国民党的腹地江苏建立根据地，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一点所谓“江湖气”，即没有处理复杂的社会人事关系及同狡猾凶残的敌人作斗争的一套本领，是办不成事情更成不了气候的；一个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如果没有坐客来谈山海经，没有民主作风，不能容纳各种人才，听取各种意见，也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的。这两种品质凝聚于吴觉一身。李一氓、曾山等同志，曾在艰苦斗争的环境同吴觉共过事，故体会极深，因而才有如此概括如此切贴的评价罢。

吴觉卒年 72 岁。我收到的讣告说：“遵照吴觉同志遗愿和家属意见，决定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没有同吴觉同志一起工作过。我这篇东西只是就与我有关的回忆，以及他的儿子寄来的材料中稍作摘要（读这些材料时，我是很受感动的），草草写成。不过是有关吴觉的二三事而已。在 20 多年的不断受到审查的过程中，吴觉为了申述自己革命的、战斗的一生，留下了成百万字的材料，我认为这些材料的史料价值，不只是属于吴觉个人的，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复杂与残酷。我希望江苏党史研究的单位，能够将这些材料整理出版，这对现在的青年也有教育意义。

这篇文章的草稿曾寄与惠浴宇、管文蔚、金明、夏如爱、谢冰岩等同志，请他们审阅。

惠老回信说：“过去一般同志认为吴觉同志有‘江湖气’，其实是他海阔天空，谈笑风生，引人入胜，但对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是从不含糊的。知道的人固然不少，但毕竟不多不详。”

管老回信又说：“吴觉是一位正派的好同志，他留下的史料，我们当与其家属商量后，加以整理，并争取出版。你的建议很好。”管老还在文中批注：“吴觉同志很重视统战工作，并很善于做统战工作。”

金明同志来同我作了一次长谈，回忆他 1939 年 5 月从东南下淮海的种种情况，以印证吴觉当年的作为。他特别谈到抗战初期淮海地区斗争的特殊复杂和异常艰难，因为这是国民党严密统治过的腹地，又是平原、河网地带，韩德勤部有几万人，韩是反共专家，我军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中。在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南下、东进之前，吴觉等创建的这支地方抗日队伍，主要由当地的青年学生组成，秀才造反，孤悬敌后，能够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们为苏北根据地的创建立了大功。他还谈到，吴在晚年一直要求对他的一生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谢冰岩、夏如爱两位虽然都在北京，但自从 1938 年在淮阴和 1952 年在湖南分别之后，就一直没再碰过面。这次他们约好一起来我家，同我详细谈了文章涉及的许多细节。他们正受命编写苏北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历史，带来了已经印出的总结资料。关于苏北抗日同盟会的问题，他们两人曾联名写过一个材料，因 1955 年和后来的十年动乱期间，对这个组织的历史和性质，有过严重的歪曲，对其中几个骨干成员有过不实之辞。他们向组织写的这个材料都一一予以澄清。关于吴觉和当年在苏北的有关活动，他们作了如下评价：

吴觉是一个感情浓郁、对人诚挚，非常健谈的人，“有他在场，满屋生风”。他尤其善于同各种人相处，善于同旧社会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家庭关系和亲朋关系，当初主要活动是做上层统战工作。后来建军打仗，发展到淮河大队的这支队伍，2/3 以上成员是进步青年，实际是一支干部队伍。我军主力到达之后，这个大队的成员大都转到县区当地方干部，也有少数留在部队。江苏省的好些负责人是这个大队出身的，在部队的有的现在已是军长了。这支队伍坚持淮海地区，同日伪顽浴血苦斗，从而使地方党组织得以顺利发展，保护了地方干部，而且将国民党大批区乡政权人员都争取过来了，使汉奸根本站不住脚。因此对苏北地区来说，吴觉同志是一位值得大家怀念的有功之臣。

吴觉去世后，他的家属为我寄来南京工学院的悼念专刊。最近又寄来治淮委员会去年出版的《治淮》（第 4 期）与《淮河志通讯》（第 2 期），其中有编辑部写的“人民治淮的先驱与功臣——吴觉”，有转载《安徽日报》上张祚荫写的文章：“杰出的才干，高尚的情操（忆吴觉同志在治淮战线上）”。所有纪念文章都称赞吴觉的才华出众、精明强干、品质高尚，有远见卓识，以及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的作风，颂扬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尊重他们，信任他们。那篇编辑部的文章说，吴当年“要求所有党员干部都要同知识分子交朋友，尤其要同旧中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交朋友，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他在淮委机关规定，有好房子要首先让老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干部住，在生活上要尽可能地照顾他们，他经常找工程技术干部谈心，一起边吃饭边聊天。在工作上，他更是虚心地听取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碰到自己不懂的问题就真心诚意地向他们请教。他每次出差，都要带技术干部当自己的参谋。他提出要大力培养青年工程师、党员工程师。所以，当年参加治淮的成千上万名新老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致感到生活在党的怀抱的温暖，心情十分舒畅。”

吴觉的一生，反映了中国当代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在任何困难、任何逆境中屈服过。是的，吴觉是一个能干的人，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然而他生前有多么漫长的时间未能尽展其才呵！也许，吴觉在离开他所眷恋的这个人世时，心中有某种遗憾。这种遗憾让我们活着的人来消除吧。今天的中国要腾飞，最大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在呼喊这八个字，确实使人感到惭愧），要唯才是用，人尽其才。我们一定要使每个有才干的人离开这个人世时，不再有丝毫遗憾呵！

（原载于《报告文学》杂志 1985 年第 5 期）

吴觉的侠肝义胆

陈克天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我的老首长和老战友吴觉同志的影像，鲜明地突现脑际。这是一位在淮海地区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一位在和平建设时期治理淮河的先驱与功臣；是一位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仍赤心为党工作的优秀党员和领导干部；同时又是待人信义忠诚的朋友。我总感到，我们对吴觉同志的宣传太少了，与他一生的功绩很不匹配。我已年逾九十，但还是想追忆吴觉，宣传吴觉，弘扬他的业绩和美德，让下一代子孙铭记，而不要因我们这一代人的疏忽而湮没了这么一位忠诚优秀的革命家。

首创淮海抗日义军

日军入侵，中华危殆。1938 年 2 月初，苏北抗日同盟会在淮阴成立。宋振鼎为理事长，谢冰岩为秘书长，吴觉任七位常务理事之一。但实际上，当时他是抗盟的关键人物和活动的主要操持者。淮海人民公认他为“淮海抗日举旗人，是淮海地区抗日的功勋之首”。他首举义旗，亲笔起草了一份《告淮阴抗日同胞书》，成立了抗日义勇队，发布告没有钤记，就由谢冰岩用一个旧砚台底，刻了一个义勇队的大印。义勇队开始从六条枪起家，吴觉任总指挥，张芳久任参谋长。随后不久，义勇队联合地方其他抗日武装在淮阴渔沟东五条路伏击日军车队，打响了淮海人民抗击日军的第一枪。随后一直就地坚持，直到迎来主力部队。当时我在他部下，与陈书同等一起，我从班长干起，后任排长、连长到副团长。吴觉同志生前写过一篇文章《在主力部队来到之前》，其中还提到我们。他写道：“由盐城抗盟介绍来的陈克天及经万毅部队受训回来的周文科、辛苦（人名），以及石振邦等同志，担任所属各中队的领导。”我在他领导下，转战在淮海地区。“吴司令”的部队赫赫有名。苏北有吴觉，苏南有管文蔚，两支兵马，互成犄角，牵制日伪。当时人称吴觉的“淮河大队”是保卫苏北的一匹“卧槽马”，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

建设抗日民主政权

1942 年 10 月，30 岁的吴觉同志出任淮阴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他与当时的县委书记李霁民配合默契，充分发挥他那英勇善战、侠肝义胆的风格，一边用武装打击日伪顽势力，一边做统一战线工作。他父亲是中学校长，他本人是大学生，乡村知识分子在农村有很高的地位，他的统战工作十分出色，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广交朋友，争取到了国民党上层抗日名将李宗仁等的支持，与当地吴道楼、李可拔等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调动一切抗日力量，获得了大量的情报、弹药、药品等。他组织人民兴修水利，开展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激发了广大人民参军卫国保家的热情。他还利用收徒、访友、认亲等多种方法，巧妙地与伪军和顽固势力周旋，分化瓦解敌人。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吴觉领导的淮阴军民，全部拔除了淮阴县境内的日伪据点，还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兵力和干部。

李霁民称赞说："淮阴共产党的天下，一半是大家用枪打出来的，一半是吴觉用拳头抱出来的。"当时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氓曾为吴觉手书一联，曰"主人颇有江湖气，坐客能谈山海经"，就是称赞吴觉是做统战工作的高手，是博学多才的雅士，又是诚挚可信的"朋友人"。

奋力理淮的先驱

新中国成立后，吴觉从淮海地区来到江苏南部出任常州军管会主任、常州地委书记。但时间不长，到 1950 年夏天，淮河突发大水，1300 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中央作出根治淮河的决策。同年 11 月，政务院成立治淮委员会，曾山任主任，吴觉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淮委党委副书记，实际全面担任组织和领导治淮的重任。在我国首座大型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佛子岭水库的设计中，他与工程技术人员同桌共餐，边吃饭边聊天，全无芥蒂，十分融洽。中国与苏联专家意见分歧，他两面兼听，后来果断拍板，采纳国内专家的方案，既保质量，又避免了人财物力的大量浪费，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要有极大的勇气。他常年住办公室，经常通宵亮着灯，干部群众随时可以见他，讲想法、提建议，真正肝胆相照。许多当年治淮的同志写文章追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程，如 1984 年发表的《人民治淮的先驱与功臣——吴觉》等。"文化大革命"后吴觉复出，钱正英还一再向中央提议要他出任水利部副部长。她在悼念吴觉的专文《为真理而斗争》中，深情地追忆道："我们建议由吴觉同志任水利部副部长兼淮委主任。但江苏省委要求把他留在南京，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我和当时的江苏省长惠浴宇同志就吴觉同志的去留进行'谈判'。他向我说明，南工在'文革'期间遗留问题很多，工作难度很大，经省委再三研究，认为吴觉是最佳人选。"

"文革"中坚贞不屈

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吴觉自然也是在劫难逃，尤其是他耿直的性格，更免不了吃苦头，遭"青蝇"之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被关在江苏省镇江地区"五七"干校。由于他多年辛劳患有肺气肿，只能从事拣菜等轻微劳动。当时干校的造反派头头自豪地说："我们厨房里的杂工还是八级老干部，月工资 240 元，8 元一天，一般小工可以雇 10 来个呢!"开批斗会，他不吭气，造反派也很难对付他。

1969 年"七一"党的生日，他夫人从镇江家中带来一瓶茅台酒。在句容"五七"干校的"牛棚"中，他邀请挨斗的一批"牛友"上山采集了一些蘑菇，买了点鸡蛋，共饮茅台酒，庆祝党的生日。造反派头头巡视中闻到"牛棚"里飘出的酒香，训斥吴觉"不老实"。吴觉朗声回答："今天是党的生日，你们不承认我们是党员，我们这些新、老党员自己煮酒庆祝。你们有种也可以来喝一杯!"搞得造反派很狼狈，见众怒难犯，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牛棚"。在批斗中，他没有检讨过一次，也一直不肯低头。"五七"干校一些受蒙蔽的大学生起先也斗他，但等暑假后回校，许多学生向他赔礼道歉，说回家后家长听说他们在斗吴觉，许多学生都挨了家长的骂，家长们说吴觉可是打鬼子、打反动派和治淮的大功臣，千万要去认错，帮他安排好生活，多听他讲讲革命道理。吴觉宽慰地勉励这些大学生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1979 年，吴觉出任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并兼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他不计以前的委屈，还写了几句感言，表明自己愿为革命事业"折腰"：

人老风霜饱，四化前程好。

烈士抛头颅，幸存当折腰。

他不顾屡经摧残的病体，忘我地工作，又加重了病情，72 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没有来

得及实现他在南京工学院的许多规划和设想，留下了遗憾。

待友人披肝沥胆

在吴觉手下工作，心情很舒畅，他待人不论上级下级，都以友人平等相待，没有官气或对上的媚气，而是一身豪气。晚年，他住在镇江市五条街唐老一正斋药店旁，水缸里养着一些黄鳝，周太和、周利人、高俊杰等老战友来聊天，就捞些黄鳝烧炒佐饭，仍然保持了当年的性格与心情。1980 年元旦，李一氓同志重新抄录抗日时期为吴觉写的“主人颇有江湖气，坐客能谈山海经”一联，并加注曰：“抗日战争时，同吴觉同志共事淮海区……三十五六年后，重逢南京，虽历经劫难无重数，而雅兴不减当年……”这里讲的“江湖气”，不是一般走江湖的油气，而是豪侠之气，披肝沥胆的诚信之气。

在战争年代，他对敌特、汉奸毫不手软。对同志乡亲，十分关爱，毁家纾难，倾全家之财力买枪支、发薪饷。实在穷困了，就请友人经商赚点钱贴补军用，也力求不扰民。解放后他是高干高工资，但子女多、朋友多，开支大，经常入不敷出。他规定夫人王凤山每天家用不得超过一元钱，刻苦自俭，接济别人。直到他逝世，家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和摆饰，最突出的就是李一氓手书的一副对联。

1990 年夏至，李一氓为 6 年前逝世的吴觉同志撰书了墓志铭。其中写道：“倭寇入侵，义军首创。奋力理淮，坚堤束浪。忌惕青蝇，高怀坦荡。呜呼噫嘻，蒋山永望。”勾画出了吴觉的胸怀。在老一辈的领导同志中，他的侠肝义胆，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激励后人为人民的事业而驰驱。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吴觉同志已谢世 20 多年，然而，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些英烈们，那些抗日、革命和建设的先驱者，我们正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节选自《陈克天纪念文集》）

“赴难有诗啼精卫，慰魂无语吊孤鸾”

——纪念吴觉同志逝世三十周年

李广涛

闻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办欲纪念吴觉同志逝世 30 周年，编辑出版《吴觉纪念文集》，感慨万千，不能自已。我因年已过百，诸事难以自理，遂嘱子女代笔记录心情，并将去年出版的《百年自述》中有关吴觉同志的文字节选于其后，我对他的怀念尽在其中。

吴觉同志的一生如精卫填海，凤凰涅槃，故取旧人诗句略改为题，以志纪念。
2014 年初春合肥

1940 年 9 月，我随刘瑞龙以及区党委机关由泗阳进入淮海区钱集。淮海区是由“淮”、“海”两个地域组成。“淮”指以清朝淮安府辖管的淮阴、淮安、涟水、泗阳等县地域的淮属地区；“海”指原清朝海州直隶州的地盘，现在的东海、灌云、沭阳、新沂一带。早在抗战初期，就由淮阴的吴觉、宋振鼎、谢冰岩及夏如爱等人，联络涟水的陈书同、万金培、李干成，淮安县的赵心权，泗阳的谢楠等一批同志为骨干组织了“苏北抗日同盟会”，动员民众抗日救亡。日军攻占淮阴后，这里成为日伪控制的中心区，吴觉、宋振鼎、谢冰岩及夏如爱等人，成立了抗日义勇队，后来与涟水、淮安的抗日武装整编，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对外称“淮河大队”。为了加强淮海地区党组织的领导，苏皖特委多次派人来这里领导并开展工作。1940 年 8 月，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以胡炳云团为前锋，进军淮海区。同时，以金明同志为首的苏皖区党委也跟着大军东进淮海区。因此，在我到淮阴时，淮、盐一带各县已先后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权。
从 1941 年直至 1948 年底，这期间除了因去党校学习短暂地离开淮阴，我一直担任着淮阴县县委书记一职。和我一起工作的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前后有夏仲芳、吴觉、陈书同 3 人。这几位同志对我都很尊重，并不因为我是一个外地干部，且比他们都要年轻一些，因为我更尊重他们。我把他们视为兄长、视为知己，时时处处依靠他们、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特别是吴觉和陈书同两位同志。县委作出的任何重大决策都是我们共同决定的结果，我们以集体的智慧巧妙地展开对敌斗争，从而取得胜利。
我与第二任县长吴觉同志一起共事了 3 年左右。吴觉本是从上海回乡的一个洋学生，但性格豪爽，交际广泛，其家族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其父与国民党地方上层某些人物是师生关系，因而吴觉在淮阴乃至淮海区有一定的活动能力。江南的管文蔚与吴是狱友，李锐在徐州突围后，单身走淮阴是借助于吴觉而去大后方的。由于是苏北人，所以他更加熟悉淮阴的斗争环境，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1942 年，吴觉将自己一手拉起的武装“淮河大队”上升为新四军独立旅三团，不久他回到地方，于 10 月出任了淮阴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第一次见到吴觉，是我刚到淮海时在涟水朱南荡的朱启宇家里，他当时穿着军装，还在淮河大队带兵打仗。一年后我们在一起共事，真正感受到了吴觉在抗日战争的那种特殊环境中，对开展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的地方民主人士，打击瓦解有投降日军苗头的顽劣势力，有着特殊的艺术和高超的技巧。
我很早就说过：“淮阴的革命斗争的胜利，一半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一半是靠吴觉用拳头抱出来的”。
何谓用“拳头抱出来的”？
抗日战争中，华中地区的斗争是典型的三角斗争：日伪一方，国民党顽固派一方，我党领导的政权又是一方。且淮阴是国民党经营的反共“模范县”，反动势力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要想战胜日军，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吴觉同志非常善于做统战工作，对淮阴的上流士绅，吴觉很熟悉且极为尊重，抱拳相交往；对一般的土匪、伪军，则以抗战为重，利用其在淮阴的名气和影响，广泛收徒。吴觉在淮阴的伪、顽“弟子”，起码有三四十余人，在渔沟一带就有四五个伪乡长是吴觉的学生。这种“师生”帖当然不同于青红帮的帖子，这是当时统战工作的需要。
1980 年，李一氓同志为吴觉写了一帧条幅：

主人颇有江湖气坐客能谈山海经

正因为吴觉的这股“江湖气”，使得他在与上层士绅打交道时得心应手。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同志曾这样写到：“……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一点所谓的江湖气，即没有处理复杂的社会人士关系，以及同狡猾凶残的敌人作斗争的一套本领，是办不成事情成不了气候的；一个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如果没有坐客来谈山海经，没有民主作风，不能容纳各种人才，听取各种意见，也是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的。”这两种品质凝聚于吴觉一身。
吴觉同志早年投身革命，曾四次被捕入狱而拒绝悔过和出卖同志。因国共合作而走出反省院后，旋即在苏北举起抗日义旗，打响了淮阴地区抗日第一枪。虽身经百战而未死，却在解放后又被以所谓“历史问题”逮捕入狱，直至“文革”后才真正恢复名誉。终因历经劫难，身心憔悴而过早离世。李一氓为他盖棺论定：

倭寇入侵义军首创

奋力理淮坚堤束浪

忌惕青蝇高怀坦荡

呜呼噫嘻蒋山永望
吴觉同志的墓现在汤山附近的一座荒山上，旁边就是水泥石料场，一片狼藉。我曾多次向淮阴建议，应将吴觉的墓迁回淮阴。数年前，曾作诗两首，虽格律不工，却表达了我的心情：

一

当年不忍山河丧，

淮海烽火第一枪。

歃血江湖求统战，

悬命苏北斥魍魉。

身逢六劫涤铮骨，

案存百钧写忠肠。

可怜长夜凄风里，

荒岭孤坟犹望乡。

二

英雄无泪也心伤，

十载抗敌尸满岗。

哀鸦漫天狐蛇走，

惊雷动地鬼神忙。

革命当然忘生死，

冤狱怎不断肝肠？

忽梦春风度万里，

为君扶椁好回乡。

诗中所谓的“六劫”是指吴觉在国民党时期四次入狱，侥幸存活，解放后又遭逮捕，加之“文革”，是谓“六劫”。“百钧”则是指整吴觉“叛徒”、“特务”的材料有几麻袋，古称 30 斤为一钧。

2000 年，欣闻淮阴要在吴觉领导淮阴抗日义勇军打响淮阴抗日第一枪——当年称为五条路的地方立碑纪念，禁不住又题一绝，依旧是诗虽不工，情却殷殷：

倭蹄初践淮海日，

五条义军第一枪。

书生报国无长物，

我以我血荐故乡。

与吴觉同志一直保持深厚友谊、并为抗日作过一定贡献的抗日民主人士有李可拔、李可宜、吴道楼、韩兰田、朱伯符、丁耀西、许介藩、陶子舟、吴共和、张一平、王叔相……等。由于吴觉的关系，我当然也认识了这些人，并依靠他们、团结他们，使我们淮阴的抗敌斗争更为顺利。

人民治淮的先驱与功臣

《治淮》杂志编辑部

治淮，这个响亮的字眼，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经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这一划时代的创举，以改天换地、令人叹服的巨大成就，载入新中国治水的光辉史册。

在千千万万治淮大军中，有一个人的名字特别为淮河流域人民所熟悉。他置身于人民治淮的滚滚洪流中，站在人民治淮的最前列，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和特出的领导艺术，带领数十百万治淮大军和淮河流域人民，英勇拼搏，艰苦奋斗，朝着毛主席指引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目标迅猛前进。他，就是原政务院治淮委员会第一任秘书长吴觉同志。

吴觉同志是一位才华出众、精明能干，具有远见卓识的治淮领导人。他在主持淮委工作期间，以治淮为己任，积极协助曾山、谭震林等同志，为贯彻执行政务院制定的“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和毛主席提出的“三省共保”（指淮河干流）的治淮原则，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治淮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以坚持原则、果敢善断，团结同志、肝胆照人等优良作风和品质，著称于淮委内外，赢得广大治淮职工和淮河流域人民的普遍信赖与敬佩。他是治淮的先驱，人民的功臣。

1950 年 7 月，淮河发生了大洪水，灾情十分严重。为解除淮河洪水给流域人民带来的灾难，毛主席作出了“根治淮河”的英明决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亲自组织召开了政务院治淮会议，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同年，治淮委员会在安徽蚌埠设立。吴觉同志被任命为治淮委员会秘书长，来到地处灾区中心、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蚌埠。他对妻子说：“我们共产党人打江山，不是为了有官做，有福享，而是为人民谋幸福。”当时，淮委主任曾山同志和其他几位副主任都是兼职的，除召开治淮委员会全委会议之外，大都很少来淮委。淮委的正常工作由吴觉同志全面主持，因而组织领导治淮的重担也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用曾山同志的话说，叫做“秘书长专政”。治淮是一项前人未曾有过的伟大事业，举世瞩目，影响深远，关系重大。对于搞过学生运动、打过仗、做过地方工作的吴觉来说，这既是一个陌生的问题，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几千年封建割据残余思想的影响，复杂的淮河水系，频繁而交替发生的洪、涝、旱、碱多种自然灾害，给治淮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矛盾和困难。吴觉同志坚信，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千百万勤劳勇敢的淮河流域人民，有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援，新中国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他凭借多年革命斗争实践赋予他的才干，紧紧依靠豫、皖、苏、鲁四省省委和人民，团结带领来自各条战线的新老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治淮职工，坚决贯彻“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妥善处理上、中、下游的矛盾，从治淮全局出发，原则问题不让步，求大同，存小异，很快打开了治淮局面，使一批批治淮骨干工程接二连三地上马，在整个淮河流域掀起了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治淮的热潮。

为了不辜负党的重托和人民的信任，避免在治淮决策上造成失误，吴觉同志常年住在办公室里，不分白天黑夜地辛勤工作。他的办公室经常通宵亮着灯光。在吴觉同志的模范行动感召下，当时上万人的治淮委员会机关、设计院、建工局，上下一心，秩序井然，呈现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工作效率之高是空前的，成为强有力的治淮参谋部和大本营。

与吴觉同志共过事的许多老治淮领导都知道，果敢善断、勇于负责，是他的工作作风的一大特点。他的决断不是无根据的轻率的武断，而是建立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他的负责精神则出于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他常说，怕负责任说穿了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这不是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对工作的态度。凡是规划方案合理，有利于治淮全局的工程，不论阻力多大，该拍板的他从不推诿或模棱两可。对于个别省难以接受的方案，他的态度是做工作，不迁就，从而使一些扯皮工程矛盾迎刃而解。佛子岭水库是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大型水库，在设计施工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同苏联专家发生了意见分歧。吴觉同志在认真听取工程技术人员的汇报和分析论证后，果断地拍板，采纳国内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进行设计施工，既保证了大坝的质量，又避免了人力物力财力上不必要的浪费，顺利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连拱坝。

敏锐的政治眼光，给吴觉同志以独到的远见卓识。早在三十几年前，他就把知识分子看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当作革命同志而真诚地团结他们，信任他们，尊重他们。他认为，没有

知识分子的广泛参加，要夺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他要求治淮战线上的所有党员干部都要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尤其要同从旧中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交朋友，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他在淮委机关规定，有好房子要首先让老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干部住，在生活上要尽可能地照顾他们。甚至连看电影、看戏也要把好票发给他们。他经常找工程技术干部谈心，并与他们同桌共餐，边吃饭边聊天。在工作上，他更是虚心地听取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碰到自己不懂的问题就真心诚意地向他们请教。对于工程技术干部的正确意见，他总是积极采纳，满腔热情地予以支持。他每次出差，身边少不了要带上一两名技术干部，当作自己的参谋。为了扩大知识分子的影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提出要大力培养青年工程师、党员工程师。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年参加治淮的成千上万名新老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致感到生活在党的怀抱的温暖，心情十分舒畅。许多同志立志献身于新中国的治淮事业，工作热情高，劲头大，再苦再累也不怕。短短几年时间，他们不仅完成了数十项大型治淮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任务，而且拿出了全流域的治淮规划方案，推进治淮事业迅猛地向前发展。有相当一批工程技术干部在治淮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优秀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水利建设的技术骨干。

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吴觉同志组织领导治淮斗争的指导思想。治淮初期，迫于淮河严重水患，各项工作仓促上阵，规划和勘测设计沿用的是旧中国的军用地图，误差比较大。吴觉同志认为，治淮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来不得半点马虎，他责成淮委工程部并亲自参与组建了一支专业齐全的庞大的治淮勘测队伍，用头尾三年时间，就系统地测量了淮河流域的地形，绘制出流域地形图，从而为治淮计划设计工程提供了可靠的基本资料。

千头万绪的治淮工作，使吴觉同志忙得不亦乐乎，即使是在病中，他也难得很好地休息。1954 年，淮河又发生了大洪水。刚做过胆囊手术不久的吴觉同志，连忙返回自己的战斗岗位。他与钱正英同志一起，日夜繁忙地工作，指挥各地抗洪抢险斗争。由于治淮工程发挥了显著的抗洪作用和抗洪抢险斗争指挥得力、措施落实，尽管 1954 年淮河洪水与造成毁灭性灾害的 1937 年洪水相类似，然而受灾损失却大为减少，确保了津浦铁路和沿淮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现在，当人们谈起 1954 年淮河抗洪斗争的胜利，对吴觉同志无不怀着不尽的感激之情。

今年 4 月 30 日，吴觉同志不幸病逝了。淮河流域人民，广大治淮职工、与吴觉同志在淮委共过事的许多老同志，为失去这样一位好领导、好同志而感到悲痛。人们抚今忆昔，怎能忘记吴觉同志在 50 年代的治淮功绩！怎能不深切地怀念他！吴觉同志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对治淮事业的重要贡献，却是永存的。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只要淮河流域人民振奋改革精神，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人心所向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终将会成为现实。

（原载于《治淮》杂志 1984 年第 4 期）

杰出的才干高尚的情操

——忆吴觉同志在治淮战线上

张柞荫

吴觉同志逝世的消息，使我十分悲痛。我与吴觉同志在治淮战线上共同工作了 4 年多时间，他那杰出的组织才干，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正直的高尚品质，使我难以忘怀。

1950 年淮河发生洪水灾害后，毛泽东同志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伟大号召，规模宏伟的工程开始了。由于工作需要，吴觉同志调任治淮委员会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和秘书长，我当时也参加了治淮工作。因为治淮委员会的领导人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和豫、皖、苏三省的负责人，都不驻淮委，淮委的全面工作实际上由吴觉同志主持。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三省省委的领导下，由于吴觉同志杰出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才干，才使得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治理淮河的方针、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

1950 年，淮河洪水泛滥，仅豫皖两省就淹地 4000 多万亩，受灾人口达 1300 多万，摆在治淮工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消除洪水带来的危害，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吴觉同志到淮委后，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根治淮河”的总目标，根据当时淮河为害的实际情况，与广大技术干部密切合作，为治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从长远的利益出发、立足于根治淮河、变水害为水利的治淮规则，把重点放到防洪、除涝工程上。第一期治理工程，决定在上游和中游的山东兴建水库，同时在中游修建淮河大堤，治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涝灾严重的困难，治淮规划受到严峻的考验，但吴觉同志作为治淮委员会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灰心动摇，而是总结经验，提出了在淮河中游修建大型水库，以便有效地控制淮河洪水的新方案。经过充分论证，证明这个方案是科学的、合理的、可行的。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能够下这样大的决心，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啊！

淮河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治理淮河上、中、下游的利害冲突比较明显。在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协调好三省的关系，做到三省团结治水，是治理淮河的根本问题。治淮委员会机关设在安徽地区，党的组织关系归安徽省委领导，吴觉同志既要安排好安徽的工作，又要协调好上下游的关系，使上、中、下游的工程能都围绕根治淮河的总目标，这就需要领导者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每年工程量的安排，既要根据国家的财力物力，又要根据各省的实际需要和能力，使各省都感到工程是合理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就需要胸中有治淮的大局，又真正了解三省的情况。而吴觉同志在这方面是处理得很有分寸，很适度的。在 1954 年发生特大洪水的困难情况下，他不止一次地派我和其他同志到上游淮滨县进行慰问，共同研究治淮的新方案；到下游高良涧了解泄洪闸的实际情况和加固措施，使洪水冲击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他的关注下，不但特大洪水冲毁的工程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了修复，而且高良涧闸得到了加固，中游大堤的堤顶宽度由 6 米增加到 10 米，防洪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了。如果吴觉同志没有一个全局的总体观念和果断的魄力，这些工程是很难处理得如此迅速又协调的。

治淮工作开始时，近 10 万名干部、工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全国著名的水利专家云集于此，干部和工人的思想教育、生活安排、技术知识和业务水平的提高等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吴觉同志以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在很短时间内使大家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在治淮工作紧张施工的几年中，干部职工的生活水平年年有所提高，干部、技术人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广大工人、农民、工程技术干部和党政干部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心情舒畅。这些都是与吴觉同志善于团结、信任、使用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与其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的作风分不开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惟有在世时自强不息，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才是革命者

高尚的精神情操和伟大的胸怀。吴觉同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他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未尽的事业会有后人继承下去，他的崇高的思想品德会得到发扬光大，我们悼念吴觉同志，就是要以实际行动，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安息吧，吴觉同志！

（原载于 1984 年 7 月 10 日《安徽日报》）

开辟治淮道路的带头人

——回忆吴觉同志

王祖烈蔡敬荀

吴觉同志自 1950 年冬治淮委员会在安徽省蚌埠成立起至 1956 年，一直任治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秘书长职务。一开始淮委主任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曾山同志兼任，副主任则分别由安徽、河南、江苏三省领导同志兼任。因此，大量日常纷繁复杂的内外工作都落到了主持工作的吴觉同志肩上。吴觉同志才华出众，为人正直豪爽，他顾全大局，善于协调各种关系，对治淮事业的战略决策极为重视，在豫、皖、苏三省治淮工程的安排上，统筹兼顾，公正无私，受到了三省人民的尊敬。在淮委的机关建设方面，他目光远，魄力大，对知识分子既团结教育，又爱护使用，赢得了淮委职工的敬佩。吴觉同志在治淮工作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大家心情舒畅，上下内外，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使治淮事业蓬勃发展。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回忆起当年和吴觉同志在一起时的情景，无论是在淮委机关工作或战斗在治淮基层，都有很深的感受。借此出版吴觉同志纪念文集之际，共同提笔，研墨具文，以志记怀。

吴觉同志对治淮的大政方针极为重视，亲自抓这一关系治淮全局的宏观工作。1952 年，淮河流域平原区发生较大涝灾，他立即组织召开了豫、皖、苏三省除涝会议。会上，他提出了淮河流域平原区的治理方针，也在坚决贯彻当时政务院决定的“蓄泄兼筹”的主导思想。1953 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同志兼淮委主任，并来淮委视察工作，吴觉同志邀我们与谭震林主任共同研究商讨淮河流域平原区的治理方针问题。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治淮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平原区蓄泄兼筹的治理意见，并向中央写了报告，由中央批示同意。1954 年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荒害，吴觉同志忧心如焚。水灾之后，他根据当时治淮形势的需要，以加强规划设计与基本建设为中心，立即着手对淮委机关进行改组，撤销工程部，成立了勘测设计院和基本建设局，吴觉同志还亲自兼任勘测设计院院长，全面开始进行淮河流域规划工作。他在水利部苏联专家组的帮助下，召集豫、皖、苏三省治淮指挥部的主要技术骨干，并邀请中央和三省有关部、厅（局）及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参加，共同编制了淮河流域规划。规划初步完成后，吴觉同志又亲自带着我们一批主要规划人员去合肥、南京两地向安徽、江苏两省省委汇报规划主要内容，又同时派龚意农部长到郑州向河南省委汇报，征求三省省委

对规划结果的指导意见，使建国后第一次淮河流域规划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这部规划不仅对当时的治淮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使治淮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而且至今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吴觉同志还十分重视淮委内部机关建设，时常关心职工生活。淮委成立初，各方面设备非常简陋，几乎一无所有，全委人员分散在几处旧房办公，职工及其家属只能由自己租房居住，条件十分艰苦。而且随着治淮事业的发展，人员不断增加，后来增至近万人。吴觉同志以治淮事业的需要及对职工生活关心的角度出发，狠抓机关建设。至 1953 年，淮委在蚌埠三马路建成了办公大楼，紧跟着又建起了一批职工合宿和水科所，淮委医院及幼儿园等生活基础设施。淮委医院设备齐全，为当时蚌埠市最大的医院，幼儿园环境优美，成为儿童乐园，把当时荒芜的三马路建成一条环境幽雅、绿树成荫的新街道，更名为治淮路。使淮委机关面貌焕然一新，创造了相当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使大家能够全力投入到治淮工作中去。

吴觉同志注重也善于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以推动治淮事业的发展，他同技术干部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怀备至。治淮初期，尽管各方面条件短缺，除积极兴建一般职工宿舍以应急需外，考虑到一批高级技术人员的需要，又修建了一些标准较高的宿舍楼。吴觉同志把高级技术干部安排进去，为工程师以上单身技术干部建了较好的集体宿舍楼房。他把方便和舒适让给了大家，自己却仍然住在原来的旧民房中，更受到职工的爱戴。

吴觉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严于律已，宽以待人，更接近知识分子、技术干部。他经常深入群众之中，询问和帮助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和困难。有吴觉同志这样的领导，在淮委工作的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感到心情舒畅，能畅所欲言，工作积极，开创性强。虽然治淮初期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但是大家都能主动克服，以治淮事业为重。吴觉同志不仅关心信任老技术人员，同时也大胆使用刚走出校门的青年技术干部，把他们推上治淮第一线，担任各级技术领导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成长。这样既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又为治淮事业培养了大量的新生力量，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水利人才。

吴觉同志虚心好学，为了工作需要，他不仅学习了水文学，还业余学习了俄语，使开展各项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在吴觉同志担任秘书长期间，由于他的充分重视和积极努力，治淮事业的宣传工作也极为出色。在淮委建立了治淮陈列馆，把重要的治淮工程制成实物模型形象地陈列出来，使国内外前来参观学习治淮工程的各界人士得以一览帷幄，便知千里。同时出版“治淮周报”随时报道治淮工程进展情况。这些工作扩大了治淮影响，使治淮在当时家喻户晓，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持，有效地推动了治淮事业的发展，使新中国的治淮成就名闻中外。当年请周恩来总理题名的“治淮汇刊”的编纂出版，详细记载了治淮大事的进展实况，为治淮事业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史料。这些做法一直为现在的治淮工程所学习和借鉴。

在担任淮委秘书长的日日夜夜里，吴觉同志不辞辛劳，尽心尽力，在当时政务院和周总理的领导和关怀下，带领广大治淮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同甘共苦，团结奋战，开创了治淮事业前进的道路。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治淮事业已进行了 60 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还将继续发展，纪念吴觉同志，正是希望他的优秀品质和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为千千万万后来的治淮的人所发扬光大，使伟大的治淮事业得到更大的发展。

他应为水利多贡献

姚榜义

吴觉同志是我在解放初期接触到的令我敬佩的领导干部之一，他在主持治淮委员会日常工作期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可惜在他后半生的二三十年中，没有给他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过早地从水利建设舞台上退出。

从地委书记到淮委秘书长

全国解放以后，大批党政部门和军队的干部转业搞经济建设。当时，大多数同志都能在新的岗位上学习业务，成为内行，领导他所负责的那一部门的工作，并在以后的经济建设中成为称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有一些人在转换工作中初期表现尚不错，但因此滋长了骄傲情绪，自以为是，在以后的工作中乱出花样，瞎指挥，给建设事业造成危害。有少数人凭出身好，参加革命时间长，稳坐在领导交椅上，不学习业务，甚至也不想知道他所领导的部门是干什么的。这些人中，能无为而治者尚不失为忠厚之辈，那些沐猴而冠，以党的化身自居，利用频繁的政治运动的机会，靠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者，就十分可恶了。
吴觉同志从地委书记和市军管会主任调任治淮委员会秘书长，在较短时间内，熟悉了作为一个领导者应当热悉的业务，实实在在地领导着治淮日常业务，是一位称职的水利建设领导者。

治淮要有较强的领导
淮河流域面积在我国七大江河中虽然位居倒数第二，但在近数百年来受到政府重视的程度却位居前列。这是因为这时期水旱灾害频繁，社会政治动荡的缘故。上世纪 20 年代末成立导淮委员会时蒋介石曾亲自兼任委员长，陈果夫兼任副委员长，尽管是挂名的，也还可以说明国民党政府重视的程度。1950 年成立治淮委员会时，也由级别高、资格老的干部担任领导，治淮需要强有力的干部来领导。但是高级干部也不能常驻驻会机构，需要有精明能干的专职干部管理日常工作，并为决定重大问题做好准备。吴觉同志当秘书长时，从组建队伍、拟订规划方案，到安排队伍的生产、生活，使治淮事业迅速开展，在较短时间内，减轻了灾害，安定了社会。吴觉作为站在第一线的指挥者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的。

治淮要处理好矛盾
淮河水旱灾害之所以难治，固然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但为消除常遇的水旱灾害，问题不在技术而在于要处理好各项矛盾，如上下游、左右岸、局部与整体、蓄水与排水、除害与兴利、跟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各条河都存在，但不像淮河那么尖锐。这些矛盾中最突出的是上下游省与省之间的利害大小的矛盾。任何一种治理方案，如果不能把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顾到，那就很难通过。因此治淮领导在研究治理方案时要充分了解各方面的要求，考虑各方面的利害得失，在方案提出后，尽可能通过协调使方案通过，以利于早治理，

早受益。

吴觉同志在处理治淮矛盾时是慎重的、公正的，初期治淮发展之所以较快，与不断打开僵局、较快统一意见分不开的。尽管治淮初期有些方案不够好，决策不尽合理，给后来遗留了一些问题，但这有种种原因，都不是由于以吴觉同志为首的日常工作班子处事不公造成的。

领导要能摆脱琐碎事务的纠缠

治淮初期，干部队伍一下子膨胀了几十倍。在 1947 年，国民党政府曾把导淮委员会改为淮河工程总局，紧缩机构。1949 年，沿用了这个名称，机构没怎么扩充。1950 年 10 月成立治淮委员会时，从各方面调入大批干部，又把华东地区新毕业的大学生全部分去，还有一部分大专院校的高年级学生去实习。劳动力方面，有几百万民工，有自己组建的建筑工人队伍，有营造商的建筑队伍，有解放军的两个水利师，还有数万劳改队伍。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分散在当时淮委管辖的 19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工程进展日新月异，随时都有问题要解决。那时淮委对各省的治淮机构有领导关系。治淮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参观团慰问团络绎不绝，需要领导接待。管理这么庞大的摊子，又有那么多问题要处理，很容易为一些事务忙得不可开交而无暇抓重要的长远的事。吴觉同志却好像胸有成竹，处理事情来未见忙乱急躁，很有大将风度，这正是组织大规模生产者应有的才能。

团结好科技人员才能治好淮河

治淮初期技术干部队伍很庞大，老中青三方面的人都有，有的是很有名望的，有的很熟悉淮河情况，有的是才出茅庐的，还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教授专家来短期工作的，这些都是治淮要依靠的科技队伍。但是由于水利工程以前很少做过，即使是老年专家，实践经验也不是很丰富的，组织这样大的科技队伍共同完成治淮大业的经验更少。因此组织者的担子就落在行政领导的肩上。要使技术队伍做好工作，并不断提高，只有信任他们，支持他们，放手让他们干，中国的科技人员中当时党员很少，但都是爱国的，有事业心的，能吃苦耐劳的，虽然当时生活很苦，工作条件很差，但都愿意在治淮中做一番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吴觉和领导日常工作的班子，忠实地执行当时党团结非党干部的政策，担任领导职务的非党干部确实能够有职有权，受到尊重。由于经验不足，在 1954 年大洪水中，治淮工程暴露了一些缺点。吴觉同志没有把责任往下推，更没有指责技术人员，而是在洪水袭来时团结战斗，洪水过后积极组织规划，为继续治理做准备。

吴觉同志治淮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经历的时间正是大干的时候，治淮经费在国家基建费用中占有相当比重，治淮的成就也是显著的，这是全国的支援，是广大干群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应当有吴觉同志的一份功劳。

怀念吴觉同志

钱仲韩

吴觉同志于 1979 年来到南工，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岗位。他在这里抱病工作，努力抓大事，对我院拨乱反正的进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吴觉同志来校之前，我院的教学科研只是在分散和自流的状态下进行，还来不及抓起来。在他主持党委工作之后，情况就开始有了变化。1980 年，在筹备我院第三次党代会的时候，吴书记首先提出：在党代会上一定要拿出一个南工的教学科研发展规划来。他又指定了一些人组成专门班子，来起草这个规划草案。制订这样的教学科研发展规划，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第一次。现在来看，规划中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仍然没有过时。在经过第三次党代会通过并逐年补充之后，成为最近制订的七年发展规划的基础。从此以后，我院教学科研的大计方针就正式列入了党委常委的议事日程，开始走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的轨道。实施这个规划，在近几年中，我院各方面亦取得了一定成绩。

吴觉同志虽然过去对学校工作并不熟悉，但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实行党政分工以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等重大问题上，他是有清楚的认识并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吴觉同志到南工不久，就主动辞去了自己所兼任的院长职务，并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积极组建了院行政领导班子。他经常支持和鼓励我们独立工作，挑起领导担子，他一直以身作则，坚持党政分工的原则。当有些人为了行政上的事直接去找他时，他从不轻易表态，从而肯定了行政人员的职责和权威。

此外，吴觉同志对打开我院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也起了很大作用。1979 年，他亲自参加了我院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的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决定院里大事时，他总是认真听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他为人真诚坦率，使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与知识分子相处得很好。

去年，在调整院级领导班子的过程中，吴觉同志明确主张：南工有足够的人才，党政领导新班子的人选应该由南工自己内部解决。新班子主要人选问题上，他也有慎重的考虑，并及早做了过渡性的安排，让他们多出面主持工作，以便得到更多锻炼，接受群众的鉴定。这样，就使我院新老班子的交接，能够在较短时期内顺利地完成。我深深感到：在选拔和培养后继力量的战略问题上，吴觉同志是有卓识远见的，超过了我们。

总之，我认为，吴觉同志在南工的最后一班岗上，努力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主要任务。我想，他也一定是含笑离开人间的。他生前曾为南工作过许多雄心勃勃的设想，这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争取实现。

谨向吴觉同志致以沉痛的哀悼和衷心的敬意！

（1984 年 6 月）

蜡炬成灰泪始干

——沉痛悼念吴觉同志

杨詠沂

吴觉同志离开我们去了，我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诲，他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历历在目，令人怀念。他像一支红烛，把自己最后的光和热献给了党的事业和南工的建设。

吴觉同志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重要的就是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要联系本单位实际，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吴觉同志以他的政治远见，比较早地在学校中提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对南工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回想这几年，南工党委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吴觉同志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吴觉同志非常重视南工党的建设。他到南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经过积极的工作和艰苦的努力，终于在 1980 年 6 月召开了距上次党代会 16 年之久的院第三次党代会。更使人难忘的是他对年轻干部的关怀和培养，他衷心拥护党中央提出的干部“四化”方针，积极建议并采取切实措施选拔年富力强的同志充实院系（部、处）领导班子。他总是鼓励我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同志对党的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和宽广的胸怀。

吴觉同志思想解放，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他对学校的办学方向、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在他的带领下，集中了全院同志的智慧，制订了学校的事业发展规划，这使得全院的工作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从而逐步走上轨道，加快了南工的发展步伐。

吴觉同志的思想品质和工作精神也是令人敬佩、堪称楷模的。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畏艰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交口称誉。他虽然年事已高，病魔缠身，但依然忘我工作，忠于职守。即使在病重住院期间，他还念念不忘学校的工作，关心学校建设，这使得前去看望他的同志感动不已。

吴觉同志去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和永恒的怀念。我们悼念吴觉同志，就要以他为榜样，学习他那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在各自的岗位上更加勤奋地工作，去实现党所提出的宏伟目标。这也正是吴觉同志生前所寄希望于我们的。

安息吧，敬爱的师长吴觉同志！

（1984 年 5 月）

悼念革命前辈吴觉同志

管致中刘忠德

吴觉同志病危期间，我们去探望他，虽觉病势比过去沉重，但总希望能像过去几年那样，依旧转危为安。然而，这次他竟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实在使人憾恨无限！但是吴觉同志仍然活在我们心中。这不仅因为他的音容笑貌宛如在耳际眼前，更重要的，是他忠心耿耿为革命事业的工作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他对南工所作的许多建树，将成为对我院今后发展长期起作用的坚实基础。

吴觉同志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老同志。他思想解放，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能迅速领会，坚决贯彻。在学校工作中，他具有卓识远见，对于原则问题，他态度鲜明，绝不含糊，而在具体问题上，则又处理得十分合情合理。他及时主持召开了南工第三次党代会，用三中全会的精神统一了党内的认识；他组织制订了我院的规划，使全院有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他力主在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扩大学校规模。他经常告诫大家不要保守自满，要看到工作中的不足，同时又鼓励大家锐意改革，努力把南工办成第一流的重点大学。

吴觉同志来南工虽仅有几年，却使南工真正走上了团结奋进的轨道。近几年来，南工的工作完全是按照党委的设想与规划，在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仅不失时机地狠抓了许多带有基础性的工作，而且各项事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吴觉同志很早就注意我院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经充分酝酿，他亲自调查物色人选，自己以身作则，主动退居二线，对新上第一线的同志热情鼓励和帮助。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真挚与无私是十分感人的。

以上所举，只是吴觉同志对南工所作的许多贡献中的荦荦大者。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些工作对于南工的发展，将有深远的影响。

吴觉同志平易近人，喜欢接近群众。他的家门一直是敞开的，无论是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或是一般工作人员，他都乐于接待，并耐心、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即使在生病期间，也常有人去看他，以便当面反映情况，陈述问题。正是通过这样的和群众的广泛接触，他对学校的情况和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得相当深入，使他有可能对学校的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

吴觉同志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学校的一些主要问题经常在他脑子里思索，不论在健康情况较好时，或是较差甚至住院时，他总是对前去看望他的同志不知疲倦地谈论工作。他说过，他对南工很有感情。的确，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惦念着南工。

吴觉同志离开我们了，我们为失去一位始终热情关怀我们的领导而悲伤，为失去一位献出毕生心血的老同志而恸哭。现在，我们再也见不到吴觉同志那慈祥、专注的面容，再也听不见他那激越、恳切的谈吐了。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将永远是一位可敬的前辈和良师。每当我们想起跟吴觉同志相处的那些难忘而深刻的往事，总是禁不住悲从中来。我们要遵从他的教诲，竭尽绵薄之力，把革命前辈交下来的担子挑起来，团结大家，努力把南工办好，我们还要学习他，像他那样忠心耿耿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事业。

吴觉同志安息吧！

（1984 年 5 月）

我所感知的吴觉前辈

朱爱民

少年时代，我家住在淮阴城水门桥南的淮阴县委宿舍，那时候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位宅条件相当简陋，就是一排排的平房，不像现在的商品房是成套型的，又没有空调、纱窗。因此，家家到晚上就搬个大板凳、小椅子的在门前乘凉。

那时正处“文革”时期，前期是一会儿有某某人被打倒、被造反派抓走的消息，后来是不断有某干部被解放、从“学习农场”回家的消息。因此，晚上经常有同住在城里的家乡人到我家，与我的父亲用轻轻的声音在聊这些事情。我父亲因为参加革命略迟一点，不够走资派的资格。但是，他虽没被打倒，但也靠了边，其间也参加了农场的“学习”，只不过很快就回来了。因此家乡的其他干部就陆续到我家坐坐，他们一谈某个话题，就要扯到战争年代，像说故事一样，讲个来龙去脉。就在这其中，为了证实某事件的特殊或重要，经常提到“这事当时还惊动县长吴觉的！”或“后来是吴觉出面说话的。”我那时正上小学，也没有作业，没事就在旁边听着。对吴觉二字有了“莞尔”的印象。

到了 1981 年，我从部队回来，在县供销总社上班。当时县总社的四位主任，三位是抗战的，一位是解放的；有淮阴籍的，也有涟水人，其中一位是吴觉当年的直接老部下“史大胆”。这几位老干部在闲暇之时，经常毫无顾忌的高谈阔论谈战争年代的故事，经常提到吴觉。当年那些房屋不隔音，我们年轻人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饶有兴趣，因而对吴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实在多年之后，我才真正理解这几位老前辈为什么会天天畅谈自己的青春年华：一是当时打倒了“四人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老干部又重新回到岗位上，他们心情舒畅。二是此时吴觉被平反了，重新工作，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他们为老首长劫去福来而高兴。又过了两三年，吴觉去世，我们年轻人并不知道，也不关心。其后的某一天，父亲给一本书，说你好看书，这本书拿去看吧。这就是王永久先生编著的《吴觉纪念文集》，我阅读了《主力到来之前》等文，从此对吴觉的高大形象有了立体的感觉。

由此，我开始留心相关吴觉的回忆录、纪念文章。

我知道了在战争年代，吴觉是虎啸山林的王者；是健步淮海的革命家；是胸怀坦荡、谈笑风生、热情四射的红色大侠。我亦理解了多年前老干部为什么总是低声地谈论吴觉？因为在吴觉建国后的 34 年生命中，只有 1949 至 1955 年，1979 至 1984 年这两个五年的时间里，他是心情舒畅、身心自由的为党工作，为人民做事，而其他时间都被诬、被冤、被查、被关。老干部、他的部下不是“谈虎色变”，而是鉴于那是非颠倒的特殊年代，虎落平原，他们同情和怀念老领导，只不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哦。我由此也知道为什么家乡的老干部会不时地提及吴觉，因为在 1939 到 1940 间的艰苦岁月里，吴觉和他的战友率领一支 500 人的队伍，坚持敌后抗日，就是以淮阴的刘老庄、古寨，涟水的成集、余圩一带为根据地，转战在淮淮涟沭大地。许多干部都是在他的感召下，拿起枪，走上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

但是，在不少的文字中，我却感到记录吴觉的分量太少、太淡。虽然没有否定吴觉，但在淮阴及淮海的许多时间、事件中，吴觉被一带而过。吴觉，作为抗战初苏北同盟会的关键人物和主要操作者；作为淮阴地方军事武装的创始人和军事主官；作为有着纵横捭阖之才的淮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作为淮海籍第一位出任地区级党政军职务的领导人（专员、地委书记、军分区副政委兼独立旅政委），似乎被时间淡化，似乎被人们遗忘。在这一点上，建湖人陈

克天的认识更直接和明白。抗战初，陈克天在淮河大队时是吴觉的部下，后曾任建湖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出任江苏省副省长。他在《吴觉的侠肝义胆》的文章中说：“我总感觉，我们对吴觉同志的宣传太少了，与他一生的功绩很不匹配。”
我们应该寻找一个对淮海革命有功的吴觉。我们应该理清吴觉与淮阴、吴觉与淮阴革命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我们后辈着力进行的一件大事，一件传给后代的功德无限的历史真实。这是我应该做的一件事。
吴觉的性格、作为，最为经典的概括，就是李一氓所誉的“主人颇有江湖气，坐客能谈山海经。”怎么理解这句话？建国后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忆吴觉》一文中，赞誉青年吴觉是“豪迈气概，潇洒风度和英发才干。”1938 年初，吴觉和谢冰岩去徐州找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想谋取一个有关统一战线组织的批文。据谢冰岩的回忆，在徐州时，通过他的关系与在第五战区青年工作团工作的地下党员李锐进行了接触。随后，在 1938 年 5 月徐州失守，李锐在突围中与同伴在新沂走散。结果是李锐一人南下，投奔淮阴城的吴觉。在淮阴期间，李锐由吴觉引荐，参加了国民党地方上层的宴会，演了一场“舌战群儒”，畅谈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李锐说离开淮阴时，吴觉给他换了衣服，赠以盘缠，并告知在苏中与江南的落脚关系。正是这两次的接触与相处，才有了李锐对吴觉的评价。
合肥人李广涛，抗战初随刘少奇开辟华中，来到了淮海，在淮阴任县委书记时与县长吴觉搭班子。1996 年，我随县委副书记去合肥拜访李老，聊到吴觉在淮阴的影响，李老形象地说：“淮阴共产党的天下一半是用枪打下的，一半是吴觉用拳头抱出来的。”我想李广涛的话比李锐说的更明白易懂。
有一份史料载：当年原苏皖特委组织部长张芳久带着高兴泰、戴曦二人，来淮涟开辟新区，发展党组织，创建武装。他们随着朱慕萍、陆亚东来到涟水，在了解淮淮涟基本情况后，张芳久对工作进行了分工，决定自己独自去淮阴城联系吴觉，自此与吴觉成生死之交。由此看出吴觉在当年的影响力。
洪码战斗，四营营长王道明牺牲，吴觉放声大哭，追思战友。涟水一烈士当时负重伤，吴觉立即输血相救，烈士其弟多年之后仍谈论此事。
吴觉夫人王凤山说：1960 年以后，他们家从河南的三门峡电站回到江苏，住在镇江。此时的吴觉已靠边赋闲，但没有几天，他就与一条街的修车汉、卖菜的老头、看小吃店的年轻人混得烂熟，男女老少都认识他，都愿意与他在一起聊天、玩耍娱乐。
这就是吴觉，热情豪放，爱憎分明，性情由衷。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淮安市尚称淮阴市，淮安地方志专家荀德麟先生编纂了《淮阴杰出人物赞》，对包括韩信在内的 60 位古今往来地方历史名人其生平功绩进行评价、称赞，中有诗一首：

胡尘蔽海欲遮空，

淮大旌旗雨夹风。

父老于今犹乐道，

缨枪乌铳踵吴公。
诗中的吴公即指吴觉前辈。荀文称吴觉是“淮海地区民众抗日运动杰出领导者”，一生“屡建殊勋，……历任要职……所在多有建树。”
当年那种“雨夹风”的艰难到底是什么样子？曾任盐城市政协主席的祝斌在《建政前阜宁地下党的活动》文章中写到：“（1940 年）3 月份，我到淮河大队找万众一。我在淮属地委的十

多天的时间里，天天夜间行军。”其实，行军仅是战斗生活一部分的写照。
吴觉率领的淮河大队坚持在淮涟，按李锐说法是对地区伪化起了阻止和威慑作用。其时，饱经风雨的吴觉们不会知道，他们艰苦的坚持，恰成了国共博弈的棋盘上的一枚重要棋子。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军令部的命令中几次都要求“第八十九军以一部驱逐沭阳、宿迁、涟水边境非法活动之异党”，蒋介石亲笔批示：“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方能有效。”事实也正是这样，淮河大队的敌后坚持，对日后黄克诚率领八路军东进淮海、开辟苏北，南下苏中支援新四军作战，起到了一个“跳板”和“驿站”作用。陈克天说“吴觉同志是淮海抗日举旗人”，李广涛的“当年不忍山河丧，五条烽火第一枪”，谢冰岩的“十年辛劳君更健，诸城克复向南迁”，都是对吴觉在战争年代的功绩的肯定。在建国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和中共文献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吴觉名列人物传915人之一。作为淮阴籍的淮海干部，吴觉是唯一一个。吴觉进了“人物传”的规格，就是人民对他的肯定，就是淮阴人的骄傲。
约在10年前，当我与吴觉长子克坚去京，请李锐为《芭根草——吴觉与淮阴革命》题字时，李老写下了“又闻救亡发聩声，再现抗日矫健影。”吴觉作为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建国后，虽然身陷囹圄，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的功绩，他的故事一直在民间传颂。《陈克天纪念文集》中记述吴觉的一段小故事：“文革”中，吴觉被关在“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一些受蒙蔽的大学生起先也斗他，但等暑假回到学校，许多学生向他赔礼道歉，说回家后家长听说他们在斗争吴觉，许多学生都挨了家长的骂。家长们说吴觉可是打鬼子、打反动派和治淮的大功臣，千万要去认错，帮他安排好生活，听他讲讲革命道理。”
我有一位做外贸的朋友，老家是淮阴三树乡，与吴觉的老家渔沟是南北位置，看见我的《芭根草》一书，便要过去看。期间，他的父亲进城，见书很惊奇，也想拿回去看看。结果儿子不解，问其故？父亲乃述其轶事，并言到现在许多农民在啦呱之际，吴觉还是故事的主人翁。朋友闻其言，阅书后感叹：“吴觉真乃了不起的人物！”看来这就是荀德麟先生“父老于今犹乐道”的注脚。
我在走访、了解、整理、宣传淮阴革命斗争史、谈论吴觉的过程中，亦遇到疑问与思考。一次，当我在谈起当年陈书同、李干成等人分别去湖北、山东寻找党组织的故事时，一位年轻干部问我：“他们为什么要去找党？给他们发工资？”这确是一个令人无语的问题！他们当年为了什么？他们毁家纾难，用淮阴话说是图个啥？如果从吴觉个案来说，20世纪50年代的审查吴觉材料达到74斤；吴家存有的吴老在狱中、“文革”中以及各个时期的“检讨材料”，装满了那种装化肥的“蛇皮口袋”一大半。是啊！他们落到了什么？
这应该引起我们党史研究者的思考，当吴觉等前辈、先烈与这个时代越来越远时，他们的精神应该随着我们时代同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为吴觉题写了“赤胆忠魂，为真理而斗争。”这，应该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和方向，我们应宣传前辈们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宣传前辈们对党对人民赤胆忠魂的品德。
我在思考，吴觉前辈们的作为，在中国革命的整体中是一种什么地位？如果形象的说，毛泽东等共和国创始者是参天大树的话，那么，吴觉们是什么？
俗话说草木丛生，有绿草的拱卫、滋润，树木才茁壮、参天；有大树的引领，庇护，草藤才绿荫、茂盛。苏北有一种草最本土、最常见，名曰“芭根”，它不羡高大，也不慕美丽，但它每生长一节均扎根土壤，再向前生长，再扎根一节，生命力极强。当年，吴觉他们在苏北就犹如芭根草一样，扎根于人民，任凭风吹雨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想，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有了他们像芭根草一样，才绿满了中华民族的大地。
我把“吴觉与淮阴革命”的文字定名为《芭根草》，并请著名书法家谢冰岩题写书名。我在书中《写在前面的话》一文中说:吴觉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淮阴人民的旗帜；是淮阴

革命的符号；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形象。
今年 4 月，在吴觉前辈逝去 30 周年之际，听闻市委党史工办和市中共党史学会将联合编辑出版《吴觉纪念文集》，十分欣慰。因为物质终会湮灭，而精神定能永存。此举功莫大焉！特别是淮安市委党史工办原主任、淮安市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家宁邀我写篇拙文，充在集中。我想以我的资格是不够写文章的，何况我也没见过吴觉前辈。但为谢郭君之邀，因此，我以感知的角度，写了些碎片。这些碎片，散见于其他人的回忆之中，或可能是其他有分量的文章所没有的记忆。虽鳞鳞爪爪，但它可使我们得见全豹，仰止吴觉那革命的一生。
2009 年，淮安市举办八一建军节晚会，区领导要我组织一个文艺节目参赛。当年正是淮海地区党组织创建的武装“淮河大队”成立 70 周年。于是，我以“芭根草”为题，写了一首歌词，以表纪念。在本文结束之时，我想用它献给吴觉前辈：
春天你发芽，
叶茂根壮，节节往前扎。
扎进泥土里，你吮吸大地母亲的乳汁，
昂起头，绣个绿色美如画！
望着那挺拔的大树，
你不惊不咤。
头上同是一片蓝天，
为自由、为理想、为生命，
小处做起不自夸。
野火烧不尽，秋风任凭刮。
严寒摧不跨，春天仍生发。
昂起头，向前扎，绣个大地绿如画。

春天你发芽，
叶茂根壮，节节往前扎。
扎进泥土里，你吮吸大地母亲的乳汁，
昂起头，绣个绿色美如画！
看着那艳丽的花草，
你不羡不阿。
脚下同是一块沃土，
为美好、为友善、为未来，
化作泥土愿护花。
野火烧不尽，秋风任凭刮。
严寒摧不跨，春天仍生发。
昂起头，向前扎，绣个大地绿如画。

追忆

王凤山

倭寇入侵，义军首创。

奋力理淮，坚堤束浪。

忌惕青蝇，高怀坦荡。

呜呼噫嘻，蒋山永望。

在吴觉离开我们 30 年之际，重温李一氓同志为吴觉题写的墓志铭，百感交集，我与吴觉相随相伴共同走过 46 个春秋，现回首那充满风风雨雨的日子，仍历历在目，难以释怀。

1932 年夏我于淮阴中学毕业，和姐姐王凤仪同去上海读书，与吴觉同行，我报考的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远行，又是去上海大都市，人地生疏，此时吴觉已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对上海很熟，由他送我到学校帮我办了入学手续，就此我们认识了。通过以后的交往，吴觉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是个热情、潇洒而又不失儒雅的青年，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虽他 4 次被捕，在一般人的眼中是个亡命徒，但我并未改变对他的看法。1937 年吴觉第 4 次被捕从反省院放出后，我毅然决定与他结婚。

我和吴觉于 1937 年底结婚，准备结婚时，正是他忙于筹备建立抗日同盟会时期。他把结婚一切事宜全权委托他中学好友夏前轩处理，而他本人于结婚典礼前 2 小时才匆忙从 57 军万毅处赶回，新婚才几日又带着朱德轩老先生的信赶赴徐州请见李宗仁，为抗日同盟会筹建四处奔波。而那时我家也成了他们联络点、活动点，家中终日高朋满座，人来人往，有各处来的抗日同志，当时家中连客厅都住满了人，我终日烧茶煮饭忙于招待，每日早点我都是以大筐篮购置，当时活动经费大多无来源，都是自筹，为了筹资金他将自己父亲的积蓄连我母亲的积蓄都拿去托人做生意，赚了钱暗地购买枪支弹药，支付部分人员薪金，印刷书本宣传材料等。

1939 年春日军进犯苏北，就在淮阴城沦陷前几个小时，我们才匆匆离开祖宅，未曾想到这一走是永远离开（祖宅内战中被国民党扒掉）。离开淮阴吴觉让我带着孩子寄住在友人张一平家，而吴觉、张芳久、谢冰岩、丁九直接去渔沟老家取枪拉武装成立抗日义勇队了。我当时除带几件随身衣服几乎什么都未带，事后才知道吴觉身上揣着 3000 多元大洋供部队所需，他未留给我和孩子分文。后来我多次遇困境时，还是老母亲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带点粮食、钱和吃的贴补于我。

游击战争时期异常艰苦，部队处于敌、伪、顽三方夹击状态，没有根据地，没有经费，部队经常日伏夜出，穿插于淮涟两个地区，吃的是派饭。我当时带着孩子（不足一岁的大女儿）跟随部队行动不方便，只有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埋伏在老乡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时吴觉成为敌人搜捕对象，曾张榜 5000 大洋悬赏吴觉人头，与此同时我也成了他们要搜捕的对象，他们在农村到处找吴觉老婆，我能幸存实属不易，完全靠老乡们的掩护。一次我埋伏在李大庄李可拔家，汉奸进村找吴觉老婆，搜到李可拔家，我藏在他家后屋的夹墙里，敌人把他家翻个遍没找到，抓走了李可拔，对他动了刑、灌了辣椒水，要他交待我的行踪，但他始终没有交出我……直到今天我仍念念不忘那些曾经掩护过我、照顾过我的乡亲们，没有他们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战争时期对于女同志来讲最怕的是怀孕生孩子，由于生活艰苦缺少营养，我接连三个孩子都是 8 个月胎死腹中，都是胎位不正难产，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我

在牛棚草堆中疼痛三天三夜才产下腹中死胎（当时风俗孕妇不能在别人家生孩子），回想当时在四处透风牛棚中孤寂忍受煎熬的情景至今仍感到后怕，也惊愕自己的生命力怎会如此顽强！

解放后，本以为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再为他担惊受怕，战争年代虽苦但我们毫无怨言，相反心情是舒畅的，我们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虽死犹荣。

1950 年底我随吴觉来到淮委工作，他任原政务院治淮委员会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和秘书长，全面主持淮委的日常事务工作，按照曾山同志的话来讲就是“秘书长专政”。当时治淮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程，数百万干部、技术人员、战士及建筑队伍，吴觉为了不辜负重托，长年居住在淮委办公厅，虽离家很近但难得回家，照顾老人孩子一大家子全靠我在操劳，但我没有任何怨言。谁知由于吴觉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愿和某领导同流合污，不愿充当其打击陷害同志的走卒，不愿为其在水利纠纷问题上充当其以邻为壑的工具，不愿充当其对抗华东局及中央某领导的马前卒，在执行与维护财务制度上不能满足其穷奢极侈为所欲为的要求，遭其打击报复陷害，借 1955 年肃反运动之机，以现行特务罪被抓捕，家中遭抄家。吴觉被捕后 4 天我也被捕，我被关在我家住室对面的一幢房子里，使我能隔着窗子看到孩子，而不能抚摸孩子，不能与孩子说话。当时我最小的孩子才四岁，孩子们每从我窗前走过时都低低的叫一声“妈妈”，但我不敢答应，每听到孩子的呼唤与哭声，真是心碎肠断。而审讯人员直接告诉我，只要交待出吴觉是特务立即可以放你回家与孩子团聚，审讯时采用疲劳战，几天几夜不准我睡觉精神上百般折磨、刺激以致我神经曾一度失常，百般折磨之下我的肺结核复发，开始吐血，患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身体异常衰弱，与此同时我的大姐、妹妹、妹夫都被抓捕到安徽，更可悲的是大姐的独子王平，是青年团员，适逢苏州工业学校毕业，分配北京一机部工作，事前未闻我们被捕之事，途径蚌埠下车来看我们，也被拘捕斗争，使这孩子精神失常，结果在北京精神病院度完一生。由于查来查去未能查到什么，半年后，我被放回家，吴觉在被捕一年后也释放回家，虽然当时承认搞错了，但没想到的是档案中留下一条“有政治嫌疑、专门机关长期审查”。从此吴觉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也使组织上无法分配工作，为此吴觉曾对某负责人讲“你们这是害了我一辈子！”我不明白吴觉在战争年代为党出生入死，杀敌无数的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了却成了特嫌，无论在感情上还是思想上我都不能接受，吴觉反而劝解我，“不是认错了嘛，运动难免会有错误”。我知道吴觉内心也十分痛苦，经过这次打击对我和吴觉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吴觉患上严重的阻塞性肺气肿，肺功能只有常人的 1/3，而我则患了高血压，肺结核复发吐血，从此我们一直闲居在镇江，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我深深地感到吴觉内心世界的痛苦，1963 年他曾对组织上写说：“八年来我未能为党工作，这是我有限生命的最大浪费，也是我毕业以来最深沉的痛苦。”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觉又受到了冲击，他先后被军事管制，送进监狱，关进工人纠察队，多次重病，几次死里逃生，我终日为他担心受怕，后来他到了句容五七干校，但是专案组始终不允许我前往探视，到干校允许吴觉给家人通信，吴觉曾给我写了一封长达 7 页的信，他回忆我们从相识、恋爱、结婚、战争直到“文革”，深深地表示了对我的歉意，他认为自己无愧于党，无愧于他所追求的事业，但唯一对不起的是我。看了这封信使我既感动，又难过，这封信我放在身边几乎天天看几遍，可惜后来竟把这封信遗失了。

经孩子们的多方奔走，吴觉终于 1971 年初冬释放回家，吴觉在“文革”中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压力多大，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也未因自保而乱咬乱供，又一次体现出他的高贵品质。

1978 年夏吴觉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24 年的冤屈得到昭雪，并出任省政协副主席。1979 年又接受了去南京工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工作，按当时吴觉的身体状况我和孩子都不同意他再出来工作，但他给组织部门的一份材料中曾这样说：“……55 年至 79 年的审干，对我确是政治上的致命挫伤，那时我是 43 岁，政治上正走向成熟，也积累了较为丰

富的工作经验，处于年富力强时期，可以为党更多更好地工作，不期突然失掉党的信任，也失掉了为党做好工作的条件，因此 79 年我又重新获得工作时止，被闲置浪费了人生最可宝贵的 24 个年头。如今年已古稀，老而且病，原可离事求全而终残年，奈以我党正处于伟大的历史转折，面临四化兴国大业之计，……这是我最后一班岗，必须坚持定力，专心致志力争做好这一工作，适时退居三线，另无所求。”他已经下决心抱病受命站好他人生这最后一班岗，我和他风风雨雨走过了 40 多年，我太了解他了，我支持他的选择。南工的 5 年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玩命地投入，甚至病床上吸氧气也找人谈工作、听汇报，没日没夜，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人找他都热情倾听，我虽心痛但无法劝阻，他又一次出色完成党交给他的最后的任务。可他终因在病中接待人过多，原本已康复不几日即可出院的人，又再次感染，而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常想他如果不来南工工作，就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们，每念及此我和孩子们均深感遗憾。然而我相信吴觉在弥留之际，对此会无怨无悔，因为他终于又得到了为国家为人民奉献自己才干的机会，他曾经为失去这一机会心痛了 24 年，他是多么珍惜这迟来的失而复得啊！

（此文为吴觉同志夫人王凤山口述，子女吴玲、吴克强整理）

那些年

——忆父亲

吴克坚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是久远以前的事了，他的音容笑貌已依稀模糊。但每当回忆和他相处的日子，往事一幕幕地在脑海中浮现，历历在目。个中的感受有时是温馨的、甜美的；但大多数是痛心的、苦涩的。

我的幼年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和内战年代中渡过的。我对那时的记忆基本是一片空白，偶尔零星地记得：姐姐带着我在田野里奔跑，在沙河滩捉小螃蟹……充满了童趣和快乐的回忆；淮阴城二次解放时，目睹街边站着、躺着的鲜血淋漓的国民党伤兵，他们在哀求在呻吟……留下了杀戮和血腥的回忆。至于对父母和家的记忆却十分模糊，这可能缘于那个非常的年代吧。

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我也随父母进了城，进了幼稚园大班，土包子接受洋教育。虽说晚了些，也算搭了正规的幼儿教育的末班车。一年后，我进了小学。那些年，父亲奉命去治淮，领导着新中国第一项建设的千秋大业。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住在淮委办公厅的办公室里。办公室是一间大房间，用屏风一分为二，外面办公，里面休息睡觉，很简陋。父亲很少回家，

我们想爸爸时，就去他办公室看看玩玩。父亲忘我地工作，日理万机，呕心沥血，置自己的身体而不顾。他终于病倒了，因胆绞痛曾几度昏倒在办公桌下。实在拖不下去，他吃了一刀，做胆囊切除。那时为新中国的美好未来，母亲和父亲一样精神亢奋地忘我工作，不为人后。因此，他们很难顾及家，特别是孩子们。我们的生活全靠外婆和冯妈（老阿姨）打理照料。我除了应付读书外，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整天就是玩。我觉得生活是甜美的、幸福的——我有一个好爸妈，丰衣足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父亲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会出差回来时，总会给孩子们带点童装、糖果、玩具等，每逢此刻我们更为高兴、更爱爸爸了。

1955 年的 8 月下旬，天气格外的闷热，空气像凝固了似的，让人心烦意乱。有一天傍晚，平时很少回家的父亲突然回来了，神情凝重，似乎有事要和妈妈商量。我那时正在学下象棋，一见父亲就缠住他要下棋，他赢了两盘，我不依不饶地一边哭一边下，非要赢。父亲耐心地教我，让我赢。时间很晚我才心满意足地去睡，临睡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要我听妈妈的话，不要任性，好好读书。第二天父亲走了，这一走就是一年，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逮捕了。每每忆及那晚，对我当时的任性，深感愧疚，对不起父亲，要知道当时父亲内心忍受着多么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啊。父亲被关的地方就是我们准备搬的新家——“花园小洋房”（这是我和姐姐经常去打扫的新房，全家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搬的新家）。在“洋房”里要父亲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与外界完全隔绝，一年音讯全无。没几天，母亲也被带走了，关在我们家的对面，彼此从窗子能看见，但不能讲话。母亲幸亏只被关了半年，她差一点就被逼疯了。接着我们的家被抄，连地板都撬开，找“电台”。就连老阿姨冯妈也没放过，要她交待“电台”等问题，吓得她偷偷地哭，偷偷地求神拜佛，保佑这一家子。家里的亲戚大多横遭株连，重者逮捕坐牢，轻者审查询问。我最喜欢的一个表哥大学刚毕业，分配到北京二机部（造飞机的保密单位）工作，路过蚌埠看望姨父母，竟被关了起来，被逼成精神分裂症，毁了他一生……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有一天傍晚，母亲在理发室理发，有两人看守。我因内心的仇恨躲在大树后用铁皮砸看守的人。为此他们大动干戈，审讯我几个小时，追查谁是我幕后的指使人。此举可笑可悲，要知道我只是一个 10 岁的孩子呀！那时厄运临头，父亲的孩子们一下从天堂坠入地狱，在小小的年纪便饱受世人的冷眼嘲弄，尝尽了世间冷暖炎凉。我们爱父母，深信他们是好人，他们一定会回来；我们也变得懂事了，一下长大了，知道要好好读书，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家庭之变故催生我早熟，我拼命地博览群书，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求支持和答案。

1956 年的 8 月下旬，天气出奇的凉爽，空气分外的清新，让人心旷神怡。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睡得很香很甜。突然听到有人轻轻地叫我，声音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我一睁眼，惊奇地看见：父亲撩开帐子，微笑地端详着我。我一声：“爸！”跃起紧紧地抱住了父亲。父亲变白了，变胖了。父亲终于回来了，平平安安地回来了。一家人大团聚，尽享可贵难得的天伦之乐。此后父亲闲居在家，等待组织分配工作。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敦促我们读书和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好人。

我的父亲可以说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诞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我的曾祖是武举，祖父是前清的末科秀才，为前清著名洋学堂两江优级师范的首届理科毕业生，在淮阴等地的省中从事教育工作，历任舍监、学监、校长等职务，家境殷实。父亲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本应循传统的人生发展道路走下去。但当时的历史环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弄潮儿，是那个时代的杰出才俊，是中华民族的铮铮汉子。军阀时代的腐败促成中学时代的他投入了学潮运动，遭当时的教育部通令开除；大学时期参加中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腐败，曾四度入狱，一度濒死；抗日战争组织义军，抗日救亡，打下一片天地；内战坚持淮海，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协助陈粟大军，出色完成支前、扩军和兵运工作，数度受到中央嘉奖表扬……就是这样一个对党赤胆忠心、功勋卓著的人，却成了叛徒、特务，横遭逮捕，置之死地而后快。幸亏谭震林等老领导出声相救，才使父亲免遭牢狱之灾。但是给父亲留下

所谓历史问题的尾巴，并受到党纪处分。
父亲肃反被整倒也因祸得福，躲过了反右并离开了安徽。背着历史包袱走上新的工作岗位——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局副局长，是一个无实权的位子。局长是原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其他副局长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的副省长出任。尽管如此处境，父亲仍很珍惜这份工作，事业狂的秉性又回来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分管的技术和外事（专家）工作中，又住在工地很少回家。然而好景不长，反右倾运动开始了，父亲不幸地又成为全工程局头号靶子。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狂热中，到处浮夸成风，什么都放卫星。三门峡大坝的混凝土浇注也在放卫星，造成大坝出现牛背大的蜂窝空洞，带来严重的质量隐患。父亲痛心地直言疾呼："注意质量，多、快、好、省四个字有主次之分，好字当头，没有好字，别的都不用谈了。"这可是金玉之言，但在当时可谓是大逆不道。加之，当时有领导言："中国将迈入共产主义社会。"但苏联专家却讥笑说："住着原始山洞（窑洞）的共产主义，原始共产主义。"因父亲主管外事工作，对此言论没有给予驳斥，这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父亲曾直言不讳地对我们说："这活脱脱是安徒生笔下的皇帝新衣。"批斗会一场接着一场，父亲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回家后，父母时而窃窃私语，时而激愤呐喊。我们担心着，无名的恐惧不时袭来，生怕爸妈又要回不了家了。值此关键时刻，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水利部长李葆华来三门峡，得知家父被批斗，立即予以制止。这帮人倒也听话，顿时偃旗息鼓。此后父母应钱正英邀请去北京养病，回避这帮人。谭震林、钱正英等深知家父的能力，数度力荐他出来工作，但终因历史问题而作罢。1960 年，父亲受惠浴宇之邀回江苏。离开三门峡那天夜里，尽管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仍有人结队前来火车站送行。
回到江苏，父亲选择隐居在镇江，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和政治的漩涡。镇江的家是一座老式的平房，一厅两厢五间房，虽说挤一些，倒也宁静温馨。父母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清晨去烈士陵园的山上晨练，打太极拳。我们居屋前有一天井，屋后是一座不大的庭院，一道墙又把它分成前后院。父亲每天在此从事园艺劳作，为了种植花草树木，凡能掘开的水泥地均被他挖开了。他的成果是：冬天，后院的腊梅暗香浮动；夏天，前庭细听雨打芭蕉；春天，满屋的迎春、蟹爪兰等竞相怒放；秋天，金桂飘香遍地黄金甲。兰花、月季、君子兰、栀子花、海棠、夹竹桃等应有尽有。那时正值困难时期，为了改善生活，父亲在后院养鸡养鸭，鸭子一天能生两个蛋呢！院子的围墙上爬满了扁豆、丝瓜等；桃树、杏树果实累累。父亲上午总要听广播、读书看报，他的必修课是：写毛笔字，揣摩王羲之、柳、颜、魏碑等各家之长；读古书，轻吟诗词歌赋，细读古文观止、资治通鉴等。每逢假期他还要求我们也写字读书，对于名篇一定要熟读会背。平时常有亲朋好友来看父亲，届时他和亲朋开怀畅饮，回忆叙旧；针砭时政，谈论国是。父亲也很接地气，与当地的三流九教，平民百姓也能打成一遍。那时父亲的生活真可谓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父亲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一直渴求报效祖国，施展才华，但历史问题妨碍组织对他的使用。对于自己的冤屈，父亲始终不断地向中组部、谭震林等申述，谭震林等亦数度批示，要求华东局等对其调查平反。但鉴于当时的政治态势，始终没能解决。家父万般无奈，唯有满愁怅，空悲切。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因父亲长期闲居，倒也相安无事。但他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青年学生的无知，发起的一场反党、反人民、反文明的罪恶暴力运动，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忧心忡忡，终日忧国、忧民、忧家。他反复写信告诫我们子女："不准造反，做逍遥派，读读书，能回家就及时回家。"我们按父亲的教导去做了，并及时回到了家里。1967 年为了打倒刘少奇，江青和中央文革教唆南开红卫兵开展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抓叛徒"运动。此运动很快波及到华东一带，我们早有准备，在南开红卫兵上门之前，已将父亲秘密转移到上海。南开红卫兵扑了个空，恼羞成怒，疯狂地抄家报复，并将我的一个妹妹打伤。此后，成立了军管会，成立了父亲的专案组，父亲按规定回来向专案

组报到。从此厄运临头，他先后住过二十七军的“炮连”，蹲过看守所、监狱。他既被军管过，又被群专过。他被群众和军人殴打、凌辱，曾重病高烧无人管。对于这一切，专案组的军人们对我们进行封锁，待后来父亲回家才知道。为了父亲，我曾在专案组门外偷听案情分析，被他们发现。我被一位钱姓参谋审问了大半天，我毫不畏惧，为父亲的历史清白和他们激辩。那时，尽管父亲受到非人的折磨，但他从没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他宁可站着生，也不愿跪着死；他坚守原则，从不说违心的话，从不做违心的事。他的铮铮铁骨、大义凛然，在当时众多被整的干部中是不多见的。后来革委会成立了，父亲被转到干校。因屡受迫害，他的阻塞性肺气肿病严重了，走两步都要喘，基本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我送他上干校，帮他扛行李，在他的床上铺上厚厚的稻草，让他冬日能睡得暖和些……父亲在干校的日子，干校领导对他还算照顾，考虑他有病，仅让他在厨房帮助摘摘菜。尽管如此，母亲和我们总是担心他的身体，弟妹们隔三差五地去看他，并带点好吃的，让父亲补补身体。我借出差或休假的机会去干校陪父亲住，帮他把宿舍的水缸挑满水，打扫卫生，帮父亲洗衣服。每到晚上听他们同室的陈姓老木匠讲朱元璋炮打庆功楼、杀开国功臣的故事。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全国政治形势有些微妙的变化。父亲在干校算是死老虎、是累赘，故有人暗示我们：只要上面发话，他们就放人。于是我们给许世友、田普和吴大胜写信并连夜送到他们家。不日，干校通知我们接父亲回家，为此全家欣喜若狂。我第二天赶早去干校，扛行李，乘长途汽车，风尘仆仆地将父亲接回家。从此父亲和我们又回到了“文革”前“悠然见南山”的生活状态。1976 年的秋天，四人帮垮台了，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逆转。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全国紧锣密鼓地展开。对父亲的历史问题中组部做了“彻底平反”的结论，父亲的政治生命复活了。这一切来得虽说晚了些，但它毕竟是来了。1978 年父亲被选为省政协副主席，随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当时的南工是江苏造反派的大本营，被称为“难攻的南工”。父亲拖着孱弱多病的躯体来到了南工，他一上任就旗帜鲜明地彻底否定“文革”，严惩犯罪的造反派头目，消弭派性；在全省高校率先成功地召开党代会，组建强而有力的校系党政领导班子；迅速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建立以名教授为核心的各级教学领导班子。在此基础上，他又马不停蹄地着手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大胆遴选提拔各级青年领导干部，在他手上学校很快走上正轨，搞得水生风起，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

父亲这个人是个事业狂，从年轻到老他做事情就是在玩命。到南工这几年，父亲又一次玩命，也是他最后一次玩命。父亲不分昼夜地工作，他的阻塞性肺气肿病也日趋严重，躺在床上还在工作，经常把办公会放在家中病榻旁，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叨念着工作。1984 年父亲退居二线，省委安排父亲担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让他发挥余热，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父亲也打算把身体搞得好一些，与家人更多地在一起，出去走走看看。本来父亲与李一氓约好，陪他到苏北走走，回淮阴看看。要知道解放后因种种原因，父亲一趟老家都没回过，这一次可是一个有意义的难得好机会，但他病了且病得很重，不能成行。对此，父亲和李一氓都深感可惜和遗憾。

父亲走了，过早地离我们而去，我们悲伤欲绝；父亲走了，过早地离我们而去，我们思念无限。父亲离去也正值中国权威主义的结束，英雄时代的谢幕，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还在继续。往后的日子，愿祖国能走好，社会能走好，国民能走好；愿父亲的经历不要在我们和我们下一代身上重演；愿中国梦能早日能实现。这也是父亲一生的追求，父亲安息吧！引杨慎的“临江仙”祭家父：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鱼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2014 年 2 月 20 日夜香港）

永远的思念

吴克勤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 30 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曾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中。父亲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但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思念和无尽的遗憾及挥之不去的痛。

晚年的父亲一直饱受病痛的折磨，每到冬天就发病住院，但到了春天都能转危为安。1984 年也是如此，4 月 20 日我从常州出差到南京，去医院看望父亲，当时父亲已基本康复，准备不几日即可出院。父亲看见我十分高兴，兴致勃勃和我谈了一个下午。他告诉我新领导班子已经产生，他可以彻底退下来了，退下后就可以好好休息啦，准备静心来写点东西。他要好好地写份回忆录，准备写本书，另外计划带着陪他担惊受怕一世的母亲到处走走看看、玩玩。甚至已和惠浴宇伯伯约好准备一块回淮阴，去到生他养他及战斗过的淮海地区看看……看到康复了的父亲心情如此之好，我也十分开心，爸爸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安享晚年了，过点舒心日子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回到常州没几天，28 日下午就接到家中“父病危”的电话，我心急如焚地赶到医院，看到的是已深度昏迷的父亲，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能特征。30 日凌晨撤去呼吸机，父亲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走得那么突然，从再次感染到离去只有短短数日就走了，走得那么平静，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只留下了多少遗憾和那些未完成的心愿，匆匆地离开了我们。也许是苍天在冥冥之中的安排，安排了我们父女 10 日前那半日交心吧！

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他的一生是那么悲苦和令人心酸。与其他父女不一样，在我的童年和父亲相处时间并不多，幼时的我很少见到他，他常年住在淮委办公厅，虽然办公厅离家很近，但他很少回家，我们姊妹跟着妈妈和外祖母过日子。有时想爸爸了，我们几个小的会摸到办公厅看爸爸，记得走时爸爸会给我们每人二分钱，拿着二分钱会令我们高兴半天，因为二分钱当时可以买几块糖或小书店看几本连环画，甚至能买支冰棍。父亲难得回家一次会让我们几个孩子十分兴奋，因为饭桌上会增添几个好菜，但这种记忆在我幼年时真是少得可怜。在我们最需要他陪伴时，他却深陷囹圄。被捕的前夜爸爸回来了，在房间和妈妈小声谈话，家中空气异常沉闷，第二天早上走后就再也没有回家。

1955 年 8 月 30 日，学校刚刚开学，放学回家发现家中里里外外全是警察，屋里因抄家被翻得乱七八糟，我们几个孩子顿时被吓得一声都不敢吱，惊恐地盯着妈妈看，看到的是母亲那充满悲怆的脸，更可怕的是几天后妈妈也被抓走了，门外布满监视的警察，陡然间我们都变成大特务的子女。平时和我们十分亲热的叔叔、阿姨们都变得那么陌生，不再亲热地和我们打招呼了，好像我们都是瘟神，唯恐避之不及。虽然当时我们都十分幼小，但已深深体会到世态的炎凉，我们突然之间变得都懂事多了。母亲被抓没几天，一天早上我带着弟弟去上学，当时正值学生上学及家庭主妇上街买菜时间，路上十分拥挤，突然发现一群武装警察押着一个戴手铐的中年妇女，围观人非常多，不少小孩跟在后面喊“女特务”、“大坏蛋”，我和弟弟也挤进人群，但突然发现押着的犯人竟然是我的五姨娘，我吓懵了拉着弟弟往外挤，整整几天头脑里全是“特务”、“坏蛋”，上课一点都听不进去。妈妈被抓走了但被关在家对面的房子里，透过窗子可以看见她，有时还让妈妈放风坐在门外，她周围站满看押的人，他们不允许我们靠近，不允许妈妈和我们讲话，我们只敢远远地盯着妈妈看，低声哭泣着，只有 4 岁的小妹会不懂事跑到关押窗下，怯生生地对着窗子喊“妈妈”。幼年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虽然当时充满恐惧，但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父母是特务。

半年后妈妈被放回家了，一年后爸爸也放回家了，但被关押一年之久的父亲身体彻底垮掉了，从此他闭门谢客不与任何人往来。有人劝他到外地休息，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疑虑，也为了不牵连任何人，他谢绝了，一边治病一边把精力放在抓我们姊妹学习上。记得当时我正上小学四年级，数学四则应用题搞不清，父亲耐心讲解，并教我用“作图”来分析列式，使我彻底弄懂当时“工程”、“追及”、“鸡兔同笼”等类型数学习题，以致后来学习中许多难题都是采用父亲教的解题方法解决的。另外爸爸要求我们课本上的课文篇篇要会背会默，直到初中再长的文章都要如此，除此而外还选择一些散文要求会背。当时我并不能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内心十分抵触，开始也挨了不少“打手心”（但大了父亲从未打过我），可是后来渐渐发现有了收效，背书、背文章技能渐渐彰显出来，作文水平大大提高，即使其他功课再差，但作文一直十分出色，同时也大大提高我的理解能力。但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不能体会到这些，由于父亲的要求过于严厉，我开始怕他，对他敬而远之。

1958 年夏天我们随父母来到黄河三门峡，尽管当时父亲已失去党的信任及重用，仅分管工程质量及苏联专家工作，但他依然忘我地投入工作，平时都住在大坝指挥部，只有周末才会回家一聚。记得截流阶段数月都未踏入家门一步。当时正值“大跃进”狂热阶段，提出多、快、好、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贪功一味追求速度，大坝浇筑中竟出现空洞，有的空洞竟然大如牛背。父亲冒风险在会议上强调质量第一，他强调“多、快、好、省”应把“好”字放在第一位，否则这是自欺欺人，皇帝的新衣。在那个很少有人敢讲真话的年代，讲真话的结果是把自己推上“反右倾”斗争的浪尖之上，父亲被作为“右倾”代表被批斗。记得当时父亲房间的灯几乎天天亮到天明，每天烟蒂能有半痰盂，家中的空气又变得异常沉闷。我们隐隐知道爸爸又倒霉了，又挨整了，惊恐厄运又会降临我们家，我们个个小心翼翼，尽量不要惹爸妈生气。所幸的是因为中央有关领导的干预，逃过这一劫，批判中止。事实是 1955 年被整时，有关领导虽当面表示没什么已查清，但在父亲档案中塞上一条“政治嫌疑，责成专门机关长期审查”，实际在政治上已宣判了死刑，因此父亲曾哀叹：“你们这是毁了我的一生！”也正因如此父亲永远都会处在党内斗争的漩涡中心，任何运动都将首当其冲成为斗争的对象，失去党的信任，空有抱负、满腔的激情都将化为泡沫。我想这一次的挨批对父亲的打击是致命的，彻底扑灭他希望的火星。父亲的病加重了，已发展成阻塞性肺气肿，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妈妈陪父亲去北京看病，离开我们几乎又近一年。

后来全家移居镇江，父亲母亲彻底闲居在家。家中所居是一所破旧的民宅，一厅四居，一个不大的前天井和一个小小的后院。为了改变居住条件，父亲把天井和后院水泥地凿石运土，植树、种菜、养鸡，天井竟修了个小花圃，种植月季与芭蕉，后院栽种葡萄，一个破落的小

院被父亲收拾得别致有加，使所有来客都能为之眼前一亮，记得芭焦竟长得高至屋沿。爸爸称之为“留得芭焦听雨声”，从中也使我能看到父亲的另一面，对生活的热爱和兴趣的高雅。除了劳动、学习、看书、练字，父亲把精力完全放在我们孩子身上，他不仅抓我们的学习，并教会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甚至连我们交友、言谈举止、待人接物都加以引导。他要求我们为人要正派，待人要真诚，举止要大方得体，同时教育我们几个女孩子要自尊、自重、自爱，要有点矜持，言谈要稳重，切忌轻浮。

“文革”初期的父亲以他敏锐的政治头脑及独特的见解，把我们都叫回家，甚至让我大哥把在北京的弟弟叫回家。爸爸语重心长地问我们：“你们是在革谁的命？造谁的反？”不准我们去参加打、砸、抢，全部呆在家哪儿都不准去。在那疯狂的年代，我们没有参加任何一次抄家行动，也未写过任何一张检举大字报，干脆都彻底成了消遥派。“古文观止”中许多优秀文章及“唐诗”、“宋词”许多优秀诗词都是在这个时期学习的。在父亲的指导下我的小妹练习魏碑体书法。可惜好景不长，当时形势不可能有世外桃源，经常有造反派及身份不明的人手持匕首抄家威胁。考虑当时社会形势十分乱，1968 年 1 月 15 日爸爸妈妈投奔西安姐夫家。但当革委会成立，秩序稍稳，尽管当时母亲肺炎刚痊愈，而父亲正值肺部感染发高热时期，仍主动于 9 月 24 日回到镇江，下车即被送至医院。10 月 4 日热度稍退就被关至 27 军炮连军营。因父亲尚在病中，开始时允许家中每日送一次饭菜。爸爸十分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在关押最困难的日子，他每天偷偷记述自己的历史，利用我们送饭探视的机会，一点点地带出来，让我们子女了解他忠诚耿直的为人，了解他顽强战斗的一生。看了父亲的自述，从心底感到震撼，也深深为之不平，从中能读出爸爸慷慨激昂背后的辛酸无奈与悲凉，我们为拥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一定要让爸爸活着走出来！当时许多干部子女和父母划清界线或吓得躲在一边，但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在关押和干校时的干部中只有父亲是唯一有子女前去探望的人。

关押中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压力多大，父亲从不会为求自保而乱咬乱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因此造反派大为恼怒故意报复。1969 年的夏天，无气异常炎热，但关押父亲的斗室门窗紧闭，窗户全用木板钉死，毫不透气，闷热难耐，而左邻右舍均拆除木板准许透气，唯独不给父亲拆板开窗透气。父亲多次提请，虽表面应允，但不见动静，父亲无力拆除木板只好用凳子敲碎气窗玻璃以求透气。闻迅而来酒气冲天的排长不听父亲解释喝令父亲罚站，父亲生性刚烈怎能受此侮辱，坚决不从，当时排长命令战士拖打最后拽着父亲双腿倒拖至室外置烈日下暴晒直至深夜。父亲绝食数日以示抗议，由于拖行拽拉致使父亲腰及身上多处受伤，疼痛数月，后排长向父亲道歉，父亲原谅了他（这件事父亲从未谈起，事后从其他关押难友口中得知，当天夜里关押的干部都是不眠之夜，大家都竖起耳朵听动静，为父亲担心）。后来 27 军调防，所有干部都转至干校，专案组却把父亲一人关在监狱，后又转押在镇江工纠队。一连数月我们都没有父亲一点消息，直至父亲病危，高烧不退生命垂危，专案组才允许我们子女前去探望。当我们看到父亲时都惊呆了，几乎认不出他来了。看到形容枯槁、骨瘦如柴、濒临死亡的父亲时，先是惊愕继而我们姊妹几个都围着父亲忍不住嚎淘大哭。当时看守的老工纠悄悄对我们讲：“你们快想办法把他弄走吧！这里是关押现行犯的地方，带惩罚性质的地方，年青的关三五天都吃不消，更何况他这么大年纪。”我们回去连夜写申诉，直送省革委会主要领导，四处奔波，在有关部门的干涉下，镇江地委专案组才不得不把父亲从工纠队放出，转送至句容五七干校。到了干校境况有所改善，父亲被允许在句容城自由活动，但不允许离开句容，不允许回家，子女可以前来探视，但必须持专案组介绍信。从长春赶回来的哥哥陪着父亲洗浴理发并秤了体重，当时父亲体重只有 120 斤，父亲身高 1 米 80，原体重 180 斤，当时可以说是皮包骨头，骨瘦如柴，也许是他坚强信念支撑着他活了下来，使他从鬼门关又捡回一条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干部虽多未解放，但是都被允许节假日周末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了，

唯独父亲不可以，获得去探视的介绍信真是难上加难，百般刁难，推三阻四，借故扯谎躲避，训斥呵斥是常事，因此能得以见一次父亲的机会我们是万分珍惜。1970 年夏天一天凌晨我揣着介绍信买票，谁知因修路当天去句容春城汽车停运，没办法只好买一张去金坛的票，到了金坛边走边打听，从早晨 8 点一直走到下午 4 点终于走到春城，又热又累没讲两句话倒在父亲铺上睡着了，因为当天还要往回赶，父亲虽不忍叫醒我，但还是将我叫醒，睁开眼我看见父亲竟然老泪纵横，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哭泣，这也使我看到父亲内心世界柔情的一面，父亲的泪至今令我无法忘怀。

“文革”中无论关押或是在干校期间，只要允许通信，父亲每隔数日就会写信给我们，几乎每封信写得都那么动情，和我们谈写作、谈生活、谈学习……他把对自己儿女的牵挂都凝注在字里行间，丝毫不见他失去自由的凄凉与困苦。最令我感动的是，他把容易混淆及易读别音的字都归纳出来写在手纸上，厚厚一迭捎给我，帮我纠正错别字的毛病。“文革”后期许多信件都烧毁了，但这迭用手纸自编“字典”我一直珍藏家中，如今虽字迹变淡了，但每次看到它时我都为之动情，因为从中我能深深体味到父亲的关心和爱。

1971 年初冬在我们四处奔波，到处申诉努力下，关押 3 年的父亲终于回家了，全家终于可以团聚了。而当时弟妹们都已下放农村劳动了，只有我因“文革”中右肾被造反派踢伤未下放，父亲再三告诫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不要自暴自弃，都不要丢掉已学过的功课，要利用一切时间自习，多读书，学习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知识面，也可以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可惜的是当时并未听父亲的话，在恢复高考时我因结婚并有了孩子，拾起丢弃多年的功课已迟了，我未能参加高考，匆匆复习只考上脱产三年半的常州建工大学，但父亲依然鼓励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只要努力一样可以有成。后来真如父亲所言，毕业后我在常州天宇建筑设计院搞建筑设计，成为建筑师，也为自己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我设计的常州“红梅农贸市场综合楼”竟获得优秀设计三等奖，我的大姐吴克利是全国知名肠胃道专家，大哥吴克坚是东大口碑很高的教授，屡得国家和省的成果奖，弟弟吴克强是江苏省秦淮河水利工程管理处工会主席，小妹吴玲原是南京印染厂印花技术副厂长，我们兄弟姐妹都十分优秀。

20 多年来父亲一直要求对他的一生有个公正的评价，但由于他的不圆滑分是非明爱憎，鄙视投机分子、政治商人，摒绝势利之交，断不与蝇营狗苟、欺世盗名之徒为伍，在党的利益面前敢于直言，惹来灭顶之灾。他有非凡的才华也常因此遭小人嫉，多年来他承担了屈辱和误解。1978 年父亲的历史问题终于彻底平反了，并出任省政协副主席。父亲难掩兴奋之情，立刻写信告诉我们，看到父亲的信我几乎痛哭失声，这封信我至今仍珍藏在家。整整 24 年，父亲终于等到这一天，我为父亲高兴同时又难掩悲愤之情，比起那些冤屈致死的人父亲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历史还以本来面目。

1979 年夏末父亲来信告诉我组织上分配他去南工，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我们兄弟姐妹都从心底不赞成父亲再出来工作，因为当时身体状况并不适应再去工作，但他仍然那么执着，依然那么无怨无悔，这也是我们这代人所无法理解的。在给我的信中他那么动情地倾诉自己 24 年渴望为党工作的心情。遗憾自己蹉跎人生最宝贵的 24 年，他愿意尽自己全部力量站好这最后一班岗，抒发出他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我们只能为之动容，谁能加以劝阻呢！

父亲到了南工，他是抱病受命，虽年老病弱但依然如前废寝忘食，又成了拼命三郎。当时正处“文革”刚刚结束，派性斗争依然激烈。南工仅在父亲到任后不到一年就召开党代会（当时在大专院校是第一个），一切整顿井然有序，一切走上正规。他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即使在病床上也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有关事宜，有时可以说是一批又一批人，而饭菜热了一次又一次，家中的大门永远是对南工所有干部群众敞开的，无论谁来父亲都是认真倾听，极力帮助解决。也正因如此，1984 年 4 月原本已康复，但因来谈工作几个同志患流感，使父亲再次感染，突然恶化而离世的，他是用生命的代价出色地站好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班岗。对于父

亲来讲可能无怨无悔，完成了他最后的心愿，但对于我们子女及活着的亲人来讲，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痛。父亲的一生虽是壮美的，但也是悲苦而令人心酸的。假如他不去工作，休闲在家他不可能那么早逝，毕竟才 72 岁，该享福了，可是一天福都没享就离去了。每每想起父亲的一生，我总觉得他太苦了，付出与回报是那么不平衡，父亲去世后，这个心结一直纠结在我的心底。

但是在帮助整理父亲的自述等材料的过程中，翻看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的回忆录及追忆文章，尤其看到陈克天老写的一篇《吴觉的侠肝义胆》中一段话“……总感到我们对吴觉同志的宣传太少了，与他一生的功绩很不匹配，我已年逾 90，但想追忆吴觉、宣传吴觉、弘扬他的业绩和美德，让下一代子孙铭记，而不要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疏忽而湮没这么一位忠诚优秀的革命家”。陈老时年已逾 90，还能留下这篇文章，这些话不能不使我感动和欣慰，尤其淮安市党史办准备出版父亲的纪念文集，使我释然，使我深深体会到父亲虽然离开我们 30 年，但往事并不如烟、历史自有公论，和你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没有忘记你！淮海人民没有忘记你！历史将永远铭记你及无数先烈们！人生虽短暂，但你的革命精神常在，事业永存！父亲，安息吧，你的女儿永远思念你！

专题

吴觉与淮河大队

柳宏为

在抗日烽火燎原的淮海大地上，在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伟大战争中，涌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纵横驰骋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是因领导著名的淮河大队而作出杰出贡献的吴觉同志。

吴觉英勇抗日之举，是从他积极参与发起和成立抗日同盟会与组建淮阴抗日义勇队开始的。1937 年 12 月底，吴觉、谢冰岩、宋振鼎、夏如爱、李干成、陈书同、赵心权、孙存楼等人

聚会淮阴城，决定成立苏北抗日同盟总会。1938 年 2 月初，苏北抗盟总会在淮阴城成立，吴觉为七位常务理事之一。

1939 年 2 月间，中共苏皖特委派张芳久、高兴泰和戴曦三同志，在朱慕萍、陆亚东的带领下，来到了淮涟，张芳久到了涟水后即转到淮阴，与吴觉接上了关系。吴觉、谢冰岩与张芳久讨论了当时的抗日形势。

1939 年农历正月十一，从徐州过来的和在连云港登陆的日军，在毫无阻击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侵入淮涟诸县，韩德勤的二十四集团军及国民党省政府的机关人员连夜全部逃离淮阴城。吴觉、张芳久在日军占领淮阴前星夜赶往渔沟，起取枪弹，拉起武装。早在回淮阴初期和开展苏北抗盟活动期间，吴觉即从友人张国权手中买下枪支，托夏仲芳、谢冰岩、李可宜等朋友密购枪支弹药，藏于渔沟镇老宅，以备日后打游击之用。同时，吴觉趁为父亲安葬、在老家守灵的机会，利用亲戚关系和拜师收徒的方法，策动、掌握国民党地方部队的一个连队。因此，吴觉、张芳久星夜到渔沟后，将贮存在那里的二十来支长短枪及自己家中与亲族中的自卫枪支集中起来，武装了族中的附近的贫苦子弟，组织有 60 人以上的队伍。接着又拉出了国民党渔沟区常备中队、洪泽湖残留下来的抗日模范队等。此时，张芳久代表党组织正式宣布组成淮阴抗日义勇队。吴觉任总指挥，张芳久任参谋长，谢冰岩任秘书长，宋振鼎为政治部主任，张一平为副官主任。

由于国民党淮阴县政府的武装逃离淮阴，张芳久与吴觉认为，这正是抓紧时间拉武装的绝好机会。因此抗日义勇队总指挥部的牌子一打出来，全县各地各种小股武装纷纷前来请委。在抗日义勇队的统一番号下，委了不少“支队”、“大队”。一时间，抗日义勇队的旗帜遍及淮阴各地，为打击驻淮日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义勇队正式成立不久，即有日军的一个车队经渔沟奔淮阴。得到消息后，义勇队的一个中队便与地方抗日武装李可拔的队伍配合，于渔沟东的五条路布阵，伏击了敌车队，打响了淮阴人民抗击日军的第一枪。接着，又派兵袭扰日军的王营据点，使日军恐慌万分，机枪小炮乱射狂吼了整整一夜。这次袭扰，打击了日军在淮阴的嚣张气焰。

1939 年 6 月，根据苏皖区党委的指示，苏皖三地委副书记张芳久将淮阴、涟水县抗日义勇队和淮安民众自卫队在涟水成集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代号淮河大队），由张芳久任党代表（7 月下旬，张芳久在淮阴县渔沟遇害，即由万众一任政委），吴觉任团长，陈书同任副团长，夏如爱任参谋长，高兴泰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陈亚昌、林士钧任副官处长。第八团辖三个营，第一营营长朱慕萍，教导员王国干。另设宣传队和随营学校。宣传队的主要任务除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外，还负责部队驻地的妇女工作；随营学校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地方培养干部。第八团成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于 8 月间西进淮阴渔沟、五里庄一带活动，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抗日，同时，清剿匪伪，为民除害。第八团的活动使敌顽大为震慑，他们妄图采取极其卑劣手段搞垮这支武装，一方面由国民党特务骨干分子组成一个飞行大队，企图封锁陇海线，割断第八团与山东主力联系，一方面指使地方土匪、国民党顽固派杀害第八团领导人。1939 年 7 月，第八团党代表张芳久去淮涟检查工作时，路宿淮阴渔沟小潘庄，遭到顽匪的暗害。张芳久，西安附近人，他到淮阴的时间虽不长，但对淮涟地区抗日武装的组建和党组织的重建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把自己的青春无私地奉献给淮阴的抗日斗争，连自己的籍贯和年龄都没有留下，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随着日伪顽夹击的局势进一步形成，苏皖三地委指示：部队必须迅速扩大，建成一支可以对付国民党一个县的武装力量的队伍，以便随时驰骋、跳动、穿插，旋转于苏北各县。根据三地委指示，第八团迅速跳过盐河，去涟东争取薛华甫部参加八路军。薛华甫部挂的国民党招牌，但同情支持抗日，且与国民党涟水县政府发生矛盾。再加上事先派人做了大量工作，薛华甫部于 11 月在涟东改编为第九团，薛华甫任团长，王国干任政治部主任。12 月，鉴于形

势紧迫，苏皖三地委先后将第八、九团以及薛味五、潘景澜为首的涟水边区游击队合并于涟东瓦滩、后皇圩一带，组建“八路军苏皖纵队南进支队”（1939 年 9 月，江华率部南下，山纵南支即改编为苏纵南支）第三梯队，对外仍叫淮河大队，梯队长吴觉，副梯队长薛华甫、陈书同，政治委员万众一，参谋长林士钧，政治部主任高兴泰，秘书长谢冰岩。下辖第八、九团，陈书同兼第八团团长，副团长陈克天，政治处主任王国干；薛华甫兼第九团团长，副团长万金培，政治处主任周文科。

淮河大队成立后，迅即挺进滨海县陈家港一带，以便建立海陆两栖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当部队刚开进该地区小尖镇时，即遭绥靖团、灌云常备队及涟水恶霸武装的拦击。为了避免摩擦，部队决定乘夜撤返。1939 年 12 月 31 日晚，部队进至韩庄、小兴庄一带宿营，与尾随的涟水常备队徐继泰部遭遇，激战竟日，击退了顽军的进攻，俘 30 人，缴获步枪 27 支。当夜，部队顺利渡过盐河，进入涟西地区，在部队活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一面尽量避开与顽固派的摩擦，一面努力捕捉战机，打击日伪军。

1940 年春节前夕，涟水城的数百名日伪军开动车队，耀武扬威地进入淮河大队的活动区的涟西，经陈师庵到梁岔一带。沿途杀人放火，抢劫财物。为保护群众，过好春节，淮河大队当即派出第八团朱慕萍营划成若干游击小队，利用密集的村落灵活运动，进行阻击、尾击、侧击。2 月 9 日上午，淮河大队在古（寨）城（涟城）公路与漳河交汇处的洪码头布下口袋阵，出敌不意，痛击回归之敌，激战数小时，共毙伤日伪军 100 余人，第八团第四营营长王道明以下指战员 15 人英勇牺牲。这次战斗，打击了敌伪军的嚣张气焰。1940 年 3 月上旬，为了摆脱国民党第三十三师两个团的堵击尾追，淮河大队移驻六塘河一带，并向西北沭阳一带行动，佯作去山东之态，意将顽敌引向西北，然后淮河大队隐蔽返回涟水东渡盐河，窥机反击敌人。当他们移驻沭阳境内钱集马庙一带时，遭顽王光夏率常备第七旅 3 个团并纠集淮阴、涟水、泗阳的反动地方武装共二三千人包围。经过一天激战，淮河大队利用夜间分几路突围成功，胜利返回淮涟地区成集、朱南荡一带集结。此役，淮河大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十多个干部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为了对付顽韩德勤部的全面“清剿”，坚持原地斗争，淮河大队决定暂时撤销团、营一级，把部队编为若干小队，分散隐蔽活动。大队部率第八团在淮阴北乡和涟西一带活动，第九团在涟东、淮安北乡活动。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以第三十三师的一个旅和常备第七旅为主力，搜寻求歼淮河大队，并以 7 个县的反动地方武装防堵拦截，同时到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捕淮河大队领导成员；胁迫一些军属到部队“规劝”、策反。面对逆流，第八、九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敌占城市周围的空隙和在自然河流的附近盘旋兜转，随时打击镇压地方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从而使他们不敢附和敌人，客观上起到了稳定活动区局势的作用。

经过半个多月反“清剿”斗争，淮河大队在残酷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保存了革命力量，保卫了刚刚重建的淮海区党组织，扩大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影响，受到了苏皖区党委的表扬。不久，他们根据华中局关于坚持原地斗争，积极准备迎接主力东进的指示，迅即集中和充实部队，恢复团的建制，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千余人发展成为近 5000 余人的一个旅的规模，为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东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起了接应的重要作用。对此，谢冰岩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黄克诚、金明等同志说过，主力进入淮海兵不血刃，淮河大队起了很大作用。”

——试述吴觉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开辟所做的贡献

成静

胡尘蔽海欲遮空，淮大旌旗雨夹风。

父老于今犹乐道，缨枪乌铳踵吴公。

这首诗中的“吴公”即抗日战争时期淮海地区杰出的领导人吴觉同志。吴觉于 1912 年 4 月 1 日生于淮阴渔沟，中学就组织过学潮，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革命活动，被视作“赤色分子”。从 1930 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四次入狱，两次进反省院，第四次还几乎判了死刑。在家庭的营救下，吴觉于 1937 年 7 月 5 日获释出狱。九死而未悔的吴觉，面临着民族的灾难，他渴望组织，向往延安，但“为了对革命的作用更大些”，最终决定留下来打游击。自此，他执着于淮海区这块光荣的土地，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阻拦，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抗日群众团体、领导抗日地方武装，在党的主力部队到来之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团结进步青年，发起和成立抗日同盟会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至 1937 年底，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失守。以韩德勤为首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1937 年秋就由镇江北迁淮阴城，淮阴成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整个苏北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韩德勤不积极抗日，而是招兵买马，扩充个人的派系势力；地方上的一些封建势力、土匪、兵痞、流氓，也趁机相互勾结，为虎作伥。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新形势下，韩德勤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淮阴和整个苏北人民的不满。卢沟桥事变前两天从反省院释放的吴觉回到家乡后，联系到同一时期从国民党监狱、反省院出来的李干成、谢冰岩、夏如爱等人及淮阴、淮安、涟水各县的爱国青年，利用串连、谈心、集会、街头讲演等方式，宣传日军在东北、华北、上海的暴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家乡。苏北抗日同盟总会骨干陈扬在工作报告中这样描述：“他们用铁的事实从各方面说服了淳朴的农民，使沉寂很久的苏北农村开始传遍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广大的农民是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了，一队一队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抗日的情绪如烈火般地燃烧着，他们是随时准备着和日军作武装斗争的。但是，这样的工作还是散漫地个别地进行着。因此，既有必须，也有可能成立抗日救亡团体，把这些分散的力量组织汇集起来。”通过商议，大家决定筹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即苏北抗日同盟会。在筹备过程中，吴觉积极奔走和活动，先后找到国民党县当局、省党部，要求给予其合法地位。在获得国民党当局批准的路走不通后，他利用父亲的关系，找到江苏有名的士绅、原上海名律师朱德轩（淮阴人），在其引荐下，与谢冰岩一道北上徐州，得到了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尚方宝剑”。1938 年 2 月 19 日，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在淮阴成立。宋振鼎为理事长、谢冰岩为秘书长，吴觉为七理事之一，并作为抗盟的骨干，负责各县动委会青年的组织培训工作。他在涟水县灰墩、金城庵举办两期干部训练班，每期三四十人，设置的课程

有抗日民众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等。此外，他还与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第六六七团(万毅团)学兵队中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取得联系，从淮(阴)、淮(安)、涟(水)、泗(阳)地区发动百余名青年到学兵队受训，为淮海地区抗日斗争培养了一批年轻干部。

除了组训工作外，吴觉还担负着为苏北抗盟活动筹措大宗经费的重任。苏北抗盟是个群众团体，不收会费，交通、印刷、出版、活动等几宗大的开销，仅靠同盟会中十余名脱产干部补贴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解决经费来源问题，吴觉毅然将父亲的积蓄加上岳母的存款作为资本，做起盐的生意，经营的收入全部用来购买枪械弹药，出版发行书籍。当时同盟会靠着吴觉的补贴，筹建了苏北出版社，翻印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战形势的文件和游击战术的材料，发给会员阅读。还翻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号召抗战的宣言近万份，以及数千册抗日救亡文献单行本和抗日救亡歌曲选，散发到城乡，从而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

国民党当局对苏北抗盟的发展十分恐慌，几次三番邀请吴觉等人谈心、吃饭，意图拉拢、收为己用。吴觉看出他们是别有用心，拒绝与国民党江苏地方当局合作。1938 年 10 月，韩德勤以不符合《江苏省民众组织条例》为由，宣布抗日同盟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还下手谕逮捕苏北抗盟总会理事夏仲芳、张一平，通缉吴觉等抗盟骨干。在此情况下，苏北抗盟总会经过讨论商定：为了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抗盟组织不再公开领导民众抗日斗争，而采取隐蔽活动方式。

二、领导抗日义勇队，打响淮阴抗日第一枪

吴觉等人在积极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团结起来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外，也迫切希望得到党的领导。陈书同、李干成等人先后外出找党，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共苏皖特委终于派张芳久等三人来到淮属地区领导、开展党的活动。1939 年 3 月 1 日(农历正月十一日)，从徐州过来和从灌河口登陆的日军，在毫无阻击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侵入了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部及江苏省政府机关连夜全部逃离淮阴城。在一片混乱之中，吴觉将以前秘藏于渔沟老宅的枪支弹药拿出来，武装了自愿参加游击队的农民，并争取了国民党渔沟一个常备中队，还把国民党的四五十个散兵游勇组成了一个中队。另外，洪泽湖畔在徐州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时留存下来的五六十个渔民抗日武装也北来投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张芳久、吴觉等汇集了 4 股抗日民众武装，人数达 200 多人。经过商议，决定组成抗日义勇队，并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在张圩设立总指挥部，吴觉任总指挥，张芳久任参谋长，谢冰岩任秘书长，宋振鼎任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导大队，在蒋祠堂进行集训，教导大队长夏如爱、副大队长陈克天。从此，淮阴人民拥有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抗日义勇队成立后，吴觉率领着淮海健儿周旋于日伪顽之间，“经常日伏夜出，灵活跳动，常夜行七八十里，穿插于淮海、盐阜两个地区，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9 年 3、4 月份，抗日义勇队在渔沟东五条路布阵，伏击日军车队，打响了淮阴人民抗日的第一枪。接着，夜袭日军的王营据点，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6 月，根据苏皖区党委的指示，苏皖三地委副书记张芳久将淮阴、涟水县抗日义勇队和淮安民众自卫队在涟水成集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由张芳久任党代表(7 月下旬，张芳久在淮阴县渔沟遇害，由万众一任政委)，吴觉任团长，陈书同任副团长，夏如爱任参谋长，李干成任政治部主任，高兴泰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营，另设宣传队和随营学校。八团成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于 8 月间西进淮阴渔沟、五里庄一带活动，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同时，清剿匪伪，为民除害。第八团的活动使敌顽大为震慑，他们企图搞垮这支武装，派了国民党特务骨干分子组成一个飞行大队，企图封锁陇海线，割断第八团与山东主力的联系。

韩德勤在铲除了东灌沭地区坚持游击斗争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后，也把矛头对准八团，想要消灭这个心腹大患。他散布谣言说其冒充八路军，同时地方顽固派也策划组织淮、

涟、泗、沭等县武装发动联合攻击。八团陷入到敌人的包围圈中，孤军奋战，情况危急，团里盛行一股悲观情绪，许多人认为无法坚持下去，主张跳过铁路与八路军南进支队汇合。吴觉同这些悲观情绪做了斗争，他指出现在日本占领城市及主要交通线，八团可以利用这个特点穿插跳动，击败围剿。大家最终采取了吴觉的主张，决定跳入盐阜区活动，扩大活动区与回旋地带，另外说服涟东的薛华甫部加入八路军，迅速扩大部队，建成一支可以对付国民党一个县团的武装力量。薛华甫部虽挂的国民党招牌，但本人支持抗日，而吴觉事先已派人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他在与薛华甫见面商谈时，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及苏北敌顽我三方斗争趋势，点明利害关系，争取到薛的信任和同意。薛华甫部于 11 月在涟东改编为第九团，薛华甫任团长。12 月，鉴于形势紧迫，苏皖三地委先后将第八、九团以及薛味五、潘景澜为首的涟水边区游击队合并于涟东瓦滩、后皇圩一带，组建八路军苏皖纵队南进支队(1939 年 9 月，江华率部南下，山纵南支即改编为苏纵南支)第三梯队，对外叫“淮河大队”。梯队长吴觉，副梯队长薛华甫、陈书同，政治委员万众一，参谋长林士钧，下辖第八、九团，陈书同兼第八团团长，薛华甫兼第九团团长。

三、坚持敌后斗争，配合八路军开辟淮海区

淮河大队成立后有 500 多人，虽然不算多，但却是个精悍的队伍。战士主要来自学生、小学教员和有点觉悟的青年农民，有一定的文化，思想觉悟比较高，大家都是冲着抗日而来，凝聚力很强。部队中个个都是战斗员，作战时人人都能上战场，连文工团的宣传员也是一人一枪。这支部队在吴觉的率领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面尽量避开顽固派的摩擦，一面奋勇打击日伪军。

1940 年春节前夕，涟水城的数百名日伪军进入淮河大队活动区的涟西，经陈师庵到梁岔一带，沿途杀人放火，抢劫财物。为保护群众免遭日军骚扰，过好春节，淮河大队当即派出第八团朱慕萍营分成若干游击小队，在敌人扫荡的两侧及首尾进行麻雀战，进行阻击、尾击、侧击；2 月 9 日上午，淮河大队在古(寨)城(涟城)公路与漳河交汇处的洪码头布下口袋阵，出敌不意，痛击回归之敌，经过激烈的战斗，共毙伤日伪军百余人，取得洪码头战斗的胜利。这场战斗后群众对吴觉率领的淮海大队更加支持拥护，对国民党则痛骂其没用，见到鬼子只会逃跑。这激起了韩德勤的嫉恨，他派出国民党三十三师的一个旅和常备第七旅为主力，搜寻求歼淮河大队，并以 7 个县的反动地方武装防堵拦截，同时到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捕淮河大队领导吴觉等人，胁迫一些军属到部队“规劝”、策反。面对逆流，淮河大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敌占城市周围的空隙和自然河流地形盘旋兜转，随时打击镇压地方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从而使他们不敢附和敌人，客观上起到了稳定活动区局势的作用。经过半个多月的斗争，顺利粉碎了国民党的大“清剿”，保存了革命力量，保卫了刚刚重建的淮海区党组织，扩大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影响，受到了苏皖区党委的表扬。

淮河大队在梯队长吴觉和政委万众一的领导下，坚持原地斗争，与敌反复周旋，屡战屡胜。他根据中原局关于坚持原地斗争，积极准备迎接主力东进的指示，迅即集中和充实部队，恢复团的建制，并进行扩军运动。三个月中，部队从千余人迅速扩展近 5000 人的一个旅的规模，为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接应作用。1940 年 8 月，黄克诚率八路军五纵东进淮海，在原来的基础上，顺利开辟了稳固的淮海抗日根据地。刘少奇同志曾说过：抗战时期金明从山东到苏北后，一大功绩就是放手使用了吴觉这一批从监狱和反省院出来的老同志，从而进一步打开了淮海地区的局面。在八路军一部主力开辟淮海区的进程中，淮河大队不仅起了重要的策应作用，成为第五纵队得力的向导，使主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由皖东北迅即东进淮海区，而且在第五纵队继续东进盐阜区的一段日子里，淮河大队肩负起接替主力，捍卫淮海区的重要使命。当时，纵队司令部仍暂留在沭阳县陈圩、钱集一线指挥。1940 年秋，驻淮阴日军乘主力东进之机倾巢而出，企图奔袭纵队司令部和苏皖区党委机关。驻守六塘河南岸的淮河大队第八团立即出动应战，先是阻击敌人于五里庄

至徐溜沿线，继则夜以继日地纠缠袭扰敌于南六塘河两岸，使敌人突然奔袭的阴谋破产。之后，在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的领导下，吴觉率部在淮涟泗一带剿匪。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吴觉领导淮阴县军民不但拔除了县境内日军的据点，恢复了被顽匪挤占的地盘，为主力培养了大量的兵力，还帮助邻县收复了失地。同年冬，根据中原局的决定，淮河大队第八、九团和以后成立的第十团，先后都上升为主力部队，一部拨归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大部上升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不久，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第三团，为主力部队增加了新鲜的血液和战斗力。

综上所述，吴觉在抗战时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阻拦，坚持留在苏北地方抗日，筹建苏北抗日同盟会，组织抗日义勇队，领导淮河大队，与日伪顽进行艰苦的敌后斗争，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到来之前，打开了淮海地区的局面，为党和军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为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吴觉为淮阴第二次解放所作出的贡献

刘波

根据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我军华中主力在宿北大捷后北撤山东地区，特别是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于 1947 年 1 月侵占沭阳和整编五十七师占领陇海路东段后，华中六分区主要城镇及交通线均陷入敌手，地区被分割，苏北与鲁南交通严重阻滞，六分区军民转入了艰苦的敌后坚持时期。此后，国民党军队集结重兵对六分区进行反复“清剿”，大量还乡团跟进，一时间各种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在此期间，吴觉先后担任六地委副书记和书记，带领全区人民，在艰难困苦的局面下，不畏强敌，勇于斗争，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一、大力开展武装斗争，打开敌后坚持新局面

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1947 年 3 月，苏北区党委成立，吴觉为委员之一，同时也承担了更为重要的工作——担任华中六分区副书记、专员。也就是在这个月，国民党在清江设立了以张雪中为主任的“淮海绥靖区司令部”，其集中兵力 7 万余众，对六分区进行全面“清剿”。面对极其残酷的严峻局面，吴觉领导各地方武装积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敌人点线之间灵活跳动，机智穿插，重点打击土杂武装，严厉镇压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不断打击、削弱敌人，坚持原地斗争。3 月 19 日，第三十五旅在淮海区第一支队配合下，一举拔除沭(阳)赣(榆)线中心据点万匹，恢复了第一中心县委根据地，重新沟通了苏鲁交通，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六分区人民的斗志。吴觉还要求各县武装主动出击敌人，宿迁徐华光游击队、沭阳民兵联防队、涟水余四海民兵队、淮阴二虎(指周文科、周文忠兄弟)游击队等各县武装在“就地坚持，分散游击”方针指导下，四处出击，拔除据点，消灭国民党土杂部队，在斗争中创造了“张网捕兔”、“黄狼拖鸡”、“引龟上钩”、“牵牛”、“掏心”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惶惶不安，从而积小胜为大胜，配合主力不断削弱敌人，为恢复地区作出

贡献。7 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苏北战场为我军南线重要侧翼战场，开始了“一面坚持，一面反攻”的战斗历程。8 月，万众一调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吴觉接任六地委书记，承担了更加繁重的任务。

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加强和统一华中地区党政军领导，华东局于 9 月 12 日决定组建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简称华中工委)，时隔一年以后，我党在华中地区又有了强有力的指挥机构，整个华中局势有了新的发展。在吴觉等人的一再呼吁之下，10 月，华中指挥部所属部队进入六分区作战，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第十一纵队于 18 日重克南新安镇(今灌南县城)，清除武障河等据点，歼敌 1500 余人，牢固控制了盐河线，第十二纵队于 25 日攻克五里庄、丁集据点，歼敌 2000 余人，收复淮(阴)沭(阳)路两侧 120 余里地区，从而打破了敌人对六分区的分割局面。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胜利。吴觉认为这是局势发展的一个新的标志，不容错过，他立即召开地委扩大会议，决定各县武装挺进敌区，开辟新区，提出“猛进猛出”、“猛打猛卫”，开展“掏心”战术。会后各地武装纷纷按月订出“杀敌立功计划”，掀起收复失地热潮。在一致向前进击的形势下，盐河线之敌龟缩涟城，不敢渡河西犯；淮阴、泗阳两县协同战斗，恢复六塘河南两个半区；西线则驱敌于运西，打通了淮北交通；北线之敌亦被压缩至陇海线。到了 1948 年，利好消息再次传来，1 月 15 日，六分区趁敌整编第五十一师南犯盐阜之际，集中三支队两个营兵力，一举拔除敌宿北中心据点陆沟。此战为恢复宿北创造了条件，同时有力地策应了南线的反“清剿”斗争，获华中指挥部通令嘉奖。6 月中旬，为策应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苏北兵团乘敌整编第二十五、八十三、七十二师西调中原战场之机，发起陇海路东段攻势，六分区地方武装积极配合战斗，解放了陇海路以南、沭新公路以东、通榆公路以西广大地区，歼敌总计 5500 余人，击毙敌灌沭联防指挥周法乾，打通了苏北与山东的交通。从此，六分区进入全面收复失地阶段。经过 7、8 两个月的攻势作战，先后收复了涟水、泗阳、泗沭、宿迁等县，至此，淮阴地区运河以东除淮阴、淮安两城尚为敌孤守外，已基本恢复，六分区与淮北区连成一片。

吴觉一贯主张发展革命武装，在他的主导坚持下，六分区在两年的敌后坚持中，培养了大批的主力，这一阶段中先后提升为主力的有两个建制旅、两个建制团及一个炮兵营。

二、开展土地改革复查和整党审干，为全区的解放打下坚实的群众和组织基础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和敌后坚持环境的好转，华东局和苏北区党委先后就土土改复查工作作出指示，土地复查运动在全区普遍开展。早在 1946 年中央发布五四土改指示后，吴觉就在六分区主持开展了土改工作，但由于当时的斗争形势紧张，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因而土改工作难以彻底和巩固。针对这次土改复查，吴觉认为：“我们的复查方针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摧毁封建势力，贯彻土地改革，消灭明分暗不分现象，使土地分配公平合理，使贫雇农均获得满意土地，纠正干部及少数农民多分土地、多分好田、多得果实、自私自利、脱离群众的富农路线的倾向，改造干部作风，以团结所有农民进行反蒋保田保饭碗斗争。”可以这样说，六分区的这次土改复查，既是对前次土改不足的一次修正，更是在新的方针指导下对土改工作的继续，因而工作量和政策性要求很高。

总体来说，这次复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组织干部公开进行民主检查，克服右倾思想，调整干部队伍，改善干群关系；然后组织贫雇农开展诉苦运动，挖穷根，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培养积极分子；进而发动和组织群众斗争地主、富农，追分浮财；最后调整土地，确立新的产权。在这一阶段，农民分得大量浮财，据淮阴、沭阳、东海、灌云、宿北 5 县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分得粮食 400 多万斤，牲畜近 7000 头，银元 14 万块。同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华中解放区进一步掀起了土地改革复查的高潮。华中工委在 11 月发出《关于彻底平分土地的指示》，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和压迫。六分区贯彻上级指示成立了新农会筹备委员会，新农会有领导土改复查、审查党员干部和监督党政组织的一切权力。土地复查全面进入平分土地阶段，运动更加广泛，斗争更加猛烈，即使在军事频繁的

边缘地区也不例外，斗垮了地主、富农，基本摧毁了封建制度。到 1948 年 8 月间，为迎接淮海战役，土改复查告一段落，这次土地复查使大多数农民平分了土地，群众的革命精神空前高涨。

在土改复查中也出现了一些过火现象，一些贫苦群众因为深厚的阶级仇恨对地主报复过重，有些地方的地主生活难以为继。对此，吴觉发出指示，要求坚决制止这一过火现象，他要求："在贫雇农得到满意土地后，另一方面使地主能生活下去，不至于陷入绝望，不完全使地主走向敌对，使他们能生活下去，给以适当的照顾"，进而提出"对地主富农的鳏寡孤独，过去没有照顾的可以适当照顾，但要经过群众讨论"。正是由于吴觉的正确指导，六分区的土改复查大体平稳进行，贫雇农和富农地主各得其所，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

在土地复查运动的同时，六分区还按照上级指示进行了整党审干运动。整党审干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把党内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和流氓投机分子清除出党，以纯洁党组织。1947 年 11 月 10 日，中共华中工委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自上而下，从高级到低级，从干部到党员开展'三查'运动，务求在党内清除地主、富农思想，保证各级领导机构的纯洁性"。据此，吴觉要求六分区各县的新农会筹委会对各级政府和干部实行监督，运动中党的组织及各类革命组织均加以整顿，清除了阶级异己分子和流氓地痞分子，一大批贫雇农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和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整个干部队伍的阶级成分发生了显著变化。在 1947 年 7 月以前，贫雇农成分的干部在各县委委员中占 7%，区委委员中占 30%，乡干部中不足 50%。通过整党审干，到 1948 年夏，贫雇农成份的干部在县委委员中达 21%，区委达 43%，乡干部达 70%。在整党过程中，吴觉有一个对六分区党员干部情况的基本判断，他认为经过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自卫战争时期的考验，六分区的党员"在艰苦残酷生死的斗争中锻炼出来了"，"干部收到了战争的考验，政治上都是坚定的，党的方针通过了基层干部是基本上完成了的"。因此，六分区通过大力发展贫雇农入党而很好地完成了整党审干工作。通过整党审干，广大党员受到了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转变了思想作风，纯洁和健全了党及其他革命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为尔后的战略决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三、配合主力作战，全力支援淮海战役，取得最后的胜利

淮海战役发起时，淮阴地区成为华东战略决战主战场的一部分(西北部)和重要侧翼战场，历史再次赋予淮阴人民以重任。为保障淮海战役的胜利，1948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华北、中原党政领导，"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以实现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于长江以北的战略计划。11 月 13 日，中共华中工委、苏北军区、华中行政办事处联合发布《支前总动员令》，号召华中全体党政军民紧张地动员起来，一切为了前线。22 日，成立了淮海战役华中支前司令部。翌日，六分区支前司令部成立，华中第六地委书记吴觉、第六行政区专员章维仁分别兼任政委和司令员。与此同时，各县也相继成立了支前总队部，区、乡分别成立支前大队和中队，均由同级党政负责人担任领导工作。"一切为了前线"，"支前第一"，支前成为地方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广大农民踊跃参加支前，几乎所有青壮劳动力(包括部分妇女)都编入了为期半年的常备支前队，随时应调，脱产服务。年老体弱者则随时准备参加临时支前任务，许多后勤任务，如磨面粉、做军鞋、看护伤员都是群众在家里完成的，真正做到全民全力支前。

由于淮阴地区西北部即是正面战场，东南部又紧连盐阜和苏中，是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不但要征集、囤存、加工和运输本地区的粮草等军需物资，运送护理安置伤员到后方，而且还要转运盐阜、苏中地区的支前物资，任务尤为繁重。吴觉要求各地党政主要负责人领队，共产党员积极带头，因此，上级布置的各项支前任务都是按时超额完成。1948 年 12 月，华中支前司令部要求六分区组织 3000 副担架，在 4 天内到达宿迁泰山集，赶赴前线运送伤员。

接到命令后，吴觉要求各县立即筹集担架，以县为单位集结运送。涟水县支队率先到达，任务是担架 600 副，实到 620 副。民工中有中共党员 500 名，占民工总数的 1/5。淮阴县支队任务也是 600 副，实到 612 副。第六行政区在淮海战役中，3 次组织担架共计 5724 副，担架队员总计 3528 万人。在战争前线，担架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抬着担架，长途跋涉，日夜兼程，运送伤员，百余里的路程，有时 1 昼夜要往返两趟。六分区组织的运输队，仅向皖北黄桥方向运输的民工就有 6.1 万余人，小车 4 万辆。各县至黄桥路程约三至五百华里，共计运粮 580 余万斤，超额完成任务 180 余万斤。在淮海战役中，淮海区 8 个县(宿北县地处前线不在内)共动员支前民工 35.6 万人，运粮 1800 余万斤，全区所有青壮劳力几乎全部参加了支前。

1948 年 12 日 2 日，驻守淮阴之敌得知独立第六旅南下淮阴城后，惶恐不安，弃城而逃，这样我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淮阴城，此后虽然敌军曾被迫回窜，在我独立旅痛击之下再次南逃。9 日，淮安城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样，两淮获得了解放，淮安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四、接管两淮，政权建设取得新成就

在淮阴城解放的当天，六地委书记吴觉即向华中工委提出要尽快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组织机构，领导各方面的恢复和重建。经华中工委批准，1948 年 12 月 2 至 5 日，苏北军区两淮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两淮市警备司令部、中共两淮市委和两淮市政府随之先后成立。吴觉任两淮市委书记兼市长，全面统筹政权的接管工作。首先是调整好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工商业，保证他们的正常营业。两淮市政府一经成立，即与驻清江部队一起召开商民代表会议，成立临时商会，组织消防小组，帮助维持城内秩序。商民们都响应政府号召，自动开门营业，城内秩序井然。这种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许多借此到城市打探消息的百姓，看到市场秩序井然，放下了原来惴惴不安的恐慌情绪，转而信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这为以后各种施政措施的贯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针对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惶恐不安的现状，吴觉与两淮市领导商定，以两淮市政府名义发出布告，实施宽大政策，明确宣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不予逮捕，解散国民党一切特务机关；欢迎外逃的地主、富农等回乡生产。这些措施的实施稳定了部分群众的恐慌心理，缓解了社会矛盾，也促成了一部分国民党人员的转化。

在实施宽大政策的前提下，对部分罪孽深重的匪特和反动分子，新生政权坚决予以镇压，对旧社会的的一些丑恶现象也予以取缔。1949 年 1 月，两淮市公安局先后粉碎了淮阴县龙爪区刀会千余人的暴动等多起反革命事件，组织干警检查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特务人员的登记、居民户籍登记，并接连下发禁止赌博、吸毒的禁令，确保了两淮地区社会治安的稳定。

在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后，吴觉等人又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上。在当时基本无借鉴经验的情况下，吴觉等摸索着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活跃了市场和经济。首先是恢复王营、西坝和杨庄盐场的生产，贷款华中币 500 万元给失业工人做资本，成立了西坝织席生产合作社。为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又先后发布了豁免部分营业税和产销税的布告，制定了《出口货物暂行管理办法章程》、《进出口货物税征收暂行章程》、《货物产销税暂行章程》和《营业税征收暂行章程》，使得市面上很快出现了正常买卖、日渐繁荣的局面。

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两淮市党委和政府顺应民意，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吴觉深知教育的重要，他曾在市政府会议上表示：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就是不重视教育，造成中国人口素质低下。当时的两淮虽处水网地带，但由于连年战乱，加上水涝频繁，淮安的贫困人口极多，很多儿童随大人流离失所，进不得校园。他们长大后很可能成为新的贫困人口，形成恶性循环。吴觉看在眼中，忧在心头，他觉得教育乃是百年之大计，必须争分夺秒地实施。所以，两淮市政府一成立，他就动员市区各学校尽快复课，保证中小学生正常学习。为了优化教育资源，提高办学质量，吴觉力主把淮阴师范等五校合并，

成立了两淮市第一联合中学(后改为淮阴中学)。
1949 年 3 月，为支援江南新解放区，华中六地委和两淮市委从各县抽调 2000 余人，组成市县区整套班子，吴觉带领着这批干部，于渡江战役胜利后随军渡江，分别奔赴常州、苏州、无锡等地，参加接管工作，走上了新的征途。

事举而水利兴

——论吴觉对治淮事业之贡献

耿宣

淮河流域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与秦岭山脉构成我国的南北物候分界线。历史上，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我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较早的地区之一，曾有“江淮熟，天下足”的美誉。然而，12 世纪后，由于黄河长期夺淮的影响，淮河水系遭到巨大的破坏，入海出路受阻，干支流洪水排泄不畅，造成淮河流域水旱灾害频繁，“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全流域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
1950 年夏，淮河流域发生大水，上游干支流洪水奔腾席卷而下，平地水深丈余，流域内许多农村或陆沉，或夷为平地，有些村庄甚至仅见树尖，交通断绝。无数受灾群众无奈攀树登屋，呼号求援，哭声震野。
面对严重的灾情，中共中央在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作出了治理淮河的决定。这一年 10 月 14 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中央针对淮河上、中、下游存在的客观矛盾以及在治淮问题上的种种争议，明确了豫、皖、苏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团结治水的原则，以后又将沂沭泗纳入治淮范围。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治淮的群众运动就此展开，千百万治水大军从全国各地奔赴治淮战场，揭开了新中国大规模治水的序幕。淮委成立初期，吴觉一直置身于治淮战线的最前列，为治淮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 1950 年冬治淮委员会在安徽省蚌埠成立起直至 1955 年，吴觉一直任国务院治淮委员会委员、治淮委员会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和党委副书记。当时治淮委员会的主任曾山和豫、皖、苏三省的负责人，都不驻淮委，因此，大量日常内外工作都落到了主持工作的吴觉肩上，曾山曾称之为“秘书长专政”，可见其发挥的作用之重要。可以说，吴觉实际上全面承担了组织和领导治淮的重任。吴觉才华出众，为人正直豪爽，善于协调各种关系，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杰出的领导艺术。在必须兼顾协调三省、统筹数百万治淮队伍、浩大纷杂的治淮大工程中，他的这种个人特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得治淮事业得以蓬勃地发展。以下谨从四个方面，探讨吴觉在治淮事业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一、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利益矛盾
淮河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个省，均为人口稠密、农业发达的省份，上下游、左右岸、干

支流和河湖关系复杂，水事矛盾由来已久、十分尖锐。由于各地利益取向不同，加之治淮工作边界工程多，所以治淮工程在省际协调这方面难度很大。长期以来，淮河之所以难以治理，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治淮委员会成立后，总部机构设在安徽蚌埠，下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另设了上、中、下游三工程局，分部参加各指挥部为其组成部分。在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协调好三省的关系，是治理淮河的根本问题。

吴觉对此非常慎重，他深知，如果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要求，考虑到各方面的利害得失，把各方利益都照顾到，就无法做到三省团结治水，治淮工程就很难顺利推进。这就要求他对治淮大局和各省情况都有一个确切的把握，能够统一规划，使上、中、下游的工程能都围绕根治淮河的总目标来开展。在遇到具体问题或者困难时，他能够做到从治淮全局出发，在原则问题不让步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化解矛盾，消除隔阂，减少阻力，最大程度地统一各方面的力量，服务于治淮总体大局。他依据中央治淮“统筹兼顾，标本兼施”原则，对上下游各项工程的规模大小、轻重缓急拟定了治淮总方案，并推动方案尽快通过，使治淮工作尽早开展，尽早受益。

公平公正则是均衡各方利益、推进治淮工作的另一项保证。在制定治淮总方案和实施步骤时，吴觉自始至终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令上下游互相配合，互相照顾：上游不独占来水，下游也尽量利用上游的排水和退水；上游尽量滞蓄，削减洪峰，下游则不独占排水通道。在每年工程量的安排上，他既根据国家的财力物力，又兼顾各省的实际需要和能力，使其不超过各省的承受力，符合各省的实际情况。

吴觉在豫、皖、苏三省治淮工程的安排上的统筹兼顾、公正无私，使得治淮工程得以不断打开僵局、较快统一意见，取得了较快的进展。

二、妥善处理好治淮日常事务

治理淮河是个大工程，牵涉面广、所耗费人力物力极多、诸事纷杂，必须有精明能干的专职干部来管理日常工作。吴觉是治淮委员会秘书长，实际承担了治淮工作的各项任务。在吴觉的“秘书长专政”期间，从组建队伍、拟订规划方案，到安排队伍的生产、生活，吴觉事必躬亲，几乎常年住在办公室里，在他的领导下，上万人的治淮委员会机关、设计院、建工局秩序井然，工作效率极高，发挥了强有力的治淮工作心脏之作用，使治淮事业得以顺利开展。1950 年 10 月治淮委员会成立后，从各方面调入了大量干部，还有诸多华东地区新毕业的大学生及来实习的大专院校高年级学生，连同工作人员的家属，仅仅治淮委员会机关本身便有上万人。除此之外，还有几百万的民工，包括治淮委员会自己组建的建筑工人队伍、营造商的建筑队伍、解放军的两个水利师和数万劳改人员等。所有的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来源、身份、待遇各不相同，全部接受治淮委员会的统一管辖，时时刻刻都有问题需要解决。另一方面，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财政十分紧张，要想办法筹集到治淮所需的大量经费物资，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面对这一情况，吴觉以他一贯的责任心和冷静果断待之。一方面，他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组织周密的调研和科学分析，制定科学可行的工作方案，坚守原则，不推诿、不迁就，确保一切有利于治淮的工程能够顺利推进。吴觉的果敢善断、勇于负责，是他治淮工作中表现出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很多问题，正是由于他的敢拍板、敢承担才得以迅速解决。另一方面，吴觉在很短的时间内妥善解决了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淮委刚迁至蚌埠时，只有几处旧房用于办公，条件很差。吴觉来了之后，很快建起各种生活基础设施，使工作人员能够全力投入到治淮工作中去。

吴觉还十分重视宣传，在他的领导下，治淮宣传工作也十分出色。他建立了治淮陈列馆，并出版“治淮周报”，使得治淮工作的总体情况和进展情况得到清晰明了的展示。他组织编纂出版的“治淮汇刊”，详细记载了治淮大事的进展实况，成为重要的史料。他的这些举措扩

大了治淮工程的影响，有效地推动了治淮事业的发展，成为后来治淮工作者学习的范本。

三、组织治淮勘测，制定科学的治淮规划

淮河流域水事复杂，这一特点决定了统一规划在治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治淮的重要原则。要做好统一规划，必须对淮河进行准确的勘测，对淮河复杂的水文地理环境有着精准的把握。而治淮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使用的是旧中国的军事地图，误差比较大。吴觉认为，治淮来不得半点马虎，准确的流域地形图是治淮工作的基础。他组建了一支庞大专业的治淮勘测队伍，用三年的时间，系统测量了淮河流域的地形，绘制出了流域地形图。

1954 年淮河流域特大洪水之后，吴觉撤销了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建立了勘测设计院和基本建设局，亲自兼任局长，召集豫、皖、苏三省治淮指挥部的主要技术骨干和中央、三省有关部、厅（局）及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通力合作，考察、研究淮河，足迹遍布治淮主要工地，最终制定了从长远利益出发，变水害为水利的科学治淮规划。治淮规划出台后，吴觉亲自带着主要规划人员去合肥、南京两地向安徽、江苏两省省委汇报规划主要内容，同时派龚意农到郑州向河南省委汇报，征求三省省委对规划结果的指导意见，使建国后第一次淮河流域规划工作顺利完成。这部规划不仅对当时的治淮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使治淮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而且至今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四、团结知识分子

吴觉向来尊重知识分子，将他们视为党的宝贵财富。治淮工作中参与的科技人员数量庞大，除了从全国各地抽调的技术骨干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教授专家，还包括华东地区高等院校的水利系全体毕业生，以及来实习的一部分三年级学生。

当时淮委的各级领导刚从长期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一些成员初次和许多知识分子共事，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不够了解，往往容易看到他们的一些缺点，对他们不够信任。另一方面，治淮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治水，大部分技术人员都缺乏实践经验，即使是很多老专家也是如此。1950 年，我国自己建设的第一个大型水库——河南白沙水库工地由于施工管理不严，隧洞发生塌方，造成人员伤亡。河南省治淮指挥部决定给各级技术负责人严厉处分。吴觉得知后，感觉这个处理并不妥当。他认为，想要治理好淮河，就必须依靠技术人员，而要让技术人员能充分发挥作用，做好工作，就必须信任他们，支持他们，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为此，吴觉亲自起草了一项关于团结知识分子的决定，并由淮委通过，发布到治淮系统各单位。这一决定在治淮工作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思想建设，它充分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各级领导、党员干部和技术人员能够相互信任，共同为治理好淮河而奋斗。

在 1954 年大洪水中，治淮工程暴露了一些源于经验不足的缺点，吴觉没有把责任下推，更没有指责技术人员。在建设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供坝大型水库——佛子岭水库的时候，工程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在设计施工意见上发生了分歧，吴觉在认真听取汇报和分析论证后，果断支持国内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推动国内专家的方案被采纳，既保证了大坝的顺利建成，又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成为治淮工程中一个成功案例。

同时，他还大胆使用青年技术干部，把他们推上治淮第一线，让他们担任各级技术领导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培养出了一大批水利人才，不仅为治淮事业贡献了大量的新生力量，也成为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基石。

吴觉非常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治淮初期，尽管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但是吴觉还是尽力解决知识分子、技术干部生活上的问题和困难。除积极兴建一般职工宿舍以应急需外，他又修建了一些标准较高的宿舍楼安排高级技术干部住宿，并为工程师以上单身技术干部建了较好的集体宿舍楼房。他的这些举措，让知识分子们甚为感动，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从而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治淮工作中去。

虽然吴觉在治淮委员会的时间并不算长，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领导下的治淮工作，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技术和经验，为之后 60 多年的治淮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那以后，治

淮工作日新月异，到如今，已经初步建成了具有防洪、排涝、灌溉、发电、航运等相结合的治淮工程体系，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促进全流域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淮河流域从全国的著名重灾区，变成了国家的重要农业基地。

拨乱反正除旧布新

——吴觉在南京工学院

郭家宁

1979 年 9 月，中央批准调整南京工学院领导班子，吴觉同志出任南工党委书记兼院长。尽管在职时间短暂，但是他的品质、水平和所起的作用，仅从下列几个关键问题上，也可以窥其一二。

一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达十年的破坏中，南工受灾甚重，加上领导人更迭频繁，8 年里换过 5 次，因此，学校各方面积累了不少矛盾，急需解决的问题颇多，真可谓百废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一年多整顿恢复，学校秩序尚未根本好转，干部、群众思想还相当混乱，停止工作近 20 年的吴觉，初到这个新战线、新岗位，面临这种新情况，不免感到问题成堆成团，工作千头万绪，究竟该从何着手呢?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寻找答案。他跑了很多个系去熟悉情况，又接待了一些人，个别交谈或听取汇报。他说："我不是内行，情况也还未摸清，今后，主意大家出，然后分工抓，各个部门各司其职，这样做，有利于发挥组织作用和集体力量。上下注意发扬民主，不突出个人，既能增进团结，又可少犯错误。现在，工作面宽，党委人手少，每个人分担一个方面，日常工作可直接处理，重要问题集体商定。"

做工作一定要依靠组织，发挥集体力量，对这个思想，吴觉是始终明确而牢固的。加强和改善党委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所在。其时，南工党代会已有 16 年未开了，过去工作未及总结，今后工作没有规划，现有党委委员也只是省委临时指定的五个人，远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为此，他先后在党委会上提出召开党代会的条件、时机和任务等问题。为了开好党代会，以吴觉同志为首，党委多次进行研究，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布置，1980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南京工学院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吴觉作为南工新形势下的掌舵人，对十年动乱后南工的冤假错案平反、组织领导的加强、教学科研的方向、后勤保障

的开展等各项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宣布了未来的发展规划。关于如何制订学校发展规划，在起草、讨论、修改过程中，吴觉有多次发言。他说过，“规划是指导工作、动员群众的武器，一定要早定下来。”“规划应考虑四化建设的发展，考虑教育本身的改革，一是学生的质量，一是科研的成果，代表着学校的水准。办学要立足于国内，但还要有世界眼光，看得远些，看发展趋势，瞄准世界最新科学成就，努力赶超。”眼下，学校还应以教学为主。不管学生招多少，提高质量很重要。当然，质与量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一定的量，如学生、专业、实验室以及科研项目的数量，也不能保证一定的质，两者要配当好，掌握好质与量之间关系的“度”。目前搞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但这不是绝对的，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还应积极创造条件，按需要与可能，取得数量上的适当发展，力争扩大学校规模，不能机械地与外国某些学院类比，或者囿于现状，把自己的手脚框死。”“推行学位制，是我们高等教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这个情况，提示我们要清醒一点，对国内外科技教育形势的发展作充分的估计。”纠正了“文革”以来一度忽视智育的偏向。他还说：“规划上要提出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措施，分步进行，形成自己的特色，学校由以工为主，办成理工结合以至文理工结合，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的重点大学。先起个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几次。先订近期的，以后再订远期的，衔接起来。”就是以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办学标准来看，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仍未过时，特别是其中关于“理工结合以至文理工结合”的办学思想，对克服理工、文理工分家的弊端，促进学校事业健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不得不说是吴觉同志对南工的一项贡献。

二

吴觉同志来院后，看到学校现状，就考虑到如何发挥行政领导作用的问题。经过集体研究，先推举有经验的同志组成院教学、科研领导小组。接着，他通过组织，表明心意，及时主动地辞去了兼任的院长职务，并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积极组建了院行政领导班子。随后，他又强调党政分工，以身作则，十分尊重行政领导的职责和权威，经常支持和鼓励行政领导人放开手脚，独立工作，大胆负责，勇挑重担。当有些人为了行政上的事直接来找他时，他从不轻易表态和直接处理。院部安排就绪以后，对系一级的党政分工，他提倡要趁热打铁，但是工作要做得细一些，于是，党委发讨论稿，开座谈会，一面打通思想，进行试点，一面在行政班子初步调整的基础上，迅速选拔人才，予以充实和加强。党政分工，不能包办，也不能分家，系总支起监督保证作用，支部起保证作用，这在党内和党外、政工干部和行政干部中，认识并不一致，顾虑也多种多样，而关键是解决党内和政工干部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在大小会议上，吴觉曾经一再地摆事实，讲道理，他说：“我们这里是一揽子领导，党政不分，过去在地方、部队没有过的。什么事情都拿到党委来讨论，弄得党委整天陷于事务、忙乱，下面不少政工干部也不抓大事，搞代替包办，造成行政干部依赖、等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下去，党委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怎么能体现得出来?”他还一针见血地提出：“学校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多是知识分子，如果说，过去在政治上不相信知识分子，那么，现在岂不是对知识分子、业务干部的工作能力也不相信了!”从上到下，实行党政分工，强调有职有权，重视发挥行政系统的作用，并明确规定各部门的职责分工，这是南工多年来的一大变化，吴觉同志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和促进了这一转变。这样做了，也确实收到效果，从此，党委以至总支、支部，就可腾出手来，集中精力，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研究工作中带原则性、关键性的问题，从而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委的领导，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在实处。

三

以吴觉同志为首的院党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委指示的精神，为了拨乱反正，安定团结，十分

重视落实政策的工作，接二连三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大量问题。
吴觉同志在党委常委和院一级党员领导干部中，提出要首先检查、清理自己的领导思想，看看是否符合形势、任务和党的路线的要求。他强调指出："现在，不仅'文革'中遗留的问题要处理，就是'文革'前遗留的问题也要处理；不仅冤、假、错案都得及早平反，就是那些定性不妥或处理偏重的案件也要尽快复查。这方面数量较多，情况复杂，可以分批复查。在复查、清理中，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政策规定办事，决不留尾巴。重大问题，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一般问题，由分工的同志去负责处理。"在落实政策过程中，他和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听取专门班子的汇报，听取各种反映，提出处理意见，掌握工作进程。在新党委建立前后的两三年中，南工处理了上千件的历史遗留案件，其结果，有力地调动了有关人员的积极性，调整了内部关系，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策观念，增强了群众与党之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吴觉认为，在日常工作中，时时处处都涉及政策问题，那怕是做一些具体工作，也往往涉及到如何理解和执行党的有关政策，他经常了解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大家所关切的食堂、住房、浴室等等，几乎成了党委和行政领导干部的经常议题。他深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需要从各个方面，诸如工作安排、学习条件、生活待遇、保健医疗以至社会活动等等，加以考虑、落实。为此，党委组织过专门调查，进行过问题排队，并结合上级的工作布署，召集各个系和部门负责人商讨，分清轻重缓急，分工协作来处理。
吴觉来校不久，党委恢复了统战部建制，党内也进行了统战政策再教育，在全省高校中，南工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恢复活动是最早的。随后，在他的主导下，党委建立了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定期协商制度，加强了合作共事、互相监督的关系。在制订规划、商讨工作中，党委认真听取意见，接受批评；而各民主党派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纷纷展开活动，从科技教育等方面为社会发展和学校建设出力，学院的统战工作新局面由此打开。

四
吴觉同志多次讲过，我们这些人都属过渡性的，该明智一些，承认"青胜于蓝"、"后来居上"的道理，有点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他自知不能适应未来的学校工作，何时该退该交，心中早有揣度，而当中央强调及早培养接班人以后，后继者该从哪里去找，他就更费思量了。在最初讨论筹建南工新的领导班子时，他说过："我看，南工这么大，有足够的人才，不相信就找不到合适的。"上级曾经准备从外地调一位负责同志来，他婉言谢绝了，明确主张人选应由自己内部解决，何必他求，也不应他求。他亲自动手物色人选，逐个征询意见，对党委主要负责人的选拔更是采取细密慎重的态度。在与其他书记、常委共同进行调研、酝酿之后，他要求召开小会、大会，几上几下，提出候选人名单，再请上级派人作实地考核，最后议定、上报。选革命接班人要注重干部的"四化"，既反对论资排辈和阶梯论，又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实践考验的过程，使新的领导班子能较快地配搭起来，并且能保持相对的稳定。为此，他反复探讨，采取了适当的提拔途径和步骤，通过一些过渡性的安排，让他们多出面和实际主持工作，以求得实际锻炼和群众鉴定。当党委新的领导班子即将建立的时候，他便主动要求自由退居二三线(未获批准)。新手上来后，他病倒在床上，还不断关心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和下面的反映。中央要求南工输送优秀干部，他也亲自了解，发函推荐。事实证明，在物色培养新手，交班让位过程中，吴觉是尽心和无私的，表现了一位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宽广的胸怀。
他说过，选好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不及早推选和培养好接班人，我们要犯历史性错误。他希望系和部、处一级新的领导班子也能早点选配好，对此，党委常委曾分工到各系和各部、处，通过个别交谈、了解，召开大小会议，民主讨论和推荐，努力把工作做得早一些、细一些。吴觉说："选接班人，我们是做了不少工作，可是，还没有一

个成套的计划。国家要长治久安，学校也要长治久安。真正了解一个干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建立后备梯队的名单，坚持不懈地了解、培养”。

五

吴觉虽然年老多病，但是他心胸豁达，思想解放。在干部、群众以及领导成员中，曾经因急于改变学校面貌，转为某些灰心失望的情绪。他在常委和行政领导干部联席会上，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同志认为南工就是搞不好，讲话灰溜溜，不够振奋，含有消极情绪，这是不好的。过去打游击，遇到困难，右倾情绪就容易抬头。可是，今天的条件大不相同了，有多大困难不能克服的!不该说没信心的话。如说我吴觉不行，这没有关系，不是主要的，我能力是很有限，即使力量再大，个人也不能决定一切，工作总是靠大家干出来的。如果我们从党委常委、正副院长起，能够态度一致，信心十足，讲话办事生气勃勃，就能带动下面，否则层层影响，士气不振，便适得其反了，南工如垮在我们手里，那是要打屁股的，有罪的。”他说：“南工应该搞好，也可以搞好。”要求好好端正领导思想，一扫消极情绪，从上头做起，克服当前存在的软弱涣散状态。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他也进行自我解剖。他说：“我来这里是真心实意想做好工作的。当碰到棘手的事，反复研究，采取了措施，仍不能见效，心里就有些苦闷，感到力不从心，出现了急躁情绪，这是不对头的。好在我这个人思想上比较开朗，想不通的，慢慢想来也通了，我工作中有毛病，学校进展不快，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锐意改革，主张因势利导。除了在教学、科研上要破锄保守自满，坚持改革以外，提出“学校管理也要改。”他曾经说过：“我们对事业持慎重态度是好的，但不能过分慎重，变成谨小慎微，观望等待，等人家走过以后再去走，就慢了几步了。重要的是接受历史经验，摸清规律，把工作趋势看清楚。现在，搞生产，建立学校基金，搞些物质奖励，已是一种潮流，要下个决心，订个章程，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搞生产，主要为了教学、科研，也考虑改善教职工的生活福利，教职工后顾之忧解除了，积极性调动起来，自然有利于搞好教学、科研，目的是统一的。”在“文革”刚过，人们还习惯于大锅饭、一碗水端平，主要提倡精神奖励的时候，吴觉已经有了用物资奖励、鼓励竞争的意识，可以看出他的管理思想的超前了。后来，学校也开始发了些奖金、补贴之类，机关也有，而他却坚决不拿，说“我已享受了高干待遇，生活上蛮可以了。”

吴觉同志在古稀之年，拖着病体来到南工，在 5 年多的时间里，他依靠组织和群众，为南工的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竭尽心力，在一些方向性和重大原则问题上，他能够站得较高，想得较深，看得较远，也把握得较准较紧。在他逝世时，南工党委在上报省委的一件文件中，对吴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对学校工作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为南工发展史添上了光彩而重要的一页。

梅花苦寒香善舞风袖长

——对吴觉同志革命道路的几点感悟

马婷

吴觉同志是淮安革命斗争史上的传奇性人物，他于 1912 年生于淮阴渔沟，接受新式教育，少年时期就参加学潮，先后四次被捕，不仅没有恐惧怯弱，革命意志反而磨砺得愈加坚定，斗争的手段和方式愈加灵活；在家乡沦陷时，他毅然选择留下，倾尽家财，组建地方抗日武装，打击日伪顽，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和武装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扎根淮海，坚持敌后，至两淮解放时队伍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成倍增长；建国后战火渐熄，他又成为伟大的治淮事业的领军人物，正是中年意气、战天斗地、豪情勃发之时，无奈为历次政治运动所裘裹，从此辗转曲折，沉寂 30 余载；至“文革”结束，政治空气焕然一新，吴觉老骥伏枥，在南京工学院拨乱反正，规划发展的蓝图。然因早年入狱染上的呼吸道顽疾，再次出山仅 5 年余，于 1984 年 4 月 30 日遽然离世。今天，在吴觉同志逝世 30 周年之际，再来回顾他起伏坎坷的革命生涯，有三点感受最为深刻。

一、革命意志异常坚定

1927 年，国民革命军北阀东路军进入淮阴，受革命洪流影响，年仅 15 岁的吴觉加入爱国团体——国民外交后援会，上街游行，抵制日货，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宣告了他革命生涯的开始。正如他自己在自述里所说，这时他的革命意识是朦胧的，只是觉得对现实社会不满，但是要坚持什么样的革命主张，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并不是十分明了，是社会现实和个人经历，促使他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在北伐时他觉得国民党是革命的，于是对国民党抱有幻想，1928 年他参加了校内反对贪污校长和专制教员的学潮，结果被国民党中央政府大学行政院开除了学籍，于是对国民党开始感到失望，随后在南京求学时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开始仇视当权政府。1930 年，吴觉进入上海读书，这时他的爱国情绪越发激昂，学校内的党派活动是很明朗的，既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和国民党改组派。国民党的主张已经为吴觉所抛弃，当他在改组派和共产党之间摇摆时，发现了改组派控制的学校营业化的骗钱行为，从此对国民党及其衍生出来的派系彻底失望，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选择共产党的初衷，吴觉非常坦诚地说：“我之参加革命并非出于阶级的觉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也没有什么清晰的认识，只认为共产党是要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是要达到人类真正平等的。”“实际生活的接触中对共产党非但具有好感，而且也具有纯朴而幼稚的崇拜，感到共产党干事痛快，热切地希望参加共产党闹革命。”因此，在 1930 年 9 月，他经吴天木、方超介绍入团，不久任团支书，两年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大夏大学的党支部书记。正是在这一时期，多次参与组织党团员活动，吴觉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日渐深入，并最终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从此，他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进步而奋斗不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国民党控制着政权、对共产党全面围剿极端仇视的情形下选择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岂是一件易事，对于年轻的吴觉来说，磨难正在蓄势而起，一波又一波地袭来。1933 年 5 月，吴觉在参加党组织举行的“五一”大示威时被反动军警逮捕，被解送苏州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途中仍坚持与敌人斗争，在庭审时因缺乏证据被无罪释放，吴觉于 6 月初回到大夏大学，旋即再次被捕。这一次敌人刑罚利诱，恩威并施，企图从他那里掏出大夏的党员名单，但是吴觉坚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敌人实在没有办法撬开他的嘴巴，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事法庭判处了一年零三个月徒刑，于 7 月送苏州的江苏反省院执行。1934 年出狱后，吴觉已被学校除名，回到家乡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活动。这样活跃的吴觉自然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35 年，吴觉第四次被捕，也是最凶险的一次被捕，他在狱中险些丧命，并留下了伴随其

一生的呼吸道顽疾，直到国共合作抗日，他才被释放回乡。
有些人，在面对困难磨难时，因打击过大而怯弱退缩，固步自封，以求自保，甚至于放弃气节，改弦更张，卖主求荣，也有些人，恰如真金，经过炉火的一次次淬炼，成色更纯，光彩倍增，耀世夺目，吴觉，显然就是后一种人。被捕被折磨，只是更坚定了他成为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的信心和决心，再次出狱回乡，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去找党，如同一个孩子去寻找他最为依赖的母亲。
建国后，正当吴觉为治淮大业殚精竭虑时，因被某领导诬陷，开始了漫漫的受审查、受排挤之路。从他写下的数百万字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吴觉坦荡的人格和倔强的个性，他毫不讳言自己为革命作出的功绩，也不掩饰自己所犯的一些过错，无论怎么被批斗，从不肯为了换取一点点的优待而改变自己的立场，这是一种对自己、对党、对革命、对人民高度忠诚的精神，对自己、对党、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自己、对党、对革命、对人民高度信任的信念。1977 年，长孙的诞生给这个受压抑的家庭带来了一个喜讯，吴觉高兴地给孩子起名为“淮绪”，含有“淮阴人氏”、“淮河大队”、“淮海地区”和“治淮大业”四重意思，并在起名的书信里写道：“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成功的，是胜利的，扪心自问无愧于党，无愧于淮海人民的期望，更无负于父亲的教诲与期望，因此以‘淮’字代表我自己，所谓‘绪’者，可称为事业，或是继续承绪之意也。”他是以“自己之内胸积愫为长孙之命名”。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精神、态度和信念的支撑，使得他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垮掉，终于迎来了云开月明、拨乱反正的一天。恢复名誉后，年近古稀的吴觉又走上了南京工学院的领导岗位，开始新的建设征程。
二、革命方向异常正确
1937 年 8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关于国共关系问题，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红军的活动，只能由自己决定。再次出狱回乡的吴觉，正是按照洛川会议的要求在已经没有了党的组织的淮阴开展起了工作。
1938 年初，吴觉、宋振鼎、夏如爱、谢冰岩等人召开座谈会，酝酿成立抗日救亡团体苏北抗日同盟会，以此领导和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需要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批准，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长周化鹏将吴觉等人召集起来，别有用心地提出先商量一下统一战线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上，以周化鹏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认为民族统一战线要想发挥其巨大力量，其组织性质必须是化学性质的，化合的，各党派必须溶为一体。吴觉等人予以反驳说：“中国境内有阶级存在，有各个民族的不同利益，有各个党派的团体代表，各阶层各民族是独立存在的，想化合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是联合的，是物理组成，是混合的而非化合的；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份，应有其自己的组织、属性与其自己的纲领，化合不但不可能，其结果是消灭了抗日的有生力量。”吴觉等有力地驳斥了对方的谬论，坚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2 月，在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干涉下，苏北抗日同盟会正式成立，成为了苏北地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中坚力量，国民党省政府当局又一次意图拉拢收买，允诺委吴觉为一个团制的支队长，并为其提供弹药经费，吴觉表示同意，但是必须保证政治工作独立、部队发展不受限制，国民党当局表示不能接受，协议未能达成，拉拢计划再次落空。
因为始终无法掌握控制苏北抗盟这支力量，这年 10 月，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宣布苏北抗盟活动非法，抗盟的活动被迫取消。而且徐州失守，淮阴失去了北面屏障，形势岌岌可危。吴觉的父亲也于此时逝世，吴觉回渔沟治丧期间，暗中购买枪支，并策动了国民党区公所一个区队，秘密而积极地为日后开展游击战争做准备。
1938 年 3 月，淮阴沦陷，吴觉立刻领着苏皖特委代表张芳久等去渔沟，起出暗藏的枪支，

成立了淮阴抗日义勇队，开始了敌后游击生涯。在 1940 年 8 月黄克诚率主力到来之前近两年半的时间里，吴觉拒绝被国民党招安，坚决不肯搞灰色武装，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坚持灵活的游击战术，反对投降主义、逃跑主义，面对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清剿”、“摩擦”，坚定地执行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指示，武装队伍不断壮大，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为黄克诚部开辟淮海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武装基础。

吴觉能如此坚决地搞独立武装斗争，既是他对党中央决议的高度认同，也与他个人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和经历有关。他在自述里说：“要说搞灰色武装，旧军阀马玉仁搞灰色武装被消灭了，陈文搞灰色武装三个团以高宝湖为根据地也被消灭了，本人也遭逮捕杀害了。”“所谓搞合法武装就是拿绳索系着自己的脖子，另一端抓在敌人手里，随时有被敌人绞死的可能。抗日战争前我就是白区的一个学生，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敌人可以随时随地逮捕你，我深知干革命不能光凭喊口号，要有自己的武装，我对国民党不抱任何幻想。因此最后一次出狱后我就决心搞武装，秘密筹备枪支弹药，……我再也不能毫无抵抗任敌人摆布。”而且，在淮阴抗日义勇队成立的初期，为了扩大武装力量，吸纳了一些地主和土匪武装，结果在义勇队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人就四散而去了，吴觉总结道：“其实义勇队就是灰色的，因为没有坚定的信仰，缺少凝聚力，最终结果大部分垮掉了。”所以，在两年多的坚持里，吴觉一直力图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和独立性，坚持正确的革命方向，保证了队伍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在异常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坚持并壮大起来。

三、革命策略异常灵活

与吴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共事过的淮阴县委书记李广涛很早就说过：“淮阴的革命斗争的胜利，一半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一半是靠吴觉用拳头抱出来的”。这里说“用拳头抱出来的”，就是称赞吴觉非常善于做统战工作。抗日战争中，淮海地区的斗争是典型的三角斗争，除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还有很多地方上的乡绅地主、土匪武装，还有农民的刀会组织，各种势力盘根错节，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并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吴觉在掌握政策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善于人交的个性特点，对不同态度、不同信仰的人群根据不同的时局采取不同的统战手段。

吴觉的父亲常年担任省立中学的校长，当时国民党省政府里的很多要员都曾是他的学生，吴觉的几次出狱营救都是其父亲四处活动的功劳。为了便于在淮阴开展党的活动，吴觉充分利用了父亲的这层师生关系，在国共关系缓和的时候多方与之交往，走上层关系使得地方特务对他忌惮三分。当苏北抗日同盟会的成立遭到国民党省政府当局的重重阻碍时，吴觉去拜访在苏沪地区极有影响力的士绅朱德轩老先生，得到了他的支持，在朱的引荐下，利用韩德勤和李宗仁之间的派系矛盾，去徐州得到了李宗仁关于同意成立苏北抗盟的手谕。在游击过程中，对一般的土匪、伪军，则以抗战为重，利用自身在淮阴的名气和影响，广泛收徒。吴觉在淮阴的伪、顽“弟子”，起码有三四十人，这些人在“扫荡”、“清剿”和“摩擦”时经常保持“中立”，有时还主动为吴觉通风报信。1940 年郑潭口反“摩擦”战斗中，吴觉所率领的淮河大队捕获了地方实力派金二板的一个连，金托人来请求发还人枪，保证今后永不“摩擦”。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吴觉忍痛发还全部人枪，在社会上获得各界人士的赞扬。人们极口称赞淮河大队这样做是真正抗日的，实行团结，是人民的军队，使其在政治上完全占了先，声威所及，在涟水境内的国民党的县区武装，很长时间不敢与淮河大队正面冲突，特别是区一级还与之暗送情报，给淮河大队的活动以很大的便利。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省政府对淮河大队的追剿计划不得不采取缓进窥机而不敢盲动冒进，紧张的“摩擦”形势有所缓和。

在郑潭口战斗发生的同时，吴觉等人也在准备另一个反“清剿”的部署，即准备开辟一个新地区。这个新地区是指涟水、淮安与淮阴三个县相交的三角地带，也是淮阴西、洪泽湖与安徽省联结地带。这个地带是掌握在地方封建势力与会门的手中，如果能在这个地带有工作基础，我部队必要时可以跳进这个地带，国民党军队是无法尾进的。吴觉和政委万众一等人协

商后认为，欲进入这个地区而能收到速效，最好是派员冒充刀会老师。吴觉在回忆中绘声绘色地写道："担任此任务的是朱慕萍等人，他们经过短期的学习训练，都练成了'刀枪不入'的本事，刀不能砍伤，炮不能打伤，口中念咒当众表演，能请下天上诸神助战，这一套魔术表演非常精彩，是任何刀会老师所望尘莫及的。此外还带了一个执法队化装成传教老师，通过社会关系进入这一区域传教，因表演精彩，声威大振，不久即控制了这一区域的刀会组织，为我主力部队东进苏北铺平了道路。"

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在淮海区与吴觉相知甚深，他曾为吴觉写了一帧条幅：主人颇有江湖气，坐客能谈山海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吴觉同志在开展统战工作上的得心应手和游刃有余。关于这一点，曾任中组部部长的李锐这样评价："在抗战初期国民党的腹地江苏建立根据地，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一点所谓'江湖气'，即没有处理复杂的社会人事关系及同狡猾凶残的敌人作斗争的一套本领，是办不成事情更成不了气候的；一个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如果没有坐客来谈山海经，没有民主作风，不能容纳各种人才，听取各种意见，也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的。这两种品质凝聚于吴觉一身。"

年表

吴觉年表

1912 年

4 月 1 日吴觉出生在江苏淮阴县渔沟镇的农家。

1917 年

开蒙入私塾，因身体原因读书时断时续。

1920 年
随父母移居淮阴城内，就读于第六师范附小，接受新式教育，形成了较强的爱国主义民主思想。

1925 年
秋考入江苏省立师范第九中学。

1927 年
国民革命军北阀东路军进入淮阴，受革命洪流影响，加入爱国团体——国民外交后援会，上街游行，抵制日货，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

1928 年
春参加三五研究社，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获得了一些革命启蒙知识。
冬参加了反对贪污校长和专制教员的学潮，作为学潮领导人被国民党中央政府大学行政院开除学籍。

1929 年
2 月考入南京私立正谊中学读书；同年冬转入上海私立建设大学附中。

1930 年
春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后又加入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参加了反对学校营业化的骗钱行为，从此对国民党改组派彻底失望。
8 月因访友被误捕，此为其第一次“被捕”。
9 月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政治经济系。经吴天木、方超介绍入团，不久任团支书。

1931 年

夏暑假回淮，与中共淮盐特委接上关系。渔沟祖宅被毁后决定停学半年。
秋九一八事变后，结识宣侠父，组织“国难剧社”，与陈白尘、张国权等宣传抗日，掀起了青年们抗日救亡的热情，并为党的城市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2 年
4 月借读于南京中央大学。
9 月回到大夏大学，不久加入中共共产党并担任党支部书记。
10 月公开组织“李顿报告书”研究会，被推选为该会主席，藉此机会大夏的党团组织迅速发展。上级党组织决定将大夏大学党支部改为支部局，吴觉任支部局书记，负责联系外校和工厂以推动上海的学生运动。

1933 年
春被分配到社会科学者大同盟沪西分盟任组织工作，实际负责领导沪西区的周家桥、大夏大学以及闸北区的暨南大学、东南医学院、真如镇等五个支盟的工作。
5 月 1 日党组织学生举行“五一”大示威，任一段游行队伍的指挥，被反动军警逮捕。在被解送苏州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途中坚持与敌人斗争。在庭审时因缺乏证据被无罪释放，于 6 月初回到大夏大学。

6 月再次被捕，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事法庭判处一年零三个月徒刑，于 7 月送苏州的江苏反省院执行。

1934 年
2 月出反省院回淮，一边与地方国民党上层交游以站稳脚跟，一边积极联系进步力量，寻找党组织，并认识了淮阴狱中的管文蔚、谢冰岩等同志。
夏与张一平办《大众日报》，担任副刊编辑，刊载了很多披露社会黑暗的文章，于年底被公推为社长后，使之成为党的秘密联络机关。
初冬赵心权代表淮盐特委恢复其党籍，此后，在淮阴城内逐渐恢复了党的活动。

1935 年
2 月积极筹备淮盐特委迁回淮阴城的活动。
3 月第四次被捕，淮阴的特务意图将之就地正法，其父通过国民党省政府中学生故旧的关系，死刑未予批准，判刑两年半，于 1936 年春二入苏州反省院。

1937 年
7 月 5 日经好友张国权活动，提前出狱，回到淮阴老家。因家乡特务活动仍猖獗，复回苏州。
11 月上海沦陷后回淮，途经扬州偶遇谢冰岩等，约定一起回去打游击，并将买来的七支枪藏于老宅，为将来武装抗日做准备。并邀请附近各县救亡活动的领袖人物如赵心权、陈亚昌、夏如爱、谢楠、孙若溪等人来淮阴城举行座谈会，商谈在敌后打游击事宜。

1938 年
1 月在宋振鼎的领导下，酝酿成立抗日救亡团体苏北抗日同盟会，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同月应邀参加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长周化鹏组织的座谈会，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商讨，坚不承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是化学的、各党派溶为一体的，而应是物理的，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分应有其自己的组织和纲领。
月底成立苏北抗日同盟会和创办《新声晚报》的要求被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驳回，携爱国士绅朱德轩介绍信前往徐州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处申述，获得成立批文。同时，吴觉被任命为淮阴县动员委员会指导员，负责组训工作，积极开展上层的统战工作。
2 月苏北抗日同盟会成立，任常务理事。
4 月因苏北抗日同盟会和淮阴动员委员会的壮大，国民党江苏省当局意图拉拢收买，欲委任吴觉为一个团制的支队长，并为其提供弹药经费，吴觉等坚持要求政治工作独立、部队发展不受限制，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10 月苏北抗盟被迫停止活动。吴觉父亲去世，治丧期间，暗中购买枪支，并策动国民党区公所一个区队，为游击作准备。
冬为筹措抗日经费，代表朱德轩溯淮而上，与地方势力及皖北国民党地方官员联系协商淮盐经淮河西运安徽、河南、湖北等省事宜。

1939 年
1 月中共苏皖特委派张芳久等三人在朱慕萍、陆亚东带领下，到涟水，随即张芳久来淮阴城找吴觉，见谢冰岩，吴觉从皖地回来后，与张芳久成至交。
3 月淮阴沦陷。与张芳久等去渔沟，成立了淮阴抗日义勇队，任总指挥。义勇队成立不久就在五条路伏击日军车队，打响了淮阴抗日的第一枪。

夏初拒绝了国民党淮阴县县长的招安，同时也拒绝搞灰色武装，并与淮阴大恶霸韩雄激战于文殊庵，击退了土匪的进攻。
6 月率部赴成集剿匪，在涟西打开局面。不久，淮阴抗日义勇队联合涟水抗日义勇队、淮安民众抗日自卫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吴觉任团长，万众一任政委，张芳久任参谋长。
9 月组织第一期的随营干校，亲自授课，发展和培训党员。
初秋率部转至涟水、沭阳边境的六塘河两岸活动，拟与东灌沭的汤曙红部会合建立根据地，因汤曙红被害而未能成功，突破国民党部队的包围后复回涟西一带活动。
11 月与涟水薛华甫部联合，薛华甫部成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注：1939 年 9 月，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改编为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九团。次月，八团和九团及涟水边区游击队在涟东合并组建八路军苏皖纵队南进支队第三梯队，对外称“淮河大队”，吴觉任梯队长，下辖第八、九团。当部队整编完后，即率部向滨海转移，拟建立海滨根据地。
12 月 31 日率部进至韩庄、小兴庄一带宿营，与尾随的涟水常备队徐继泰部遭遇，激战竟日，击退了顽军的进攻。

1940 年
2 月 9 日在古（寨）（涟）城公路与漳河交汇处的洪码头布下口袋阵，出敌不意，痛击回归之敌，激战数小时，共毙伤日伪军 100 余人。
3 月遭遇国民党韩德勤部组织的七县联合“清剿”，果断将队伍分为小股，灵活穿插，严惩特务和土顽，伺机打击敌人，取得了反摩擦战的胜利，得到了苏皖区党委的嘉奖表扬。
5 月～7 月根据中原局关于坚持原地斗争，积极准备迎接主力东进的指示，迅即集中和充实部队，恢复团的建制，为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起了接应的重要作用。
7 月主力东进淮海后，奉命率第八团赴淮阴协助建立县乡两级人民政权。

1941 年

春奉命保卫淮海根据地负责剿匪，激战于涟水马圩荡平涟水之土顽；再战于淮阴之新渡口；三战于三棵树一带，扫平淮阴土顽之乱。
6 月经淮海区党委批准重新入党。随后八团上升为主力，改番号为新四军独立旅第三团，吴觉任团长。
10 月率部配合新四军主力参加程道口战役。

1942 年

5 月离开部队，回淮海区行政公署任民政处长，率部队保护民工扒万公河。
7 月陪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赴各县巡视。
10 月任淮阴县县长兼地方主力部队四支队十团团长，推行全县扩军运动，收失地、打日伪、搞统战、挤匪顽。
年底任淮阴县敌工部部长。

1944 年

8 月至次年 2 月，在淮南华中党校学习。在淮海地区根据地开辟和对敌斗争的工作经历得到

了认可和表扬，经民主讨论，组织决定，改吴觉入党时间为 1938 年找党、为党活动时起。

1945 年

2 月淮海地委进行改组，任地委委员，同时任淮海专员公署专员。
8 月任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淮海军分区副政委。
9 月奉命率淮海区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三师攻占淮阴城。淮阴解放后，全面负责接管工作，筹备建立新政权。
11 月 1 日苏皖边区政府成立，担任行政委员会委员。

1946 年

1 月清江市（淮阴城）划归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后，吴觉仍回第六地委（原淮海地委）工作，组织人力、物力救灾。
4～5 月与边区政府副主席韦悫一起代表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去“北京三人小组”执行部，与美国代表谈救济问题。
8 月底华中军区、苏皖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北线后勤司令部，吴觉任北线后勤司令员，负责调动指挥皖北、淮海、盐阜三个地区的后勤工作。
9 月～12 月参加了洪泽湖阻击战、两淮保卫战、涟水保卫战和宿北战役等，全力做好后勤工作。
12 月底出席六地委扩大会，进一步号召和组织群众性游击战争，就地坚持斗争。

1947 年

3 月苏北区党委成立，吴觉为委员之一，同时任六分区副书记、专署专员、军分区副政委，领导党政军民坚持敌后，艰苦战斗，与敌争夺六分区这个苏鲁交通“华容道”。
7 月出席地委会议，总结敌后坚持斗争与财粮工作，确定土地复查为今后中心任务，并要求党员干部进行“三查”（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
8 月 7 日任第六地委书记。

1948 年

6 月 3 日主持召开地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华中土地会议精神，纠正“左”的倾向，落实团结中农的政策。
9 月为配合淮海战役，奉命率部围困、解放连云港。
12 月率部攻打淮阴、淮安、宝应等城。两淮市（淮阴淮安）成立，兼两淮市市委书记、市长、军管会副主任、警备司令部政委。

1949 年

4 月 24 日率大批干部过长江，接管苏锡常一带。
5 月任常州地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军分区政委。

1950 年

8 月任苏南高等法院院长。
10 月调国务院治淮委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

1955 年

8 月受诬被捕。自此，吴觉因为身体原因及为历次运动所累，除在 1958 年短暂担任河南三门峡水电工程局任副局长外，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恢复名誉，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重新出来工作。

1979 年

9 月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拨乱反正，除旧布新，使南工的各项工作重新走向正规。

1984 年
4 月 30 日因病逝世，终年 72 岁。

附录

我的自述

一、我的幼年
家庭出身学校教育参加学潮开除学籍革命思想的萌芽

我的家庭原是苏北淮阴县有权势的名门巨族，祖居县城西北渔沟镇五条路南吴家庄的乡村，自曾祖始家道衰落，殆至祖父手，有田不及二十亩，祖父母及我父辈兄弟三房二十余口的家人，尚不及一人一亩，虽佃田租种，但仍入不敷出，每年均举债，实为一贫农之家庭。祖父是一清朝末科举武秀才，与伯叔父等均粗识文字，终生从事农业生产，但性情豪爽，办事公正为乡里所推崇。自己因学武不能求进，因为时已有洋枪洋炮，清政府已废除武考，因此一心使儿子专力学文，三个儿子中只有我父亲肯学习，故力求我父亲上进。父亲名引湘，字楚南，从淮阴王举人学习，中二名末科秀才。因清政府已废除科举考试，父亲初为垫师，后清政府创办洋学于南京设两江优级师范，是为苏、浙、皖三省最高学府，父亲自学数、理、化报考，结果考取“二级优级师范”，实属不易。当时学校不但不收取学费而且有津贴，我父亲当时常将津贴节省以资补家庭。父亲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即就聘于江苏省立第六师范，教授国文、史地学科，并兼级主任、舍监等职，薪给颇丰，服务于该校十有数年。晚年历任中学教务主任、校长等职，1938 年秋死于苏北宿迁中学校长任上。他为人忠厚、极重道德，重信义、不损人，沉默寡言，终日埋首于书堆内，不爱与人交游，真是非礼莫为、非礼莫言，俯首走路目不斜视。晚年同情革命，对我参加革命，非但不因我是独子而予阻拦，并时时给予鼓励，常因我被捕入狱而停职奔走营救，如我第四次被捕时，他在外奔走营救达一年之久，待我诉讼诉定案后才返校继续他的职业，虽然如此对我迄未流露怨言。族人多讥其对我过份溺爱放纵，我父为我忧郁辛劳过甚，实为他过早病死的主要因素。他生前对国民党极不满，他的学生多有劝他参加国民党而利于工作，均遭其拒绝。他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之所以不致失业者，且能获得中学校长之地位，端赖其在江苏教育界服务数十年，其学生故旧供职于国民党省方者颇多，因此他的职业工作自有其学生故旧给予支持了。

我是于 1912 年 4 月 1 日生于渔沟农村的故居祖宅。据母亲讲，当我出生时家庭经济情况才开始好转，逐步上升，乃因当时我父已服务于省立第六师范，月薪在百数十元，本人每月仅用不及 10 元，按那时城市每人 3 元即可生活，因而月结余悉数交给祖父。祖父则利用父亲月薪购田置产，未及十年家中购有良田 200 余亩，连同典入地约三百数十亩，并有市房两处，并与人合股经营木厂生意。我的大家庭，亦逐渐由受人剥削的贫农，数年间即上升为中农、富农、雇工耕种的地主。迨至 1918 年祖父病逝，1920 年我随父亲、母亲和姐姐整个一房移居淮阴县城。由于农村大家庭已很富有，所以至此以后父亲就不再贴补大家庭，农村田产等均由伯父、叔父经营，他们自己参加劳动并雇工数名，成为经营地主。我们一家完全依靠父亲的薪奉收入在城里生活，薪俸节余，多储存于银行内以准备子女教育经费的基金，由于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不善经济经营，其生平积蓄大多为人所骗。至于我的出身，入党时都填“地主”，但 1944 年秋~1945 年在华中局党校整风学习时，由小组讨论改为“教师自由职业”。我父亲的为人处事、品德、对政局的不满以及对国民党人的轻视是给我有一定影响的。

我的祖母是个中农的女儿，和善慈爱，对我最为钟爱，我的任性与祖母的溺爱是有一定关系，在我第三次被捕入狱时，祖母因思念我而死，弥留之际尚不断呼我乳名。

我的母亲何氏，是一个中农家庭出生的农村妇女，不识字，性情善良，是一个旧礼教影响陶冶的农民女儿，贤妇、孝公婆、笃爱子女，但不知如何教育子女，同情邻里穷人，无论居乡居城对穷人有所求无不应，且能主动帮助穷人，她的为人也对我有很大影响。

我小学就读于父亲学校的附属小学，虽然之前也读过书，但因种种原因都十分短暂。我 5 岁时开蒙入学，初则在私塾就学，次年进万寿庵小学读书，因被牛角所触及同学碰伤吐血而不读了，也只几日。1919 年入渔沟小学读书，又因患伤寒而辍学，直至 1921 随父就读于江苏第六师范附小才真正开始读书。因该小学是省立小学，经费充实，设备齐全，师资较优，校长主事是名教育家，曾历任中学校长。五四运动后，学校从校长到教员大多是爱国的，废文言，倡白话，崇尚民主，反对军阀割据，反对官僚腐败，轻视猪仔议员，因而小学教育给我幼年影响是很深的，接受了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思想，从小就厌恶军阀，痛恨帝国主

义。
我幼少年时期体质极弱多病，除咳血、脾大、患伤寒病外，经常咳嗽、高烧，可能是气管炎，今日阻塞性肺气肿想来植根已久，而且扁桃体经常发炎，直至 15 岁割除，我的身体也是从 15 岁以后才开始由弱转强。
我幼时的聪明是为人所道，可是我不用功，也不爱惜，只喜看旧小说，因而学习成绩都是中等或中下，小学毕业就专门请人为我补习。1925 年夏，时年 13 岁，小学毕业投考的江苏省立师范第九中学是名教育家李更生首创的，极难考，所收学生，要学习好、年轻、聪明，尤重口试，是专为交通大学培植学生，2000 名才录取 100 名，每 20 名中取 1 名，考取该校我感到十分荣幸。这个学校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化的学校，生活极为严整，对学生灌输了强烈的爱国情愫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学校一切生活均采取欧化，学生全部住校，除星期日外不准请假，不准走出校门，教学采取淘汰制，两门功课不及格就开除，每学期都要被淘汰数名。校长李更生是国民党的老同盟会会员，朝气蓬勃，办学严肃而认真，于 1927 年北阀军抵上海时为人所暗杀。
虽然我幼年所受教育，均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教育，但它毕竟培育我具有热爱祖国、仇视军阀及帝国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追求真理的心灵，以及伴随生长起来的正义感。1927 年，北阀军抵我家乡，国民革命军驱逐了盘踞淮阴的孙传芳，给我莫大的振奋鼓舞。当时我很幼稚，尚不知道革命的深远意义，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也不知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其分歧，只知道军阀应该打倒，洋人应该赶走，打倒土豪劣绅也很痛快。到了“五卅”惨案，蔡公时在济南为日兵所杀，我的爱国感已达到狂热，同学相聚，每谈及时事往往为之痛哭流涕，当时就参加了淮阴地方所组织的爱国团体——淮阴青年所组织的国民外交后援会，很快就被卷入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洪流中，结队游行，搜查日货，烧毁日货，跟着第六师范的大学生后面跑，满腔热血，废寝忘食，这是我开始走入社会活动的第一步。当时我只有 15 岁。可是后来我听说蒋介石与北方军阀妥协，国共分裂，听说蒋介石不革命了，再看本地的国民党县党部的国民党委员们又穿起长袍马褂，吃喝嫖赌，贪污枉法，土豪劣绅世侩都参加国民党，变成党老爷，一切恢复旧观，革命的风暴已过去，一切不过如此使我十分失望，自革命风暴过去自己也不安心读书，对学校的高压政策有些不满之感。1928 年春，为了追求知识而加入了同班同学王凤楼组织的“三五研究社”（当时参加时不知道是党所组织与领导的，这是以后才知道的），开始阅读创造社的文艺书刊，有时也读到新青年季刊，在进步同学的点拨下稍许获得了点革命启蒙的知识，这才概念式的知道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两大任务，理会到蒋介石与国民党是出卖了中国革命而投降了帝国主义，由于狭隘的爱国情绪而对蒋介石与国民党极为不满，蕴蓄着革命的萌芽。我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革命认识极为模糊，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参加共产党，但内心却激荡着不满与仇视现实的热流。我是异常轻视学校内的国民党员，见面则呼之为“党老爷”。我也不安心学习，学习成绩不好，可是学校国文会考我乱写一篇，倒得了一个全校第一，校中对我大加嘉勉。我也想努力学习，循序渐进不要沉湎于空想，走父亲的道路，可是就在同年冬季的时候，学校里爆发了学潮。这个学潮的目的是驱逐校长及少数压制学生、行为专横的教员，我参加了这个运动。也许因为我当时是个狂热的孩子吧，而被选为学潮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风潮坚持有两日之久，终因停发经费而解散。那时我尚没有意识到这个学潮与共产党有何关联，可是学校在告家长及社会人士时都宣称“赤色气氛弥漫全校”。风潮的终息是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大学行政院公布了开除风潮为首的 12 个学生的学籍，不给转学证件，并通知各公立学校勿予收容。这样惩处犹嫌不足，学校当局又开除了 36 名同学，但对这 36 个同学尚表示点“宽大仁厚”而发给了转学证书。我呢不幸而为大学行政院开除学籍，失去学籍，不发证件，读了十年书，最后是落个赤手空拳，一个 16 岁的孩子遭此打击，真感到前途茫茫，不知所往。但是出乎我意外的，是我的父亲对我被开除学籍，非但未予责难，反说：“你们的校长是个贪污的党

棍，是该被驱逐的”，并且鼓励我今后要好好读书，并说既然公立学校不好进，你可以往江南去进私立学校。当时我被父亲的深爱与宽大感动得热泪泫泫，几乎要失声痛哭一场，以泄满腔怨气。我被开除时年仅 16 岁，即遭国民党如此摧残，自此以后我即变成一个流浪的学生，失掉正常循序渐进的读书机会，因此我对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有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思想。我仇视国民党，蓄意要向国民党造反，至于如何造法，走什么路全未考虑，只要是反对蒋介石的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我都想参加，我完全变成一个愤恨现实的青年。

1929 年新春，我改名吴玉随着被开除的同学去南京求学，考入南京私立正谊中学，同年冬又转入上海私立建设大学附中。

国民党中央政府大学行政院对我的开除学籍，是对我幼年时期的一个摧残扼杀的残暴行为。当时我很幼稚的想到我们反对校长而没有反对掉，我们失败，他们胜利了，失败的人是应该受到胜利者的惩罚，但国民党的最高政府为什么这样凶狠毒辣，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呢？况且校长的贪污是证据确凿而且已经其派员调查过，但是他的处理是校长仍回原校继续任职，校长开除的学生是发给证件，但是领导全国教育的大学行政院对我们 12 个不幸青年偏偏是开除学籍，剥夺我们享受教育的机会，想绞杀青年求进的欲望。因此，我由仇视学校当局转而仇恨大学行政院，使我对国民党的统治产生嫉视与仇恨的情绪，内心蕴蓄着对国民党这一不公平的残酷行为必须给以报复。至于如何报复，当时却未能思索过，但对国民党的一切都是嫉视仇恨的，也可以说在我的心灵中撒下了不满现实的“叛逆性”。尤其我在南京读书期间，目睹国民党为了装璜京都，扩建马路，逼死市民的惨剧，以及国民党为了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勒令拆除下关一带草房，一任国际观瞻，但居民不肯迁移，公安局竟然干起夜间纵火焚毁的勾当，因事不机密，引起群众包围公安局，向蒋介石焚香跪求请愿。这些卑劣的土匪流氓行为，曾唤起我参加革命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念头。当时我在南京读书时，是常见到国民党改组派要求蒋介石下野、改革政治的传单，当时我即想参加改组派，但我不认识一个改组派的人，也没有一个改组派的人找过我，否则我当时完全有可能参加国民党的改组派。那时由于我政治上的幼稚，我是认为凡是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都是好的，都是对的，所以至此也可以说是革命思想的萌芽吧！

二、入团前后

参加革命被殴争讼误捕首次入狱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度厌倦动摇组织爱国救亡的剧社

1930 年春，我来到上海进入建设大学附中，这时我父亲将我的名字改为吴觉。

上海，这是东方最大的都市，也是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们侵略中国的神经枢纽，过去仇恨帝国主义是出于理性的认识，并没有亲眼看见过帝国主义凶恶贪婪的嘴脸，以及亲身受过帝国主义者们的贱视。可是自我踏进了上海以后，我目睹了外国巡捕殴打中国苦力，游荡在马路上的外国水兵殴打中国人与侮辱中国妇女作为酒后余兴。我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傲慢的神色，也曾亲身体验到对中国人的轻视。因此，自我踏进上海以后，我的爱国情绪是越发激昂，我想若不是国民党蒋介石投降了帝国主义，上海租界也将如九江租界一样是久为中国人所收复了，因此要求参加革命的意识是益发迫切。当然上海学校也非内地学校可比，党派活动是很明朗的，党派之间的斗争也很激烈，学校里有共产党，也有改组派。

我初到上海喜读国民党改组派的《革命报》，因为这个报纸是专门攻击蒋介石当权派的，骂得很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那时我比较幼稚，由于对蒋介石的不满，因而对改组派曾报有幻想，认为改组派是反蒋的，是革命的，是可以救中国的。可是因为建设大学就是一批改组派办的，我很不喜欢这些人，因建设大学是没有立案的学校，大学已解散，中学也被勒令停办，但是学校当局仍意图拖下去，骗学生的钱。那时没有立案的学校是不能开学的，因此学生就要求学校退费，学校则坚不退费，组织一部分免费的学生来护校，想继续维持下去。我是坚决参加了退费学生一边。由于我积极参加退费运动，被一个同学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也曾经同他们参加了一次党所布置的示威，当时我们似乎意识到共产党的革命

是要比改组派彻底些，要革命就应以参加共产党为好。因此进校未及两个月由一位苏北阜宁人姓孟的介绍而参加学校内党所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也许是左联，现在已记不清了。这时我虽然已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队伍，实际我在淮阴省九中被开除以后，在家乡及认识的同学中，已久被视为赤色分子，但是我之参加革命并非出于阶级的觉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也没有什么清晰的认识，只认为共产党是要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是要达到人类真正平等的。

在我参加革命队伍的同时也就卷入了学校内的学生运动，反对学校营业化的骗钱行为，斗争甚为剧烈。由于我的积极，也许是锋芒过露致遭反动校职员及其走狗学生们的仇视，在某晨周会中，为反对学生所包围，棍棒殴打，遍体鳞伤。当最后一棍劈向我的头部时，我用力接棍，顺势起立，冲出礼堂，所幸正好另一被打而逃出同学已带警察前来营救，因我们伤势较重，即抓了数名为首的凶手带回警局。其实这次行动完全是学校教务处长杜某亲临现场指挥的，他是国民党改组派在学校中的头子，我尝到国民党改组派的苦头，自此彻底丢掉对国民党改组派的幻想。也为此争诉于上海市地方法院，我为原告，学校当局反控我为共产党分子，并散发反动传单，但无人证物证；我则控其聚众行凶的伤害罪，终因我伤痕累累，人证又多，结果为我胜诉，行凶同学被处以短期拘禁。

这个学校我也不能再住下去，由同乡同学、复旦大学的史文敏把我接往复旦大学居住，准备功课，想夏天直接报考大学。

同年夏天我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系。大夏是私立大学，我一个初中未毕业的学生，由于流浪的求学生活，学习已抛荒了，经过努力复习，如今能跨进大学门，自有一番欣喜。在未开学前的 8 月间，我曾被误捕入狱一次，其被禁期间不及 10 日，虽然是因普通案的误捕，但也算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被捕。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年夏天苏北同学多来上海投考学校，有两位同学一姓王，一姓诸，他们两人来上海后，是住于工厂区内的亲属家，我与另一大夏同乡去探望，适值密探巡警搜查该区，王、诸两同学携带有很多的学校印信文件，且每人身带数百元，因此为巡警所拘，我虽是来访之客，亦未幸免而被拘。其事情的发展是，起初巡警有敲诈之意，而王、诸两同学则坚不屈从，巡警因而恼羞成怒，遂将我等及房东人等一并带拘分局，旋以“嫌疑”字样转介市公安局，由该局司法科进行审讯了两次，也许是三次，案情判明，且有诸姓同学亲戚淮阴人周仲千是当时上海中南银行总经理，从中作保，除诸姓同学承认伪造印信科以少量罚金外，其他人等均无条件释放。

出狱后，学校已开始登记报到，我即进大夏大学读书。此时我在思想上也起了一些变化，由于过往两年所经历的“被开除”、“凶殴”、“误捕”，使我对敌人更加仇恨，由于实际生活的接触对共产党非但具有好感，而且也具有纯朴而幼稚的崇拜，感到共产党干事痛快，热切地希望参加共产党闹革命。因此入校后就参加了校内党所领导的革命学生会（是秘密组织），不久就由同乡同学的党员吴天木、团员方超二人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年 18 岁了。我入团后，政治上虽然是很幼稚，但在工作行动上都表现非常勇敢积极。我是一个热情奔放、勇敢奋斗、出色的战士，我自己购置了工人服，经常化装成工人，在工人放工时，混杂在工人中散发传单，夜间进入美国水兵营地散发反帝传单。在 1930 至 1931 年夏的这段时间，上海的党组织经常举行示威与飞行集合，每有活动我都积极参加。白色恐怖当时非常严重，每次行动都能看到一些同志被捕，我也看到我们学校很多同志对白色恐怖是有所畏惧的，表现了躲避行动与趔趄不前，我是鄙视这些胆小的同学。由于我的积极勇敢，我曾被上级党选去参加捣毁反共反苏的现代书店与放映反共电影的黄金大剧院，这两次均遭巡捕密探围搜，几乎被捕。尤其是有几次我参加了示威打电车的行动，在行动中已被密探抓捕到手，但又被我从人群中挣脱逃走。由于我的机智多次脱险未被捕，也由于我的积极，在入团不久即被选为团的支部书记。一个初参加革命的青年，当然是满腔革命的烈火，一往直前、无所顾虑的，但由于我个人参加革命，多出于对蒋介石国民党愤懑敌视，以及狭隘的反帝爱国思想所驱策，

在入团以后，政治上仍是极为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严重存在。一度积极奋发，经受几次惊险以后仍全无顾虑一往直前。可是大夏的老党员，他们都很警惕，很多人都是待行动后才到达旋即返回，方超就是这样一个老党员，因而在我的印象中留下些暗影，同时也对这些频繁的游行示威及飞行集会产生怀疑。当时我看到不少同志对行动的躲避畏缩，因而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产生了怀疑，我开始怀疑行动的效果及其是否正确，行动中大批同志的被捕，革命力量的损失，同时也联想到我如果万一被捕是否值得，我所支付的代价，对革命对个人能够获得的是什么？因而我对革命生活产生了厌倦消极的情绪，加以后来又伴随着某些其他原因，间接离开组织，参加革命组织生活为期只有 6 个月。

我之一度离开组织生活是 1931 年夏以后的事，其时我 19 岁。这一年夏天，因暑假而回到了家乡的淮阴城，我的组织关系也被转到淮阴，可是地方党组织并未同我碰面，我当时也无法找到他们。直至省团委巡视员小周来淮阴住在我家中，问我同地方党是否发生关系，我说他们没有来找我。小周很奇怪说我的团关系早就转来了，他们为什么不来找你呢？尔后他掏出淮盐党的机关地点一看，原来党与团的特委机关就在我家对门巷内，相距不足 20 米，我即陪小周去找特委，才有机会与淮盐特委书记王伯谦、团书记小宋见面，王也说我的团关系介绍信是久已收到了。我们相距咫尺，而且他们也是认识我的，为什么不找我呢？对此我确实感到怀疑和茫然。省委小周走后，他们还不分配我的工作。后来我听人说是他们看不惯我的西装革履的派头，说我是公子少爷大学生，怕我靠不住，因而迟迟不分配我的工作。这种对我轻视的态度，使我受到一次意外的打击，我的感情颇为之激动而且反感。自此，我怀疑我过去的一切，我过去的勇敢、积极、冒险的行动是否幼稚，是否值得，党的这些行动是否正确，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许多人那样的消极，我的道路是否走对了呢？

不久介绍我入团的方超也由上海回淮阴家居，他是未带关系回来的。在此以前方超久已脱离大夏大学，而被调在共青团江苏省委任秘书，因生活腐化，乱花党的经费而被撤销工作。但是方超对我隐瞒了这一情况，而胡吹一顿，说上海党的内部派别斗争非常紊乱，很多老同志都悲观失望，因此他暂时避开上海而回来的。由于平时视方超为革命的先辈，政治上、理论上都较我强多了，也由于我政治上的幼稚而听信了方超的鬼话，他劝我不要与特委发生关系，说他自己也不与特委发生关系。适值淮阴农村土匪蜂起，我家农村大家庭为土匪抢烧一空，寸物无存，多年积累一旦化为火烬，数十口家人均团聚城内，今后生活、房屋、衣物、什物、牲畜农具等均需添置，这些费用均要我父亲负担，造成了父亲在经济上的一时拮据。同时我个人又有对革命生活的厌倦情绪，因而我主动向父亲建议停学半年，父亲也未表异议，因而 1931 的下半年就停学在家了。

可是我的消极情绪毕竟还是暂时的。暑假过去了，紧接着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致使我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让于日军。事变激发了我的爱国情绪，燃烧了我胸中潜伏着的革命火焰，反而厌倦家居生活的孤寂，恨不能马上奔回革命的战场。由于淮盐党组织并没有改变对我的看法，我决心自己找工作做，做些于革命于国家有利的事情，我已不能自持，我要奋起为抗日救亡斗争。那时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有占领我国沿海的可能，因而我一度下乡活动，与族人吴其锷、吴引腾及一个和尚还有些青年商议决定成立铁血团，参加者每人必有一支枪。后来组织建立了，大家都准备日本人来了我们就打游击。我由乡回到城里后适巧于城南公园遇见了特委书记王伯谦，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因此见了我就劈面说："你在渔沟组织铁血团，要每人一支枪，不是地主富农子弟谁能参加？"意思就是我们组织的是地主武装。我听了以后，虽然有不痛快的感觉，但也觉得有理，自此就不与这些人联系了，也不参加他们活动。后来听说铁血团的人员大多数都成为了共产党员，大概在 1932 年夏以后那个和尚就被国民党部队逮捕了。

同时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人也暂时适可而止，时局求得暂时和缓。因此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进行宣传工作，唤醒民众反对不抵抗的蒋介石。于是我着手联合城区进步青

年组织“国难剧社”，开展爱国救亡的宣传工作。当时联系到张国权、陈白尘两人。张国权是一个爱国青年，是无党派的学生，在上海领导学生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国民党出兵东北收复失地，被蒋介石用刺刀驱散押送遣返回到淮阴。陈白尘是上海左翼作家，参加了当时有名的南国剧社。

寒假期间上海等地的淮阴学生归来，国难剧社终于成立。以旅外学生为主，结合了本地青年学生，剧社设三常委，无社长，张国权任总务部长，我任剧务部部长，方超任编辑研究部部长，陈白尘任导演。

我在组织剧社活动的过程中结识了西北军冯玉祥部二十五路军的参议宣侠父同志（宣是蒋介石派驻二十五路军监视二十五路军总指挥梁冠英的，谁知宣侠父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与梁冠英搞得很好，梁对宣很赏识信任，并跟宣学习社会科学，因宣和我结识，因而梁冠英就支持国难剧社），宣随部队驻淮阴，我在他的扶掖下终于组织了剧社。宣当时以部队指挥部名义津贴剧社每日 100 元，而剧社对其全军进行公演，宣传抗日救国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公演时甚至个别演员由于激动在台上高呼“打倒国民党！”台下士兵竟响以热烈掌声。剧社除公演外还经常进行城乡宣传工作，公开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剧社以公演、演讲的形式向广大市民、士兵进行宣传，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行为。西北军二十五路军整个官兵都轮流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对部队教育很大。由于二十五路军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另外当时国民党淮阴县党部是由周化鹏担任整理委员会主任，周是我父亲的学生，私人关系很密切，同时他也仅知我们纯是爱国青年学生，台上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我们解释是演员演戏过于激动的行动，因而他们也未追究。由于二十五路军和周化鹏的关系，当地国民党当局对我们敢怒不敢言，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这个时期国民党县政府也组织了什么“御侮自卫委员会”，都是地方土豪、劣绅、巨富参加的，以欺骗群众，竟然也聘请我为委员，当时国难剧社在淮阴社会的影响可知矣！

1932 年，淞沪停战，江南各学校纷纷开学，我们都要南去读书，因而国难剧社约在 1932 年 3 月份解体了。可是由于国难剧社的活动，淮阴城市抗日救亡的热情被掀起来了，青年们也动起来了，为党的城市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国难剧社的社员绝大多数都为党所吸收了。淞沪停战协议签定以后不久，南京学校都开学了，可是上海的学校由于受战争破坏的影响，未能及时开学。因此我与上海同学张国权等数十人遂于 1932 年 4 月间前往南京借读于中央大学（当时全国各地都自动起而支援上海学生，各大学都登报欢迎上海学生借读，因为当时大学采取学分制，读了的学分带回原校可以注册算入总学分内），时年 20 岁。那时中央大学是国民党的最高学府，国民党对其控制极严，都是名教授，学术水平是远远超过上海的各大学，全校是暮气沉沉，嗅不到一点革命气息，当时在学生运动中是落后的，全国学生运动主要是北京和上海起先导和主流作用。我在这个学校感到气闷，我虽有心找党但也无处可找。同年大夏大学复课，暑假以后，9 月份我又回到上海大夏继续读书。

三、转党前后

领导学运初受处分“五一”示威被捕法院宣判无罪

我是 1932 年 9 月份初又回到上海大夏大学，虽然我离开大夏一年多了，但回到大夏大学以后，大夏支部里的老同志依然很多，他们对我很熟悉。回校后党的支部书记福建人严炳煌就来找我谈话，他原是大夏的老党员，认识我，我即将我回苏北为何脱团的情况，以及在家乡活动的情况向他作了一个详细的汇报，他立刻决定恢复我的关系，并说党的领导较弱要我参加党的支部。当时上海党的情况是党团不分的，仅仅因为年龄的关系而分别参加党团，又可以因工作的需要将团员调到党内工作。我回到党内未及一个月支部即改组，严炳煌竭力推荐我任支部书记，因此大家就推选了我任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严炳煌、金飞霞、小郭（四川人）等人，金任组织干事，小郭任宣传干事。大学团支部书记是小苏（南洋华桥），附中团支部书记是赵瑞，安徽人，是金飞霞的同乡。我当时领导着一个党支部与两个团支部。在我

任支部书记时间不久，上海党组织决定大量发展组织，发展赤色群众与党团员，因而大夏党团员发展为百余人，赤色群众也有近百人。当时我回到最亲爱的母亲——党的怀抱后，是多么兴奋而激动呵！革命的狂热燃烧着我，热血奔放，真是奋不顾身地工作着，有时忙得连课可以不上，编写着公开与秘密的墙报，也经常化妆去工厂区做突击工作，因此大夏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上海党鉴于大夏党的基础相当雄厚，故以大夏为基础点发动学生运动，以推动上海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

也就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的国际分赃机构——国际联盟为调解中日纠纷派遣一个以美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件，调查后并写了一个李顿报告书，向国际联盟作了报告，并向全世界公布此项文件，中国报纸也全部发表了。这个报告是出卖中国权利而偏袒纵容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与日本帝国主义谋求妥协，是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花招。大夏党支部决定公开组织李顿报告书研究会，藉以公开组织与发动群众，掀起沉闷已久的学生运动。在发起组织公告张贴后，当日签名参加者即达五六百人。旋即召开大会，成立组织，我被推选为该会主席。李顿报告书研究会搞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其时大夏除近百人党团员加赤色群众基础力量恐将近 200 人，以一个一千数百人的大学而论，革命力量的比率是可以说是雄厚的了，观形势是大有可为。大夏党支部原是由沪西特委、周家桥区委领导的，现在改由沪西特委书记小葛亲自领导，并派了省委巡视员刘顺元同志来直接领导我。为了加强领导，大夏支部改为支部局，我被选为支部局书记。上级示意以我校为重点再与外校及工厂联系掀起上海的学生运动。我也曾与上海各大学联系过，记得也开了些联系的会议，但终因当时学生运动历遭国民党的摧残破坏，是处在低潮时期，除大夏的运动开展外，其他学校大多死气沉沉，未能发动起来，在形势上已显示了大夏的运动是比较孤立的。可是当时党仍决定首先在大夏进行罢课，以此来策动其他大学响应。现在想来当时发动大夏罢课的斗争口号似乎是异常模糊，不够明确，缺乏鼓动性与指导性，也有些突然，运动发展的过程是表现不自然的。

但由于当时大夏革命基本力量比较雄厚，而且全校绝大多数的同志已被组织进李顿报告书研究会里来，这个研究会是形成了全校性的群众运动，并且实质上它已代替了当时黄色学生会的职能，因此发动全校大罢课是并不太困难的事。翌日召开群众大会时，上海市国民党当局派来了大批军警包围会场，全校戒严，岗位密布，反动学生四处寻找，学校校长公开出面宣布李顿报告书研究会为挂羊头卖狗肉的非法组织，大会被驱散，白色恐怖笼罩全校，情况甚为紧张。当时我估计敌人可能夜间进行搜捕，因群众被驱散后，国民党的军警仍在学校巡逻，因此我决定并通知了较红同学暂为隐蔽一二日以观察情况的发展，我本人即与胡增煌同志（支部局组织委员）去真如暨南大学张国权处暂避。经过两夜敌人并未进行搜查逮捕，因而我也就于第三日复回大夏。经此打击后，加以时临期末考试，大家都忙于考试，因而李顿报告书研究会就解体了。

但是学校当局及国民党并未放过我们，他们要进一步侦察与摸清我们的情况。我记得我回校后没有几天学校的训育长（当然是国民党员，可是我已忆不起他的姓名了）找我谈话，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以窥测我的态度。他见了我劈头就说找我磋商一件事，说上海市警察总局说我是共产党，我当时很镇定，表示很急躁，我说我之所以组织李顿报告书研究会，是研究国际政治与基于爱国胸怀所驱驰，我是无党派立场的，我并且诚恳要求这位训育长将我带到警察局去解释一下。他说也不必去了，自己注意就行了，他说他估计我是纯爱国的行动，可能为人所利用，由于这一席谈话学校是不怀疑我是共产党，认为我是个豪爽热情的无派别的爱国青年。其所以如此，可能是我的主席地位所决定的，因为主持大会，为了团结大多数不能有露骨的政治倾向性，因为参加研究会的学生是很复杂的，一般学生多数，所以主持大会的主席要以一套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来对待各种分歧意见，与维持会场的秩序，不轻易流露自己的观点。国民党既然不怀疑发起人及该会主席是共产党人，因此他也就很难确定谁是共

产党，到了寒假仅开除了金飞霞等极少数人，这也仅仅出于怀疑，否则他们可以逮捕金飞霞的。

寒假到来，我仍是回到我的家乡去度假。学校利用假期之便开除了几个较红的同学，我作为公开领导学运的人反而未被开除，这可能是学校当局真的认为我是为人所利用的。寒假过后我仍回校读书，这是 1933 年春，时年 21 岁。当我回到学校后，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即留校同志所组织的寒假支部在假期中曾讨论了大夏支部的工作问题，认为我的领导是犯了路线上的错误，记得指出我的错误是两点：一是在领导运动中犯了“左”倾；二是又犯了右倾逃跑主义，不应将红的人布置暂时隐蔽，并决定给我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当时我对这个处分是不服的，可是那时的情况无法申诉，这是春天三月的事。

当时上海的形势是国民党正在上海大肆推行“自首”政策，因此上海党组织上层和基层时遭破坏。上海党组织在李顿报告书研究会成立之前一方面布置大胆发展组织，为保存实力又布置反“自首”政策，教导每个党员学会保护组织、保护自己，下达“三不”，一不破坏党组织（不出卖供出同志），二不泄露党的机密（党开会的地点、时间或示威、飞行集会的时间地点等），三不发表反党自首宣言，可以采取一切办法欺骗敌人，记得还举列宁说过为了摆脱强盗可以丢掉点财物以欺骗敌人的例子……可见当时斗争是多么严峻。当时大夏与上级党的联系时断时续，我没办法找到区委谈谈我的看法及申诉，我认为我在领导上没有犯什么错误，开始有些左倾这不是我个人应该负责的，我完全根据当时江苏省委巡视员刘顺元的指示执行的，当然刘顺元直接单线联系我，这在支部上是不公开的。运动初期，在群众大会上有些党员在发言中提出过“左”的口号与不够策略的言论，事后我都加以说服纠正。最后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学校，校中反动派与之配合行凶，当时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谁也不能估计国民党就不会抓人，而抓人在当天夜里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为了保证党组织不遭敌人破坏，通知红的人临时离开暂避一二日是完全应该的，不能说是逃跑主义。至于国民党没有抓人，学校寒假没有开除我，这仅是敌人当时没有摸透李顿报告书研究会的真实情况。关于这件事，在同年 5 月 1 日我被捕，在狱中（苏州高等法院）遇见了刘顺元及沪西特委书记小葛，我向他们报告了关于我的错误以及支部给我的处分，他们二人一致表示这个处理是不公平的，并说出狱后一定为我解决这个问题。

我受了这个不公平的处理，是负气、不满的。我没有参加党小组会，隔了一个多月后，支部书记胡增煌向我表示，他们准备撤销这个处分，要我参加党的小组会，因此我在四月间才参加一次党的小组会。

这段时间我虽在大夏读书，但我被分配到社会科学者大同盟沪西分盟任组织工作，实际负责领导沪西区的周家桥、大夏大学以及闸北区的暨南大学、东南医学院（即今日的安徽医学院）、真如镇等五个支盟的工作。这一时期虽然受到党的处分，但革命情绪与工作热情仍是向上发展，对工作是积极负责埋头苦干的。

同年 5 月 1 日，党决定了在公共租界泥申桥举行“五一”大示威，并决定我在示威时任游行队伍某一路段的指挥。当时示威情况尚佳，虽然有巡捕密探驱逐逮捕，但示威者仍历久不散。当示威群众向大马路附近移动的时候，忽然有人通知我们，要我们转移至华界小西门公共体育场集合（现在看来这个通知可能是特务的鬼把戏，想将我们诱骗去华界以便逮捕）。当我奔至小西门公共体育场时，门警拒不准入，此时先后抵达的示威群众已有百数十人，正围聚门口与门警争吵，忽然特务出现包围逮捕，当场被捕者约有数十人，安徽省教育厅孙兰同志亦于体育场门口被捕，她是由上海市公安局直接出狱未被送法院。

被捕后即被解往国民党上海市公安总局，都由叛徒特务审讯的。我可能被审讯两至三次，已记不清了，我坚不承认是参加“五一”示威，更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我坚称是往小西门体育学校等我爱人×××的，是在途中被捕，而否认是在体育场门口被捕。在公安局看守所内遇见了先后领导我工作的刘顺元、小郭、小李、老何等四位同志，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捕的，

被关在公安局内。我在公安局被关约一个星期，其间公安局已通知我找保，保尚未找到，又被解往上海地方法院，后即被解送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同时被解送者约有四、五十个同志，刘顺元等同志也被同时解往苏州法院。我们每两人同铐一副手铐，中间串以粗绳索相连，分为两个小队，每小队约 40 人左右，由法警分别押上两辆囚车，经公共租界而驰往北火车站乘火车解往苏州。

囚车也必须经外国巡捕房的批准才能过境，囚车停在美国巡捕房门前，久久未能办好过境手续，我们也等得不耐烦了，索性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例”、“立即收回租界”，这是难得的一次大示威，大家不约而同的高呼口号，如此一来倒也惊动了外国老爷，慌忙办了过境手续。这也帮了法警们一个忙，因此法警也很高兴，毕竟有这么一批政治犯长了他们的志气。

囚车抵达北火车站，法警将我们引出囚车从漫长的候车室鱼贯而过，数以万计旅客和群众围观我们这个 80 余人的囚徒队伍。我们要不负群众的热望，要不虚此行，于是缓步而行，高唱国际歌，振臂举起被镣铐的一只手，高呼“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立即出兵收复东北三省”、“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国民党”，群众引颈而望，法警则瞠目结舌。至车上法警驱赶其他乘客，让我们独乘一列客车，我们则向月台上的旅客高唱国际歌与呼口号，火车开动了，我们则向押解的法警宣传蒋介石对帝国主义是屈膝投降，忙于内战，逮捕我们这些爱国无辜的青年等罪行，法警对我们也无可奈何。我记得我当时劲头最大，讲话激昂慷慨，法警反而取杯水给我并说“口渴了吧，喝口水，休息休息。”自此车每停一站我们即向月台上的旅客演讲，呼口号，就连两个列车相遇时我们也不放过机会呼口号。

抵达苏州后，法警的原计划是雇马车，将我们送往高等法院，这个计划被我们拒绝了，坚持要步行去法院，利用这个机会来一个反国民党的大示威大游行。法警由于雇用二、三十辆马车也非易事，而且还要解开绳索分散置于各个车内，监守更为困难，因而也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当我们穿过数华里的苏州闹市时，正值上午 10 时左右，街上市民极为拥挤，我们却又缓步而行，整齐地呼口号，唱着歌高呼“反对国民党对我爱国青年的无理逮捕”、“反对不抵抗主义”、“出兵立即收复失地”等口号。歌声震荡了整个闹市，围观民众堵塞了道路，往往还要法警前边开道，有些青年与孩子则跟随我们队列前进，不忍离去，沿途振臂高呼口号，引吭高歌，好不动人，真是壮观。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壮烈激昂的大示威、大游行，是从上海地方法院游行示威直至苏州高等法院，途程有二百多里，尚有国民党法警沿途护卫与开道，真是生平快事，现在看来也是在国民党专政下的怪事，是不可理解的。

至法院后，列队停立大院中等候接收与分发监所，我们当然不唱国际歌与呼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因为这是法院，但我们是有秩序的，呼出的是“反对无理逮捕”，要求“立即释放”等口号。当时我是这些行动的组织者指挥者之一，可能给解押的人印象较深，因此国民党的报纸都刊载了“赤匪吴觉等被捕解往苏州法办的消息”。

在交接手续办好后，我们全部被送押于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也就是第三分监，是个老监狱，除女难友复旦大学顾乃湘等两个人被押女监外，我们“五一”示威被捕的与刘顺元、小葛等都押在同一排监房。这所监房全部都是关的政治犯，而且都是共产党，每天各号都上锁，但有两次放风，每次约半小时，可以串号，可以相互谈谈，或者学习革命歌曲，也无人干扰。看守人员还可以为犯人买菜肴与酒，所以我们同号难友也可以盘膝而坐围成一圈，动辄买酒与菜，传盏痛饮一阵，微醉则引吭高歌，倒也另有一翻乐趣。

狱中有党的支部，我进监后，可能由于我被捕后积极带头呼口号唱歌与宣传，能与敌人斗争，况且领导过我的周家桥区委书记小吕是沭阳人已先我而来，因此我参加了号内小组会。我们组织起来，日常进行讨论（因为没有书读）来代替学习，有时由于激烈辩论而招致了看守们的干涉。看守看到我们这批犯人太嚣张，想对我们进行压迫威胁，结果我领导了我们一室的

人与看守对打一顿，这个情况方毅同志是知道的，我当时确实是一个勇敢积极什么都不怕的小伙子。
当我被解到苏州监狱以后，我的父亲也从苏北经上海赶到苏州来营救。他在外边找律师为我们示威被捕的 30 余人递了一个联名的申诉状子。同时我们在狱中也研究与商定法庭斗争的办法，一是大家都不承认沿途唱国际歌与喊口号，二是我们都说是在马路上分别被捕，当时最主要的办法是与法官耍赖皮，采取不肯退庭，全体要求将我们迅速无条件释放，使我们可以继续读书与继续工作。因此每开一庭都是争吵不休，每人都是以各人编造的口供对付，都是马路上抓来的，毫无线索，法官被搞得很难退庭。法官看到我们激昂恳切的态度，每每也表示摇首叹息，也流露出不相信我们都是共产党，允许研究想办法。我们讨论了申诉辩论意见，并由潘天觉执笔写了一个申诉状递交侦察庭，侦察庭开了两庭以后，刘顺元等就分析了我们这批“五一”被捕人可能在第三次庭审即可开释。所以到了第三次侦察庭前，刘顺元就与我谈话，说你可能不会回来了，他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是报告他在上海警察总局看守所时，所知道被捕人员中的自首叛变情况，要我将信密藏带出监狱。果然不出刘顺元同志所料，第三次庭讯时宣布了我们无罪交保释放。
我从苏州宣布无罪释放，父亲带我游玩了风景名胜后，而回苏北去了，我仍回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此时已是 6 月初了。这次被捕给我很大鼓舞，很大教育，学习了很多东西，勇猛壮烈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四、三次被捕
特务鞫询军法判决首次进出反省院
我从苏州出狱回到大夏以后，大夏支部同志对我表示很热情。我参加了党支部会议时他们要我讲述被捕斗争经过，予我很多鼓励。这时大夏党的支部书记是胡增煌（同我住同一个房间），团的支部书记名字叫赵倜（安徽人，现名叫赵瑞，建国后在广西省百色军分区任政治委员），仍有党团员六七十人，但由于白色恐怖而与上级党组织经常失掉联系，党内存在不够稳定的情绪。不久沪西特委负责人来大夏，胡增煌首先将我所转刘顺元的密信交给他，尔后他就找我谈话，问我狱中的情况，并同意将我的问题带回去研究，可以另行分配我的工作，也就是可以将我调出大夏从此脱离学习直接参加革命工作。
事实当时我的处境十分危险，因为在由沪解往苏州途中，由于我积极与敌人斗争，锋芒过露，早已引起新闻记者的注目，而在报纸上报导一批共产党解往苏州的消息，披露了我的名字，学校里的人全知道我被捕解往苏州的情况，学校里是万难再呆下去了。我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一心还想在大学里读下去，事实上是完全不可能了，我将永远离别了学校生活。回想起来，自己从初三被开除以来，为了读书东游西荡，飘泊周转数个学校，有幸能进入大夏大学读书，实属不易。而自己虽然参加了革命，在党团内的组织生活，前后未及一年，政治上非常幼稚。那时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对党员是无法开展系统教育的，我根本不懂马列主义，全凭着热情盲干乱闯，在参加革命后仅读过一本是苏联布哈林的《共产党 A、B、C》，才知道了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向共产党发展的道理。仅读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就以为满腹经纶，自以非凡，其实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战略策略是茫无所知的。当时中国革命已处于低潮时机，白区的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特务猖狂，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白区，处此境地我考虑了我应如何决定我今后的命运，我应有所决策。我也曾有过回家乡暂避一下的念头，因我家是淮阴的巨族，有地位，关系多，料无多大关系，但是由于我的自尊心，由于我对国民党的仇恨，当然也掺杂了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虽然书已不能再读下去了，大夏也不能再长久的呆下去，明知留在上海是很危险的，我仍选择了留在上海继续革命，继续工作。这次被捕非但未有挫伤革命意志，反而加强了我的革命意志，等待组织把我调出大夏继续革命工作。
在我回大夏的第二天，胡增煌即对我说：现在上海有人发起“留苏（联）工读团”，公共登报招考，他说他想到苏联去读书，问我是否愿意去，当时我还问胡这个工读团是否可靠，

他说听说是与苏联大使馆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两个人就决定了前往报名。报名时需要论文一篇及照片两张。我们也唯恐上了特务的圈套，因此论文写得很灰色，主题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以俄为师”来论述阐发的。谁知就在我们报名后的第两三天吧，我又第三次为特务所逮捕，出狱仅仅十来天的时间又被捕入狱了。

被捕后旋即为特务挟持至上海市公安总局内，负责审讯的特务名叫朱秋白。朱是苏北宿迁县人，原名朱曦，是我父亲的学生，在中学时代也与我同过半年学，那是因为国民党定都南京后曾将淮阴的第六师范与淮安的第九中学合并过一个时期，那时朱是学生会主席，是一位出名的共产党，我是一个普通的学生，虽然朱秋白对我的家庭及我个人很熟悉，但他还不知道我后来参加革命的情节。朱见我故意装出热情殷切之态，他准备了早餐，餐后首先向我详细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演变以说明共产主义在国际国内的没落，他很流利滔滔不绝地谈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是劝我要及早回头。在朱秋白谈话时，我并没有很好的在听，正在考虑如何应付他的第二步询问，决定了不管如何我还是来个一切不晓得，一切不承认。因此在他说完以后，我就说我是从未参加任何党派，并说到中学他是共产党而我并未参加呀，也说明了我前次的是被误捕，已经是江苏高等法院查明宣判无罪的人，责问他们为什么又将我捕来，要求其将我即刻释放，以免误了我的学期考试。我的话尤未了，却恼了旁边的两个小特务，向我扑来是拳打脚踢，我的头被击昏倒在地上，鼻子与口腔都被打破，衬衫上满是鲜血，还是朱秋白拦阻了两个小特务，一面将我扶起，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谁个被捕之初都是这样的，并对我说这次谈话到此结束，要我好好想想，改日再谈，并说我是个读书的学生也不会是共产党的重要分子，他能够帮忙的话一定会给我帮忙的，接着我即由小特务带出室外交给巡警送往看守所。这次我在看守所是被关在铁笼子内，还关着重刑的绑票犯以及行刺宋子文的凶手要犯。

在我被捕的第三天，张国权曾来看守所看我一次。张国权其时之所以能见到我，是通过当时公安局的内部关系。在我被捕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长是文（闻）鸿恩，广东人，北伐驻防淮阴时与淮阴李幼章的女儿结婚，因此文鸿恩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时，李幼章的儿子以及淮阴还有些人都于上海公安局任要职，张国权是通过这个关系来看守所见我的。张国权告诉我说胡增煌已将我被捕的情况发电报告诉了我的父亲，估计我父亲这一两天内就可以到上海。

也许就在张国权见我的第二天吧，特务又提我审讯。审讯特务仍是朱秋白，桌子放了几本书，都是社会科学的书籍，其中可能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以及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也有我学校读的讲义《经济思想发展史》，这些书在当时都是禁书，阅读的人是犯罪的，但是除讲义外，这些书都不是我的，而是同房间胡增煌同志的。当时朱秋白拿起了书问起这些书可否是我的，我怕暴露了胡增煌，因而默不作答，他又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是否愿意交出大夏的关系？”我说：“我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我是一个无党派青年，我平时也不关心各党派之间的事。参加学潮而被开除学籍后，流落在江南各私立学校鬼混，学业全无进展，遭遇恶劣。”我希望能让我早日出去，好准备参加学期考试。朱秋白却说过去的事就不用说了，现在我们主要希望你谈谈大夏的情况，要我能将大夏共产党员说出几个来，他可以立即将我释放。我说我过去参加团组织的时间极短，开小组会都以小张、老张的称呼，因此我不认识什么人，同时我离开大夏一年余，上海又经过战事等变动，当我又回到大夏时，却是一个熟脸都瞧不到了，因此我不能瞎说乱冤枉人。他又问：那么你搞的李顿报告书研究会，搞得轰轰烈烈又是什么玩意儿呢？我说我学的是政治，当然对李顿报告书很感兴趣的，其中有关国际法与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因此我们法学院几个同学发起组织该会，原是研究性质，不期大多同学参加了，继而由于强烈的爱国感，也是全员的共同要求，但与共产党无任何关系。他仍要我回去再想想，下次再谈，我还是请他帮忙，他也是满口应承。

第二次询问后的当天，也不知是否第二天，我的父亲从苏北赶来上海，并通过公安局的内部关系见了我。我告诉他审讯我的人是朱秋白，我父亲喜出望外，认为这下好办了，他说他马

上去找朱秋白，可是后来我出狱后才知道我父亲的想法完全落空了，他的高足，竟然不认老师，据说我父亲连续拜访三次，他都躲避不见。隔了两日后，朱秋白又找我谈了一次话，劝我只要交待一个大夏大学的关系也就可以马上恢复自由，但被我严正拒绝了。最后他又以同情的面貌和私谊的姿态，表示他是爱护我的，是竭力帮我的忙，表示我写一份自首启事，办理自首手续也可以释放的。我表示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他沉默说以后再谈吧！可是就在这次谈话后他再也没有找我谈过话，第二天我就被押解送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事法庭审判治罪了。这完全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事，根据国民党的自首政策，像我这样一个自认是一度参加共青团，而由于自己胆小惧怕而自动脱离的人，一般都是释放的，即或怀疑我仍与共产党有关系，又无证据，也该留在警察总局继续审查，也不该送往军事法庭，即或送往法庭也只能以嫌疑犯送往普通司法处理，我是一个普通学生不应送往军事法庭审理治罪，况且朱秋白是我父亲的学生与我也一度同学，而且我父亲又找了他，于情于理也不该采取这个突然迅速的处理。现在想来可能是父亲追逼太紧，他可能想迅速推出手以避纠缠，对我虽有怀疑，但又无证据，从我身上又榨不出油水，特别是最后一次谈话想要我办自首手续而遭我婉拒软顶了。关于我婉拒软顶要我发表自首启事一事，我过去在 1955~1956 年的审干中，我所写的自述中，没有提过此事，这是由于当时的气氛，特别是根据党的政策，在敌人面前承认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就是自首，既然是自首了，又有什么拒绝办自首手续呢？这是自相矛盾，涂脂抹粉了，因此我过去也未提起这事。

我到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出乎我意料的是，这里的监狱对政治犯颇为优待，日间不关号门，每日两餐荤食，犯人可做各种正当娱乐，也可以读社会科学的书。当时警备司令是戴戟（解放后任安徽省副省长），他是当时违抗蒋介石命令发动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领导人之一。十九路军是中外闻名的，尔后十九路军又在福建与我党合作成立反蒋介石的人民政府，但后来垮台了，蒋介石实行分散瓦解的诡计将戴戟调任淞沪警备司令。因此淞沪警备司令部都换了十九路军的人，对犯人也不刑讯了，对政治犯特别优待，除可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外，还可以相互学习英、法、日文。据说特务到这里是吃不开的，法官对特务往往是轻视的，特务来庭作证者，说得不好，往往会讨个没趣而返。

我到了龙华看守所以后心境是开朗的，党给了我很大鼓舞。大夏党支部书记胡增煌为首的同志代表党时常来看我（因为我被捕后，大夏党组织未受任何损失，未有一个党团员为之被捕），并递赠社会科学、辩证法等书给我阅读，见面多给鼓励慰籍。因此我在狱中除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外，则专心致志学习世界语，因为世界语是当时世界进步力量所倡导的，很多马列主义书籍有译成世界语者，因此我以一个月的时间即学会拼音与文法，打下了自学基础。

我的案情也不可能有所变化，因为我已承认一度参加共青团而由于畏惧自动脱离，别的又坚不承认，已经闯过了特务的第一关，至此也不须更改口供，静待其处理。据一般老难友估计，如此案情是判不了多少罪的，据同狱朱碧云同志告诉我说是如能通过看守所所长花点钱是可以释放的（朱碧云同志抗战中在延安，日军投降后的 1946 年，朱返苏北家乡，我们曾见一面）。我听信朱的话，也曾找看守所长谈过话，看守所所长也同意帮忙，谈好 300 元。同时我的父亲从镇江回到上海，他是找到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的关系，因为我族中叔祖吴次藩是顾祝同的老师，随顾当秘书。当时吴次藩以顾祝同的名义致函淞沪警备司令部说情，加以我的供词大体如在公安局的口供，根据这样的案情也是可以免受刑事处分的，所以当时我及父亲都很乐观，认为是可以获得释放的。我也将可以花 300 元买放之事告之父亲，父亲也将此事函商吴次藩，吴次藩复信说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一个高级大机关，断不会行此小贿，要我父亲勿受人骗，因此行贿之事也就不谈了。

我的案子判决很快，第三次庭讯，法官声明终结宣判，判我曾一度参加什么颠覆危害民国的组织，因悔悟而脱离，但仍阅读……等等，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从轻判处一年三个月的徒刑，并送江苏省反省院执行感化等，也未发给我判决书。在法官判决书宣读后，我当庭要求

免送反省院改为留监执行。当时我不想离开上海，因为上海党组织了解我，有组织和同学照顾。但法官未于接受，他说根据司法部规定：凡是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政治犯均一律送反省院，并说就是执行期满的政治犯也必须送反省院后才能出狱。

我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时间不及一个月，于 7 月间就被送往苏州的江苏反省院。同时被解往反省院者共 4 个人，两个是工人已忘其姓名，另一个则叫任仰之，四川人，已是一位眉须皆白的老人，被捕前是中央负责保管文件的人。初入反省院时，该院院长是当时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林彪兼职，但不久就换了国民党的政客刘云专任院长，同时江苏省党部还派一名叫王进珊的来院任思想考核主任，是反省院的主要负责人。进反省院先由该院管理科科长开堂讯问一番，问明年龄、籍贯、职业与犯何罪，以了结接收手续，次则入反省院铁门内分配室，照像按拇指印，填写入院表。此表也不过是一般表格，如姓名、年龄、性别、籍贯、职业、父母配偶姓名、已婚未婚、有何著作，参加何党派社团、信仰何种宗教，我都填写了。填表后根据你填写的文化程度分配编入研究组，大学与高中生编入第一组，初中以上编入第二组，初中高小之间编入第三组，粗识文字的编入第四组，不识字的编入第五组，四、五组的可能还要做工。每个组都是大的班级，约四五十至六七十人不等，我被编入第一组，与任仰之同住一室，后又与黄强（原名王福基）同室，黄强出院后我又与一姓杨学生同室，我先杨而出院，其他也未有什么熟人。

我初进反省院时，反省院是直属国民党司法机关管辖，院中不仅收留政治犯，而且还收容普通少年犯。管理是监狱旧的一套，如反省人员每天要正襟危坐守规矩，并劝反省人员阅读佛经一类的东西，如果能守规矩，即可出院，看守人员都是老狱丁狱吏。

反省院二组以上反省人员都是两人一个房间，号子每日锁门，号子间不准互相私通消息与交谈，上课时列队入教室，有众狱丁狱吏随队列监视，早晨则有晨操。一组的讲授课程有三民主义、中国哲学史、国文、中国近代史，选修的有日文与英文。反省人每天要写日记、上课笔记，课后整理腾清，要写读书笔录，两个星期由反省院收阅检查一次。每大组设组长一人，由反省院从反省人中指定，由院长任命一名院方人员为组主任，即类似学校中班主任。反省人学完 6 个月即出院，如 6 个月不能出院尔后每个月都有出院的希望。我在反省院是心境开朗、乐观的，我认为自己与特务的斗争是机智的，未供出一个人，而且未供出在狱中的上级党领导刘顺元与小葛，是保护了党的组织与大夏百余名党团员及革命群众的，没有办过自首手续与发表自首启事，我坚信自己是革命的斗士，所以一遇机会就与院方人员开玩笑，在课堂上故意提出疑难问题与辩论，置教员于难堪尴尬之地，是吊儿郎当、无所谓，以顽皮捣蛋分子而著名的。

在文字上，我是极为慎重的。反省院有反省人半月刊，敌人采取一切手段鼓励与组织反省人投稿，或从反省人的日记、作文、读书笔记中擅自择取篡改登载，即或是灰色的甚至黄色的文章也不放过登载。因此我的日记并不经常写，有时则在收缴前一天晚上每日写两句以应付之，有时则写点过去我未好好读书今后要发奋读书，努力求知。而我每天的时间都读些外国小说，我最专心致志的是学日文与英文，我之所以学日文，因为当时日文出版马列主义书籍很多，而中译本则不多，将来可以畅读日文社会科学类书籍，而反省院又有日文选修。英文有些基础，借助字典我已读了大半本英文版三民主义。日文经过 6 个月的学习，已经能掌握文法，可以阅读了，当时我即读完了日文小说《三姐妹》。我很安心的蹲下去，敌人也不会 6 个月期满将我释放。在进入第 6 个月时敌人已向我表示不可能到期释放，谁知在将要满期的前几天，忽然该院思想考核主任王进珊提我谈话。我记得当我们谈话开始，他首先问我省党部的邱有珍、周化鹏可否认识，我说与邱有珍并不认识，但我是知道他的，与周化鹏过去曾见过面。接着王进珊就说到邱、周二人有信给他，要他待我到期将我放出，使我可以继续读书，他并说很多人反对放我，但他还是设法决定将我放出。邱有珍、周化鹏都是淮阴第六师范毕业的，又是我父亲担任级主任那一班的学生，当时邱有珍是国民党省党部的委员，周

化鹏则是国民党省党部的宣传部长（而且周化鹏是王进珊的直接上司）。果然期满调号时将我也调出了，当离开监房搬向候保室时，所有反省院人都很惊异，看着我而发出“啊，吴觉也放了呢！”王进珊亦在我出反省院后的不久，为刘云等所驱逐。

出反省院的人，一经调号后即住入候保室与在院反省人完全隔离，不准见面，不准互通消息。我在调号未入候保室前，只知出反省院要履行交保手续，原不知尚有其它手续，至交保室后，才宣布：一要有铺保或人保，二要在悔过切结上按指印，三要向院方写出院表态（或是申请），这是二组以上的人要写的。我的保是苏州的一位间接亲戚曹养和找的保，这是父亲久已委托办好的，悔过切结是印好一齐拿来的，每个出院人在纸上按个指印即行了。悔过切结是石印，因为是切结所以极为简单，廖廖数十字，大意是“经过反省学习，决心痛改前非，信奉三民主义，恪遵国法，如有重犯，甘受严峻处治谨具切结”，原字句不尽如此，我仅记忆其大意，我就不经思索的在指定地方按了指印。可是出院表态却是各人自己写，不限时间，不拘内容，由自己写好交给院方，对于写这个我是极为慎重，大费愁肠的，考虑到党“反自首”的三点原则指示，不能有反党反共的言词。因为用过一番头脑，所以尚能记其梗概，大意是表示悔恨少年时未能很好读书，挥霍家中钱财，有负父母的期望，现还年轻出院后要发奋读书以报效祖国。因为我们的交保手续都是在期前办妥的，因此调候保室不数日即出狱了。我们几个同时被释放的人被一起带到院长室，由院长刘云谈话发给反省自新证书，没有什么仪式，仅是刘云问我们姓名、家乡，出院后打算干什么，今后生活是否困难等一套伪善公事式的谈话。与我同时由反省院出来的尚有薛味五同志，我出狱后，他陪同我前往王进珊家去向王表示谢意，王夫妇对我均表示殷勤招待，王并谈些他与周化鹏等人的友谊关系。我与薛味五同志一同回苏北家乡途经江苏省会镇江时，并由薛味五陪同前往江苏省党部去见周化鹏表示谢意。

我出反省院时，是 1934 年 2 月间，年已 22 岁。我原打算仍回上海大夏大学继续读书，不期回到淮阴后就遇到大夏支部书记胡增煌（寒假回来了），他告诉我上海白色恐怖很厉害，学校里蓝衣社分子（法西斯分子）活动猖獗，党支部虽然在，并且还坚持着工作，但是久与上级党断了关系，并告诉我学校已宣布将我开除，因此他劝我不宜去上海。我在反省院胡增煌曾从上海来苏州看我一次，但胡并未谈到学校开除我的话，现在才知道学校毕竟开除了我，因此我即打消去上海的念头，也就只好暂为家居了，寻求继续革命。

我之第三次被捕经过是如上述，自始自终我没有承认我回大夏后参加党的情况，未供出一个同志。自 1933 年 6 月至 1934 年春我入狱这段期间，大夏党支部尚有数十党团员，未因我被捕而使大夏党团组织有什么影响，也未使一个党团员被捕。

五、第四次被捕前后

出狱找党办报活动批准回党第四次被捕特条残害未遂移转法院判刑二次进反省院

我出狱后暂时家居，父亲希望我寻机去日本读书，因为日本读书费用并不比上海高，那时家中经济情况是可以让我去日本的。

当时我虽数度被捕入狱，但并未因此而对革命有消极畏惧的心理，革命积极性也并未削弱。同时也不认为自己由反省院出来就不能继续革命。在出狱回苏北的途中，还向薛味五表示了自己绝不灰心，要继续革命，继续找党。薛味五回涟水后即将我要继续革命，继续找党的事告诉了万金培，因此而有后来万金培来淮阴与我相约找党的事。我出狱回到淮阴后积极找党，经多方打听，始知淮阴城内已无共产党组织，但尚有失掉联系的同志，因此我即与失掉联系的王书勤、王宗鲁等联络起来，并与各中学的进步学生有所联系。

是年春，万金培同志由涟水来淮阴找我，他说他是听薛味五说我要继续找党干革命，又说现在党的组织是在农村，他是可以找到的，叫我安心勿性急，他负责找到党后即来淮阴找我，我们商定后，万金培在我家住了两天就回涟水去了。

回到淮阴家中住定后，摆在我面前的政治难关必须闯过，就是反省院规定，反省人出院后必须履行两件事，其一是每两个月向反省院报告行踪一次，其二是反省人回到所在地要向各地

特务机关报到登记，接受管理。第一个我不写信给他是无可奈何于我，第二则是个大难题，如果去特务机关报到登记，接受管理，那就是自首，被编组就是特务了，这是我万不可以的。我不去特务找上门来怎么办呢，当时我是打好主意，首先在家深居简出，摸清情况再作打算。如果特务找上门来我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先到农村亲友家隐居半年一载，再无法就远走高飞，主意已定我就安心在家中安居。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反省院报告我的行踪，我说我现家居，称父亲认为我国内政治情况不适合我读书，要我准备学好日文及功课，准备暑期后前往日本读书。仅写这一封信，嗣后我在淮阴已站稳了脚，所以再没有给反省院去信了。

这时淮阴城已无党的组织，因此我决定积极活动，团结革命力量为党聚集力量，准备找党。但是我不能龟缩家中，长此下去是无法工作的，因此决定冲进社会，挤入上层，造成威势，以此掩护，使特务不敢侵犯于我，望而却步。由于我在淮阴社会上层中一贯是有一定基础的，是容易混入，是可以立足的。这时淮阴国民党县党部主任黄相荣及两个常委李可宜、石维乔都是我的朋友，又有相当感情，因此我利用这层关系，就常去国民党县党部找黄、李、石三人聊天，吃喝闲游，由此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同时我也积极活动，经常与王书勋（王辉）、王宗鲁、王宗华、史鉴等联系（都是和党失去关系的），又与省立淮阴中学、省立农校、私立成志与光华等中学之进步学生相交游，积极团结蓄积进步力量，积极为党他日恢复城市工作奠下基础。

同年夏初，我又结识了在淮阴监狱中的管文尉、谢冰岩、金人龙等同志。我之所以结识他们是因为族人吴道楼的关系，吴道楼经常去狱中探望他的哥哥（因盗匪坐牢）而认识了管、谢诸人。吴道楼曾告诉我狱中管、谢等人很好，而吴本人是从大革命以来一贯被视为左倾分子，其本人处浊世尚能自持，迄未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吴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即参加我方革命工作，现仍在苏北做地方工作。当时我除相信吴道楼的话，同时也深感家居寂寥苦闷，极多愿结交革命友人，因而我就于某日相约前往狱中探访管、谢、金诸同志。那时淮阴监狱仍是旧式监狱，远非南方监狱可比，一切旧式监狱的陋规陈习多被保留，有钱有势的人随时可以进监，也可以终日在狱中与犯人饮酒作乐，进出监狱极为方便。我们一见如故，见面后才知道他们是想通过我来找党的关系。他们坦率相告都是老党员，在狱中组成支部，过去与党有关系的最近才失掉，当时我也坦承地告诉他们自己与党无关系。另外管又问我一事，说前淮盐特委有一负责人来狱中，要他们可以办自首手续，争取出狱为党工作，如此做法不算自首，问我可否有这事。我说我未闻有此说，我仅知道上海党有关组织“反自首”的三点指示，他们说需要问一下免得讹传而上当。因为彼此都十分热情诚挚自此成为密友。那时社会上特务密布，狱中倒是一片净土，可以恣意密谈。我因家居苦闷时，就去狱中找管、谢诸同志闲扯，他们也常常带信要我进监狱去玩，从此以后我经常出入淮阴监狱与他们相见畅叙衷怀。

那年夏天地方国民党友人张一平等创办《大众日报》，邀我参加负责编辑该报副刊，副刊名“我们的话”。那时我固然是家居无聊，同时也深知张一平等虽是国民党人，但一贯倒是国民党地方的在野反对派，为人坦率热情，因而也就乐与之合作了（张一平于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工作，并已入党）。当时这个报纸除新闻外，全部稿件均由我负责张罗安排。那时经常为报纸写稿者，地方上有王书勤同志，监狱中有管文蔚、谢冰岩同志，另外，我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也为报纸写些文艺作品。同时我个人写作兴趣也浓，学写些中短篇小说及小品文，都是些暴露社会黑暗的文章。首篇是描写一个被暴风雨战败的鸽子，他虽然遍体鳞伤，但仍然振翅重飞；次则写一篇“离别”，描写一个破产的市民，一个不幸的孀妇，为了生活，为了自己的女儿，最后离别家庭而落入上海都市魔穴，遭受资本家及工头的剥削蹂躏；也写些时评。刊载的文章在当时都是比较进步的，比较左倾的，立论是新颖的，讽刺文学，是敢于说话的，如当时洪泽湖恶霸地主为群众所杀，《大众日报》就发表了“封建地主的末路”社论。报纸也时常揭露特务的丑行。由于这个报纸稿源丰富，内容进步，确为青年市民所喜爱，销路很广，而经费开销很小。社论、时评、副刊稿件都是我一手经办的，稿子很踊跃，几乎

所有人都是义务，不要报酬。张一平的生活困难，则由我负责从我父亲与人合伙经营的大酒糟坊发货代销以解张一平家的生活问题。每月报费收入足敷全部工人及经理家庭开销尚有小结余。总之报纸当时之发行，我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经理及工人对我的印象是非常好，他们认为报纸的发行及发展前途主要依靠我，所以年底改组公推我为社长（张一平任董事长）。我之初参加报社原是偶然的，并无打算，待至我与淮盐党组织发生关系后，即想利用这个报纸来团结联络进步青年，并作为个人立足社会之掩护，所以推我当社长，我也就受而不辞了，最后我也就把它变成党的联络机关了。

时至同年初冬，万金培与当时淮盐党的特委书记赵心权同志来找我，万金培已回到党内，这次是介绍赵心权同志与我见面谈话的。我把他们安排在报社所包租的一个旅馆里，赵心权同志向我表示他代表淮盐特委决定恢复我的党藉，并说淮盐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后，城市不能立足，因而淮盐特委机关就由淮阴城迁至农村，现在计划迁回淮阴城，希望我帮助恢复淮阴城市的工作，并要我负责开辟淮城乡的党的工作。我即将回淮阴期间所联系的一些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与团结了一大批各中学进步青年以及报社的情况都作了详细介绍。他们异口同声说："太好了！"并再三关照对报纸一定要很好爱护，这是得之不易的，要很好的利用它。他们在淮阴住了两天后，我即带赵、万两同志往淮阴城西北 30 里许的一个农村里，意欲在那里建立点的工作。他们走后我立即将失掉关系的王书勤、王宗鲁诸人建立了一个党小组，并将各校进步青年学生以文艺座谈会的方式进行组织，有时利用星期日进行座谈会。大概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万金培单人来淮阴找我，向我传达了特委的决定，拟将特委机关仍搬回淮阴城（因淮阴是苏北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要我帮助建立淮盐特委机关。当时我召开了党的小组会，万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传达了特委决定要在城市布置打"狗"工作，以镇压积极活动的叛徒。万金培这次来淮阴，我曾带他去狱中见管文蔚、谢冰岩诸同志，这是私人访问，直至第四次被捕前也未向管、谢诸同志流露过我与淮盐党组织的任何关系。

1935 年 2 月间，万金培同志再次来淮阴找我，传达了特委决定于近日即搬来淮阴，要我在淮阴城内找房子建立特委机关。我即召开了党的小组会进行布置，万也参加了小组会，在会议上决定了以王宗鲁家后进大楼上为特委机关。因王家系一大地主，住宅处有数进房屋，后进大楼深邃隐蔽。万金培与王宗鲁、王书勤及王宗鲁弟弟王宗湛谈了话决定成立一个小组，由王书勤准备油印机等件，晚间并举行了正式会议，万金培仍回涟水乡间，说下次带一女同志来同住，好作掩护（因为那个时候城市住房，都必须是夫妇成家，才不引人注目），并约定一个星期后即返。万金培走后三、四日，淮盐特委又派特委委员陈亚昌来大众报社与我联系看看特委机关筹建情况，并代表特委传达要我必须注意爱惜大众报社，勿要办得太"左"而引起敌人的怀疑。

本来形势是很好的，但是世事无常，3 月初，我在报社中忽为特务所捕，王宗鲁亦同时在家中被捕。这是我第四次被捕，也是我最后一次被捕入狱，时年 23 岁。

在我被捕前，国民党正在鼓噪着"导淮"，工程指挥机关设在淮阴，因此国民党派了大批特务驻于淮阴，以之作为镇压群众的反摊派敲诈行动的工具。这些特务耀武扬威，纵横于市，我们就常在报纸上揭露特务们的暴行丑态，如特务闯进戏院看白戏，打茶房，我即在报纸上以"看白戏还要打人"的标题新闻来出他们的丑，因此特务对《大众日报》及对我个人都是异常嫉视。他们将我逮捕后，立即对我进行了审讯，想在我身上找到谋杀他们的行为，要我交出武器，说我有一支手枪，并说我还向人声称要"打狗"。我说我个人并无枪，仅是别人的手枪我曾拿出来玩了一下。事实是这样的：我曾经拿手枪向人开玩笑说："手枪不但可以打人，而且还可以打狗呢！"也许这句话被小特务听了进去。特务匆匆问了一下，也未再问什么，叫人将我押起来，并说："不怕你会强辩，终叫你认识我好了。"在审讯中，特务曾从屁股下抽出皮鞭子，随手抽了我两鞭子，打在我膀子上，当时穿的衣服多，并不疼痛，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

当天我被特务送往淮阴县政府，关在一间黑暗的小房子里。里面已关了数十人，满满的一屋，无法躺卧，每人终日仅能坐着或蹲着，夜间则是互相挤压着，一夜过后周身麻木，似若失去知觉。我进这个小室的第三天就有一个共产党员的父亲压死在我身旁，临死前他的手尽在我的脸上抚摸，死在我身边后一夜带半天，尸首才被拖出，这是我过去从未想到过的残酷行为。仅仅是两三天的被捕，已使我的肉体精神都难支持，完全麻木了。当时我想如果这样煎熬下去，倒不如速死的好，死的阴影不时在我的眼前显现。

特务似乎也不急于审讯我，大概过了两三天之后，特务在县政府的常备大队部里提我审讯，死死地追问我对他们的谋杀意图，追问枪支情况，我认定敌人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方才甘心，奋力向敌人冲撞过去，特务上来拖我，我咬住敌人的手臂，当时我确有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念头。我被几个士兵拖住了，敌人也不再审问我了，大吼："将他拖出去钉起来！"我被几个士兵拖了出去，钉了一副十几斤的脚镣，仍送回原关押的地方去。回狱后我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除了为爱我的父母难过外，别无所思。因此写好了给我父母的遗书后，就等待着死刑的执行。谁知我自此患了伤寒重病，日夜高烧，神经完全陷入昏迷状态，以后一切的事情都不知道了。也就在我昏迷大病中，父亲请淮阴县长帮忙，将我从这个暗室内移到淮阴大监内管文蔚、谢冰岩二同志的房间。我被转移监狱前后的情况都不了解，因为我在昏迷中。这个监狱的犯人都认识我，对我极表关心。（其中管文蔚从中也出了力，所以我由拘留所转入大监而住进管文蔚的优待监。）他们不管国法王法，首先将我脚上的重镣砸掉了，装上一轻的假镣。在我昏迷的一个多月中，他们分班守候着我。我自移大监后，家中就请当时淮阴最好的西医进狱诊治。有时我偶尔苏醒看见父亲母亲在我床边流泪，当时我已麻木了，毫无感觉旋即又昏迷了。我昏迷月余才清醒过来，但因为个性急躁，以后又经过了三次反症，因而缠绵病榻达三个多月才能勉强下床柱棍行走。直到省会派人来提解时，自己尚不能洗澡，而仍靠狱中难友助洗。

由于我的大病，倒使特务们对我无法审讯。也就在我大病的时候，特务们计划着将我杀害，说我坚不认罪，毫无悔悟表现，因而判我死刑，呈报省政府批核，并要求将我于淮阴就地正法。这大概是想显示一下他们的威风吧。所幸这个消息由国民党县党部的友人告诉了我的父亲，我父亲闻讯之下立刻就昏厥过去了，连夜赶去镇江省会，奔走营救，找国民党省党部的周化鹏设法营救。听说当时周化鹏通过了叶秀峰，才没有批准淮阴特务的请求，并批了"重新研讯"。

父亲在省里一直没有回来，因为他了解到我的案件发展如何其关键是在省里，因此他就索性在国民党省党部附近租个房子住下了，进行活动，让我的案子提省处理，使我摆脱淮阴特务的掌握。终于在当年夏天，大概是在 7 月的某天，省方派人来淮阴提我赴省处理。当时是大病初好，形体未充，行走尚不方便。我被提省后的前几天是被关押在省党部门房的一个房间内，周化鹏派了一个干事与我谈话，说我的官司已无多大问题，但需我多少承认一点罪行，表示悔悟之意，他就可以从中作进一步的斡旋，也有可能将我恢复自由。当时我虽怕上了特务的圈套，但因在事前周化鹏下班回公馆时，经门房窗户时曾打过我的招呼，说要派人来找我谈话，所以我对这位干事就不怀疑了。当时我囿于周化鹏私人感情的圈子内，就接受了周化鹏的意见。我认为我前次出反省院是周化鹏的帮忙，这次被捕要不是周化鹏的力量，恐怕已死于淮阴特务之手，认为周化鹏是不会害我的。我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避重就轻了。因此我就承认了在前次出狱家居中，由于自己的失学，对前途悲观，因而对现实不满，在报纸上常写些发牢骚的文章，自己也曾想要革命，把自己思想说得有些矛盾，但未承认又回到党内的事情，请求恢复自由。由于病后手颤抖不能书写，就由周化鹏派来的干事代写了，也未来签名就拿走了。自此以后的一两天时间，我就被寄押在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内，后来从未经任何审问，不久即被移送江苏高等法院镇江第五分院由司法处理了。

在保交处看守所，我与林士均关在一个看守所，住在林士均身旁的铺上，（我第一天来这看

守所的号子里是睡在尿桶旁，这是老犯人欺侮新犯人的一贯做法，第二天，林士均却进了我的号子，说是他久闻我的大名，已和院方谈好，要我搬到他的号子里）住了二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最老而又有权的犯人才能睡头铺，而我这个新来的犯人竟然住二铺，是很大的幸运，否则花很多钱才能谋到这个位子。在这个所里只关了两个政治犯，就是我和林士均。我原不认识他，也不知这个人的名字，可是他对我很照顾。

我被移转法院以后，思想上一切顾虑都没有了，因此决定不承认一切，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犯法行为。在侦察庭上我声明我是自动脱离共青团，经反省出来安分家居，并以办报为职业，从未想过要参加什么革命。在刑庭开庭，律师出庭，所讯内容与侦察相同，我仍如前供，坚不承认自己有不满现实情绪。最终法院判我两年六个月的徒刑。经我父亲与两位律师研究，认为上诉最高法院是可以更判无罪的，因此就由律师撰状向国民党最高法院申诉不服，请求更审判决无罪。但是到了 1936 年新春，最高法院还是驳回了我的申诉。法院认为我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同时已刑满 1/3 以上，故又将我送苏州反省院。因我的案子已定局，父亲为我在江南奔走近一年，至此才回苏北继续他的教职，我于春天亦被解往苏州反省院。

我深知反省院是不会将我到期释放的，思想上已作了长期蹲下去的准备。平时自己阅读一些社会科学的书藉，对反省院的学习采取应付，有时也甚至懒得应付，也从未写过什么文章，更没有在半月刊上投过稿。一期过去了，反省院果然没有放我，以后熟人也就多了，如管文蔚、曹荻秋诸同志均相继进院了，管文蔚与我同一组学习。

在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合作已成事实，在这样的国内形势下，反省院对反省人员的管理也采取某些欺骗改良的办法。如自 1937 年春以后，反省人员的住室号子门也打开了，但仍严格限制不让反省人相互串号与相互交谈，同时，宣布反省人自治会可由反省人自行选举互推，而不需再经院方圈定批准。（反省人自治会的组织，是在 1933 年第一次进反省院时刘云任反省院院长而建立的一种欺骗组织。其组织形式亦如国民党最高政府组织一样，实行五院制裁，并有各种委员会。两三个月就改选一次，留在反省院较长的反省人是难免不被选上，但反省院对此是加以控制的，名为反省人选举，实质是院方圈定批准。我两次进反省院均未被选为反省人自治会。）不需圈定后，我被选入了自治会，研究组的汪竹铭被选为主席。汪竹铭与彭康同志同一个组，这个情况彭康同志是可以记忆的，我被推为行政处长。在这届新自治会成立的二三日内，适逢孙中山的逝世纪念日，按反省院习例，反省人各组要集会纪念的，集会时自治会人要讲话，我是被推派去向二、三组讲话。我讲话的大意是孙中山在世是光明的，孙中山死后的今天是黯淡的，国难深沉，孙中山救国的正确主张未能实观，因而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当时我认为西安事变以后这样讲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谁知就在我讲话的第二天，反省院就宣布撤销此届自治会，进行重选，并声明今后自治会必须仍经院方批准圈定。撤销以后，除研究会的汪竹铭及我被落选外，其他数十人绝大多数仍继续被圈定当选。在我讲话后，反省院即找我谈话，指出我的讲话与外面人民阵线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这是我参加反省人自治会不及一个星期的实际情况，这件事我于 1944 年华中党校整风时都说得很清楚，并作为有利于自己的例证。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不少反省人被调号出院，进行调整房间，我与管文蔚两人房间都各有一个空床位，管文蔚通过看守将我调与他住一室。我与管原是好友，此刻是既同组又同号，无有顾虑，什么话都可以谈，精神上倒也是痛快一时。可是这时反省院对反省人进行了调整，将蹲满一期以上，一般是蹲了两期的人，而于短期内又不可能释放的人编为一组，名叫特别组。反省院也公开对特别组宣布说凡被调入特别组的人是于短期内不可能释放的，要我们安心学习反省。江苏反省院 6 个月一期，绝大多数反省人是 6 个月期满就被释放，否则于第 7、8、9 三个月中也就可以相继释放的，满一年不放者，那是极个别的。我因满一年而未放，因此也就被编入特别组了。

这次我在反省院期间没有什么人来苏州见我的，来狱见我的仅有张国权。张国权是我幼年的

朋友，我们是同宅近邻，是由小学到中学的朋友，青少年是终日相聚，形影不离，可以说是异姓兄弟，亲如手足，又是通家之好，是我爱人的姐夫。他是原任国民党江苏丰县的禁烟科长，大概在我二次进苏州反省院后的几个月，适巧调任苏州县政府的科长。他调来苏州后即来反省院看我一次，并存放些钱于反省院思想考核主任朱少清处，由朱替我代办在狱中所需食物。其实这些钱可以存放院中按期购物，这是朱少清串挪的办法。这时苏州反省院由于南京反省院的解散，空气已极为涣散，但院方仍故作镇静，勉强维持。

由于张国权的帮助，大力向朱少清及刘云活动，反省院终于在 1937 年 7 月初，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两天将我提出释放，未要店保，可能是由张国权保的，而不要店保了。是否也像第一次那样履行例行出院手续，具体的我是模糊记不清了。仅明确记得反省院未发给我出院证明书，说我是二次进来的，因此不需要这证明书了。

事后张国权告诉我，本来反省院是不肯放我的，是张国权通过朱少清和刘云做了一笔政治交易才放了我，因为当时反省院院长刘云想当国民党国大代表，为了拉拢张国权的选票，才送了一个人情，允许张国权将我保出。

5 月管文蔚先我而出狱了，他出狱后还送来一个竹笋烧肉给我，让我吃点新鲜玩意。他回到家又写信给我，诳称说是遇见了我的父亲，谈到我时老泪泫泫，说是待我出狱后父亲决心要送我出国去读书，这一篇鬼话是写给敌人看的，最后说是希望我出狱定脚以后即写信告诉他，以便他来看我，这些使我很感动。我认为管文蔚待我的感情深矣，是很难得的朋友，所以我决心如果出狱后，必须与他见面会晤，相聚畅叙数日。

六、苏北沦陷前的抗日救亡工作

与东北军五十七军的联系苏北抗日同盟会的始末国民党的摧残迫害与党联系的经过

出狱时，适值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掀起，我在张国权家呆了两天即回苏北的淮阴家中。临行时张国权对我说，如果我回淮阴家居不便，就仍回苏州来，说安置我吃饭是没问题的。我回到淮阴后未见到父亲，此时父亲在宿迁中学任校长。到家后方知家中的情况，父亲原是身体很健康的人，由于我数次被捕，他为我四处奔走营救，日形消瘦而虚弱，想尽办法也未恢复健康，经常独自暗暗流泪叹息，梦中也常呼唤我的乳名。他对母亲也常说：觉儿的道路是没有走错，他不是一个自暴自弃的孩子，也是能有所作为的，而我仅有这一个儿子，我确实舍不得他。而我的母亲呢？在我最后一次被捕中母亲急出病，几乎死去，当我回到家中看见我喜得哭了一阵。我的妹妹正童年，自我回家后整日依依不舍地跟着我。所以母亲说我回来好极了，父亲自此可以得到安慰了。这一切，左右使我不能离开，我很爱我的父母，不拟再外出，以安慰老人。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天下午夏仲芳来看我，他说他四弟夏如爱好端端在家里不知为什么被特务抓走了。我没想到，到今天特务还如此嚣张，事不宜迟我当即决定翌日南返张国权处。当我把要离去的消息告诉母亲时，当即她就呆住了，刚刚高兴几天就又要和儿子分开，不禁老泪纵流，但还是同意了。因此我又悄然回到苏州张国权处。

在我回苏州前曾写信告诉管文蔚同志，说我已出狱住在苏州张国权处。我回苏州不及二三日，管文蔚同志即由家乡来苏州看我。同时我的父亲也由宿迁回淮阴转赴苏州来看我。因此我陪父亲、管文蔚在苏州玩了一个星期，他们才走了。管文蔚在苏州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私下计议表示要继续革命，但时机未到，他说时机来临时希望我到他家乡一起打游击，他在家开办了一个梨山农场可以立足，其次他对我来苏州屈就一个小职员表示不满。我说因为家乡特务仍猖獗，恐生枝节，故南来，况且张国权是我至友，他邀我且来聚首，不办公，不过是玩玩而已。管文蔚同志并对我说，谢冰岩同志也由南京出狱，因家庭生活困难住于亲戚处。管要我同张国权说，设法替谢找一吃饭处。管走后谢冰岩同志也就接踵来到苏州，因此张国权就将我们俩人都在他的禁烟科内挂个小职员的名义，月薪 40 元，一个人用倒也绰裕。我是挂个名儿，也无事可办，因苏州同乡友人较多，无聊时就去同乡处溜达，如同乡朱公亮同志在苏州当律师，朱在我的影响下，思想进步，从 1937 年即帮助我们活动，后入党。

我进入苏州县政府不久，8 月间，日机轰炸苏州，县长邓某胆小，擅离城防，逃往太湖而被撤职。国民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县长来后就辞退了张国权，张国权离开了县政府就接任了江苏省的烟民工厂厂长。当时该厂已迁在太湖内的西山孤岛上，该厂一个烟民一个工人也没有，仅是保管性质，只有厂丁数人看管机件物资，尚有几名技师会计也是无事可做。我随张去太湖接管烟民工厂，因此我在苏州县政府也仅有月余时间。我到了西山烟民工厂不久张国权的爱人王凤仪和我爱人王凤山都来到西山。自到了西山后，我逐渐对张国权有了看法，张国权原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曾是上海学生反国民党不抵抗主义运动的学生领袖，我们曾一道创办国难剧社，对我的革命活动与遭遇也是一贯同情的，是一个无党派的爱国青年。可是大学毕业后为了饭碗他参加了国民党，成了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工具，每日角逐个人利禄，爱国思想极为削弱。我发现他变了，过去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看不到了。他的爱人王凤仪也对我说：张国权变了，已不是学生时代的张国权了，变俗气了。因此我们感情也渐疏远，他是每天筑方城之乐，而我则看小说或打猎。张国权也看出我的意态，向我有所暗示，说我变得太孤傲了。我索性向他表明，信仰不同，道路不同，今后我们是永远走不到一起的。他听了很伤感，昔日幼年时的朋友，由于所选信仰不同终于要分道扬镳了，大家都感到沉重。

至西山后，因为中国已发生全面抗战，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已成定局，两党都公开发表决定及申明表示合作，我默观形势认为可以回到家乡去。我到西山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向张国权提出要回淮阴去，只是他都表示坚决不放，他说待些时日，我们一起回去。当时的烟民工厂既然是保管性质，更是无事可做，湖中孤岛是嗅不到烟火气的，每天除看书外，就是逛山寻猎，直呆至冬初上海被日军侵占，这才与张国权及其家属返回淮阴家乡。

在回返苏北舟中，张国权已决定全家向西逃亡，并要我与他全家一起向大后方撤退，并保证供给我们的生活，但被我拒绝了。我说我们年轻时就有为祖国驱除帝国主义、为祖国献身的夙愿，都未能偿愿，今后确是我们献身抗日救国极好的机会，我是决心留在敌后抗日，绝不他往。虽他再三要求，但都被我拒绝了。在扬州住一宿，遇谢冰岩、胡浩等，谢冰岩、胡浩即随我们船返淮阴。回到淮阴时，日军已占领了苏南及江苏省会镇江，进逼南京，因此在我们回到淮阴后，张国权就带着父母妻子孩子向西逃亡去了，临行前因秩序混乱，无处交待，张就将烟民工厂的厂警及长短枪支交给我，要我为之处理。在张走后，我即出资将厂警遣散，枪支密藏于渔沟农村家中，准备日后留用。

我们回到淮阴约在 1937 年底，日军虽然沿沪宁线直下镇江、南京，但并未向苏北侵犯。但苏北形势也极为混乱，江苏国民党代主席韩德勤兼二十四集团军司令，与其副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都是蒋介石之嫡系，他们吓得胆破心惊，丧魂落魄，草木皆兵，闻风而逃，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未看到即逃出江苏省会镇江，北经扬州，直奔徐州。结果逃到徐州，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桂系军阀李宗仁申斥鼠窜而返，坐镇淮阴，12 月底以淮阴为临时省会。李宗仁与蒋介石是有尖锐矛盾的，当时国民党将全国划为几个战区，直辖几个省领导抗日，而韩德勤等虽为蒋嫡系，却也不得不受制于李宗仁。

当我回到淮阴时，因韩德勤北逃，害得人心惶惶，群情愤慨，青年苦无出路。当时我也未能了解敌情，认为日军将至，也忙于多方联系。我首先去洪泽湖边与王书勤等联系商谈拉武装抗日之事，因其不够热情，回城后又去淮阴北部大兴庄、五里庄一带与旧友联系到处演说，发动群众。特务们这时也不谈反共而高谈起联合抗日了，想以各种抗日救亡的名义来组织青年，利用本地青年为其奔走。因此我与谢冰岩同志就说服某些青年领袖勿为特务所利用，脱离特务牢笼。没有本地青年领袖为其抬轿子，这些外地特务也就跨了台。

当时淮阴青年中已有人组成宣传队去延安，如胡绍祖、周太和、高啸平、王书勤等青年，前后走了两三批人。当时我们也曾有去延安之念，起初我父亲也主张我们到延安去，而他本人也极愿随我们去延安。可是后来首先是他动摇了，说他老了，不管用了，怕死在路上，同时

我们也认为延安地区地广人稀，我们去延安不仅无用反而增加负担，倒不如留在敌后打游击对革命的作用要大些。因此大家也就决定不去延安，留下准备打游击。
既然决定不去延安，准备留下打游击，因此我与谢冰岩同志等也就开始进行救亡的组织活动。这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及其省党部以淮阴为他们的临时省会，省政府主席是顾祝同，未到职，由二十四集团军司令韩德勤代理主席，省党部书记长是周化鹏。这时我与周化鹏未有什么联系，也未意识到要做些上层统战工作。在开始阶段我们主要是四处奔走，联络各地的进步青年，直至 1937 年年底，尚未形成什么组织。这时我们与东北军五十七军取得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五十七军由江南退回驻于苏北一带，其师长常恩多，旅长王维城、唐君尧，团长万毅同志都很进步。我曾与常恩多、唐君尧等联系过并多次面谈，我们介绍了大批进步青年参加五十七军以及万毅同志所办的训练班，但不久五十七军即奉命调往山东。尔后我们仍与之取得密切联系，后常恩多于鲁南随万毅同志起义参加我军。
在开始阶段，我曾与谢冰岩同志出面邀请附近各县救亡活动的领袖人物来淮阴城举行首次座谈会，参加者淮安县有赵心权，涟水县有万金培、陈亚昌，灌云的有孙若溪，泗县的是谢楠，以及淮阴夏如爱、夏仲芳、吴道楼等参加，其他的人记不清楚了。座淡会的内容主要是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及今后的联系问题，当时也未提出要建立统一的组织问题，以及需要建立什么群众性的救亡团体。那时我们唯一的想法是认为日军即将占领苏北，思想上都是集中在准备打游击上。如我个人活动的对象大多是武装性质，与族人帮会领袖吴漱泉联系，商讨打游击向题（后吴漱泉为江苏省政府逮捕，强迫其招抚后任国民党支队长、旅长等职），我吸收了一批上海暗杀团的人员，如金求真（后入党，曾任地委副书记及江苏治淮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毛用之（是匪首，也是上海暗杀团的打手，后为我们枪毙）等这些枪手以准备转入游击战争。接着，宋振鼎同志由武汉回淮阴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宋振鼎原是淮盐党的领导人之一，是王营人，于 1932 年夏在淮阴和方超同时被捕判刑坐牢，后辗转经反省院出狱后到上海继续革命活动，据说又参加了党，这次从武汉回来，告诉大家是党派他回苏北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此人与我过去不认识，他与夏如爱、陈书同、夏仲芳都极为熟悉友好，因为当时淮阴已无党组织，因宋振鼎是和党有关系的，而且又是淮盐党的老人，故大家即以宋为马首是瞻，当时即酝酿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这时是 1938 年元月初之事。我因为忙于结婚，故未参加具体讨论，仅是夏前轩每天晚间到我家与我谈谈他们研究讨论的情况，最后终于决定组织苏北抗日同盟会。
也就在这时期我与我的爱人结婚了，我们是在 1938 年元月 20 日结婚。在那兵荒马乱之时，一切从简，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只举行一个规模不大的宴会。但是在旧社会结婚一定要举行一个公开的仪式，必须要有地位的人为证婚人，有男女介绍人，这些都必须在婚书上盖章的，这样才算完成合法的手续。我当时是请了淮阴国民党县长为证婚人，我的朋友国民党人淮阴县党部常委石维乔及其夫人刘葆珍为介绍人，因为刘葆珍与我爱人曾是同学也是朋友。当时习俗一定要在礼堂上举行，所以我们的婚礼婚宴都是利用国民党县党部大礼堂举行的，当时一般人都在那里举行。我的结婚事宜，请客及家中陈设布置都是由夏前轩一手布置经办的。在结婚那天又很忙，因事往淮安与五十七军联络接洽，在结婚前几个小时我才由淮安赶回淮阴。这次婚宴上夏前轩请来了一位特客，就是国民党江苏省特工指挥部主任吴卫九。吴卫九这个人是与我、张国权少年时代一块玩得最欢的朋友，因为我们当时都住在淮阴城内赵家楼，平列的三个大座住宅，是相与为邻的，到了青年就各走各的道路了。吴卫久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派，可是由于内部倾轧，改组派若被蒋介石系统抓到了，轻则坐牢重则枪毙。吴卫九也是曾被国民党通缉过，我记得 1932 年冬，我在上海大夏大学正在搞李顿报告书研究会时，一天突然光临，可能是躲风逃到我那儿，两人同榻住一宿，天一亮时就不辞而别了，自此未见面。后来不知怎么又混到复兴社，因而升了官，如今跃为省特工负责人，他出席我的婚宴，是我们自 1932 年冬以后第一次见面，彼此很沉默，没有什么交流。参加我婚礼婚

宴的除证婚人、介绍人外都是些抗日同盟会发起人及从事抗日救亡的朋友们。
婚后我即又去忙抗日同盟会之事，成立抗日同盟会需征得国民党省、县党部同意，因我当时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长周化鹏、淮阴县党部书记长陈以惠、常委石维乔及县长胡海泉颇友善，故大家要我出面商洽。我首先与国民党县当局商谈，他们都表示无所谓，是可可否否的，都向他们的省党部身上推，我就只好与国民党部省党部书记周化鹏协商，周化鹏说我们可以先召开一个座谈会彼此交换抗日统一战线的看法，要我邀几个人，他们也有几个人参加。座谈会是在周化鹏家里举行的，江苏省党部出席的是周化鹏、韩练成，我们参加的有宋振鼎、谢冰岩、沈肇华、夏如爱，也可能有陈书同、万金培、赵心权等，其他记不清楚了。座谈会主要是交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认识问题，当时是各执己见的。国民党人认为民族统一战线要想发挥其巨大力量，其组织性质必须是化学性质的，化合的，各党派必须溶为一体。我们则认为中国境内有阶级存在，有各个民族的不同利益，有各个党派的团体代表，各阶层各民族是独立存在的，想化合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是联合的，是物理组成，是混合的而非化合的；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份，应有其自己的组织、属性与其自己的纲领，化合不但不可能，其结果是消灭了抗日的有生力量。这次座谈会的结果我们是毫不让步地批判了国民党省党部以周化鹏为首的谬论。座谈会不久，周化鹏又与我作了一次解释性的谈话，并暴露了他个人的野心，他说他上次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主要目的是想将江苏的热心抗日救亡的领袖们结成自己的团体，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力量，将来在敌后打下一个地盘，搞一个小天下，然后，再看全国政治趋向，哪个党派胜利了，我们就跟哪个走。有了力量，还怕人家不要么？因此他想组织一个团体，想叫我们参加，并说他可以活动支队番号，可以让我们先行组织游击队，结果我们决然拒绝了周化鹏的政治骗术。
我们虽拒绝了与周的合作，但也看到当时的情况是日军向苏北进攻的矛头已缩回，集中力量由津浦线向北伸展，以准备向徐州合击会战。苏北无论在空间与时间上均成为敌后的一段空隙，这种偏安一隅的局面能维持多久，当时是难以估计的，看情况也不是三两个月的时间。既然不能马上转入游击的武装斗争，就必须利用这一段空隙时间，有组织有领导地组织群众与展开宣传工作。我们又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与宣传机构——苏北抗日同盟会与筹办《新声晚报》。向国民党县党部洽商备案，答复说我们的团体是苏北范围的，他们无权批准，省党部才有批准权。后来胡海泉告诉我这主要是省方不同意批准成立，因此我就直接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周化鹏处商谈，解决备案批准问题。周化鹏向我表示，他个人很同意我们的行动，但是省党部不同意，并说现在江苏省县两级都在组织抗日动员委员会，我们的人可以分别参加省县两级动委会，共同发挥抗日力量，不需另成立团体等。
既然当时国民党省党部已明确表示不准我们组织团体与发行报纸，那我们今后也就无法公开活动了。要求国民党批准的路走不通，我就转而活动当时进步士绅朱德轩先生，朱是江苏有名的士绅，曾任大学教授，为上海之有名律师，是无党派的进步人士，顾祝同、韩德勤均为其乡里后辈，顾、韩未发迹前，多为朱所提携，故对朱极尊重。朱也常指责省政府的非法行为。朱原居上海，抗战发生后由江苏省当局请回苏北协助号召抗日，后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组织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时，李兼主任，并请朱老任副主任。李宗仁对朱老亦很尊重，常征询朱的意见。当时朱老还兼任江苏省动委会副主任（国民党省主席任主任），同时任淮阴动委会主任。朱老与我的父亲是朋友，我与之素不相识。我即通过朱公亮（朱老族侄）的引见介绍与朱老面谈，想通过朱老协助而使江苏省当局批准我们成立团体。朱老完全赞成我的意见，极表同情，并说与江苏省这班没头脑的人是谈不出道理的，而李宗仁的头脑很清楚，可以谈得来。他说他可给我写信去引见李宗仁，如李宗仁批准了，省当局也就无可奈何了。我与朱老会谈的第二天，朱老即写了一封介绍我见李宗仁的信，信是由朱公亮交给我的，我当即办好申请批准的呈文以及苏北抗日同盟会与《新声晚报》的有关条例章则等

文件，由我与谢冰岩同志携文件信函前往徐州去见李宗仁，这是 1938 年 1 月底，我已 26 岁了。

我们到徐州后，投递了朱德轩先生介绍信，李宗仁派了一位姓郭的部长接见，好象叫郭若水。他接见我们时，旁边还坐着总干事郭萃章（郭萃章同志后在建立抗日根据地时，在鲁南微山湖西一带领导游击战，现名郭影秋）。在谈话时我申诉了江苏省当局如何压制抗日运动，以及特务横行的情况。第一次谈结果，郭姓部长未表示态度，仅允转达上级，改日再谈。但在谈话后的第二天，郭萃章同志却来旅社访我，向我表明了身份，并告诉我下次谈话要注意些。第二次接见是李宗仁的秘书夏某，郭萃章同志仍在座。据郭萃章同志说这位姓夏的秘书还不错。这次谈话以后郭萃章同志复来旅社见我，通知我问题已获解决，非但批准苏北抗日同盟会及《新声晚报》的成立，并要我们苏北抗日同盟会成立后，可派一代表前来徐州参加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任委员，长期驻总会，参与总会实际工作，使总会与苏北抗日同盟会经常取得联系。郭萃章同志还与我商谈了关于开展苏北救亡运动问题，他希望我们要同时抓各地的动员委员会，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并希望我能亲抓淮阴动委会的工作，所以当时就决定任命我为淮阴县动员委员会的指导员。为了便利工作，又决定同时任命淮阴县长胡海泉及朱公亮亦为指导员，共三名指导员。批准指令及委任状办好后，我即携带返回淮阴。当我将李宗仁委任胡海泉为指导员的委令交给淮阴县长胡海泉的时候，胡表示对我异常要好，并说一定要与我合作到底。我回到淮阴、回到家中时，已是农历春节元旦之早晨。

我回到淮阴以后，即致力于改组淮阴县动员委员会的事宜，由宋振鼎、谢冰岩、沈肇华等人负责召开成立苏北抗日同盟会，并派林士均同志代表苏北抗日同盟会驻徐州，为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委员。至于《新声晚报》的问题，国民党江苏省当局认为无需再出新报，要苏北抗日同盟会派一人参加当时江苏的唯一省报《战报》为编辑。适时我们办报人力财力俱有困难，所以接受其意见，缓办《新声晚报》，拟集中力量办定期刊物与翻印延安出版之刊物，就派谢冰岩同志担任《战报》编辑。从这时开始，江苏省国民党当局看到我们是李宗仁批准的，并派代表驻徐州李宗仁的总部，限制不了，也就转而拉拢了。在我从徐州回来不久，除了谢冰岩任《战报》编辑外，省当局又委任了宋振鼎一个职务，对宋、谢二人都给了较高之薪水。

淮阴县动员委员会在朱德轩先生与县长胡海泉的支持赞助下进行了改组，我与朱公亮同志参加常委会，主任仍是朱德轩先生，朱公亮任秘书，我负责组训工作，宣传工作由国民党县党部负责。我负责筹组训练城区乡指导员，分派各区乡成立区武装，成立各乡抗日自卫队及模范队。在我的组训部之下又成立了妇救会及抗日青年团。抗日青年团是由吴引诚与夏如爱两同志负责，最多时团员有 2000 人，各区乡指导员多为抗盟及青年团的积极分子。

抗日同盟会成立不久，尚在冬季酷寒的时候，郭萃章同志又介绍由延安出来的陈扬、陈淦、薛汉扬、夏南等人来淮阴找我参加苏北抗日同盟会的工作。次年春，又由延安出来的丁岩之同志参加会内的内部工作。当时苏北抗日同盟会的组织活动地区主要是今日苏北的淮阴、盐城两个专区，与苏中的救亡组织仅是联系关系，其参加的分子多系监狱出来的政治犯与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进步的知识分子，学生、小学教师，城市的店员工人，以及觉悟的农民。参加总会的领导人有宋振鼎、谢冰岩、李干成、陈书同、沈肇华，在会内做实际工作的有陈扬、陈淦、丁岩之等，各县负责人我所记得的有：淮安赵心权、丁九，盐城县有夏南，涟水县是李干成，泗阳县是沈肇华与谢楠等，其他人我已记不清楚了。在县以下有的组织名为农会或叫青年战地服务团等，名目虽多，但都统一于各县抗盟的领导之下。苏北抗日同盟会的成立当然是复杂的，但我对特务是拒绝接受的，如当时在淮涟诸县负责的特务蒋希文、郑洪等我们都是拒绝其参加（郑洪在 1945 年夏日军投降时，我负责接管淮阴市时捕获枪毙）。非但如此，我们在抗盟成立前所召开的座谈联络会议对曾干过特务而已脱离共产党的人员亦未予以邀约。苏北抗日同盟会在当时是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的，团结了苏北的进步知识分子与

青年，今日苏北以及调出的地方与部队的干部，在县团级以上的干部中，大多是当年参加过苏北抗日同盟会的。那时谢冰岩参加《战报》编辑工作，我是专搞动委会以及上层统战工作与筹措大宗经费，会内工作完全是宋振鼎同志负责的。

我们的工作发展至 1938 年的春天，是普遍开展了，当然也有些虚张声势。以淮阴而论，每个区都组织了两个脱离生产的中队，全县各乡都组成了自卫队与模范队。我与朱德轩老先生亲赴各地检阅，抗日青年团也发展了 2000 左右团员。这时江苏省国民党当局想进一步拉拢我们，也可以说是想收买吧，首由二十四集团军副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江苏省保安司令的李守维邀我与谢冰岩同志谈了一次话，以示好感，继又由省主席韩德勤请我们吃了一次饭，表示愿意团结一切力量，与愿意接受善意的批评，随后就由其政治部主任李歧鸣出面表示韩、李要委我任支队司令，枪支经费由他们供给，要我做预算。这一问题经抗盟研究后认为我可以接受他们的委托，但需谈明两个条件，一是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是独立的，不受他们政治工作的干涉，二是部队的发展应不受限制。当时决定由宋振鼎、谢冰岩与我三人共同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正式谈判，几次商谈未达成协议，也就作罢了。

同年夏，国民党江苏省当局要淮阴县长胡海泉出面请我们吃饭，同时请他们省方要人如李歧鸣等，想利用吃饭交换一次意见，主要想在对统一战线认识方面求得一致之意见。我们参加作客吃饭者是我及宋、谢三人，另外还有李锐同志。因李锐同志由山东来淮阴，他听了党内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报告，我们准备在座谈会时以李锐同志为主发言。在宴后开始座谈的时候，国民党人开了话题后即由李锐同志发表了长篇意见，李的一席话很生动，说得国民党人哑口无声，而不敢继续发言了。这是最后一次的交谈，也许国民党认识到我们这批青年小伙子是无法争取的，改而考虑欲以其他手段来对付我们了。

江苏国民党当局向我们进攻，想绞杀我们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也就是从这年夏天开始的，即在日军占领徐州，李宗仁退走，我们的徐州代表退回淮阴以后发生的。因为江苏省政府是蒋介石的嫡系，李宗仁上台后，曾想改换桂系的人员但末成，当时江苏省韩、李可能不知道我们与李宗仁究竟是何种关系，李宗仁退走后，他们也就无有顾虑，同时又看到我们不能为其争取利用，因此就对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行为。其第一个步骤，是采取了限制与禁止我们翻印延安的书刊。因我曾以动委会组训部名义翻印了延安抗大教材的游击战术，由于陈扬等同志对此书未能很好改编，致使书的内容中尚保存有建立红军、建立革命政权等，江苏省党部提出这是不妥的，是破坏统一战线的，搜查书店、没收小贩加以收缴。这本书印了 1 万册，大部分是分发各乡区自卫队及苏北各县的，只有少数是各书店代售，及卖报小贩推销的。其翻印经费完全由我个人负担，仅以动委会名义刊行。我当时即向国民党抗议，坚决否认这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翻印教材，学习游击战术，用以培训人员游击战术的知识，是增强抗日战争的力量，如果认为翻印此书是违反抗日建国纲领，经过司法程序处理，我个人绝不逃脱对法律应负之责，但我坚决不同意不以法律手续而实施没收与逮捕小贩等行为。由于朱德轩先生的支持，最后仍是将全部印出的书分发各县各地，事情不了而了之。此事过去后，国民党又采取了第二个进攻的步骤，他们逮捕了参加我们活动的两位国民党党员张一平与夏仲芳两人，关押禁闭十余天，说他们两人跟共产党吴觉等跑是违犯党纪的，要他们写悔过书后才释放出来，以此使社会上层人士不敢接近我们，达到孤立我们的目的。在夏、张二人被捕时，我曾询问其逮捕原因，他们回答我说，这是他们党内的管教问题。同时，国民党秘密通令监视我等的行动。当其密令下达各县后，淮阴国民党县长胡海泉即请我去，将密令给我看，并劝我要注意。此事为宋振鼎失言被暗藏特务吴文崇告密，而使胡海泉因泄密而受到撤职处分。国民党向我们进攻的第三个步骤是在报纸上宣传我们的苏北抗日同盟会的错误，当然是捏造夸大，更无耻的是胁迫一些人公开登报脱离抗日青年团。

至此，我们的工作是不得不改变了，我们将外来的干部如陈扬、陈淦、丁岩之、金求真等同志分散到其它地区，有的去管文蔚部，有的去山东五十七军，城内机关人员亦多转至农村，

城内仅是我及谢冰岩等与之应付。到了是年秋天的时候，国民党采取了最无耻的手段停发动委会的经费，以使动委会无法活动，各乡区指导员也就停止了活动，全县所组织起来的自卫队、模范队都全部垮台。情况发展至此，朱德轩先生也只有悲观失望，摇首叹息。他自己创办了大同盐公司，并向我表示准备搞些钱，以作为一旦转入游击战争时军费之需。同时，我也看到了徐州沦陷，苏北偏安局面不会维持过久，因此，也将自己积累的私款，秘密派人购买枪械弹药（是收买国民党溃散逃兵的），密藏于渔沟农村的家中。

也就是在这年秋末冬初的时候，我的家庭遭遇了最大最沉痛的事件，即是爱我的、同情我的，也是知我最深的父亲不幸病故了。我虽然是久经锻炼、饱尝艰险的人，但在这时也无法压抑我的悲痛与伤感。我对我父亲的死是最为抱撼的。父亲出身于贫苦家庭，他的身体原是健康而耐劳苦，由于我多次被捕入狱，使他过分劳瘁忧愁，隐藏在他内心的痛苦终于损伤了他的身体。我的善良慈爱的父亲终生勤劳工作，由于我历次不幸遭遇而使父亲过早死亡，这是我终生不忘的憾事。父亲未因我是独子而阻止我参加革命，他对革命一向是同情的、赞助的，我多次被捕，为了营救我四处奔波，四处恳求他的学生来营救我。他为我愁，为我忧，为我急，但从未抱怨过我，直到死为止对我都未流露出丝毫怨言。在当时社会他因他儿子数度被捕遭到社会舆论的压抑，遭世人的指责，瞧人白眼，而他则一直为有这样的儿子而骄傲，宁可失业也不参加国民党。父亲的病是从 1938 年夏严重起来的，我为他的病而担心，而奔走。我内疚很深，我感到我的一生无负于人，但我实在对不起我的父亲，我的家庭。这年夏天以后，徐州为日军所占领，我们的活动也为国民党所限制，这种环境反而使我可以照顾父亲的病。

是年秋，我的大女儿克利出生未及一个月，我的父亲就与世长辞了。失去我亲爱的父亲使我陷入无比悲痛，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痛。我伤心欲绝，由于过度悲痛我的声带失声达数十日，不能发音。父亲死后即抬回渔沟故居办理丧事，我在农村守灵达月余才择吉安葬。我护送父亲下乡，从陪灵到安葬，是住在农村祖宅的，也就利用这个时候，对附近的农民及族人做了关于武装准备的工作。在国民党区公所的连队中，布置了私人关系，掌握了整个的一个连队，同时委托了国民党的区长李可宜为我收购弹药，这一切都是为了一旦县城沦陷，我能有基本的武装力量。

在料理了父亲的丧事后，我同我的爱人及孩子回到了淮阴城。这时适朱德轩先生筹办盐公司，包销淮北产盐。时因陇海铁路为日军占据，淮北产盐原由陇海西运，今则道路梗塞，滞于内销而停产趋势，因朱德轩为苏皖淮上封建势力所共仰，与沿途国民党官吏亦有往来，因此淮北盐商群请朱出面经销淮盐。朱则商之于我，要我代表他溯淮而上，与地方势力及皖北地方官吏联系协商淮盐经淮河西运安徽、河南、湖北等省，并商定所获利润悉为他日抗日军费。我允其请，即往洪泽湖与地方势力漆二大王商妥淮盐过湖事，并至皖东北的双沟与国民党专员盛子瑾商谈。盛自称是进步抗日民主专员，两度会见，热情款待极愿协助淮盐西运。盛子瑾派副官一名、卫队数人护送我至淮南盱眙往见该地区专员秦庆林。秦是一反动军人，与盛子瑾有矛盾，在我抵达当夜还未见，秦即将盛之副官及数名卫士逮捕。翌日我与他会见，也慷慨表示协助淮盐西运，提到副官等被捕事，则谓先生是经商之人，不懂政治。他说盛子瑾是共产党，想利用护送我之名义派员前来刺探军情，故而逮捕与我全无关系。我因此人反动粗俗透顶，全无谈头，即日告辞东返，彼则派小轿一顶护送我至老子山，经老子山渡湖回淮阴，诸事办妥，朱德轩极为高兴。

在苏北未为日军侵占前的一年余的过程中，我们除了积极发动与组织群众、团结进步力量、宣传我党主张、扩大我党影响，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不屈服不妥协的斗争之外，同时我们也是无时无刻都在思念党，渴望企求党的领导。我们并不是仅沉溺在缅想渴望，而在行动上也是积极找党的。在 1938 年新春苏北抗日同盟会成立时，我们即派陈书同同志往武汉找党的长江局，想请长江局派人前来苏北领导，长江局因苏北不是它的工作范围而未获解决。书同

同志又往山东鲁南一带找党。李干成同志在鲁南终于找到了党，建立联系关系。但鲁南党组织认为苏北这么一个大的局面，暂无适当的干部可派，但是允诺设法派人来苏北。可是迟迟未派来，这也是当时苏北的实际情况，即缺少核心的领导干部。

当我从安徽回到淮阴家中，一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等着我。鲁南终于派以张芳久同志为首的三个同志来苏北。张芳久同志是西北人，红军的一个营长，由西北随钟辉同志南来鲁南，组织当时有名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的。张芳久同志来苏北后，即住于淮阴城内我的家中。不久淮阴县城为日军占领，他即随我转至我的渔沟农村老家一带，筹组武装转入游击战争。张芳久同志是我开始搞游击队时的党的领导者，部队工作的组织者，是个朴实热情的、年轻的工农干部。同来的还有高兴泰、戴曦二同志，他们两个已去涟水一带。三个人以张芳久同志为首，他们的任务是开辟苏北（淮盐）党的工作。可是张芳久是个军人，对搞武装很有兴趣，我告诉他我私人已筹集枪支 20 余支，能控制一个连的武装，尚有几支潜伏力量，只要日军临境即可拉起来的。他听了以后很高兴，表示这是很难得的力量，真有这样的力量，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在此我想再提一下，在这个阶段中，我除了全力从事于爱国救亡运动，还间断进行些商业活动，这是在 1938 年春，苏北抗日同盟会成立以后的事。我是不谙商业的人，但那时的情况驱使我要解决些经费问题，否则我是维持不住当时的局面。我家庭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的妻子王凤山同志原在中学里教美术、唱歌，由于怀孕所引起身体上的不良状况而回家休养。春天我的父亲亦因病而停止工作回家医治，花费颇多，而父亲的病又非短期所能治好的。但这也还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是我个人花费较大。那时我为了准备游击战争，养了些亡命打手，他们不时向我要钱用，加之那时苏北抗日同盟会内尚有十余名脱产的干部，抗盟是不收会费的，日常小开销是靠有职业的领导人从薪金中补贴，但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交通、印刷出版、活动等大宗经费，那就毫无着落了。我记得同盟会成立不久，我就先后买了数辆自行车，翻印一本歌集要数十元，一本游击战术则需要 500 元，在当时解决这些经费也并不是容易的事。开始时，我以父亲的存款及岳母的积蓄进行活动，第一次生意我是以 500 元作资本交给张一平做盐的投机，竟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获得纯利 600 多元，这是一倍以上的横财暴利。因此我就把家族的人组织做生意，资金由我供给，每月可以获得数百元至千元左右的收入。到了快要沦陷时又与张一平、朱公亮等正式集股组织盐公司。除集股外，他们是向淮阴国民党县政府二科（财经科，科长张蔚玉是同乡朋友关系）借了 7000 张盐票，每张盐票是 1 元 2 角，合计是 8400 元为资金进行商业活动，这笔钱也未归还，都在沦陷后损失掉了。我个人从未参与商业，都是他人负责经营的，前后大约赚了数千元，但这些钱多为我购买枪械弹药，翻印书籍，贴补抗盟的费用，以及安葬父亲等用去了。后来由于我忙于敌后游击战争，无暇照顾，那个盐公司的盐都损失掉了。

七、苏北沦陷后的游击坚持

成立义勇军改编八路军国民党的清剿迫害反特务斗争的胜利坚持斗争迎接主力

日军进犯苏北，淮阴县城沦陷，是在 1939 年 3 月初，我年交 27 岁。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不抵抗，因而日军进军异常迅速。我于县城沦陷前的几小时才与张芳久、谢冰岩、丁九诸同志及我的爱人孩子仓促离开县城，谁知未走几里路敌机已在我们头上盘旋。实际上此刻日军已经由南门及西门进城而占领淮阴了，可是我们当时并不了解这一情况，边走边议估计日军可能从徐州至淮阴公路经渔沟向淮阴进攻，因此决定我爱人和孩子去五里庄张一平处暂住，我们一行去渔沟迅速将已布置的武装拉起来，另外估计可以趁机收缴沿途散兵游勇的枪支以扩大武装。一到渔沟当即筹组部队，因为久有准备，工作进行颇为顺利。首先将我的家庭枪支 10 支及弹药拿出，又向当地地主富农借些多余枪支将本地农民及青年学生编成一个连，同时将国民党区公所的一个整连全部调出集中，继而有地方人士组成一个独立中队（即一个连），又由洪泽湖的渔民、猎户、枪手组成了一个洪泽大队前来参加，至此部队基础已初步

形成，实际上拥有四个连的部队。但是日军是由运河经洪泽湖边迅速挺进而占领淮阴的，并未经过渔沟，因此在渔沟并无散兵游勇可收容。当时我即改变另一种扩大部队的办法，是根据党中央所提出的“有枪出枪”的原则，向地主借枪抗日，借来枪支发给参加部队的城市青年及农民。因为我有较为强大的部队实力，又亲自上门向地主借枪，这不等于收缴，因为地主家都有数支枪，我仅借其一部分，并保证地方治安，因而地主估计也不得不借点枪给我。此计划后因故未能实行。为了继续扩大武装，张芳久同志和我决定成立淮阴抗日义勇队，即在党所派来的张芳久同志领导下成立抗日义勇队总指挥部，决定我为指挥，张芳久为参谋长，谢冰岩为秘书长，张一平为副官长，宋振鼎为政治部主任，夏如爱为教导大队长。

抗日义勇队成立立即张贴布告号召群众起而抗日，不久就在渔沟东五条路伏击了日军一个车队，取得了胜利。这是日军攻占淮阴遭到的第一次埋伏袭击，影响巨大，群起响应，因此全县，甚至邻县的地方人士，甚至地主、土匪也纷纷请求发给委任，全县境内都是义勇队（当时发了几个支队，十余个大队的委任），都挂着义勇队的臂章，人人皆以佩带义勇队的臂章为荣。淮阴沦陷后，我部当时已成为武装力量最雄大的力量，当时国民党的行政办事处人员亦多依靠我部保护。

当时的经费开销是我个人从城内携带的私款 2000 余元，同时朱德轩又资助 1000 元，我又下令将国民党存于农村的军粮完全启封供部队之用，同时遍设税局收税以供军需。当时每个士兵每天两角钱的伙食费。为了解决军需我和党代表张芳久商定一个计划，拟率部前往杨庄镇启运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存盐，价值数十万，即可供给大量部队的军需，完全解决经费问题。另外建议推出进步抗日士绅朱德轩任苏皖抗日义勇队总司令，以他的名义可以号召苏皖两个省的。原拟即刻率部队前往杨庄解决军费问题，在这个时候宋振鼎同志由盐阜回到淮阴，他和夏如爱同志反对我的部署，认为这是不妥的，应该首先和鬼子打一个胜仗再去打盐庄，他们提议首先攻克淮阴门口王营日军据点扩大影响后，顺流而下至杨庄去处理盐事。当时我的分析是：王营据点位于黄河、盐河之间，有日军驻守（其时有百余名日军），又筑有碉堡群、沟堑，首先要攻过盐河才能攻击碉堡群；而淮阴城内是苏北日军司令部，驻有重兵，距王营仅有 7 里，又有较高级便利的公路，增援极为便利，而我部是新成立的游击队，对游击战尚在初学之中，如何能去攻取日军坚守的重镇呢？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时日军刚占领自己的家园，群众愤恨鬼子，当宋振鼎同志提出攻打日本人据点后立刻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因为要抢渡攻坚，部队做了一个时期的准备工作。一切工作准备好了，于某夜向王营据点挺进，军至盐河边，连船只都未准备好就被敌人发现，以猛烈炮火向我部射击，照明弹满天飞，探照灯照得遍地通明，我部根本无法强渡盐河。而且我部队全是毫无作战经验的城市青年和农民，何曾经历如此战景，乱放了一夜枪，徒然消耗些子弹，我与张芳久见此情景只有下令撤退。原指望的内线毫无作用，连据点外船只也未能掌握一只，全部被敌人控制。经此一战部队极度疲劳，怨声四起，讽言讽语，由于经此周折，时日蹉跎，贻误时机而使杨庄的盐早被地方士绅恶霸勾结土匪一抢而光。因此我原与张芳久商议的计划只能成为泡影，张芳久同志对此是表示了一些意见，但我为了团结始终未表示任何意见。当时有人却认为我是一个新军阀，要防止我向这方面发展，甚至有同志暗暗告诉我有人想暗杀我。当时我就对这位同志讲，这可能是坏人从中挑拨、破坏革命队伍团结，而且这些人不可能对我如此暴行，况且我们已有党的领导，有党代表张芳久同志更不可能发生如此事情。从后来看这可能是特务吴文崇挑拨离间之计。

当时宋振鼎同志对张芳久和我提出建议，将我在渔沟所搞的四个连部队合编为一个教导大队，建议由夏如爱任大队长，当时我同意了。就在此时，国民党县长陆选之写来一封信给我，邀约我共商抗日之事。这个混蛋县长，原是 1928 年我在九中的同学，因闹风潮，我们两人都是为国民党中央大学行政院开除学籍的，抗战发生后到处乱吹胡扯抗日民主，为韩德勤所赏识，委以睢宁县长。胡海泉被撤职后，调为淮阴县长。来淮阴前尚有电话与我联系，可是

下车后非但不敢理我，而且对朱德轩也是敬而远之。自带北京总统府名厨制作各种佳肴，真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迎逢上司拉拢各方人员。日军占领淮阴时，拥有装备充足的一个团，非但不抵抗反而率团离淮之境躲入高宝湖的芦花荡中，龟缩不敢露面，淮阴境内仅设立办事处，仅有卫队一个排，所以当时淮阴境内的部队都打着我们义勇队的旗号。陆邀我前去是缓兵之计，是想限制我的发展或则有杀我之意，我是不想去见他，但是为了统一战线也无法推辞，只好前往高宝湖与陆会见。陆虽一方面盛情款待，一方面又暗示我说：老吴这时再想搞混水摸鱼已非其时矣！我则反唇相讥，说是此地如此安全，日军是不会到的，我能将家属居此，则心安矣。最后陆则公开向我表示要我接受他的一个大队委托，我说一个大队无法整编我的部队，但可以研究，待我回去研究后再告诉你，因我个人不能擅作主张，总之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一切事都好磋商。我耍了一个花枪拒绝了他而得以脱身。

我与陆选之一见，费时十余日，即在这十余日中，我们的部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在我离开期间，宋振鼎未经张芳久的同意，听信了谣言，接受了国民党淮北行政办事处的意见，发还了所封存的军粮面粉，撤销了各地税收。因此我回来后即遇到经济恐慌，仅依靠过去一部分余粮余款及我这次从朱德轩处带回 500 元，杯水车薪难济于事。此后又经过与日军两次埋伏战，又与淮阴大恶霸韩雄激战于文殊庵，虽然击败了众匪进攻（四、五百名），但弹药消耗殆尽，经济毫无着落，部队动摇，所受委各部纷纷他去，声言待我部有办法时再回来，即使我控制最好的国民党一个区队也有些动摇。队长吴铁生，原是我族中叔父，与我私人关系极好，此时也抱怨我误听人言，表示消极。因此我即将吴撤换了，任命陈克天同志为队长，调吴铁生任参谋。当时国民党淮阴县政府招抚了五十七军的叛军成立一个大队，战斗力尚强，经常尾随我部进行监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摩擦，这时我部确处在一个危险困难的境地。由于各部的离去，垮台解体，或另寻门路，最后仅剩下我初创的一个教导大队，一个轰轰烈烈好端端的形势被搞得冷冷清清。

也就在这时我有一位族中叔叔名字叫吴漱泉，与我私人关系颇好，抗日战争前是地方一个清帮头子，利用抗战在苏北杂牌军中混了个旅长，与韩德勤对立，独霸一方。这时他带了部队回淮阴到渔沟会我，要我跟他去当个团长，给我一个海口让我收税以发展部队。他以混事江湖的口吻对我说，你干你的，你先跟我干，我们叔侄合作，他日共产党来了，你可以率部去干共产党，我决不会阻拦你。我考虑再三认为跟他走是危险的，但是当时一般合法派与搞灰色武装者，都主张我跟他去，接受吴的名义后尚可挽回已走各部。但是我拒绝了这个叔叔的邀请，因为我对当时的形势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

我认为江苏复兴社是顽固透顶的，莫说是干共产党，即是国民党内异已派别也是要受到排挤，甚至能送命，要说搞灰色武装，旧军阀马玉仁搞灰色武装被消灭了，陈文搞灰色武装三个团以高宝湖为根据地也被消灭了，本人也遭逮捕杀害了。以我个人而论，过去虽是个学生，但因四次被捕，二次被判入狱，当时在群众中是太红了，如此红法岂能搞灰色武装？即以吴漱泉部队而论，虽是灰色的，但实质也是复兴社所领的二十四集团军所管辖，随时可以为人所出卖，所谓搞合法武装就是拿绳索系着自己的脖子，另一端抓在敌人手里，随时有被敌人绞死的可能。抗日战争前我就是白区的一个学生，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敌人可以随时随地逮捕你，我深知干革命不能光凭喊口号，要有自己的武装，我对国民党不抱任何幻想。因此最后一次出狱后我就决心搞武装，秘密筹备枪支弹药，实在不行做土匪造反，我再也不能毫无抵抗任敌人摆布。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曾想以朱德轩的名号搞武装，这样号召力大些，可以搞一个规模较大的部队而与韩德勤的部队相抗衡（我也曾向朱德轩全盘托出我的设想，他亦表示同意，他让我先弄，他再来），但由于杨庄盐库未按我计划拿下，没有资金，计划落空。其实义勇队就是灰色的，因为没有坚定的信仰，缺少凝聚力，最终结果大部分垮掉了。因此我决心竖起共产党八路军的旗号，而事实我们已经有了上级派来的党代表张芳久同志，只有这样才能干得彻底、痛快！我认为在苏北敌后的国民党区搞八路军公开拉起共产党的红

旗，不但能够存在，而且是大有发展前景的，我基于以下认识：
当时苏北淮海地区，是江苏的最北部，与山东、安徽相接，所有县城均为日军所占领，但广大农村仍是国民党势力所统治。但是国民党的主力都龟缩在苏中一带，因为那里尚有几个县城未被日军所占领，江苏省国民党领导者都群集在那一点安乐窝里，留恋城市，不敢深入敌后，因此淮海区仅有一些战斗力不强的保安旅、县的保安团，总的来说，苏北淮海区（包括盐阜）是国民党统治较弱的地区，是平原地区，国民党即或以主力来对付我，但我仍可以利用敌顽矛盾，在广大的平原与国民党相周旋。而且在各县有些交界处即是日军所鞭长莫及之区，也是国民党敌后统治的薄弱区，加以拉起共产党的红旗，竖起八路军旗号是可以团结大批进步青年，可以发动农民，可以团结一批进步民主人士，这样我们的队伍才有前途，有奔头，另外可以公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可以掩护并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同时此时陇海线已有八路军游击小兵团，在东灌沭一带已准备建立八路军，如果我们建立了八路军，两相会师力量强大，可以利用六塘河一带建立根据地，是可以打开局面，部队可以大发展，是大有可为。我将我的认识与我的分析及方案与张芳久同志谈了，谁知我一谈，张芳久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也正合他的意，他立刻找宋振鼎、夏如爱谈了，他们也没有意见，因此张芳久就去山东向上级请示汇报了。未及 20 日，张芳久同志由山东回来，他说上级党已经同意我们的意思，批准成立八路军的一个团建制，并决定我任团长，他任参谋长，高兴泰担任政治工作，在淮阴武装方面就由我和谢冰岩两人参加八路军这个团的领导工作，至于原政治部主任宋振鼎及教导大队夏如爱都不参加部队领导，退出部队，涟水武装方面何人参加部队领导等他去涟水后与高兴泰研究后再决定。我初认为张芳久必然是担任政委，他告诉我上级决定他担任参谋长，不久将派人来此担任政委，并决定让我率部暂时脱离淮阴转移至涟水县西一带休整，同时争取与涟水地方游击队汇合。因此，我与张芳久同志于 1939 年初夏率部队至涟水西区小成集一带休整。这是我第一次踏入涟水县境。当时对外番号仍是利用淮阴义勇队旗号。
此时涟水西部几个区十分混乱，几个国民党的区公所都没有什么强大的武装，而涟水义勇队大多未脱离生产，而且分散，每小股多则 20 余人，而无统一指挥，国民党县政府及常备团则在盐河以东、涟东境内。日军占领县城后数月，国民党县常备团从未到过涟西各区，因此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土匪遍野，加之土匪又与国民党各个部队招兵站拉上关系，兵匪不分，地方政府与人士对此无可奈何，任其荼毒，危害极大，群众苦不堪言。此时张芳久去涟水与高兴泰及地方同志碰头研究部队会合改编之事，而宋振鼎、夏如爱因党组织要他们退出部队，也去地方上活动了。我鉴于涟西群众苦于匪患，决定首先解决群众疾苦，清除匪患。因此进入涟西后，首先进行剿匪，既可以驱逐国民党势力，又可以获得社会各阶层及广大群众的拥护，为今后在涟水西部建立根据地奠定良好的基础。我先通过地方关系摸清匪情，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进行抓捕清剿，所捕获之匪众，召集地方进步的革命青年及一般公正士绅会商研究处治。由地方研究处决名单后，立即处决数十名，人心大快，群情拥戴有口皆碑。地方士绅当即发表书面传单，张贴布告，一致拥护淮阴义勇队为民除害，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国民党区乡政府对我之行动亦表拥护，纷纷来访致意，所有国民党派至此地区招兵人员也立即撤走。我则继续进行清剿，未及半日时间荡平涟西境内所有匪患，为当地群众免除了土匪抢劫、绑架、烧杀、奸淫之苦，自此局面打开了，我部虽无军饷、粮食供应，但地方群众主动供给部队住房与伙食。如此一来，我们的部队就变成了直接吃群众的饭了，不需自筹伙食，一直到 1940 年夏建立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后，才自办伙食。
由于涟水义勇队，分散且未集中，又各自为政，不如我们淮阴义勇队开始建军之日即脱离生产，按连、排、班编制，集中行动与整训，已形成一支部队规模与作风。这应该归功于党代表张芳久同志，他是一贯搞部队的人。由于淮阴义勇队的积极活动与影响，使地方进步青年扬眉吐气，促使涟水义勇队集中起来，但人数并不多，仅百十人。就在这个时候，我因为忙于剿匪与统战工作，未与涟水部队接触，因为张芳久同志是代表党的，他好说话，而我所处

的地位是很难说话（我的党籍问题还未解决），因此我索性不沾边，让芳久同志去搞。芳久有时也到我的部队来，据他告诉涟水方面有人反对搞八路军，还要搞灰色武装，去接受国民党的常备队一个什么小队，争论十分激烈！据说下面干部战士听了很气愤，决心要干八路军，我也不能理解一个县的群众领袖而接受国民党当局一个中尉头衔，又是分队（排），能容下几个战士？而这个分队又在国民党中队长直接领导下，有国民党两个分队夹在中间，能搞什么工作？他们的会议我未能参加，他们都是在朱南荡举行的，我的部队则住于小成集忙于剿匪。

涟水方面最终放弃了去国民党常备队，同意参加八路军，大家在涟西小成集小学开会，就汇合改编八路军交换意见。翌日张芳久代表党组织宣布，吴觉任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团长，陈书同任副团长，政委由地委书记兼估计不久即可派来，团参谋长张芳久，政治部主任李干成，副主任高兴泰，秘书长谢冰岩，陈亚昌任副官长。并择日在涟水西部小成集开建军大会，邀约地方群众、绅士参加。由于我部荡平涟西匪患深受当地群众拥护，因为当时要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对地主既不实行二五减租，也不分土地，也不打土豪，又保一方平安，于他们毫无损失，反而有利他们，因此当时地主富农大多数也是拥护我们的，有的尚且为我们宣传。

这次部队改建为八路军，又回到党的怀抱，我的心里是非常喜悦的，因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因而我就决心好好干下去，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另外搞武装斗争也是我一贯追求的，我深深体会到没有自己的武装，一切革命都是空白，也是没有保障的。

淮阴义勇队成立约在 1939 年 3 月间，至同年 6 月即改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一个团，这个团主要以淮阴义勇队为基干，其次则是涟水义勇队，另外也有一部分淮安县的武装。淮阴又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抗敌协会”，已放弃不用抗日同盟会等名义，这是由党直接领导的，由于我一直随部队故未参加他们的会议，也许我在抗敌协会中会担任什么职务，但我自己不知道，这与抗盟有类似情况。

建成八路军八团后，部队迅速进行整训，并开办随营干校以训练地方及部队的干部。营有教导员，连有指导员，排有政治宣传员，这些人都是党员，在连队里发展党员并建立党支部。我现在尚记得第一营营长是陈克天，教导员是周文科；二营营长是朱启勋，教导员是陈凤洲；三营营长是林士均，教导员可能是王国干，也可能是王小楼，这个营是扩军营，还未成为建制连。部队经过整训后，即开展扩军，当然是个别扩军，参加者都是些小学教师与失学青年，以及有觉悟的雇贫中农。

在涟水休整期间，东灌沭三县以汤曙红为首的游击队已改换番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因此我部为第八团。改编后苏皖区党委即派万众一同志来任中共苏皖第三地委书记，并任八团政委，随部队活动。是年夏，部队复往淮阴进行剿匪活动，同时进行政治宣传扩大党的影响。在淮阴活动时期，斩杀著名匪首张六、相大荣、吴其清等，获得群众的赞扬。我们的这支队伍，每个战士都能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与党的政策，教当地青少年唱抗日革命歌曲，又能帮群众做事，群众感到非常惊异与喜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好军队，都呼我们为八路军，在苏北地区都知道这个八路军。上级党除派万众一同志来以外，又派了杨汉章来参加党的工作，当时地委工作人员仅十人左右，在部队内呼为地方工作组，亦随部队行动，以开展地方党的工作。部队在淮阴活动一个时期后复回涟水西部，准备与三团汇合以建立淮海抗日根据地，因为那里已形成了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呼小成集为小延安。

回到涟水后，一则继续剿匪，二则派出突击小组，深入敌伪区捉拿或惩处汉奸。同时部队由于吸收了一批男女学生，因而又组成了一个宣传队，随部队做宣传工作，演出抗日的街头戏。并成立随营干校，学员都是由地方党选派党员或进步青年来学习，采取抗大式的办学，从中发展党员，毕业后除一部分留部队工作外，大多回地方去做党和群众工作。第一期随营干校

是在同年 9 月底左右举办的，由我亲自讲课。
根据我的分析，淮海地区包括盐阜，是一个真空地带，因为日军占领了县城及少数交通线的重镇外，广大农村是无法占领的，而国民党主力都是退走苏中的，未被占领的地区，地方各县仅有数百人常备团及一个常备旅，兵不多，战斗力弱，如果八团能与三团汇合，力量是强大的，国民党的县武装已不足为敌，即是常备旅也是可以击败的，我们汇合后，以六塘河两岸建立根据地，由于力量比较强大是可以迅速发展以填补这个真空，武装扩大建立根据地。我决定先人一着争取早日汇合，因此派人前往三团联系，并于初秋时率部转至涟、沭边境六塘河两岸活动，拟与三团沟通连成一片。可是正在我们与三团联系时，三团团长汤曙红同志为地方顽固派杀害，三团遭此打击，一时人心惶惶，认为不能坚持，退过陇海铁路休整去了。我们的计划未达，因而部队仍回淮阴活动。不意地方常备团结合五十七军叛军并地方顽固地主武装向我部包围进攻，血战数日，我部突围，仍退回至涟西小成集一带进行休整。
顽省政府韩德勤看到三团团长汤曙红已被谋杀，三团已退出苏北，现在苏北的共产党武装仅有我部，他当然想消灭这最后的心腹之患。首先是散布流言，说我部是冒充八路军，说蒋委员长曾去电报向延安询问，朱总司令回电不承认吴觉是八路军。这些宣传无非是想孤立我们与作为消灭我部的藉口，摩擦战业已开始。同时，地方顽固派也正在策划组织淮、涟、沭、泗等县武装向我联合进攻。果如此则我部现时活动的地区也正是这四县联合进攻的矛头中心，陷在敌人包围圈内，情况是危急的。我们在苏北地区也确是孤军奋斗，当时部队的思想情况异常紊乱。一般人的意见认为是无法坚持，悲观失望，主张只有走三团的路子才是上策，就是及早地退出苏北跳过铁路去与南进支队汇合。当时我与这些悲观失望的情绪展开了斗争，指出今天有日本占领城市及主要交通线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穿插跳动，是可以击败顽固派的围剿的。当时我们决定：一是跳入盐阜区活动，扩大活动区与回旋地带，使国民党部队难以捕捉；二是想说服涟东国民党区长薛华甫率部参加我部，当时薛华甫有两个连队，战斗力尚强，部队当时骨干大多系原苏北抗盟成员，万金培同志当时亦在这个区队工作，薛华甫本人是一有正义感的人，生平最恨特务，这些都是争取薛部参加的条件；第三，我们也想往海滨建立根据地，并向海上发展，这不仅是海上有财源，同时也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下海，使国民党对我部无法围剿。最后，我们确定了唯一的、基本的指导思想是积极扩大部队，争取薛部参加，使我部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国民党一个县的武装，使国民党一个县的武装不敢向我部寻衅进攻。当我们决定了这些措施以后，即率部转至盐阜区，与薛华甫本人见面。也就在这个时候，原淮阴营坝战地服务团领导人，后参加党任淮阴东南地区党的负责人张德雨为特务吴文崇所暗杀，吴文崇暗杀张德雨以后立即投降日军，搞曲线救国，想利用日军与我为敌。
与薛华甫见面，是在 1939 年 11 月间，这是我第一次与薛见面。薛确实人不错，明智而豪爽，我当即向他阐述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苏北敌顽我三方斗争的趋势，表明：你部的进步，另与我部关系久为国民党所知悉，是无法灰色下去的，敌人是无法捕我部的，但是却可以随时随地消灭你部，灰色武装陈文部队被国民党消灭，陈亦被杀害，三团汤曙红因对国民党尚存幻想，因而招致敌之毒手，陈、汤均是前车之鉴，如你部参加我部则合力更大，非但可以坚持，而且可以发展的。在我们说服鼓舞下，薛华甫欣然允承，决然挂冠率部参加我部。薛部参加后部队进行了改编，决定成立第三梯队，下辖八、九两个团，我任梯队长，万众一任政委，高兴泰任政治部主任，谢冰岩任秘书长，林士均任参谋长，陈亚昌任副官长，陈书同任八团团长，陈克天任八团副团长，薛华甫任九团团长。汇合以后，部队也仅有 500 余人，但这 500 余人都是战斗人员，因为我们的部队是吃派饭的，无一个伙夫，也无一个事务人员与一个卫生人员，一人一枪，人人都是战斗员，因此我们的部队以战斗人员的数量和战斗力都超过那时国民党的一个建制团的。当部队整编完后，我们即率部向滨海转移，拟建立海滨根据地。自整编为八路军后，国民党即视我们为心头之患，始终伺机想消灭我们，因此之间摩擦不断。

10 月间我们进入淮阴境内，这次淮阴地区的国民党当局率其常备团与反动地主武装向我围攻，我初不还击表示忍让以争取群众，同时发布文告，劝其应停止摩擦，枪口对外共同抗日，如此一来，在政治上他们是失败了。我们仍按原计划移动并进行抗日宣传，他们就尾随围困我们，坚持数日后我们决定仍回涟水活动，估计今后摩擦是频繁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我们必须抓紧扩军准备反摩擦。而且以整编后的情况看，如不改变部队的组织也是很难持久的，但这又需要一定根据地与一定的经济来源，因此我们就决心往海滨建立根据地。不料我部进入滨海区后，即为涟水、灌云两县常备团及地方小刀会等拦住包围，发生激战。原可彻底击败此部顽军，但因我部初到此处，即与地方刀会冲突，今后给养也是无法解决的，此地滨临东海，人口稀少，无处吃饭，两日来饿肚苦战，这种情况是万难持久的，因此在给顽常备团以打击后即于夜间仍向回转移。不意回师途中复与国民党的追兵遭遇，又展开了一场血战，终于消灭了敌人一部并俘获了敌人的一个连，获得了反摩擦的初步胜利，从此国民党的县武装就不敢向我部寻衅，顽区的武装亦纷纷与我妥协，暗通声气，因而形势又暂为和缓。这个时期我部仍穿插活动于淮海、盐阜两区。

1940 年 2 月我部于涟西地区伏击“扫荡”日军，以数十名之重大伤亡，毙伤日伪军百十人，获得胜利，军威大振。这时顽国民党省政府韩德勤已知我部非地方部队所能消灭，因而决定以其二十四集团军的主力前来进剿。韩德勤消灭我部之步骤，首先是加强特务活动，然后派主力配合地方保安旅及县团武装进行驻剿。韩德勤曾抽调淮海区籍县室级之特务 15 人，番号为省政府交通大队，配以短枪回淮海进行活动。这部分特务进入后即为我部全部俘获，由我亲自询问，获悉他们的任务是到陇海铁路的沿线，布置特务站，隔断我部与山东八路军主力的联系，切断我们的交通线。他们都是经过特别培训的特务，武器装备精良（携带的是快慢机 20 发的手枪），我决定将其全都秘密处死，秘密处死的执行人是陈克天同志。

在解决了这批特务不久后，江苏顽省政府即抽调其二十四集团军三十三师的一个旅进驻我活动的涟、沭边境，同时省保安第七旅亦由西而东向我包围，并调集了各县常备团向我清剿，这时敌人的兵力是两个旅，外加几个常备团。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当时我们是采取避战，想向西行动，引敌尾追，然后穿隙消灭敌人之一部。

当时即由我向整个部队作反摩擦之动员报告，号召所有干部群众都有信心，能够坚持并取得反摩擦的胜利。由于之前决定建立海滨根据地的计划受挫，在部队中滋长了能否坚持的问题，悲观情绪油然而生，有个别领导人主张临时埋枪分散潜伏。这是投降主义，是自取灭亡的一条死路，我当即与这种倾向作斗争，仔细分析说明埋枪埋伏的结果就是灭亡，分散的结果只会被敌人各个击破，过去淮海的党组织之所以遭受重大打击，活动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武装以致任人宰割，现在只有握紧拳头，才能打击敌人。我有力的驳斥了消极悲观论及逃跑主义，重振士气，决定仍回涟西。

在返回涟西的途中与尾随追击我部的涟水县武装及地方顽匪常备队遭遇。这时天已拂晓，敌人纠缠袭击，部队被迫作战，被困于涟东郑潭口，从凌晨至夕，血战竟日，我有一个连的部队被敌人阻击封锁于一个居民点上，无法突击，是以整个部队为敌拖住，因此决定组织我之神枪手，迂回敌人侧翼尽歼敌人阻击手，才使这个连脱离战斗。因为淮海一带村落连绵，穿过村落易遭敌袭击阻挠，故一与接战，大多坚持至晚，利用夜幕进行撤退，战斗至下午敌人已被我完全击退，部队集中晚间转移。我们胜利击退了敌人，也大大鼓舞了士气，因为除杀伤敌人外，还俘虏了敌人一个连的全部武装。我部转移驻地后，将少数伤员处理安置后，仍转回涟西一带活动，并密切观察敌人动态。

郑潭口一战，我部声威大振，苏皖区党委即来函嘉奖表扬，士气鼓舞极大。而国民党地方势力则要求与我接洽。我所捕获的一个连是地方实力派金二板的一个连，他当即请人前来说话，要求我发还全部人枪保证今后永不摩擦，并给予我部活动的便利。要发还人枪我部上下都不同意，由于薛华甫与金二板私人甚善，他主张发还以利扩大统一战线，另外薛是初参加部队

的，为了加强内部团结，又要扩大统一战线，所以就忍痛发还金二板这个连的全部人和枪。因为当时我部处于那样的环境，多一枪一弹对我们来讲都是好的，更何况是一个连的装备。虽忍痛割爱但在政治上也是有一定收获，在社会上获得各界人士的赞扬。人们极口称赞，八路军这样做真是仁至义尽，在政治上我们完全占了先。都说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实行团结，是人民的军队。声威所及，在涟水境内的国民党的县区武装，就不敢与我们动手动脚，特别是区一级还与我们暗送秋波，暗送情报，给我部的活动以很大的便利。因此国民党省政府对我部的追剿计划不得不采取缓进窥机而不敢盲动冒进，因为群众是拥护我们的。

由于我们没有炊事班，所到一处均由当地群众领袖分配在群众家派饭，因此每到一处，最多只能住两三天就得转移，因而不能固定住在一个地方，在以涟水为主，淮阴、淮安及沭阳一些地方，能够到的地方村庄都住过了，因飘忽无定，使敌人难以捉摸。而且这个部队的人员是淮阴、涟水、淮安、沭阳等地的人，到每一个地方都有向导，都有社会关系，虽是夜间行动，也不致与群众发生误会与摩擦。因为那时群众都有枪支，各个村庄都有武装自卫，如果没有地方人为向导，是容易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的。我们这个部队的参加者都是些学生、小学教员与觉悟的青年农民，他们都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而来参加的，他们的衣服、鞋子甚至吸的烟都是家庭供给的，部队里全不供给的，当时我们连供给制都无力量做到，以我个人而论，我的鞋子及棉衣都是群众捐给的。由于战士觉悟高肯学习，实际上整个部队都是干部。我们的部队在学习上是抓得很紧的，每天都上政治课与瞄准射击的技术，晚上行军前整个部队集合后就唱歌，都由我讲话，谈形势与敌情，以及我军的纪律及介绍新宿营地的环境与政治情况和要注意的问题。

这个部队的行动都是采取保密的，在日间派出侦察人员去预定宿营地侦察，察明情况，下午决定行军方向与宿营地，临出发前才通知所宿营地地址。一般在群众睡觉时开始行军，如是向西行军，则先向东行数里然后再改道，使敌人无法判断。至新宿营地，在情况紧张时，进入村庄即封锁消息，设置暗哨，进出村庄可疑人员则暂时扣留，晚间行军时才放行。下午以前都在室内上课练习瞄准，下午才在农场上活动，当夜又行军。差不多每两三天或每天都在行军，都是夜行军，情况紧张时则每天夜要跑六七十里，忽东忽西，异常灵活，敌人是根本无法掌握，当然也是异常艰苦的。

我们的战士每到一处都积极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向地主富农、国民党基层政权人员及士兵做政治宣讲工作，宣讲党的政策，教青年儿童唱革命歌曲，帮助贫下中农做事，严格执行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群众非常拥护，紧张时群众为我们侦察放哨，到处都能与群众打成一片。我们的部队就是兵扩兵，个别发展而壮大的，因此部队很巩固。没有开小差的现象，被打散的，或掉队的都能自动归队。由于我们的部队都是年轻人，行军时几乎都是小跑，速度很快，善跑善于夜间行军。

像这样的部队在几个县范围内跳跃回旋，无怪乎敌人无法捕捉。国民党主力三十三师一个师，奉命追剿我部，虽到处张贴悬赏通缉我们，以 5000 大洋通缉我，但是有 3 个月的时间，他们的主力也不敢进入我们的活动区，仍龟缩在黄河以南窥机徘徊，不敢冒进。

同时我们也在准备另一个反清剿的部署，即准备开辟一个新地区。这个新地区是国民党主力或较大点的部队不能深入的地带，这个地带是掌握在地方封建势力与会门的手中，即是涟水、淮安与淮阴三个县相交的三角地带，是淮阴西、洪泽湖与安徽省联结地带，长约 150 华里，宽约 40 至 60 华里。如在这个地带有工作基础，我部队必要时可以跳进这个地带，敌人是无法尾进的，但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封建会门所统治的地区。我们欲进入这个地区而能收到速效，最好是派员冒充刀会老师。担任此任务的是朱慕萍等人，他们经过短期的学习训练，都练成了“刀枪不入”的本事，刀不能砍伤，炮不能打伤，口中念咒当众表演，能请下天上诸神助战，这一套魔术表演非常精彩，是任何刀会老师所望尘莫及的。此外还带了一个执法队化装

成传教老师，通过社会关系进入这一区域传教，因表演精彩，声威大振，不久即控制了这一区域的刀会组织，为我主力部队东进苏北铺平了道路。由于我们在后一阶段很顺利的粉碎了国民党的大清剿，所以并未跳入这个地方，当时之所以如此，不过是有备无患罢了。

也是在这一年的 2 月，涟水县城的日本鬼子忽然带了伪军数百人向涟西“扫荡”抢劫，涟西 30 万人民遭到了日军骚扰而不能过好春节。涟西虽有国民党的三、四个区政府，但没有国民党军队，政权是国民党的，军队却是我们的，群众都眼巴巴地瞧着我们，看我们是如何保护他们过春节。我们首先派出几个游击小组在敌人“扫荡”的两翼及首尾进行麻雀战，使敌人不敢分散离队进行抢劫。在敌人驻地则终夜袭击，使敌疲劳不敢四出抢劫，缩短其“扫荡”期，除夕夜和鬼子伪军纠缠一天一夜，至农历初一的春节，也未打过什么大仗。我们当时还在洪码头布置了一个口袋阵，拟歼灭大部敌人，将两个团的兵力全部投入战斗，也没有预备队，后来想想，真是件凶事，200 余名鬼子加上数百名伪军，岂是我们这个装备低劣的游击队所能歼灭的吗？可是我们当时确实布置了一个口袋阵，拟了歼灭敌人的大胆作战计划。

我们是利用涟西张福河弯曲地形布置我们的口袋阵的。早晨时阵地已布置好了，曙光初照，严冬的阳光也显得温暖，全体指战员屏住气，西北风刺在脸上全无寒意，在专心等待敌人进入我们的口袋。当敌人列队进入口袋时，众枪齐发，子弹如雨点似地向敌人泼过，这是措手不及的袭击，敌人一个一个倒下去了，乱窜乱吼，混乱成一堆。但是日本鬼子是有战斗力的，在一短期的混乱以后，即以装甲车向我阵地冲锋，意将我们整个阵地切断。当装甲车冲到我们阵地附近时，我们的神枪手奋不顾身跃上河岸，向敌人装甲车猛扑上去投掷手榴弹。敌人被我们打回去了，但是炮弹纷纷投向我阵地。敌人再次布置向我发动冲锋，又被我们击退。当时整个形势，敌人在火力上是完全占优势，逐渐由被动而变主动了，我们如果不及时退出战斗将要吃大苦头，而且我们已给敌人很大杀伤，是个大胜仗，当机立断，即传令全军撤出战斗，我们指挥部及两个团大部撤走了，但是八团有一个连在小马庄未能迅速撤走，致为敌围攻。

敌人喊话要我部投降，这个连坚决向敌人冲锋争取突围，在冲锋中营长王道明牺牲了，因敌众我寡，敌人火力强，加上又是白昼无地形可利用，是无法冲出去的。最后战士们就决心死守村庄的院宅，敌人的排炮如雨点似落在这个村庄，村落房子全部着火，顿时变成一片火海，但是英勇顽强的战士毫不动摇，宁可葬身于火海，也不向敌人投降，在火海中继续向敌人射击。由于春节，我们家乡农民有传统习俗，每家都将水缸等储满，在春节整个期间是不能挑水的，所以家中各种缸里盛满水，战士们跳进水缸，湿透衣服，伏在院墙上射击，当衣服被火烤干了，再跳进水缸，就这样反复。有的人子弹打光，就拿起斧头准备迎敌。最后整个村落几乎夷为平地，敌人以为我被困战士全部被烧死，几个日伪军想靠近拣一点战利品，但又被火海中发出的枪弹送了命。敌人不敢再送死，又怕我部再来追击，时已至傍晚，不得不仓惶载着百十具尸体逃回涟水城。我们的这个连既未向敌人投降，也未被消灭，血战竟日，日本鬼子也为之咋舌。小马庄战斗中八团四营营长王道明、义勇队老战士严永文、叶朝中等 20 余人光荣牺牲了。至夜间这个英雄的连队终于胜利归队了，战士们都被烧掉头发、眉毛，遍体灼泡。洪码头战斗，我部死伤约 40 余人，但敌人死伤近 200 人，日本鬼子就死了 50 余人，由于我部不断的袭击尾随敌人，因此日军“扫荡”了两天，也不敢分散抢劫。

洪码头之战捷报飞传，轰动了整个苏北地区！这是苏北地区从未有过的与日军的一场恶战，群众对这场英勇的战斗颂声载道，越传越神，到处都传播着八路军在洪码头摆下口袋阵，大歼日本鬼子和小马庄火海血战的故事！群众对八路军赞不绝口，又骂国民党的顽军没用，轻视国民党军队。

这消息传到韩德勤耳中，又嫉又恨，因为这里是他和顾祝同的家乡，是他二十四集团军兵源之地，岂能让共产党八路军存在。他们选择我部洪码头战斗消耗之后，乘机向我进攻，真正伤尽天良。

洪码头战斗以后，我们忙于安葬死者，处理伤员，因为我们既无稳定的根据地与后方机关，也无医生，所有受伤人员必须寄托在最可靠的群众家里进行治疗或找关系转去敌人占领的城市医院中去，还要采取一切的办法迅速补充弹药。死者安葬，伤者就医，群众自动发起向我部献子弹、手榴弹，未及数日弹药就补充到位，而且很充实，能储备一部分。这个捐助运动，许多开明地主富农都参加了。可以说，洪码头战斗真正感动了广大爱国民众，在安葬烈士时我亲眼看到群众男女老少都痛哭失声。群众自动为治疗伤病员想方设法，由此更加激发鼓舞了我们的士气；群众争着参军，部队也补充了新生力量。善后问题能处理如此之快，都应归功于群众。

洪码头战斗后未及十日，当我们引部西至沭阳钱集一带时即与顽固头子王光夏的省保安第七旅遭遇，展开激战，国民党之主力三十三师的一个旅及各县常备团亦尾追而来，因此，我部即被顽军层层围困。当我们侦得这一情况后，当即研究对策，分析敌情后，我提出闪开一侧让路，待其奔波疲劳分散之后寻机袭击其一部，使其知难而退的意见。这个意见大家都说好，但是当时苏皖区党委派来一个代表，他提出修正方案是：我部不是向一边闪开让路，而是向西北沭阳、泗阳一带挺进，调动敌人向我尾随，尔后穿壁回师利用黄河、盐河与敌周旋，伺机袭击敌人。最后两个意见合而为一，就这样办了。可是谁也没考虑到沭阳、泗阳这个地带我们从未进入活动过，地形不熟，又无群众基础，而西北钱集一地又是大地主集中的地带，这是极为不利的条件，当时大家全未估计到这些条件。

当夜我部即转移至涟水、沭阳交界的前六塘河的夹滩内，都不隐蔽，故意暴露，以牵引敌人，住了两日后又依靠宣传队的一个小孩的关系将部队转移至沭阳、泗阳两县交界处的钱集北红庙一带。这一带是地主区，恰巧在这次转移中我患了气管炎，高烧而昏迷，一切由区党委的军代表与参谋长处理，一夜过后，我的病还未好，仍在高烧。至第二天晚间，我向参谋长说应该回师涟水了，参谋长说可以再住一晚，明夜再回涟水，因为明天就可以查明三十三师的动向了。

可是就在第二天黎明以后，我的高烧才退去，尚在睡梦中，敌人突然向我部进攻了。原来是我部与国民党常备第七旅发生了遭遇战，这是顽固出名的王光夏所率领的武装。王光夏是当时韩德勤手下反共最坚决，也是最能打的部队，他是奉命由西而东配合三十三师一个旅向我部进剿的，不期在此发生遭遇，而我们又是住在地主区，人生地两疏，为敌侦悉，而我们全无所知。敌人先我一着向我发动全面进攻与包围，当时由于就食群众家，部队住地分散，战线拖得很长，敌人也难于包围，但敌人是知道我们指挥所在地的村落，因此首先向我指挥地村庄进攻，与哨兵接火了。敌人火力很强，枪的子弹向我住房的门窗飞进，我的警卫组，冲出大门向敌人反扑过去，把敌人火力压了下去，但大门仍被敌人封锁，我们旋即挖了墙洞，进入村落后面的丁字沟内，而后考虑一下，我们住地太分散，战线拉得太长，容易被敌人突破分割，分别消灭，因此传令各部队立即放弃村庄，全部退至丁字沟内，坚守迎敌。因为我们估计白天是很难撤退，易被敌消灭，只有坚持到夜间才能突围撤走，这个丁字沟离村较远，沟之周围都是开阔地带，敌人无法接近，易守难攻。

由于敌人在开始时分散兵力全线发动进攻，由于我部射击技术好，神枪手多，故敌人遭杀伤很大，一个村子也未被攻破，而我各部均未遭到损失，从容退至丁字沟内，这是约在上午 9 点。此后敌人也作了重新部署，将丁字沟团团围住，占领四周村庄，对我发起冲锋。我则以丁字沟为掩护，从容对敌，敌人的冲锋不到 100 米范围内是不会还击的，当走到 100 米、50 米左右才予以还击，因战士们射击技术好，敌人难以靠近，如果少数敌人突入沟边则短枪手榴弹待之。敌人屡攻无效，则想迫击炮摧毁我阵地，众炮终日乱轰，极少落入丁字沟内。当敌人不进攻时，我们的战士用枪挑起衣帽于沟边，伪装反扑之姿态，引起敌人乱枪齐发，使其大量消耗弹药。敌人从上午到下午 3 点前发动十余次进攻，均被击退，陈尸遍野，冲锋号虽一个劲的吹，但敌人再也不敢向我冲锋进攻了，除大炮不时吼叫外，别无其它举动。这预

示着敌我双方都在准备等待夜幕降临以后的一场恶战。敌人之所以怯于向我进攻，据事后调查，敌人在白天进攻中已死伤 200 余人，而我部除个别负伤外毫无一人牺牲。
在敌人不再发动向我进攻以后，我们指挥部就考虑研究夜间如何突围之事，当时情况是：经过一天血战我们的弹药所剩无多，如夜间不能突出，敌人可能利用夜幕向我进攻，即或能坚持到明天，也是要被敌人消灭的。现在包围我们的不过是顽常备旅的常备团，敌人主力三十三师的一个旅并未参战，估计该师明晨以前即可兼程而来投入战斗，因此今夜能否胜利突围是关系我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决定今晚突围，估计敌人也会估计到我们夜间要突围，而且敌人也会估计到我们是向东突围的，但敌人也会设想我们是由南、北、西三个方向突围而折向东去，不会直接向东突围的。因此我们就决定向东突围，向西佯攻，具体部署是八团向东进攻突围，组织短枪突击队，由我亲自指挥向东突围，九团为后卫，先则向西佯攻，伪作突围，以牵制敌人。梯队部及第二届的随营干校为中锋，第二届随营干校的学员全部参加战斗，而且表现都很勇敢。在晚间八九点钟时突围战斗打响了，首先是九团向西佯攻以调动敌人，继而八团向东攻击，经几度冲击后，发现敌人在东阵地火力最强，屡攻不能突破，但敌人也有些慌了，为了防我突破即响起调队号，北边敌人向东移动，因此我当即命令九团向北突围，八团为后卫。命令一下，九团立即行动很顺利，由北边阵地突出去了，梯队部及随营干校与八团大部分也突围出去了，可是我率领的突击队及一部分八团的部队突围时敌人又攻占阵地，封锁了突破口。随我突围的直属队指导员在我身边负了伤，我当即将突围的人引至一独立户的院中，这时未突围出去的人有六七十人。我将他们组织了一下，说明必须死里求生，不拼命突围是死路一条，我们宁可在突围中牺牲，也不能被敌人活抓，而且我们只要勇往直前，只有前进与敌人死拼才可以胜利突围出去。部署甫定，哨兵报告敌已向这里搜索了，我当即率队冲出院子，敌人向我阻击，但被我们冲破了，这时所有各庄草堆都被敌人放火烧起来了，火光冲天如同白昼。我们能看见敌人活动，敌人很难看见我们（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穿过村庄时敌人则用机枪盲目乱射，我们全不理会，一往直前，穿过约三里地纵深，终于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涉过前后两道六塘河，又回到涟水境内。突围时已预定集合地是涟西小成集，因此我们于黎明时回到小成集，部队全部集中在此。至下午部队已集中起来，能够归队的大多数都在涟西小成集集中了。这次沭阳钱集马庙之战果是一次被动的被迫应战，在形势上对我们非常不利，但战术上我们是胜利了，非但胜利突围，而且大量杀敌，敌人死伤团长以下 200 余名，而我部在突围中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即将出任淮安县委书记直属队指导员吴正霖，六连长朱玉山，排长宠永才、戴如谈，排政宣朱士顺等十多个干部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了。另伤连长以下数人都随部队突围而出，并及时予以妥善安置与治疗。这次战斗形式上我们败了，而实质上敌人损伤则数倍于我，敌官兵闻战心寒，后来在尾追清剿中，都不敢猛进，心惊胆战，怯与我部交锋。
经钱集一战后，国民党则以其主力，组织 7 县会剿，大军汇集于我活动区内进行全面清剿。此时部队是大战以后，子弹打光，人心惶惶，又有主张埋枪散伙隐藏的，也有人认为我们的队伍是干部队，为了保存实力，撤退皖东北以待机。我再次与这种右倾思想斗争，指出如这样做，其结果是部队将为敌人消灭光，地方组织地方党失掉掩护，亦将为敌人全部催毁，只有紧握枪杆与敌人战斗下去，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且淮阴、淮安、涟水的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我们可以利用广大的平原、河道与日伪之据点回旋周转使其无法捕捉。这次敌人是以三十三师一个旅，与王光夏的一个常备旅为主力配合地方常备团举行 7 县会剿，这种会剿的局面处在敌后区我估计是时间不会长的，也不可怕，还可利用日伪与顽之间的矛盾。我建议为了便于分散潜伏灵活跳动，以及为了镇压特务坏蛋，可将部队重新整编，取消营团层次，编成几个直属梯队（部队对外的番号叫淮河大队），同时将全部短枪及打手集中，编成特务队，专门化妆突击敌人，镇压顽方特务。特务队由我亲自掌握与敌斗争，其它则以队为单位，分散潜伏，灵活跳动于敌占区，并设立秘密交通站，各队每天与总部取得联系。当

时政委万众一同志是同意并支持我的意见，但同时也将部分同志提出的撤退皖东北意见报告苏皖区党委。
苏皖区党委同意采纳我的意见采取措施，万众一同志也有意识的将主张撤退不能坚持的指挥员调离部队，安排其他工作。就在我们一切处理就绪以后，国民党果然采取了所谓的 7 县会剿，淮阴等县的常备团开进了涟水境内，国民党对我部的全面清剿开始了。敌人以三十三师的一个旅和常备七旅的主力搜寻求歼我部，以 7 县的地方武装防堵拦截搜查地方游击小组等革命组织，同时到处张贴布告，宣布我部为非法武装，以 5000 元赏价通缉我，并以各不等价钱悬赏通缉我各指挥员，通告严令地方党限期自首，并逮捕拷打我军属，地方特务、土顽、恶霸一时异常嚣张。这时我率特务队到处活动，专打特务及地方坏蛋使国民党清剿部队失掉羽翼，缺少耳目。我们的特务队队员都是从八、九团中挑选出的骁勇善战机灵的神枪手，个个身怀绝技。在清剿行动开始时，特务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干净利落地将国民党省属特务飞行大队全部消灭，又把涟西两个拥有 200 人队伍的反动恶霸地主、特务头子余士卓（余五）、张文波击毙。余、张两恶霸在我部临近时即聚众以抗，且十分奸滑警觉，一直难以剪除，对他们只能智取。我部佯装撤走，使其放松警惕，留下的几名队员混入圩内将其击毙，趁乱之机迅速撤离，胜利完成任务。另一个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张某拥枪数百支守一圩寨与我对抗，我们趁三十三师进驻其附近时，他放松警惕，数名队员埋伏其附近，监视观察其行踪。一日张某带卫士数名乘车前往三十三师去拜见顽旅长，我埋伏的神枪手将其击毙。另一恶霸与他两个特务儿子，清剿时积极反对我部，父子三人分居三处，同一夜都被特务战士处决。这一有力的回击，使特务谈虎色变，闻风而逃，使地方坏蛋不敢迫害我部家属，地方人士及国民党的区乡保长也不敢逼地下党自首，并暗地保护我方人员及军属，扭转了当时的自首风气，稳定了地方干部与群众的情绪。
我们除了对国民党特务进行镇压外，另一个办法就是破坏顽军的扩军。当时国民党二十四集团军的司令韩德勤、副司令李守维，都是淮海区泗阳县人。因此二十四集团军其基本部队的八十九军都是淮海兵，他们对外地区的兵是既无兴趣也不信任的，因此八十九军是完全靠招募淮海兵前往补充。当时他们所招的兵，必须经过盐河线才能输送出去，而当时盐河线是我部活动地区，因此数百上千的新兵经常为我击散，使其有兵也无法补充。这事确使韩德勤等顽固派无可奈何，钱潜同志在当时就是经常执行这个任务的。
喧嚣一时的所谓联合清剿，只半个月即告结束。我部坚持苏北敌后孤军奋斗的最后一次反摩擦战就此胜利结束了。在清剿中，部队非未缩小，相反是发展了。淮安农刀会有 100 多人组成的一支队伍前来参加我部，而且在我们胜利的影响下涟东滨海区终于建立了一个滨海大队，后来发展至五六百人。由于我们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 7 县围剿获得了苏皖区党委的嘉奖表扬。
敌此次兴师动众向我大举清剿，其结果以失败告终，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曾宣布战绩说薛华甫被他们击毙，吴觉负重伤在逃。敌人也总结了自己失败的教训，是老百姓都相信共产党，他们没有情报工作。因此他们撤军以后，就大量布置特务情报站，差不多在我活动地区的四周都布置了特工组、特工站以及特务的武装。由于我们在最紧张时潜伏敌区，因此他们也采取了依附据点，背靠日伪建立特务组织与特工队，以准备下一次清剿时，使我部无藏身之所。
根据这一情况，我部为了扩大胜利与巩固胜利，并彻底破坏敌人之下一次清剿部署，决定首先将我们活动区域内之特务全部消灭，并选择干部冒充刀会老师，至敌区组织刀会，这些工作都是由我亲自负责掌握的。执行任务的特务队在极短期间内，在地方群众的协助下，凭借着集体机智与英雄的行动，将在我们活动区域内的大小特务大部分都枪杀了。这时，地方党也有些同志向我们提出意见，认为杀人太多，人心惶惶，但我们说服了这些同志，对付此类特务必须坚决镇压。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消灭国民党区（是我活动的地方）的特务，还采取一

切办法，消灭依附日伪据点的特务组织。我们以一切技巧将涟水县境内的、日伪据点内的，专门对我们设的四个特务站的人消灭了三个站，还有一国民党情报站长姓王的特务头子被我们追缉，终日躲在敌伪据点不出来，我队员化妆白天混入据点将其活捉归案后向我自首，转变了态度，以后为我所用。最后仅剩下淮阴方向在敌区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洪毕成大队，有人枪六七十，躲在敌区。他们的任务是与国民党打入日军内任日军司令部特务头子的吴文崇联系，一方面是专门对付我部，另一方面是作为国民党省务室与吴文崇联系的武装组织，这部分特务最狡猾，难以捕捉。其存在于我大军东进也是不利的，因此在我主力东进前两个月，我利用了狂风暴雨之夜，亲率特务及第一营钱潜同志（解放后在湖南任衡阳军分区司令）等长途奔袭，将其全部歼灭俘获，除当场击毙数人外，俘虏了大队长洪毕成，手下无一漏网，使敌人胆战心惊。

最终，所有国民党派遣的特务都为我部消灭了，镇压的技巧，在当时也是惊人的。淮海区现在安徽工作的黄驭、朱启宇、姜龙楼、张景文同志，对当时我们歼灭特务的情况也是了解的，这些行动是我亲自掌握的。当时党委部门批评我们杀的特务太凶、太左了，部队几个领导同志万众一、薛华甫与我都不同意这种批评，我们三人都有同感，尤其我个人，感受最深，我认为根据我的体验是国民党人（如周化鹏）有时尚谈感情还保存一点旧道德，但是叛徒特务是没有感情的，是既无旧道德也无新道德，是最卑鄙的人，因此在我的思想上是久有大杀特务的念头。同时薛华甫也最恨特务，他是恨不得将特务杀尽斩绝，薛华甫的这种情绪，万金培同志是最了解的。也许当时我与万、薛诸同志都有这种情绪，在某些行动宁可稍有过“左”，但后来一切事情的发展，都证明了我们采取对特务的无情镇压是正确的。

总之，这一年来的斗争是尖锐、残酷、艰难困苦的，我们投有根据地，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日伪统治区内活动，既要防顽又要防日，实处于日顽夹击的状态。同时我们没有经济来源，数百人的一支游击队，完全依靠分散在老百姓家里吃饭，这就需要有最高度的自觉的纪律。群众好的有基础的地方，虽然可以隐蔽，但因吃饭问题使你难以停留两天以上。我们经常日伏夜出、灵活跳动，经常夜行七八十里，穿插于淮海、盐阜两个地区。由于战斗频繁与摆脱敌人的追击，我们是常饿着肚子作战与快速度地行军。没有卫生人员，平时病号治疗护理有其困难，作战伤员更是难以处理。在一年来坚持斗争中，牺牲了不少的优秀干部，如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张芳久牺牲了，涟水县群众领袖四营长王道明，淮安县委书记兼支队部指导员吴正霖，一营教导员朱鸿宾等同志均先后在作战中牺牲了，淮阴县委书记也为特务所暗杀，其他县营以下的干部牺牲者就更多了。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党没有忘记我们，除了苏皖区党委经常写信鼓舞安慰我们，当时华中党的最高负责人刘少奇同志曾决定了保存这数百人干部，要我们撤到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但我们表示可以坚持，而且可以坚持到胜利迎接主力。由于我们的信心，党又改变了决定，要我们积极活动，策应主力东进。我们终于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由于我们的游击坚持，保障与掩护了苏北地方党的建立与发展，便利了主力的东进。我八路军的主力终于 1940 年盛夏之际顺利地进军苏北，建立了淮海与盐阜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我已是 28 岁了。

在苏北沦陷，抗日民主根据地未建立的这一年的游击坚持中，我是一心跟着党走的，在建立游击队的初期，我家族叔叔吴漱泉也曾两度派员来我部争取我前往，不要我一兵一枪，他可以给我一团人。当时吴漱泉同张翼结伙与江苏韩德勤对抗，张翼过去曾在红军任职，与黄克诚同志熟悉，是黄克诚同志进军苏北时的主要争取对象，也就在我大军东进时，张翼为韩德勤所诱杀。我为了党的事业，为了自己的光明前途，拒绝了吴漱泉的召请。在情况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有个别的领导干部动摇畏缩，也曾数度酝酿要收枪散伙，而我毫不动摇，与这些逃跑思想作斗争。我们部队成立不久，国民党就向我进攻清剿，在国共合作、全国团结抗战的情况之下，国民党竟然以 5000 元的赏价通缉我，这暴露了国民党对我嫉恨之深。与特务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斗争是我亲自掌握的，最后是彻底粉碎了特务，被我所镇压的特务是难

以计数的。当时我的党的关系问题尚来解决，我还是一个党外群众。我在部队里开办了随营干校，训练地方党的县区级干部，当时地方党的县区干部，大多系这个干校训练出去的。干校是我所主持，主要课程是我所亲自讲课。万众一同志是我当时的政治委员，我们朝夕相聚，有时则抵足而眠，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八、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至全国胜利解放前后的经历

两年的建军工作淮阴反“扫荡”的坚持斗争华中党校的整风日军投降前后渡过灾荒完成支前解放战争中的敌后坚持与建军工作胜利渡江的接管工作

远在主力未进军苏北，我部还处在独立坚持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即指示我部积极活动以迎接主力东进。在主力到达淮海地区后，上级要我部积极扩大为 3000 人以上的一个旅的建制，以留守坚持地方，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新四军北进，与迎接八路军南下进入苏北。

我部当即加强刀会活动，开辟主力经皖北东进苏北之道路，抽出大批干部前往安徽迎接主力，以作向导。同时规划主力东进后粮草供应，与建立政权之预为安排，同时掌握各个渡口。终于在 1940 年 6 月底 7 月初我主力兵不血刃，东进而占领苏北淮海区，从此结束了我部独力坚持的局面，取得了坚持的最后胜利。当与主力会师时，全军真是欢喜若狂。

在主力抵达淮海地区后，我部即恢复八、九两个团的建制。我即奉命率带所属第八团前往淮阴去帮助地方建立县乡两级人民政权，由我出面召开淮阴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长。另外又成立了一个十团的番号，由各个负责人分赴各地进行扩军，并派一部至滨海区扩大所有的滨海游击大队。我们决定将团结队 600 人与滨海大队约 700 人合编为十团。我当时为梯队长兼八团团长，当时八团团长因身体关系未能参加洪码头及观庙战役，区党委将陈书同调离部队派往皖东北。坚持胜利了、主力东进以后，陈书同又回到部队，组织上将陈分配为梯队总部参谋，当时梯队参谋长是山东一一五师第五纵队派来的，建立十团，我向上级建议由陈书同担任十团团长，上级同意了。因此，1940 年秋以后陈书同任即将合并的十团团长，而不当八团团长了。由于主力东进胜利的影响及我部队员的地方关系，在主力抵达淮海后不及两个月的时间，我部即扩大 8 倍，而达到 5000 余人的一支地方武装。旋即奉到上级的命令，要我部拨十团的一部分去补充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五纵队的第八旅，我们即以十团的一部约 700 人（即原滨海大队）去补充主力八旅，至同年冬又奉命令调十团的另一部约五六百人补充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一个主力营调淮海区党委为警卫营，如此这个旅至 1941 年新春已被调出两个团，而仅剩下八团一个团。

部队分散调拨后，我部仅有第八团 2000 人左右，奉命驻防淮海区六塘河河南一带，负责防堵戒备韩德勤的北犯，同时保护当时苏皖交通之运河、盐河的交通线。在这个时期我政权未能巩固，顽固地主、土匪特务等联络而起，命令我负责剿匪，也就是这一年新春，日军进攻我淮海区党委及第三师（第五纵司令部）所在地。当时淮海区无主力，我部即奉命阻击日军，奋战两昼夜，首先阻击敌人于前六塘河之徐溜镇，翌日后，复阻击敌于后六塘河之钱集，使区党委及纵队司令部得以安全撤退。在此两次阻击战中，我个人两次为敌人发现目标而射击，坐骑负伤极为危险，几于丧命。在此期间地方土顽暴动，到处骚扰，危及我根据地，嚣张一时。我奉命保卫淮海根据地负责剿匪，激战于涟水马圩荡平涟水之土顽；再战于淮阴之新渡口，激战于齐老庄，再战于朱集；三战于三棵树一带，扫平淮阴土顽之乱。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指挥下我部担任阻击战，配合兄弟主力部队向盘踞在泗阳境内陈道口之王光夏部进攻，消灭王光夏之全部，荡平泗阳县之土顽，完全清除三个县的土顽。其后又与日军激战于宿迁县之陆集，粉碎日军之“扫荡”。几次战斗，我部是付出一定伤亡的，前后牺牲二营营长朱启勋等若干同志，负伤者有一营营长钱潜及三营教导员周文科等，连级同志若干。于 1941

年初春，复奉新四军军部命令，将我部拨归新四军主力独立旅（即是一一五师的教导五旅）建制，改番号为该旅第三团，我任团长。

我被批准回到党内来也就是在这年的 6 月间，我要求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是在万众一同志来到部队，并在部队里已经建立了党的组织以后的事。我曾向万众一同志提出了我的要求，他表示这个问题需要苏皖区党委解决，他许诺将这个问题转给区党委考虑。同时，那时专心忙于游击坚持，与敌人斗争之不暇，哪里还有思想去考虑这些了。事实上一切重要问题和政策都是由我们领导决定，有时我还帮助上党课，参加了党的同志对我也极为尊重，因此我认为解决组织问题，也仅仅是形式问题，自己也常以党外布尔什维克来自慰。认为游击坚持胜利了，根据地建立了，区党委来了自然会解决的。但由于发生有关托匪的案件，详细情况我是不了解的，但我知道党组织正在调查，虽然逮捕许多人，我未动摇对党的信任，我相信党是可以弄清问题的。据说当时逮捕数十人后，原拟扩大逮捕审查，后来之所以不继续扩大逮捕，是由于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的意见，吴说逮捕了这许多人，而未逮捕者并未有动摇逃跑之事，如果是托匪特务，日军和国民党与我们犬牙交错，近在咫尺，他们是随时可以逃跑投敌的，而他们处之泰然仍积极工作，毫不动摇，由此可以证明为好人，不应扩大继续逮捕。我虽未被审查，但这个时期也不便向区党委申请解决我的组织问题。等之前的案件有了结果后才进行申请，并经淮海区党委批准重新入党。

我在被批准重新入党的时候，正是在新四军独立旅任三团团长之前，这个部队改编为独立旅之第三团，而最后完成了主力化也是经过一番艰苦教育的过程。这个部队究竟是地方上土生土长的，乡土观念异常浓厚，而独立旅是山东的主力（原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有红军的基础，部队作风生活习惯都有所不同，尤其是前次补充 500 余人给独立旅时，因与带队的干部关系不好，这些干部回来以后，就散播了对主力独立旅不好的印象。部队改成三团以后，团政委、政治主任都是新派，营连各级都派了主力干部的副职，因此主力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都各有成见，在感情上也就不能水乳交融了，经常闹无原则的纠纷。这一情况在 1941 年陈毅同志过淮海时，我都向军长报告过了。在这一年中我是亲自掌握部队的思想教育，全心全意帮助主力派来的副团长、政委等建立威信。经过一年的教育与配合主力一、二团作战，政治素质与战斗力都提高了，完成了主力化的任务。

至 1942 年初夏，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将要调教导第五旅回山东归还建制，我知道这一情况后，因为一年多在国民党区坚持武装斗争，每夜都急行军致生脚疾，我的两只脚都生鸡眼，即胼胝脚，行旅艰难，痛苦难忍，不适宜干主力部队的野战军工作，因此向旅部提出不随部队去山东，留地方安排工作。旅部则要我任旅的政治部副主任，我则坚请离开主力，而同时淮海区党委也有意留我在苏北地区工作，因此我于同年 5 月间离开八路军教导第五旅回到淮海区工作。这个团后来随教导五旅回山东，日军投降时，即被调赴东北了。在前后两年建军工作中，我非但能完成任务，在政治上我也是比较开朗的，绝不因私人得失，而对党的工作表现消极，仍是积极工作，忠心于党的任务。

1942 年 3 月，淮海区成立行政公署，由李一氓任主任，我回到地方后则任民政处长。适逢淮海区党委决定疏浚万公河工程，可是这条河穿插于敌伪区，怕敌人干扰我群众疏浚工程，因此我回淮海区后的翌日，未及休息即命我率两个主力营监察敌人，掩护群众进行工程，同时要我总管此项工程，至 7 月初此项工程才全部竣工。紧接着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要往各县巡视让我陪同。时值盛暑，这年夏天特别热，当时我有三匹马，其中一匹马即中暑而瞎了，可见那年天气是非常热，据当地农民说是数十年来之酷暑。我是 9 月间巡视完回行署，至 9 月底，区党委决定我去淮阴任县长兼团长，任务是恢复失地与监视。其时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正北窥淮海区，当时韩德勤踞守淮阴南部邻县淮安境内凤谷村之弹丸之地，为新四军所包围，无法发展，想北进淮海重建苏皖边境，向西以联结国民党的主力，因此在淮阴地区策动土顽勾结伪军向北推进。当时我方淮阴县县长夏仲芳，被迫退守六塘河一带，大部地区

都顽化或伪化，区党委鉴于此而任命我任县长，当时任县长兼团长仅有我一个人，这也是特殊情况。10 月，我至淮阴，商得县委同意，并得到区党委批准，将原主要工作推迟或列于第二位，抓紧时间，进行全县扩军大运动，以期于极短时间每个区政府都要建立一至两个连的骨干武装，同时扩大主力团，区以下则根据敌情与需要建立若干边防队，为民兵骨干，向顽伪区开拓地区，建立整套武装系统，加强对敌顽斗争的领导。同时改造地形，将全县所有道路都修成交通沟，沟边修散兵坑，沟中筑有工事可以防堵敌人由沟中进犯，路路成为交通沟，可以说是路路相通，村村相连，而每个村庄都有树木围绕，每个村庄都可掩蔽阻敌。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所有计划都顺利完成了，有效解决淮海平原地区无法隐蔽的弊病。

事有凑巧也就是在我任职后，诸事妥善安排之后，苏北日军就神出鬼没的，以数万之众，向我苏北根据地进行全面大“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期间一次规模最大的突然“扫荡”，妄想尽歼新四军，活抓陈毅。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扫荡”，事前我军毫无所闻，日军极其诡密的由前线抽调大军至敌后向我苏北进行铁壁合围与梳篦式的大“扫荡”。这次“扫荡”国民党全部被搞垮，韩德勤、李明扬数万之众都在蒋介石曲线救国论的指使下全部投降日军，改为和平军。而我新四军临机指挥，全未有损失，军部跳出敌之合围，由苏北盐城转移至淮南盱眙地区。

由于淮阴城是日军驻扎苏北的司令部，因此首当其冲，遭到日军数千至万之敌横扫县的全境，可谓铁骑遍野，村村皆到。当时我部未撤退仍坚持斗争，我率领独立团采取敌进我进，绝不退出县境一步，也就是在敌人“扫荡”时不是向后撤，而是寻隙由交通沟运转至敌占区活动与敌换防。同时，全区亦不得擅离职守，退却逃跑，利用地下交通沟与敌人回旋，绕至敌侧与敌后进行麻雀战，向敌据点靠近灵活跳动，勿为敌所捕捉。同时将县委及政府领导干部都分散至各区加强区的领导，有擅离职守者，即行撤职惩处。敌人数日“扫荡”我们都是就地坚持，敌人毫无所获，不得不改弦更张，以撤退而告终。

但是敌人是不会死心的，在敌人撤退后，我们估计敌人会卷土重来。果不出所料，约 10 天以后，日军采取华北的“扫荡”清剿办法，以淮阴为苏北试办的治安肃正区，进行治安肃正，想取得经验后，再在苏北地区普遍推广。所谓治安肃正，即是以数千日军配合伪军对我进行反复“扫荡”到处建立据点，在每隔十里左右即构筑一个据点，所建据点堑深高圩，外围有铁丝网，并配建碉堡群；日军分散各据点另配伪军把守，反复经常以铁壁合围，梳篦式进行全县大规模“扫荡”，并携有大批政治人员，编组保甲，扩建自卫团。我们的独立团宿营于任何地方都不能超过敌人据点五、六里路，随时可能遭到敌人围歼，夜间行动则会引起各庄狗吠，又易于为敌人发觉，因此下令尽宰全区之狗，便于我军行动。这时我率团则跳至境内伪区活动，靠近区据点宿营。因为伪区据点全是伪军所有，日本人则都在我区新建据点。夜间我们所有边防队及区队和党政人员都于夜间分至各村庄，向群众宣传，教育群众如何与敌人斗争，坚决镇压投敌分子及汉奸。同时我部向敌之老据点发动进攻，攻下老伪区之据点，在伪区建立我之政权，或两面派之政权。新据点伪军和日军是分开居住，我则进行偷袭而尽歼伪军。这时敌人进入新区立足未稳反而丢掉老伪区，我部则极力向敌占区猛进，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同时以坑道与交通沟直逼之据点，以游击小组终日凭借坑道与交通沟围困骚扰敌人，使敌人寸步难行。另一方面则进行坚壁清野，将县内瓦屋拆尽，所有砖头石块全部掩藏，使敌人不能就地取材，无法建筑碉堡与扩大碉堡群，使敌人完全陷入人民游击战争的火海中。而伪军与伪人员大为惶恐，纷纷与我拉关系，所有伪区长都秘密来根据地与我见面，保证愿为我方效力，伪之团大队及中队长亦来与我拉关系，我们的敌工人员则经常进出于敌伪之据点，在伪军中进行组织工作。

在此地还值得一提的是于“扫荡”之初，恰有 30 余名八路军教导第五旅的营连干部，由军部学习返山东师部，因敌人“扫荡”，道路阻塞，不能去山东，由军部批准留我处分配工作。这些同志都是我的老战友，久经战争锻炼，善于游击，我除一大部分充实团的部队外，其余

全分配各区任区长或区委书记，加强了我部力量，这是当时能够战胜敌人疯狂“扫荡”的条件之一。在“扫荡”中奉华中局的指示，淮阴成立敌工部，我兼部长。过去斗争中从无情报工作，这时我们运用间谍手段，以机智巧妙的方法，将一位年青的区委书记打进日军司令部的情报处工作，使日军情报处能为我所用。我们对敌斗争的一个手段是集中力量打击最顽固而又不愿与我发生关系的伪军，不打则已，要打就要打得狠，以求全歼，如此更加巩固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伪军更为我效力，另一则是对于敌人进行编组保甲的政治大队人员，坚决予以镇压歼灭，而使城中伪人员不敢随日军下乡进行编组保甲，被强迫下乡的伪政治人员也纷纷逃走。在敌人向我有计划合击“扫荡”的时候，我则命令与我关系较好的伪军起义投降自行烧毁放弃据点，以打击日军的气焰。同时我们还运用交通沟、地下坑道，挖向敌人据点，逼近敌人据点，由民兵日夜监察敌人，挖断敌人的电话线，常使多个据点都陷入孤立，使其与城市联络隔断，各个据点都无法联系。日军感到本地伪军不可靠并从其它县调来伪军驻守据点，我们专门打击外来伪军，将所有外援伪军各个歼灭，因此外地伪军都不敢增援淮阴，如灌云县的伪军一个营，全部被歼。

另一方面我则集中力量向敌占区前进，也是挖沟向前挺进、蚕食，向敌方向挖深度横沟，以求巩固新沟道逐步深入。由于我们遍地皆沟，敌炮兵运动十分困难，每次“扫荡”半天只能前进十余里。而我们则利用交通沟、村庄、树林等有利地形，灵活跳动，我们的神枪手专门射杀日军，使日军终日龟缩在碉堡内，不敢轻易外出。因此至 1943 年以后，日军不得不被迫撤退，仅留伪军驻守据点，我则发动向伪据点进攻，伪军成营成团被歼或被逼投降，根据地内之敌伪据点碉堡尽被摧毁。至 1943 年年底日军之治安肃正计划全部粉碎。这一切都是由于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加以县委书记又是一位勇敢坚韧的人，我大量吸收在我过去独立坚持时能打的干部来领导部队与坚持地方，我们以集体的智慧展开了巧妙的敌伪军工作与对敌斗争的策略，达到掌握据点、孤立日军、离间顽方的目的。在两年的残酷的拉锯式的斗争中，我们的地区逐渐扩大，不但收复了过去为顽军所占的失地，且收复了邻县的失地及淮海以外的友邻地区的失地，一是邻县丢失的吴集区为我们开辟恢复，二是收复邻省安徽丢失的蒋集区，开辟了城北区，协助盐阜区开辟夹滩区，地区扩大了两倍。我们非但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与治安肃正，同时也摧毁了国民党的顽政权，在我们的原有根据地的边区及新收复的四个区都是国民党的顽政权，是顽伪合流的统治，所剩下的仅是县城及少数据点为日军所占，直至日军投降也未出城“扫荡”过。但是斗争是极其残酷的，也是惨烈的，如刘老庄战斗，我军八十二烈士与千余日军血战尽日，全部壮烈牺牲，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恶战。这二年时间坚持斗争中也曾受到上级表扬，这些功劳应归功于党，归功于英勇善战的部队及干部。在数千日军进行庄庄不漏的梳篦“扫荡”时，我们穿插于密星似的据点之间，从未离开县境一分钟，取得了多次反“扫荡”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军推行治安肃正的计划。同时我们这一支英勇善战的独立团迅速上升为主力。

1944 年 8 月，我被调往淮南军部华中局的党校整风，我来淮阴以及离开淮阴去整风，前后相距正好是两年时间，这时我已是 32 岁了。我在赴淮南整风的途中，适遇金明同志刚从华中局开会回淮海，途遇于洪泽湖滨的蒋坝镇，他说他在华中局开会，了解到国际形势的发展异常迅速，远东的形势也可能发展很快，因此，这次华中局的会议决定各个地区要培植代替工作的人。他还说在这几年斗争中，党对我已经了解了，因此他在军部打电报回去调我来军部学习，以准备接替他们的工作。金明同志与我短短谈话真是语短意长，非但给我以鼓舞，并使我深受感动。

在淮南新铺华中党校的整风学习，是自 1944 年 9 月开始至 1945 年 3 月间，我对我的历史问题，基本上都作了说明，也基本上都谈清楚了。当时我在党校整风时，对我是有较好的气氛，因为华中局某同志在党校做了关于华中各个根据地的发展与党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了苏北根据地党的建立是以吴觉等同志为首而创建发展起来的，同时华中局敌工部长刘

贯一同志做了关于华中对敌斗争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到我在淮阴对敌斗争的范例，并予以表扬。由于这些报告，校中的同志们对我的印象也就比较好了。正由于这些情况，所以小组首先提出改变我的家庭成份为自由职业者，否定了我一贯填写的地主家庭。其次小组根据我被捕的情况，认为虽然出反省院是履行手续，写悔过书，但这尚不是叛变自首行为，并且认为我每次出狱后都积极奋斗，积极找党，因此提出我的党籍是可以恢复的。但后来经校方审查结论大意是：吴觉同志于被捕中在文字上表现屈服，但出狱后尚积极革命，并对建立根据地是有一定功劳的，因此其重新入党时间可改为自 1938 年春开始找党之时算起，至于以前党龄的恢复，暂不做结论。这个结论是写在我当时的自传的最后一部分，很不幸，我这本自传在 1949 年中的敌后坚持历次轻装转移中，不知遗失何处。

1945 年 2 月初，我 33 岁。党校整风将近结束，金明同志打电报要我速回淮海，这时适逢改组淮海地委，金明同志奉调过江开辟江南苏浙新区，李一氓同志亦调回苏北区党委，仅留下分区司令员刘震同志为首组织新地委。我返回淮海之第 3 日，金明同志就率干部南下了，去江南开辟苏浙地区。这是中央的决定，粟裕率部队渡江南下，任苏浙地区党委书记，金明任副书记。淮海地委进行改组，组织新地委，刘震任地委书记，万众一任副书记，我是新地委委员，党外任淮海区行政公署专员，李干成任组织部长，章维仁任宣传部长，李广仁任民运部长，都为地委委员，另外张克辛、邵幼和都是新地委委员。是年春，淮海区遭十年所未有的大旱，接踵而来的是洪水泛滥，广大地区都成泽国。在金明、李一氓二同志在淮海区数年中，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今则旱灾水患相偕而来。就在水灾形成以后，日军投降，我送出一个主力旅由刘震率部离开淮海向南京一带活动，在此之前我区已出一个旅去安徽巢湖一带增援新四军第七师。这时淮海地委又进行一次小调整，万众一同志任地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党外任行政专员兼分区副政委。

这时日军虽然宣告投降，但淮阴城仍为伪军潘干臣的一个军及国民党的一个专员、四个县长坚守不投降。此时我奉命率淮海武装部队围困淮阴城，我部当即将敌外围据点全部攻克，敌人则退守城内坚守，城外街道、河川全部为我攻占，我部则挖坑道埋炸药，拟攻城时炸毁城墙，积极作攻城准备。不久刘震率一个旅回淮阴参加攻城，在新四军第三师统一指挥下，于 9 月 6 日下午 2 时发动猛攻。敌顽强抵抗，我军由城东南角爆破处攀云梯攻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我亦随部队攀云梯入城。至下午 3 时将数万之敌全部歼灭就俘，而顽军长潘干臣被当场击毙，我军随即封锁全城捉捕剩余汉奸特务。经过一星期搜捕无一漏网，全为我捕获，俘虏 9000 多人。破城后由我负责建立市政权及全部接管工作。

苏皖区政府成立，我是苏皖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后决定将清江市（淮阴城）划归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因此我仍回第六地委（原淮海地委），这时已是 1946 年 1、2 月间了，我 34 岁。淮海区由于几年来抗日战争中财力、人力负担过重，底子已枯，加以去年的旱灾水患，因此，灾情是异常严重，这时我是专力于救灾工作。由于华中分局及边区政府的领导支持，采取了各种紧急的有效措施，终于制止了灾情的发展，稳定了灾情。当时救灾工作获得了分局的明令表扬。同年 4、5 月间，我奉命与当时边区政府副主席韦悫同志代表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去北京三人小组执行部，与美国代表商洽救济问题。由北京回来后，华中分局又决定我为国民党所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要我准备随代表团去南京。当时我确是不乐意接受这个任务的，经过北京之行后，我发现我是不习惯于白区的生活与工作了。我在北京虽时间很短，却是时时感受着恐惧与局促。北京虽然是我初到的地方，也无意去游览名胜古迹。我回忆往昔的白区工作，是手无寸铁，任人摆布的，没有拿起武器来得痛快。这种无名的恐惧驱使我争取早日离开了北京，而回来后又要充当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因此更加烦躁。但这种情绪又不便表露，同时也认为这个任务也许是仅仅参加一个会议而已，如果

决定从此就留在白区工作，那我是坚决不干的。因此也就不提意见准备出发。此行后虽由于内战而作罢，但也说明了我个人的心绪。

这年 7 月，六分区（原淮海区）又是一场洪水，遍地泽国。与洪水相继而来者，是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在占领了皖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后，其进攻的矛头正指向两淮。国民党是以其王牌七十四师（军）张灵甫的部队为骨干的，从苏皖边区的腰部，直接插进边区的心脏两淮。这是我们华中分局的所在地，当时是由粟裕领导指挥几个纵队与敌战于南线的苏中，北线则由陈毅指挥部队与敌主力战于淮海泗州及洪泽湖之滨。华中分局根据战场的需要组织两个后勤司令部，南线后勤司令部由陈丕显任司令，陈当时任苏中区党委书记，北线则任命我为后勤司令，指挥调动皖北、淮海、盐阜三个地区的后勤工作。我是跟随陈毅行动，参与战役布署会议，指挥战前、战时及战后的战场后勤工作。我参加的洪泽湖阻击战、两淮保卫战、涟水保卫战都是直接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师交锋，都是恶战，给这个王牌军大量杀伤，大挫其锐气。我也参加了宿北大战，彻底干净地消灭了国民党整编第 69 师，击毙其师长。

我们的后勤任务是逐渐加重加剧，频繁而艰巨的，在 10 月份以前我们仅负担陈毅指挥的几个纵队，而且可以调动皖北、盐阜、淮海三个区的民力、财力。但是至同年 10 月份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南线与北线部队会师，即两个拳头合为一个打击敌人，作战部队增加一倍以上，同时敌在攻占两淮以后也会合为一，向我涟水及淮海地区进攻。我方的后勤任务则因皖北、盐阜两个地区沦为敌后，所有人力、物力不能为我所用，仅有淮海一个地区的人力、物力可以调动征用，非但如此，更为艰巨的则是自两淮为敌所占后，华中分局决定北撤山东，所有华中各个地区及华中分局及部队后方机关，以及各地撤出人员及应撤退人员与物资都需撤往山东。这个任务是极其繁重而艰巨的，加以预见我淮海区势必要沦为敌后，又要准备坚持工作。

当时的六分区是灾荒之后接着洪水，而洪水仍未泄尽。我们打的是运动战，又无固定战场，这个任务的艰辛，当时双肩之重，实非笔墨所能描述的。但我们并未被困难吓倒，我是大胆而忠诚于这个任务的，忘我的投入，特别是保卫苏北的最后阶段，一方面要负担几十万（也许是有近 20 万的部队吧）大军的作战，一方面还要负担华中向山东大撤退的后勤。六分区是退向山东的华容道，当时确是阻难重重，紧张的时候是数夜不能眠，但我终于在刘瑞龙同志的领导下完成了战争与转移撤退的后勤任务。在战争中，我是跟随陈、粟首长指挥机关的，高级军事会议及作战布置的会议我都是亲自参加的，但我并没有贻误军机，而是完成了每个战役的后勤任务。在华中向山东大撤退时，除华中最高一级的各个机关外，尚有华中的各个地区的人员物资向山东转移，虽军务倥偬，但也不因此而丢落了物资或丢失一个伤病员，我的后勤工作是受到华中分局表扬的。

我在轰轰烈烈忙着大后勤的时候，思想上已充分准备着未来敌后坚持。我坚持的决心是久向万众一同志表示过，俩人都很愿意再做一次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当然我也了解这次坚持责任重大，与可以估计到的残酷性。国民党占领淮阴城市后，竟然将我在淮阴的住宅拆除的片瓦无存，这种下流无耻的行为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这座城市的住宅，在日军占领的 7 年期间，残暴成性的日军也未拆除，国民党以其执政党而又是胜利之师——当然那时他们自认为是胜利者——既不是为了军事建筑，也非扩建马路，在没有任何藉口的情形下，竟然拆除我的房屋，其恨之深是可以想象的。我的老母、家人，在七年抗战期间都住在敌伪占领区的，而这时我不得不将我 70 高龄的老母先期送去山东，免得日后在敌后坚持中多一个精神负担。此虽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政治上却充分表明了敌我界限。

蒋介石军队占领苏北，华中分局撤退到山东。为了便于敌后坚持，华东局决定以曹荻秋同志为首组成苏北区党委，我参加区党委为委员兼六地委书记、行政专员及分区政委，而六分区在当时来说，在形势上已形成了一个小的战略区。在我转入坚持的时候，华中分局负责同志即交待了我必须要将六分区坚持住，要将苏鲁交通线维持好，这是山东与华中敌后交通联系

的枢纽，是关系到华中的坚持与今后的反攻。谭震林同志又详细谈到今后华中坚持与反攻的发展形势。淮海转入敌手后，华东局、华中分局以及华东军区屡有来电指示，要我们尽一切可能保住这条交通线，不使之为敌封锁。当然这场斗争是残酷的，六分区的蒋顽军是经常保持着 10 万人左右，也经常以 5 个主力师进行“扫荡”，并以空军配合，这种大规模的“扫荡”一直到展开淮海会战，我军反攻华中时才告终。敌人想打通陇海线，割断我华中与山东的交通，常以飞机坦克配合步兵向我“扫荡”，建立据点，以割断我的交通。如不谨慎对待，会压垮我们地区的。况且安徽皖中、皖北地区都被敌占领，那里的领导者未能很好的坚持，全部撤出，以致遭受重大损失，给我们地区造成很坏的影响，而增加了我们敌后坚持的困难。但是根据我们以往在国民党区孤军奋斗的经验，以及 1942 年至 1943 年对日军反“扫荡”与治安肃正的坚持斗争并最终获得胜利，使我相信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是可以坚持的，而终将会取得胜利的。

当时我们地委根据过去斗争的经验，以及敌人可能占领某些战备要点的形势，将六分区分为三个地区，建立三个中心县委，每个县委有一个支队的主力，即一个主力团，将沭阳、东海县列为第一中心县委即是第一支队，淮阴、涟水两县为第二中心县委即第二支队，泗阳、宿迁、宿北、灌云四个县为第三中心县即第三支队，各配电台与地委联系。每县有一独立团，每区有一至两个连的区队，区以下建立若干脱离生产的边防队。地委、分区、专署三位一体，有一个三个团的主力旅及一炮兵营（后扩大为炮兵团），我身兼三职以统一领导，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长李广仁任第一中心县委书记，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李干成任第二中心县委书记，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章维仁任第三中心县委书记，这是为适应敌后坚持的组织机构的布置。另一个措施，鉴于形势之严重，便于领导干部之坚持，决定所有县团以上的领导干部的家属一律撤退去山东，二是民主人士及政治上不够稳定的党员干部撤往山东，三是不能作战而在坚持环境中暂不需要的干部一律撤往山东，并在山东建立驻鲁办事处，以地委委员兼社会部长邵幼和任驻鲁办事处主任，总管撤往山东之人员，并携带电台一部与地委保持经常联系。对于如何应付敌人进攻与敌后之坚持，鉴于安徽省全部地区丧失教训，因其未能预先采取应对措施，加之领导人坚持决心不够，当敌人大举进攻“扫荡”时临机仓惶而采取逃跑主义，致使其解放区全部为敌人所占领，而招致残酷破坏。因此地委指示在敌人进攻前各县区必须将所属境内的反动分子，又是实力派或打手者可能为敌所用之重大嫌疑分子一律予以镇压以绝后患。二是敌人进攻或“扫荡”时，不得擅自撤退其所领导管辖地区，如为敌所迫，万不得已而离境必须于 24 小时以内回转返回境内，继续坚持，勿使群众误解为撤退，造成人心惶惶以致为敌有隙可趁进行顽化。

为了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我曾亲自率部队至陇海线一带与敌纠缠激战，终将敌之据点全部摧毁，恢复了苏鲁交通，曾获得嘉奖表扬。每次接运物资与过往干部以及掩护主力部队之运动，我们常率三至五个团前往接应掩护。因此在两年多的敌后坚持中，保证了交通运输。在这两年中，斗争是残酷的，而灾情仍是连年不断，1947 年又是洪水泛滥，我 35 岁。我的 36 岁也是在灾情“扫荡”交织中度过的。直至 1949 年我离开了淮海时，四年中真是年年水灾，民穷财尽，灾黎遍野。但是，我们硬是渡过了灾荒，完成了胜利的坚持。在胜利到来前，为了配合徐州会战，我们率部攻克了连云港，俘敌 3000 余，收复了运河线的两淮、宝应、高邮等城市，我部伤亡亦有 1000 多人。在六分区转入敌后坚持至淮海战役时期，在武装斗争方面，不但完成了坚持，而且在坚持斗争中还很快地培养大批的主力部队，在这一阶段中先后提升为主力者是两个建制旅、两个建制团及一个炮兵营，淮海战役中的十二个纵队内，就有两个师以上的部队是由淮海区部队提升的，后来是一个师去朝鲜参战，一个师改为华东海军部队了。当我离开淮海前，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也时常对我说：淮海区坚持得好，战斗积极，出兵多，培养主力快。他也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是战斗打得硬，打法野蛮，伤亡似

嫌过重。当然我们的成绩是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是部队同志们的努力，全地区党、干部、群众英勇斗争的果实，应归功于党。但当时地委同志都分散下去，我以地委书记、专员、政委三个工作身份来看，对坚持救灾、建军工作等，在政治上不会起坏的作用，对工作上多少是起了些保证作用的。

1949 年春，我还兼两淮市（淮阴、淮安两城）军管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市长等职，不久即决定我随大军南下过江做接管工作。1949 年我 37 岁，即率淮海与山东南下的干部及一个旅的部队随大军过江，我任常州市军管会主任及常州地委书记，负责接管常州戚墅堰铁路龙头厂及苏南工业供电的唯一电厂，并接管无锡、武进、江阴、宜兴、溧阳、金坛等六个县，接管初期由于在粟裕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未犯过什么错误与偏向（渡江后初期，三野司令部驻常州市）。当时华东局对接管铁路龙头厂最为重视，因其关系到华东铁路交通的恢复问题，因我们先期派便衣进入，故未遭破坏。这个厂在当时的情况是异常复杂的，数千职工中，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占了相当数量。接管后国民党即派飞机前来轰炸，投弹数十枚，由于事前防范得好，损失不大，且能继续工作。在接管初期，辖区内所发生特务煽动的暴动，都予以及时平息，并坚决予以镇压。常州市内国民党安置隐藏的特务，曾经常不断地搞破坏，暗杀我干部，但均在短期内予以一一破案，将这些特务归案法办。至 1950 年初春，华中局决定我回苏北任苏北行政公署主任，我个人有不愿回苏北的思想，陈丕显同志认为苏北班子似缺少了解苏北情况的干部，他说如果我不愿回苏北，他就向华东局建议惠裕宇同志回苏北。后来我决心不回苏北，所以就由惠浴宇同志回苏北。

（编者注：吴觉同志从 1955 年肃反运动开始长期蒙受冤屈的过程中，留下的各种申述材料达数百万字，本篇自述以其“文革”时期的“自述”为蓝本，由编者及其家属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和修改而成。）

讣告

原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工学院 1988 年 5 月已更名为东南大学——编者注党委书记吴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 1984 年 4 月 30 日在南京逝世，终年 72 岁。

吴觉同志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青年时代，吴觉同志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中，吴觉同志历任淮阴义勇军总指挥，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和教导第五旅团长，淮海区行政公署民政处处长，淮阴县县长兼县团团长，敌工部长，淮海地区行政专员、地委委员等职，对开辟和发展淮海地区抗日根据地有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吴觉同志历任淮海地委书记兼专员、军分区政委，苏皖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战区北线后勤司令部司令，苏北区党委委员，两淮市委书记、市长、军管会主任等职，为巩固和发展解放区、支援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建国初期，吴觉同志任常州地委书记、军分区委员、军管会主任，苏南高等法院院长，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维护社会主义秩序，胜利进行民主改革，作出了巨大努力，后调任国务院治淮委员会秘

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和党委副书记，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等职，为治理淮河、黄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十年内乱中，吴觉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 1978 年恢复了名誉。1979 年任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对南京工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有很多建树。

在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岁月里，吴觉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不畏艰难，经受了艰苦环境和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他坚持原则，爱憎分明，十分痛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虽蒙受过不少冤屈，但始终对党忠心耿耿、襟怀坦白，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毫不动摇，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思想开朗，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克己奉公，善于团结同志，工作有胆有略，深受干部和群众的好评。他在长期患病期间，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即使在住院治疗时，还念念不忘党的事业，经常关心“四化”建设和青年一代的成长，对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新成绩感到由衷地高兴，对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奋斗目标充满信心。

吴觉同志生病住院期间，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南京工学院党委的领导同志以及其他有关同志和生前好友，曾多次前往看望。逝世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又前往医院向遗体告别，并慰问了家属。

（刊于 1984 年 5 月 15 日《新华日报》）

治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任命录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五十六次政务会议通过

主任曾山
副主任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
委员（依姓氏笔划为序）
吴芝圃吴觉汪胡桢林一山孙竹庭陆学斌
惠浴宇曾山曾希圣黄岩万金培刘宠光
钱正英

吴觉同志在建国初期任国务院治淮委员会委员、治淮委员会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和党委副书记，是新中国治淮的先驱。他先后辅助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山、谭震林同志领导治淮，主持全面日常工作，为治理淮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觉同志是《淮河志》的名誉顾问。今年 3 月份，《淮河志》编纂办公室同志曾到医院，请他为《淮河志通讯》题书并讲述治淮斗争史。当时他虽然身体已很不好，但仍满腔热情地承诺了我们的请求，并十分关心地询问了当前的治淮情况，还激动而费劲地讲了一些当年治淮斗争的片断，而且答应在病好些以后再给我们详细讲述治淮斗争史。不料他于 4 月 30 日与

我们永别，与世长辞了。他在逝世前，曾扶病用钢笔草写的《淮河志通讯》五个字，为我们留下了对治淮事业的深厚情意。
现在把吴觉同志的题书在本期刊出，以作为治淮战线的同志们对他的沉痛悼念和永远纪念。

（原载《淮河志通讯》1984 年第 1 期）
后记

后记

吴觉同志是淮安党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生于淮安长于淮安，并在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们作为地方党史工作者，理应对吴觉同志的奋斗史、革命史予以收集、整理和研究，既是纪念他今年逝世 30 周年，也是对革命前辈的一种纪念和告慰。
为了编辑好《吴觉纪念文集》，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吴觉同志革命的一生，本书的编写人员多次与吴觉的夫人王凤山和子女进行面谈或邮件往来，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近百万字的吴觉手稿、信件等大量第一手材料，很多资料因为纸张和年代的原因，字迹已难以辨认，大家均不辞辛劳，不厌其烦反复确认，并佐以其他史料，努力还其本来面目。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本书编辑为传略、文存、回忆、研究、年表和附录六个部分。特别是附录部分所收录的“我的自述”，是以吴觉同志“文革”期间的“自述”为蓝本，结合他留下的厚厚几大本手写笔记整编而成，其中对抗战时期淮海地区地方武装的成立、发展，以及党组织如何在淮海恢复和开展工作的情况记述甚详，这对我们深入研究淮安地方党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市委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市委常委、秘书长肖本明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编写工作进展情况，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给予了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省农垦机关印刷厂有限公司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通力合作。值此书稿付梓之际，谨向所有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努力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错讹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4 年 4 月